

中国现代史
(下册)

第四编

抗日战争 国民党政权走向腐朽和人民力量的壮大（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第一章

全国抗战的开始 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三种政权并存局面的出现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

一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的准备

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国际形势下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九三七年发生了新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首先从美国开始，迅速席卷了英法等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也正酝酿着危机。经济危机大大激化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最富于侵略性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为了摆脱危机，对内加紧镇压人民，对外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法西斯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的开端。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在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权，十月，宣布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加紧扩充军备。一九三五年三月，又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中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并将常备军扩充到五十万人。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发动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次年六月宣布将埃塞俄比亚并入意大利领土。一九三六年十月，德意轴心成立。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六年四月，日本政府将驻华北日军的兵力增至五千七百余人。规定其任务为“确保从渤海湾的海港到北平的交通”。指示该军司令官“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的治安，需要时可对该地区行使兵力”。五月，在改订的《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规定对中国的作战要点是：“以占领华北要地及上海附近，保护帝国的权利和在华日人为初期目的。”八月，广田内阁按照军部事先制定的方案，决定了全面侵略中国和称霸西太平洋的《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并要求以此国策为轴心，扩充军备，调整外交政策，革新行政机构，确立财政经济政策，指导和统一国内舆论。

按照这个国策，日本帝国主义大力扩充军备。一九三七年度日本政府预算总额为三十多亿日元，其中直接军费支出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中日开战前，陆军已发展到十七个常备师团，共约三十八万人，此外还有预备役和后备役战斗兵一百六十多万人。飞机共有二千七百架。海军共有舰艇约一百九十余万吨。同时，还大规模地扩充军事工业，发展航空和海运事业，振兴贸易，

《国策基准》（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一三四页。

统制电力等。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侵华政策，重点是霸占华北五省，“把该地区作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使之“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日本政府加强反动统治，残酷迫害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进步人士，镇压工农运动，推行一系列使国民教育军事化的措施。

日本帝国主义的备战政策，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财政危机和人民生活恶化的恶化，激起日本人民的反抗。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全国工人的经济斗争空前增多，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从重工业、军事工业、交通运输业扩展到整个产业部门；农民为争取保障耕种权而进行积极的活动；文化界也展开了批判法西斯和战争的活动。在一九三七年四月的大选中，反政府方面取得胜利，表现了人民对战争政策的不满。

日本国内形势的恶化和西安事变以后中国抗日运动的高潮，冲击着日本的侵华政策。日本政府企图用扩大战争的手段来摆脱困境。一个秘密文件写道：“帝国内部现正痛切体验……生产力之不足，生产设备之不足，原料之不足及蓄积资本之不足。凡此均需开始新的战争，俾有所补充；而国内不稳势力之高涨，罢工之狂澜，亦需发动内外举国之战争，以期平靖”。日本帝国主义迅速走上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罪恶道路。

二 芦沟桥事变和平津失陷

一九三六年九月，日军侵占丰台，作为准备切断中国华北与南方联系的重要军事据点。日方要求中国撤退芦沟桥至长辛店的驻军，但被中国拒绝。自一九三七年四月起，日军经常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特别是六月以后，驻丰台日军几乎每天夜晚都在进行这种挑衅性的活动。日军在准备着随时挑起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时，北平外围的形势是：自丰台至山海关铁路沿线，有日本在华北的驻军；北平东面是日本卵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面和西北面，有日本豢养的察北伪蒙军；因此，位于北平西南十多公里、处于平汉线上的宛平城和芦沟桥，就成了北平通往南方的唯一要道。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军又举行“演习”。将结束时，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内发枪数响，致使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正交涉间，日军竟向宛平城射击，继而炮轰芦沟桥。驻守在芦沟桥附近的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在民族大敌的武力进攻面前奋起抵抗。这就是七七芦沟桥事变。据当时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的回忆录透露，早在六月份，东京就已知道，七月“七日深夜会在华北重演柳条沟事件”。这就清楚地说明，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

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七月八日，日军继续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当晚双方协议，中国

《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二 一页。
转引自《芦沟桥事变》，第二一页。

今井武夫：《不可思议的预告》，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二三二页。

军队撤向芦沟桥以西，宛平由保安队接防，日军撤至丰台。但日军在十日又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同时提出所谓“解决事变”的无理要求：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处分负责官员，保证防止再发生同类事件；撤退芦沟桥附近中国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彻底取缔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十一日，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在该条件上签字。但是日方却继续向北平周围调集兵力，不断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虽然声明采取“不扩大方针”，实际上却加紧进行侵华战争。十一日，近卫内阁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同时将关东军的两个旅团，驻朝鲜的一个师团，国内的三个师团派往华北，并且制定出对华作战计划。接着又将十八个中队飞机编成临时航空兵团，由国内派到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十七日决定在预算中追加临时军费九千六百万日元。

七月十二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命令部队“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完成在通州、顺义和天津的兵力部署。接着日军向冀察当局提出要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责任者，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等无理要求；并限定十九日以前承认这些要求。十八日，宋哲元访问日军司令官，表示道歉。十九日，张自忠等在日方所提的条件上签字。但是这时日本援军已到达北平、天津一带，并完成了战斗部署。于是日军发动了全面进攻。

二十日前后，日军连续在北平四郊发动攻击。二十六日攻占廊坊，并企图派兵进入北平城，与中国守军发生战斗。当天日军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芦沟桥和八宝山附近的三十七师，于二十七日正午前撤至长辛店；北平城内和西苑的三十七师于二十八日前撤至永定河右岸，以后继续移驻保定地区；如不照办，日方“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未等中国方面答复，日军就于二十七日向南苑、西苑及永定河一线攻击，并对平津大举进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二十八日晚，宋哲元等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撤往保定。二十九日，北平失陷。三十日，天津在日军进攻下弃守。

三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面抗战 国民党政府对事变的动摇态度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汉奸卖国贼分子。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七月九日，红军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日。

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长辛店铁路工人，将大批铁轨、枕木、麻袋送往宛平前线构筑防御工事。战地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民工，为军队送饭、送情报、抬伤兵、运送弹药物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等群众团体，派出代表到前线慰劳，并组织宣传队、募捐团、看护队、战地服务团等，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武汉、南京、太原等地的工人和各界爱国群众，相继组织抗敌后援会。全国各界各群众团体，纷纷电慰前线守军，推派代表到前线慰劳。各地报刊也大量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

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动摇不定。它曾向华北调动军队，并向日本

提出抗议；但又表示愿以和平方法谋得事变的解决，愿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条约接受斡旋。指示冀察当局与日本谈判，企图实现局部的妥协。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准备抗战，并提出解决芦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但同时他又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什么“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和平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当日军一再破坏协议，不断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于十九日向日本使馆提出备忘录，仍然希望日方和平解决这次事变。二十一、二十五和二十六日，蒋介石连续会见英美德法大使，要求各国进行调解。在日本军队已经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后，外交部发言人还在二十七日发表谈话，说什么日方“与我方地方当局议定解决办法，我中央得报后，察其内容，与我既定方针，尚无重大出入，为贯彻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对。我方极度容忍，维护和平之苦衷，应为中外人士所共见”。就在国民党政府的“极度容忍”之下，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北平和天津。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动摇态度。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方针是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为了实行这一方针，主张采取全国军队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改革政治机构、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等一整套办法，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实行这一方针，采取这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跟着这一方针来的是军队不动员或向后撤、给人民以压迫、照旧压榨人民、坚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套办法，压迫人民起来抗战。实行这种方针，采取这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这后一个方针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所实际执行的方针。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这两种方针，两套办法，表明了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抗日战争的始终。

四 八一三事变 中国军民奋起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华北的同时，就策划进攻上海。八月九日，日军一上尉率士兵，乘汽车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将日军官兵击毙。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与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日本政府在谈判的同时，加紧制订作战方案，向上海派遣军队，将三十艘军舰集中到吴淞一带。

十三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淞沪抗战开始。

十七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公开“放弃”所谓“不扩大方针”。日军除在华北各地进一步扩大侵略和在上海继续进攻外，还对南京、杭州、徐州、安庆、广州、武汉、厦门等地进行空袭。日海军于二十五日宣布封锁中国海岸。

从此，全中国进入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

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认为，由于日本已将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破坏无余，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所负之义务也。”

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上海属第三战区。同时制定了作战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

淞沪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曾一度进行反攻。十五日，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二十三日，日军在吴淞和川沙登陆，向罗店、宝山等地进攻。宝山城守军姚子青营五百余人，奋勇作战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九月中旬，日本援军陆续到达，兵力增至十万人。双方在北站、杨行、浏河一线，进行激烈的争夺战。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队调整战场部署，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将部队分为右翼军、中央军、左翼军三路。每路各率两个集团军。三十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军队退守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一带。这时日军总兵力已增至二十万人以上。十月，日本军方决定将主要作战方向移至上海，并调用华北兵力参战。日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二十五日大场失陷，中国军队撤到苏州河南岸。八十八师副团长谢晋元等率八百人扼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敌军的猛烈攻击下，孤军苦战四昼夜后，才奉命撤离。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人民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各界群众都组织了救亡协会。文艺界救亡协会、学生界救亡协会、上海市纱厂工友救亡协会等团体，都开展了宣传、募捐、演出、慰劳等活动。全国各界民众积极支援上海抗战。湖南学生战地服务团和福建省民众组织的慰劳团，都到前线进行慰劳。海外华侨踊跃捐输，支援祖国抗战，到十月十六日止，捐款已达三百三十余万元。

五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立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动员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作了极大的努力。

从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到九月下旬，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六次正式谈判。二月中旬到七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张冲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了四次谈判。共产党方面继续坚持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所提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国民党方面则顽固地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协议。

为了早日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为公布国

共合作宣言》，并于七月十五日在庐山交给蒋介石，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宣言》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实现这三项总的目标，促成国共合作的成立，又重申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

八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留四项保证，共产党拒绝这种修改。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共产党反对由国民党委派政治部主任，坚持设正副总指挥。正在这时发生了八一三事变，蒋介石被迫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了改编命令。

九月中下旬，国共两党举行第六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表等问题。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显著的特点：第一，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这就使得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不能得逞，就使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第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当权派蒋介石集团，因而其内部存在着极其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尖锐的斗争。第三，由于国民党的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一个组织形式和共同商定的政治纲领。

自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主张之后，红军即着手进行改编的准备工作。七月二十二日，红军召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他强调红军改编后的中心问题是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因为红军不但是民族革命的军队，而且将来还要担负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队，才能担负起这样伟大光荣的任务。八月一日，总政治部作出关于部队新阶段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红军改编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积蓄与加强抗战力量；保证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

依照同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协议，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十一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编为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治委员（初称政

训处主任，十月改称，下同）罗荣桓；以红军第二方面军的第二、第六军团为主，编为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以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为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张浩（一九三八年一月由邓小平接任）。全军共三万二千人。八路军属于第二战区序列。

六 中间集团的抗战主张

抗日战争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属于中间集团。他们的抗战主张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又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有区别。

抗战开始后，中间集团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他们要求实行“全民抗战”，希望国民党政府“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共赴此神圣之民族战争，以争取最后胜利”。他们主张动员群众，发展民众运动，说“民众是抗战的主体，民众是一切抗战力量的根本源泉”。“政府以民众为基础”，并认为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为了动员民众，支持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他们认为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提出：“要扫荡一切的懒惰侥幸的心理，肃清一切贪污无用的分子，彻底改造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的机能”。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允许民众有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以及武装保护国家的自由。政府应召集临时的民意机关。在筹集抗战经费方面，他们认为应该实行“有钱出钱”这个普遍公认的原则。

中间集团的抗战主张，表现了他们的抗战积极性。但是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依赖国民党政府抗战。当国民党政府被迫“应战”，对民主运动的压制有所放松的时候，中间集团无视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的事实，声称：“国民党已经居于唯一领导抗日的地位”。只有“统一一切思想，意志，政见，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智力于中央，且掌握于最高领袖之下，……方能胜敌图功”。“如有别为自己团体打算逞其私图者，即是要负破坏统一分裂抗日战线和危害国家的责任”。为了维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他们提出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由“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来领导对日抗战。他们主张“加强国家战时的军治化”。甚至有人认为应“回复完全训政时期”。一九三七年十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自动解散，以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一九三八年四月，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勱和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致书蒋介石、汪精卫，或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以此换得公开合法的地位。因从事抗日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的章乃器，刚一出狱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发表了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文汇报》，一九三九年五月出版。

施复亮：《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文化战线》创刊号，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大公报》社论《今年的国庆》，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陈铭枢：《抗战中之党派问题》，《抗战文选》第二辑，一九三八年五月出版。

《新民报》社评《今后的党派问题》，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大公报》记者《国家战时军治化》，汉口《大公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

陈铭枢：《抗战中之党派问题》，《抗战文选》第二辑，一九三八年五月出版。

拥护蒋介石的文章《少号召多建议》，反对所谓“标新立异”，要人们“信托”政府，“信任舵师”，一切听从国民党蒋介石。这些党派或个人，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在蒋介石抗战言词的迷惑下，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产生了很大的幻想。

领导权的问题，是抗日战争胜败的关键问题。中间集团把整个中国的前途，放在蒋介石集团的身上。其结果只能是断送抗战的胜利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他们主张动员民众，但是并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真正依靠群众，而是要求民众接受“政府的领导”，幻想国民党政府“切实保护并促进救国运动”。他们有人提出武装民众的主张，但是要“统一军队编制及指挥”，要“扫除地方色彩”。他们主张有钱出钱，但是没有提出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有力的政策。这一切都是中间集团的软弱性在抗战初期的具体表现。

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翼集团仍然存在着差别。后来，随着国民党对日抗战的日趋消极，对内政策的愈加反动，他们同顽固势力就逐渐疏远，同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日益接近。

七 苏联和世界人民及英美对中国抗战的不同态度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中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便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号召他们用一切方法组织对中国人民的国际援助。

苏联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中国抗战以很大的支援。苏联的舆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两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一九三八年，苏联两次贷款给国民党政府，总计一亿美元。次年，又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同时，苏联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和志愿飞行员，帮助中国打击日本侵略者。一百多位志愿飞行员为中国的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

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从政治上精神上声援中国的抗战。在各国共产党领导、号召或影响下，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大会、示威游行，声援中国，并开展援华的宣传捐献活动，阻止向日本运送军用物资。还有一些志愿人员直接到中国参加抗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华。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因医治伤员中毒，在河北完县不幸逝世。印度的柯棣华大夫于一九三八年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他在延安和华北解放区工作五年之久。一九四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事国际医疗援助运动，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她赴八路军山西战场采访，后又随新四军转战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著名通讯。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严重地损害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但是他们继续高唱“中立”和“不干涉”，对中国抗战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打一下，拖住日

本，借以削弱其争霸对手，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和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统治，因此，对中国抗战表示某种同情。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同日本做生意赚钱，不愿公开得罪日本，并且害怕中国革命会在抗战中发展起来，想借日本之手削弱中国的革命力量，因此，又极力与日本寻求妥协，阴谋用牺牲中国的办法缓和同日本的矛盾，并把日本帝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英美两面政策的目的是，是要利用日本的侵华战争寻求他们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芦沟桥事变后，七月十一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报告说：“日本及其他各国政府……有在华北数处驻屯军队之权力”。实际上支持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七月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分别照会中日驻美大使，袒护日本侵略者。他一面佯装不清楚中日冲突的原因，一面要被侵略的中国和侵略者日本一样承担对“和平与世界进步之重大打击”的责任。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海岸时，英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美国也在实质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海岸的封锁。

美英帝国主义还鼓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压制中国抗战，促使蒋介石对日本妥协。芦沟桥事变后，美国国务卿声明：“美国始终不渝，赞成和平解决”；英国政府也表示：“将利用各种机会，竭其能力，以作趋向和平解决之贡献”。八月十日，美国向日本提出了居间斡旋的建议。

大量地向日本输出战争物资，是美英对日本侵略活动的一种支持。一九三七年，在日本全部进口的军事原料和物资中，美国的钢占百分之九十二，汽车及零件占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及石油产品占百分之六十，生铁占百分之四十一，废钢铁占百分之五十九，机器及机床占百分之四十八。一九三八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消耗的军用物资有百分之九十二是从美国进口的。

美英帝国主义对日本侵华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纵容和支持日本侵略，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节 日军全面进攻和国民党战场的败退 敌占区伪政权的建立

一 华北日军的分路进攻 中国地方部队开赴抗日战场

平津失陷后，华北战场的日军分别向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三方面发动进攻。晋察绥属国民党战场第二战区，河北豫北属第一战区。

平绥路方面。八月九日，日军向南口进攻，中国守军曾进行激烈抵抗。十三日南口失陷。二十七日，日军占领张家口。九月上旬，日军分路向晋北攻击，企图占领山西以控制华北。驻守晋北重镇大同的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率部不战而逃，十二日大同失陷。下旬，日军在平型关受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增兵后于月底突破茹越口，占领平型关。

平汉路方面。九月中旬，刚刚编成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沿平汉路南侵，二十四日占领保定。十月十日占领石家庄。中旬又相继攻占邢台、邯郸。十一月攻陷安阳、大名等地。

津浦路方面。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于九月下旬攻占沧县。十月初攻占德县。十日，山东国民党军韩复榘部退守黄河南岸。

日军占领平型关后，发动了以攻占太原为目标的作战。十月上旬，连陷代县、崞县、原平。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危局，调集了八个军又三个师的兵力，编为左中右三路兵团，在忻口以北的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布防，阻击敌军，进行忻口战役。从十月十三日开始，日军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等约五六万人，在飞机战车和重炮的掩护下，对忻口发动猛攻。守军奋勇抵抗。经过半个月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日军被歼两万人，中国军队伤亡十万人以上，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和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等于是役阵亡。战争处于相持状态。

为策应晋北日军迅速夺取太原，十月中旬，河北的日军一个师团沿正太路西攻，在娘子关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下旬，敌增派两个师团的主力参战。二十六日娘子关失陷。月底，平定、阳泉、寿阳相继陷落，日军进迫榆次，太原告急。

忻口的国民党军队苦战兼旬，精疲力尽。加以晋东战况不利，遂于十一月一日南撤。原拟退至太原以北阵地，配合保卫太原。但在日军追击下，一片混乱，未能进入阵地，即渡汾河西逃。九日，太原失陷。随后日军沿同蒲线进至太谷、平遥、汾阳一线。

日军向大同外围攻击时，即集中一部兵力由张北向集宁进攻，九月下旬连续攻占集宁、凉城、陶林。接着继续西进，十月十二日陷归绥，十六日陷包头。

十二月下旬，津浦路北段日军与南段进攻的日军呼应，南渡黄河，韩复榘弃济南逃走，二十七日济南陷落。月底，日军进占泰安。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日军占领青岛。

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山西、广西、四川、云南、宁夏、青海等省的军阀，仍然占据着各自的地盘，并拥有数量很大的军队。抗战开始后，一些地方势力在人民群众抗日要求的推动下，同时也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蒋介石集团则想利用这个机会，削弱地方势力，夺取他们的地盘。于是就利用团结抗战的名义，将他们的军队调往前线。

一九三七年八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各省军政长官出席。蒋

要求地方派兵参加抗战。会后，除原已在前线者以外，其它地方部队陆续开赴前线。

山西的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在山西、绥远的部队抗战。晋绥军编为第六、七两个集团军。

桂系的白崇禧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路南段的作战。桂军参战的有第十一、十六、二十一集团军。

九月初，川军邓锡侯部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川北出发经陕西至山西参加战斗。刘湘部第二十三集团军，杨森部第二十七集团军，也出川参战。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随后刘湘病重，蒋介石乘机撤去他的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刘不久去世，蒋又撤销第七战区，并派亲信到四川，加速四川的“中央化”。从此四川被蒋介石直接控制。

龙云所部滇军，先后参战的有六十军和五十八军。宁夏、青海的地方部队被编入第八战区。

上述情况的出现，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部分。这是民族大团结的一种表现，是有利于抗日的。但是蒋介石却乘机消灭异己抬高自己的地位。

二 战区工业的内迁

中国的工业，集中在上海等沿海沿江城市。抗战爆发后，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和使企业免遭日本的掠夺，纷纷向国民党政府申请将工厂迁往内地。淞沪抗战前夕，上海机器同业公会、大鑫钢铁厂、中国炼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等，要求资源委员会拨给奖励金和低息贷款，将工厂迁往内地继续生产。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战时的军事和民用需求，除将其所属的一些厂矿内迁外，对自愿迁移的民族工业，给予贷款和运输的便利，同时还强制一批他们所需要的工厂内迁。于是，在抗战初期有大批的战区工业迁往内地。

迁往内地的工业，除资源委员会经营的厂矿外，以上海各业工厂最多，此外还有山西、河南、山东和天津等地的一些工厂。上海的工厂最初迁往武汉，并有一部分在那里复工生产。武汉危急时，又和当地的工厂一起再次迁移。由于国民党战场的迅速败退，原计划拆迁的广州和南京的一些工厂，未及迁出。按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统计，到一九四一年，陆续内迁的厂矿共四百四十八家，机器材料七万零九百吨，技工一万二千余人。该年底，已大部复工。内迁工业按行业统计：机械工业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四，纺织业占百分之二一点六五，化学工业占百分之一二点五，教育用品业占百分之八点二六，电器工业占百分之六点四七，饮食工业占百分之四点七一，矿业占百分之一点七八，钢铁工业占百分之零点二四，其它工业占百分之三点七九。其中属于国防工业范围者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地域分布情况是，四川占百分之五四点六七，湖南占百分之二九点二一，此外广西、陕西和云南等省也有一部分。大批工业的内迁，对大后方经济发展，对支持抗战，有着很大作用。

在工业内迁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起了重大作用，他们历尽艰险，运送机器，保护设备，克服了极大的困难，使内迁的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国民党政府却对内迁的民族工业百般刁难。民族资本家向军事当局如淞沪警备司令部等处申请迁移护照非常困难，即使取得护照的工厂，也往往受各军防区的

层层阻难，运输的船只车辆屡遭各军扣用，到达迁移地区后，购地建厂更是障碍重重。另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乘民族工业之危，进行吞并。如负责迁移工作的工矿调整委员会，就用接管或加入股分的办法，吞并内迁的民族工业。蒋介石曾经指令以救国公债“收买”轻重工业的厂矿移入内地经营。

三 上海南京沦陷 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为了迅速解决处于胶着状态的上海战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的全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七日，日本编成华中派遣军。九日，日军攻陷松江。中国军队淞沪阵地的侧后受到重大威胁，遂于当天全线撤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沦陷了。

淞沪之战，日本投入的兵力约三十万人。中国参战的军队约七十万人，他们奋勇战斗了近三个月，毙伤日军五万多人，给日寇以很大的挫折，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抗战方针，蒋介石指挥的无能，以致受到很大损失，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结果。十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曾说：“目下现役部队略已使用殆尽，此后补充者多系新募，未经训练，故战斗力益见低劣”。“械弹器材被服粮秣之积储略已用至半数，后续补充堪虞”。

日军占领上海后，一部向沪宁路进攻，并派兵在白茆口登陆。十一月中旬，先后攻占嘉定、常熟、苏州等地；下旬又陷无锡、常州。十二月初，攻陷江阴要塞等地。另一部日军向沪杭路进攻。十一月，连陷嘉兴、长兴、吴兴、宜兴等地。十二月一日，日本决定进攻南京，企图迅速结束侵华战争。

淞沪抗战失败以后，蒋介石仓促决定固守南京，临时建立起南京卫戍军，由十三个师和一些炮兵部队组成。

十二月初，日本华中方面军所属上海派遣军继续沿沪宁路及两侧地区进攻，相继占领句容、淳化、镇江；中旬又陷江北的扬州、仙女庙、滁县。日本华中方面军第十军的三个师团，分别沿宜兴至溧水、长兴至洪兰埠、宁国至南京的公路进攻，相继攻占溧水、秣陵关、宁国、芜湖等地。八日开始了南京附近的战斗。前一天蒋介石离开南京。十二日晚卫戍军按蒋介石的命令撤退，全军在极其混乱中溃逃。此役国民党军损失十余万人，器械弹药丢弃无数。十三日，南京失陷。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日本政府的纵容及其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唆使下，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大竞赛”。兽军见到中国男子便杀；见到中国女子就强奸，奸后再杀；大肆焚烧房屋，抢掠金钱财物。十八日夜间，兽军将从城内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五万七千余人，用铅丝捆扎，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然后将尸体浇上煤油焚化。兽军用砍头、劈脑、剖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剁四肢以及其它种种惨绝人寰的野蛮手段屠杀中国人。在持续六周的杀戮中，我国同胞被杀者达三十五万人之多。在一个月內，南京市內发生的强奸事件，有二万多起。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端残暴的法西斯兽行。如当时的一分密电中所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但是，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兽行，并没有吓住中国人民，相反，更

激起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

十月下旬，日本曾通过德国向蒋介石提出和谈问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此进行斡旋。但是由于害怕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政府未敢答应日本的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之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十八日，日本首相近卫在会见记者时说：今后的“对华方针是谋求使国民政府崩溃”。

四 华北、“蒙疆”、南京伪政权和伪组织的建立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每攻占一个地区之后，就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加强对中国人民的镇压和掠夺。

日寇占领平津后，积极策划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并企图使之成为“真正的中国政权”。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政权由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组成。伪政府的汉奸官僚还有王揖唐、朱深、齐燮元等。伪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年号，以北京（即北平）为首都。临时政府成立后，冀东伪政府取消。这个临时政府下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京、天津两个市政府。

九月，日寇在以张家口为中心、包括察哈尔南部十县的地区，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于品卿为主席。十月，在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十三县，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夏恭为主席。同月，在归绥成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管辖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塔拉、伊克昭五个盟，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政务院长。十一月，上述三个伪政府组成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统一管辖三个伪政权。一九三九年九月，联合委员会改组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主席，李守信、夏恭、于品卿为副主席，挂蒙古旗，用成吉思汗年号。

上海陷落后，日本组织了伪上海大道市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又成立了南京自治委员会和杭州治安维持会。三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京沪两个特别市政府。

上述各个伪政权都是在日寇操纵下建立的，并受到严密的控制。日本人以正式官吏或各级顾问的身份，从上到下监视着各个伪政府的工作，一切大小事务，必须得到日本官员和顾问的同意，才能施行。

日寇还在沦陷区建立各种伪民众团体，配合伪政权进行殖民统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操纵，在北平成立了“新民会”。“新民会”宣称它是与伪政权表里一体的“民众团体”，其宗旨是：“维持新政权”、“开发产业”、“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参加反共战线”等。它的总部称中央指导部，设在北平，下级组织遍布华北各地。会长王克敏，中央指导部长缪斌。该会的主要活动是在华北沦陷区进行奴化宣传，建立伪组织，配合日军进行治安保卫等。此外，日寇在上海建立了“大民会”，在汉口组织了“正义会”。这些伪组织都是日寇进行暴力镇压的帮凶和鹰犬。

五 台儿庄战斗和徐州撤退

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的联系，企图占领战略要地徐州。国民党政府为保卫徐州，并把日军主力钳制在津浦线，调集了六十万军队组织徐州会战。

一九三八年一月，由山东南下的日军，先后攻占兖州、济宁等地。同时，华中日军沿津浦路北上，于二月初攻占蚌埠等地，接着进抵淮河北岸。三月中旬，日军进攻滕县，守军激烈抵抗，牺牲重大，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阵亡，滕县失陷。

日军攻占滕县后，兵分两路进犯峄县之台儿庄，以取得进攻徐州的据点。第五战区所属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据守台儿庄。三月二十三日，日军约四万人发动进攻，守军顽强抵抗十余天，将敌主力吸引在附近。第五战区调动兵力包围日军，至四月六日将围攻之敌击溃，歼敌约二万人，缴获了一批武器。抗战以来，国民党当局不断丧师失地，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台儿庄战斗后，日军按原来的意图，加紧部署兵力准备进攻徐州。五月上旬，敌华北方面军由北向南、华中派遣军由南向北发动进攻。中旬，日军切断陇海路，形成对徐州的包围。国民党军仓促突围撤退。十九日，日军进占徐州。

徐州失陷后，二十日，日本海军攻占连云港。下旬，又连陷碭山、归德。六月六日又陷开封，次日再陷中牟、尉氏，并分兵迂回到新郑，准备夺取郑州。这样，一方面把平汉、津浦、陇海三路沟通，一方面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形势。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日军前进，不顾人民的生命财产，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使豫皖苏三省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田园尽成泽国，数十万人被淹死，更多人流离失所，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各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一 洛川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也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即抗日战争应该是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民族的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战胜日寇的纲领、方针和具体政策，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他指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晋察冀三省，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他指出，要坚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的阶级独立性和警觉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

会议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和全国人民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是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它全面地概括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指明了争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道路。

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它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因此共产党“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

会议决定了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具体行动方针：第一，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二，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第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红军实行战略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

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增加为十一人，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

洛川会议在历史转变关头，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规定了共产党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对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

洛川会议后，为进一步指导共产党和八路军实行战略转变，毛泽东在九月连续发出指示，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

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必须解决一些基本政策问题。十月，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指出芦沟桥事变后，广大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斗争方式。华北数十万游击队是能战胜多数敌人的，华北的反日游击战争，是有光明前途的。

刘少奇指出，游击战争要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建立真正人民的抗日政权。这种政权的基本任务是：（一）普遍地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改善人民的生活；（四）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为实现这些任务，抗日政府应该实行如下的各种具体政策：

（一）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是，取消旧的捐税和摊派，重新规定统一的累进税；没收汉奸及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向富户征收救国捐等。经济政策是，保护一切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协助对抗战有利的工业和生产合作社及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发展农业生产，进行耕种运动等。

（二）农民土地政策。由政府采用法律命令的办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着。在根据地内，应没收汉奸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没收逃亡地主的土地，无租息的分配给农民耕种；颁布减租法令，减租至最低限度；保障农民佃耕土地的永佃权；协助农村合作社的发展；禁止高利贷；农村政权由农民直接选举，组织农民武装自卫队等。

（三）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确立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在法律上的权利与合法地位。建立真正群众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团体。群众团体的中心任务，是动员群众加入抗日军队和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

此外，抗日政府还必须执行正确的劳动、内务、教育、民族和对外各项政策。刘少奇在这里所提出的各种政策，是共产党十大纲领的具体化。

二 平型关战斗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展开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立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一五师挺进至晋东北地区；一二〇师到达榆次地区；一二九师主力开赴正太路南侧地区。

这时，日军正由晋北、察南、冀西分路向平型关、雁门关进攻。一一五师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二十三日以一部在灵邱、涞源方向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以三个团的兵力于二十四日夜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次日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进至伏击地区，八路军突起猛攻，迅速将敌包围分割，进行白刃战。经过一天的激战，歼敌一千多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次胜利振奋了全国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加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平型关战斗以后，八路军参加忻口战役。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在察南、

晋北和冀西地区作战，收复了十余座城镇。一二九师的一部于十月十九日夜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二十二架。当正太路危急时，八路军总部率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驰援，先后胜利地进行了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当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从忻口、太原及晋中地区溃逃时，八路军仍在积极战斗，使他们免于被歼。

上海、太原失陷前后，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一部留在以恒山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主力进入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一二九师进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总部率一二九师主力进入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八路军在完成了战略展开之后，接着就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战争和其它各项工作。

晋察冀根据地平型关战斗后，聂荣臻率一一五师一部两千人留守五台山，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十一月，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八路军在各地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游击队。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在河北阜平召开全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各级政权进行了改选，统一了政策法规，改编了当地的抗日武装，部队迅速扩大。二月，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寇二万多兵力的八路军围攻，恢复了晋北、冀西、冀中、察南的五十余县。这是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三八年春，派出一个支队进到北平的西山一带，开辟了平西根据地。同年四月，在冀中成立了行政主任公署，建立了冀中根据地。六月，又组织一个纵队，进入冀东。七月，配合当地的党组织，在冀东七县发动武装起义，并在十七个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冀东根据地。它是以后冀热辽根据地的基础。这些根据地的开辟，使晋察冀边区更加扩大。

晋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党军队弃守太原后，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抗日。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乘一二九师开赴同蒲路作战之机，调集万余人兵力向晋北进攻，侵占宁武等七个县城。一二九师闻讯，星夜回师，经二十多天激战，收复了七个县城，打垮了日寇的第一次围攻，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同年八月，一二九师派一个支队北上绥远，越过平绥线，进入大青山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相配合，发动了绥东、绥西、绥南以及察哈尔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后，大青山区和晋西北区统一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正太路痛击日寇之后，进入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中心开辟抗日根据地。十二月，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一九三八年，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起来。二月进行了长生口伏击战。三月中下旬进行了神头岭和响堂铺战斗，歼敌约二千人，焚毁汽车一百八十余辆。四月，日军三万余人分九路进攻晋东南地区。一二九师等部在长乐村歼敌二千二百余人，又乘胜追击，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共歼敌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下旬成立晋冀豫军区。同年春，一二九师一部开赴冀南，发动群众，打击日寇，建立政权，开辟了冀南区。八九月间，一二九师一部在漳南作战，收复了豫北滑县等地。

山东根据地抗战爆发后，山东的共产党组织，从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先后在盐山、乐陵、文登、长山、徂徕山等地领导起义，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逐步开辟了十个抗日根据地。为加强统一领导，十二月成立中共山东分局，同时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领导山东地区的部队。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各一部进入冀鲁边，将该区部

队统一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随后在宁津、乐陵、盐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从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扫荡”，开辟了冀鲁边根据地。

华中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月，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军长叶挺，政委兼副军长项英。下辖第一、二、三、四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同时，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一九三八年二月，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四月，军部由南昌进到岩寺。六月，第一支队在陈毅率领下进入苏南敌后，七月，第二支队在张鼎丞率领下也进入苏南敌后，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两个支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向华中内地侵犯的敌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以后，进入皖南前线抗战，于芜湖、宣城等地开辟了皖南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四支队挺进皖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九年五月成立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开辟了津浦路东、西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六月，中共河南省委组织了豫东游击第三支队等抗日武装。十月，该支队与新四军游击支队合编，东渡黄泛区，十一月在睢杞太地区取得多次胜利，初步打开了豫东抗战局面。

陕甘宁根据地一九三七年九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共辖二十三个县。十一月，在完成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了边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中央一直在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陕甘宁边区成了全国抗日的中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首府延安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在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前线后，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地方武装，守卫着几百里黄河河防，保卫着边区。一九三八年粉碎了日寇的两次进攻。同时消灭了国民党派遣的四十八股土匪，使边区日臻巩固。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总工会、农民会、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会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民主运动。一九三九年一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立，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运动，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在全国树立了榜样。共产党在这里创办了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卫生学校，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欣欣向荣，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共产党通过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组建了青年抗敌决死纵队（新军），共有四个纵队和政卫队、工卫队，全部兵力约四万余人。第一、三纵队和政卫队活动于晋东南地区，第二、四纵队和工卫队活动于晋西南地区。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日寇腹背受敌，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基本力量，成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人民解放的保证。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华北八路军与敌人战斗一千五百余次，毙敌五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三十万以上。八路军迅速发展发展到十五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这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

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胜利。至此，日寇只得停止战略进攻，回过头来以主要兵力把守占领区。

为了使共产党员充分认识人民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和意义，正确地指导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这个国家被小而强的日本所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由于敌人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因而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这样就使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对广大军民的发动，就使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问题、向运动战发展问题等等也发生了。因此必须“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方针是：（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其中第一项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

毛泽东这一著作，指明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和方针。使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沿着正确路线向前发展。

三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亡，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对抗战的悲观情绪。国民党政府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宣扬“再战必亡”论。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则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或者日本国内的变化，迅速结束战争。台儿庄的胜利，引起速胜论一度风行。速胜论在共产党内也有影响，使一些人产生轻敌思想。

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对抗战发表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使抗战无法获得彻底的胜利。

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望抗战的胜利，迫切要求解答中国能不能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的问题。肩负着领导抗战责任的共产党，为了给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前途，必须彻底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同时，十个月战争的发展，已使共产党掌握了足够的论据，来击破亡国论，说服速胜论，对战争的全局做出正确的论述。

抗战一开始，共产党就已确定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朱德、洛甫、彭德怀、周恩来等曾先后发表文章，论述持久抗战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系统地论述了有关持久战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

“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

和速胜论都是没有根据的，是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战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指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持久战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四种情况上。根据这些情况，具体地进行持久战的方针，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中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总之，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第三阶段中，是战略的反进攻。

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对全军全民进行广大的政治动员，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这样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的发表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成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也是重要的哲学著作。

四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

抗战开始以后，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式发生变化，共产党内一部分人中滋长了右倾情绪，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曾先后发生了闽粤边区的“何鸣事件”和西安的“西救”事件，在八路军中出现了新军阀主义倾向，某些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右倾投降主义已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主义。

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洛川会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王明否认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抹杀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反对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受到毛泽东等的抵制，未能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会后，王明到武汉担任共产党长江局的书记。在此期间，他不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不执行中央的正确指示，擅自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极力鼓吹并在实际工作中推行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使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工作受到损害。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确立抗战即将转入新阶段时的方针任务，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

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他强调全党要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动员和团结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深刻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极为重要的作用，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的任务。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决议案指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全会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的错误。全会重申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解放区，发展华中解放区。全会认为，必须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鉴于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和张国焘的叛党行为，全会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统一。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由刘少奇兼任书记。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取得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作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抗战工作的迅速发展。

第四节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一 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国会议 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活动

国民党政府被迫抗战以后，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威胁他们的统治，同时又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日寇的进攻；因而就幻想依赖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制止日本的侵略。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断地呼吁国际联盟和英美政府的援助。蒋介石一再申明，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建立一大陆帝国”，要“排除驱逐其他各国利益于亚洲大陆之外”。各国应该认识日本侵华战争对于他们的威胁。中国今日“不仅为中国本身战，且为根据条约之神圣以生活于此领土上之其他各国侨民利益战，特别的是那些在中国商业利益被敌人摧毁代表被人驱走的国家”。因此，缔结九国公约之列强及组织国际联盟之各国，对中日战争“有联合干涉之必要”。

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持久抗战，促起国际共同制裁日本”的方针。

在这个方针之下，不会有真正的“持久抗战”。蒋介石所谓“持久抗战”不过是在战役上多支撑一段时间，以等待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干涉，以实现“光荣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上海之后，国民党政府一面集中大量精锐部队在上海作战，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吁国际干涉，正是这个方针的体现。

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声明，九月七日又送交补充声明。十三日，出席国联第十八届常会的中国代表团提出正式申诉，并发表长篇宣言，陈述日本侵华之经过。要求国联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

国联将中国的申诉提交由二十三国组成的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讨论后，通过了对日本空军轰炸中国未设防城市加以谴责的决议案。并向中国捐赠二百万瑞士法郎，作防疫之用。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上提出，谴责日本为侵略国，不应予日本以任何协助，不应酿成足以阻止中国抵抗之障碍，国联应再采取协助中国之行动等四项建议。但是，国联大会通过的建议书，仅仅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认为日本违背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建议召开签订九国公约各国的会议，讨论中日问题。国联大会表示“对于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建议会员国避免采取足以减少中国抵抗力之动作，并自行考虑单独援助中国的问题。随后即宣布休会。中国虽然多次呼吁和申诉，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国联，并未理睬中国的正当要求。会议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由国联倡议召开的第八届九国公约国会议，十一月三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日本拒绝出席。苏联应邀参加会议。国民党政府对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会前美国国务院就提出，此次会议“必须给日本以经济上、政治上的安全感”。“必须为日本保障原料和市场”。会上中国代表提议对日实行经济制裁，但未被采纳。苏联代表提议对日本实行制裁，也未通过。二十四日会议通过《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建议中日双方停止战争，改取和平程序。随即宣告休会。同国联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答路透社记者问。

蒋介石：《对前方将士训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依靠西方列强阻止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在进行对日本妥协投降的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后，企图通过谈判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日本外相广田表示，希望德国劝说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和谈。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愿意促使中日直接谈判。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去见蒋介石孔祥熙，转达了日方的七项和谈条件：（一）内蒙古建立自治政府。（二）在华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华北的行政权仍交给南京政府，但须委派一个亲日分子为首脑。（三）上海非军事区须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六）减低对日货的关税。（七）尊重外侨权利。蒋介石表示希望“恢复战前状态”。他对陶德曼说：如果他同意日本提出的七点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再一次会见陶德曼，提出：（一）愿意接受日本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二）同意派亲日分子为华北行政首脑。（三）同意共同防共。六日，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五十四次常委会讨论了与日本妥协的问题。

当妥协投降活动正在进行中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南京一败涂地。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凶，要求蒋投降的条件也更苛了。这些新条件是：（一）中国政府须放弃亲共和反日、反满政策，与日满合作共同反共。（二）在中国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及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缔结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四）赔款。并限定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以前作出答复。这时正是中国人民抗日运动极其高涨的时候，中日“和谈”消息一经传出，便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人民的反对和日本条件太苛，蒋介石不敢按日方的新价格成交，这次“和谈”没有成功。

在依赖国际制裁日本无效，屈辱妥协不成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只有采取拖下去的办法了。于是国民党政府重申“持久抗战”的方针。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自即日起，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往重庆、汉口和长沙。外国大使馆也开始撤退。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迁都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批官员抵达重庆。政府机关陆续西迁。

二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抗战建国纲领》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政府报告、党务报告、军事报告，通过了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等提案，发表了大会宣言。宣言说：“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要使“抗战建国”“同时并行”。关于抗战问题，宣言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为获得最后胜利，“决不辞任何之牺牲”。表示要坚

决抗战。但另一方面又说，希望日本“幡然变计，放弃其侵略主义”，谋求同日寇实现“合于正义之和平”。关于国内政治问题，宣言提出：“民众方面则注意于能力之养成，政府方面则注意于机能之适应”。所谓民众“能力之养成”，其目的是使“民力”为国民党政府服务。所谓政府“机能之适应”，仅是在不变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的原则下，对国民政府的政治机构作细微的变动。宣言强调“国家至上”，说在抗战时期“阶级斗争更不容许其发生”，因此各政党要作“政治的休战”。宣言强调“政治统一”，说什么“自由与统一”必须“兼顾”，一方面说“政府对人民之自由，必加以尊重”，另一方面又说“同时亦必加以约束”。这些表现了国民党既想利用人民抗战，又害怕人民在抗战中发动起来的矛盾状态。

《抗战建国纲领》是上述宗旨的条文化。这个纲领除前言以外，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七项，共三十二条。纲领提出“抗战建国”的总口号，并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个纲领规定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它具有两面性。在对日问题上写了“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一切伪政治组织等字样，但是没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妥协投降的明确规定。在军事问题上，写着全国官兵“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等；但是没有提出战胜日寇的正确战略，而各地的人民武装和敌后的游击战，都要“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这实际上是不准人民自动起来抗日，取消人民战争。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只提出设立国民参政机关，改善各级政治机构等，而没有实施民主政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国防政府的规定。在总纲中特别规定抗战建国要以蒋记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要在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之下”。这个纲领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因为它具有两面性，国民党可以用它来包办抗战和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人民也可以利用它作为发动抗战力量和向国民党作斗争的工具。

大会决定国民党设总裁、副总裁各一人，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扩大特务机构。决定设立训练委员会，由总裁兼任委员长，分组掌管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机关、公务人员及学校教职员之思想训练事宜。

大会按照蒋介石的意旨，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集中全国“优秀”青年国民，“与以一贯之训练，集之于同一之组织，纳之于新生活之规律；由明礼义，知廉耻，具备现代国民之基本条件，以进于群策群力，一心一德，负责任，守纪律，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实际上是要把全国青年控制在国民党手中，把三青团作为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工具。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成立，由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书记长。蒋介石决定以复兴社为三青团的核心。三青团成立后，举办“干部训练班”，调党部人员（CC派）、各级政治部（政训处）政工人员（复兴社分子）、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人员（陈诚派）共约二百人受训。

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执行着一条单纯由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战，坚决反对中国人民自己动员起来抗战，把抗战

蒋介石：《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

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完全纳入蒋介石国民党设置的轨道，以便国家命运完全由蒋介石集团摆布的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比较明确地体现了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

三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国际国内和中日之间的形势的变化，推着蒋介石集团不得不走继续抗战的道路。实行抗战，就不能不作些民主的表示，因此国民党有设立国民参政会的决定。

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国民党政府于四月十二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它只有听取国民党政府施政报告及询问建议之权，它的决议对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条例规定参政员总额二百名，具体人选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后，由国民政府公布。在二百名参政员中，国民党员八十八人，共产党员七人，中国青年党员七人，国家社会党员七人，社会民主党员一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员一人，余为无党派人士。国民参政会基本上是国民党独占的机关，而不是真正民意机关。但是，设立这个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各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的政治机构是过去所没有的，这是一个进步。它给了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是有利于抗日和民主的。

一九三八年七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任议长。出席这次参政会的参政员有张伯苓、王世杰、王造时、张君勱、黄炎培、史良、秦邦宪、邹韬奋、陈绍禹、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陶希圣、董必武、林祖涵、谭平山、王云五、梁漱溟、杜重远、邓颖超等一百三十多人。毛泽东被聘为参政员，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在致会议的电文中说：“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会议的召开，各界均极重视，纷纷提出建议。会议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关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等等提案。会议还发表了宣言，表示“国难严重”，各党各派“应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而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这些提案和宣言承认“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长期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国策”，表示要实行“民主政治”、“保障民生”，都是进步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只是把它们当作装饰品加以宣传而已，并无真正实施之意。会议选举张君勱、左舜生、曾琦、董必武、陶希圣、胡适、秦邦宪、傅斯年、梁漱溟、罗隆基、沈钧儒、陈绍禹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国民党政府释放了救国

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八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军律》，规定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者、不奉命令临阵退却者、降敌者、敌前反抗命令不听指挥者、造谣惑众摇动军心或扰乱后方者等等，都要判处死刑。九月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私通敌国图谋扰乱治安者、以政治上或军事上之机密泄漏或传递于敌国或叛徒者、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利于敌国或叛徒之宣传者等等，都要判处死刑。同月又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这些法令公布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认真地去执行，有的条文本来就是用来装璜门面欺骗人民的。但是，这些法令还是有利于抗战的。

在这种情况下，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曾经一度蓬勃开展起来，文化界的救亡运动发展更为迅速。

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政治中心，也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武汉民众的抗战情绪极为热烈，青年界尤为突出。青年救国团在成立后的七个月当中团员发展到两万人。该团曾经提倡青年参战运动，有七、八千团员到豫东和第五战区参加游击战。他们还到后方参加民众动员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任厅长。在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第三厅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集中了文化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出色地进行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第三厅成立后，首先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用文字宣传、口头宣传、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方式进行宣传，把武汉三镇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还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深入前线 and 后方城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抗战一周年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进行“七七”献金活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此外，第三厅还协助文艺界各抗敌协会开展工作，促进抗战文艺的发展；建立全国慰劳总会，到前线进行慰劳；建立战地文化服务处，输送了大批抗日宣传品到前线；进行了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

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在《发起旨趣》中说：“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文协宣言。宣言指出：“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大会选举郭沫若、茅盾、冯玉祥、夏衍、田汉、巴金、老舍、郁达夫、郑振铎、朱自清、许地山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并推举周恩来为名誉理事。

文协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主要有：（一）先后在成都、昆明、延安、上海、桂林、广州、贵阳、香港等地建立了分会，以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界的抗日力量，推动各方面作家，进行文艺战线上的抗日斗争。（二）号召作家“下乡、入伍”，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战地和农村，宣传抗战，

反映抗战，直接为抗战服务。为此，在一九三九年派遣了作家战地访问团和抗战文艺工作团，有计划地访问战地和参加战地工作。（三）提倡文艺大众化，号召写通俗文艺，以便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由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展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无数的文化工作者踊跃投身到抗战的实际斗争中，使得抗战初期的文化运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诗歌的创作在抗战初期非常活跃。诗人们写了大量战斗的诗篇。当时出版的诗刊有《开拓者》、《时调》、《诗时代》、《诗建设》等十余种。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出版了《战歌》。诗歌创作和朗诵在部队、农村和工厂中，都得到开展。

在沸腾的战斗生活中，戏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七七”炮声一响，中国剧作者协会就集体创作了《保卫芦沟桥》。“八一三”后，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演出。十一月，田汉等主编的《抗战戏剧》在武汉创刊。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剧协成了戏剧“走向农村”、“走向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战文艺工作团、实验剧团、烽火剧团等。当时，街头剧、活报剧、化装宣传成为最流行和很有效的宣传方式。这个时期，各地创作了许多比较有名的独幕剧、多幕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更是活跃。一九三八年十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

这时报告文学空前地兴盛起来。无论是文艺刊物或一般的报章杂志，都大量刊登报告文学。沙汀、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等都写出了好的报告文学作品。

作为抗战号角的歌咏运动，这时也蓬勃地开展起来。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冼星海、张曙、吕骥、贺绿汀等创作了《全民抗战》、《壮丁上前线》、《洪波曲》、《干一场》、《太行山上》、《游击队》、《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歌曲。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一九三九年三月写成），不仅风行于当时，而且成了中国音乐史上不朽的杰作。随着歌曲创作的开展，歌咏活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无数歌咏团体，纷纷出现于前线 and 后方，用歌声来唤起人民的抗敌热情。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更是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新的美术运动，在抗战初期也很活跃。在上海，漫画家首先出版了《救亡漫画》，用有力的画幅揭露敌人的兽行。其他如木刻家、讽刺画家，甚至一些工商美术画家，也都开始采取抗战的题材，为抗日救亡而宣传。武汉抗战美术工厂的设立，差不多集中了全国优秀的漫画家于一处，制作了大批的美术宣传画。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中心，将抗战美术深入到广大农村，使墙头画、报纸和杂志上的漫画与木刻都成了有力的战斗武器。

抗战爆发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进步爱国的电影戏剧工作者积极组织了战地移动演剧团，去前线服务。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三月，创刊《抗战电影》。一九三八年初，著名的荷兰纪录电影艺术家伊文思来华，拍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八路军对敌作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以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等镜头，编成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又名《一九三八年的中国》）。一九三八年九月，延安影剧团成立，十月开拍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国共合作后，

中国电影制片厂由于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加入，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以抗战为题材的故事片的拍摄，西北影片公司内倾向进步和爱国的人士拍摄了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

“八一三”后，抗日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上海涌现，接着在武汉、广州、西安等地也大量出现。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正式出版《救亡日报》。《群众》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新华日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一九三八年四月，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一九三八年五月，《抗战文艺》在武汉创刊，它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刊。还有《抗战》三日刊、《战时联合旬刊》、《文化战线》等共有百余种之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除原有的《解放》与《新中华报》外，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出版的小型报纸，多达数百种。这些报刊宣传了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动摇妥协倾向，揭露了日寇暴行，推动了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

抗战初期，蓬勃开展起来的进步文化运动，对推动抗日战争起了重大作用。此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运动继续向前发展，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文化战线上欣欣向荣的阶段便结束了，那里的文化运动开始进入迎着巨大逆流艰难前进的时期。

四 国民党的“溶共”宣传和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制

抗日战争开始后，虽然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本意并没有改变。抗战前夕，蒋介石就在庐山训练班提出，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五分之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不承认国共合作，而把这种合作说成是政府“开诚接纳”共产党，“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他是要共产党在他“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在一九三八年底和一九三九年初的国共谈判中，蒋介石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制定共同纲领、改革政治机构等各项建议，公然向共产党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在国民党的指使纵容下，一些反动文人在《扫荡报》、《血路》、《民意》等反动报刊上，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他们大肆宣扬中国必须“统一”，用“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其他单位合并于国民党以后，“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反动文人叶青说，抗日战争在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实行民族主义，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的党，因此“抗日不是共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转引自《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转引自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见《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产党底任务”。这是取消共产党的理由之一。

国民党玩弄阴谋，压迫共产党投降国民党。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未取得共产党同意，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就作出决议并公开宣布，恢复周恩来、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董用威（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的国民党党籍。当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七人郑重声明不予承认，指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恢复几个人的党籍一事，事前更未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他们严正要求国民党撤销上述决定。

对于国民党的“溶共”宣传和作法，共产党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毛泽东在同《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那种不允许共产党存在，不允许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等等，“这是再重新回转到十年来走不通的道路和做不到的办法。这一思想如不幸而见诸实际行动，则既有害统一而又有害抗日，则是使中国已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体，因而也就是使抗战救国的事业发生危险”。他呼吁共产党员和其他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同胞们，对此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命运的问题，应严重警惕。关于所谓国共两党合并问题，中共中央指出：国共“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和“溶共”宣传同时，国民党还采取秘密的和公开的办法压制共产党的活动和抗日民主运动。一九三七年十月，安徽芜湖的国民党党部指使流氓匪徒破坏学校的抗日活动，把两个学校的校长诬为“汉奸”，拖到街上游街示众。一九三八年二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接连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分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北作家抗敌协会等十三个救亡团体。四月，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迫使中国工人抗敌总会解散。五月，湖北省教育厅以“行动越轨”的罪名把全省乡村巡回宣传队的五十多个青年加以驱逐。六月，西安国民党当局逮捕民先队西北总队长，并勒令《救亡》杂志停刊。七、八月间，正当武汉的抗日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规定民众团体召开会员大会必须于召开前三日呈请批准，又规定民众团体不得召集联席会议和开办训练班等。许多很有群众基础，工作开展得好的民众团体被解散或被勒令停止活动。

一九三八年二月，蒋介石电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共产党“非法”活动。五月，蒋介石命令所有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及各军事学校之主管长官，彻底查明所属人员学生之党派关系，凡系其它党派分子，应即负责检举，并停止其职务与学籍。七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指令：宣传共产主义仍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加取缔。八月，国民党特务在西安杀害了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凡此种种，都说明国民党政府为了坚持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是不准人民起来抗日和争取民主的。

叶青：《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时代思潮社一九三八年九月版。

《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六大以来》（上），第一——页。

五 武汉广州的失陷

由于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国内的矛盾日趋尖锐。日本政府一面加强国内的法西斯镇压，实施国家总动员法，加速经济的军事化，以应付战争长期化的要求。一面决定进攻当时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武汉，摧毁国民党政权的中枢。同时进攻广州，切断国民党政府的主要补给线。以此威逼蒋介石屈服，或将蒋政权变为地方政府，为建立伪中央政权准备条件。

日军对武汉的作战，主力为加强配置的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进行配合牵制作战。六月初，日军开始进攻，在海军配合下，于十三日攻占安庆，并占领潜山、太湖，下旬又陷马当，七月初进占湖口。此后，敌军继续由长江南北进攻武汉。

为保卫武汉，国民党政府组建第九战区。九战区所属之第一、二兵团，在幕阜山、九宫山、庐山等山地设防。第五战区之第三、四兵团，在大别山、富金山一带布防，并在马当、湖口、武穴、田家镇等江防要塞布雷，阻敌西进。

江南日军于七月中旬分路发动进攻，二十六日陷九江。八月下旬，日军一部在港口登陆，进攻瑞昌等地，然后西进，在海军配合下，于九月下旬攻占富池口。十月中旬，中国军队在敌军进攻下，向武宁、通城、岳州等地撤退。二十五日，敌军迫近武昌。江北沿江西进的日军于九月连陷广济、武穴和田家镇要塞。十月二十五日攻占黄陂。在大别山方面的敌军，八月下旬陷六安、霍山，九月中旬占商城、潢川、罗山，十月十二日陷信阳。十月中旬，战争移至武汉附近。江南日军占阳新、大冶后，分三路进迫武汉。二十五日，中国军队放弃武汉。敌占武汉后，继续进行追击战，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连续攻占应山、孝感、嘉鱼、崇阳、通城等地，十一月十二日占领岳州。

在进攻武汉期间，日本政府决定了《汉口方面政务处理纲要》，计划在汉口建立地方政权，管辖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由于种种矛盾，华中伪政权未能建立，只在一九三九年四月成立了伪武汉特别市政府。

与进攻武汉同时，华南日军于十月十二日在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在广东的防务空虚，守军第十二集团军，事前既未作防备，敌军登陆后，又望风而逃。日军相继攻陷淡水、惠阳、博罗、增城、宝安等地后，二十一日占领广州。接着又攻占虎门要塞、从化、三水、佛山等地。

日军占领广州后，十二月上旬成立伪治安维持会。下旬又指使汉奸成立伪广东省政府，彭东原任主席。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广州失守的十五个月里，日本侵略军在北方占据了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在华中占据了京沪杭地区和武汉地区。在华南占据了广州地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过长，兵力有限，在攻占武汉广州以后，已经没有力量做大规模的战略上的进攻，只能进行战役的进攻了。在日寇进攻面前，有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抵抗，但多数国民党军队见敌即溃，多数国民党官吏弃职而逃，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使国民党战场遭受巨大的损失。

第二章 国民党政府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斗争

第一节 抗日战争向相持阶段过渡 投降分裂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

一 抗日战争向相持阶段过渡 日本对国民党政府政策的改变

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广州沦陷，日军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困难。到一九三八年为止，日军伤亡达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军费开支剧增，人民生活日益贫困。人民的反战情绪在增长。由于战线的延长，日军的兵力更加不足。这些是日本政府非常忧虑的事情。中国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猛烈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抗击着四十万日军。国民党政府仍保有西南和西北广大地区，拥有很大的兵力和日军对抗。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英、美、法等国由于不满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对中国的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和日蒋矛盾的无法调和，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战略和短时期灭亡中国的幻想，迫使它不得不下决心应付持久的战争。战争的长期化、国内的困难以及外交上的孤立，使日本政府“重新检讨对华国策”。它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在策略上作了新的修改。这就是把以往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把重视国民党正面战场、轻视广大的敌后人民战争的战场，改变为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日本希望经过这一改变，不仅能够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而且可以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这样，日本在占领武汉以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转入敌我相持阶段。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并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明确修改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中“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接着制定了《（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等文件，提出“中国事变的处理，要尽量采取各种办法，因势利导，努力使之早日解决”。但是它解决事变的条件和办法，同过去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仍以所谓“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为原则。但是日本政府也估计到，“要迅速取得成果，预料尚有困难”。因此要准备“对付长期作战”。为此要“进一步做好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和自主的建设”，“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声明重申过去提出的“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其内容要点是：（一）中国“放弃抗日”，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二）签订日华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并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三）日华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特别在华北和内蒙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声明还宣称“日

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全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这个声明具体提出了对国民党政府招降的条件，并为国民党内投降派的降日活动预留了借口。

在上述声明中，日本虽然改变了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方针，但仍要求国民党政府“更换人事组织”，仍坚持把蒋介石下野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所拟的“和平计划”中，改变了这个政策，公开声言“尊崇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位置。”三月初，日本新任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不久，就从否认国民党政府改为承认国民党政府，从反蒋变为拉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重大改变。

日本侵华新政策提出之后，虽然蒋介石并未响应，但这个政策鼓励了他的反动性、动摇性和投降性，这就使抗日阵营内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复杂，双方的斗争更为剧烈。这就加重了中国坚持抗战的困难。

二 国民党政府的南岳军事会议

武汉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门迁到长沙。十一月初，第九战区司令部在长沙举行高级军事会议，检讨武汉作战的经过。这是南岳军事会议的准备会。会后军政重心又暂时移到衡山。

日军攻陷武汉后，一部沿粤汉路南攻，十月十一日攻陷岳阳。次日蒋介石电令湖南省，在日军进攻长沙时，焚毁市区，实行“焦土抗战”。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奉命，于当日深夜派出三百余人纵火焚烧长沙。大火延续了三天三夜，烧毁了长沙城，烧死两万余人。长沙大火激起极大的民愤。蒋介石以，酆悌等三人作替罪羊，将他们枪毙。

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三、九战区的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百余人出席。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词。他说，这次抗战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撤退、岳阳沦陷为第一期，此后是第二期。蒋说第二期抗战，是所谓“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这次会议就是要求得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以完成第二期抗战的使命。此外，蒋介石还有多次讲话。尽管他竭力为国民党军的大溃退进行辩解，但仍无法掩盖将领指挥无能、临阵脱逃等事实，不得不承认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南京失败、马当要塞失守及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等，是“统帅职责所在，实不能辞其责”。他还列举了国民党军队的“耻辱”，即：阵亡官兵，多暴尸疆场；士兵逃亡，不能防止；军行所至，民众逃避；谎报军情，不负责任；不能贯彻命令与达成任务；不能抽调部队机动使用；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等等。这些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反人民本质和军事制度腐败的暴露。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的任务，指出今后抗战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要求分三期轮流整训全国军队。

南岳会议根据已经变动了的战场态势，重新调整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河南及安徽之一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及陕西之一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南皖南及闽浙两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两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皖西鄂北及

豫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之一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辖江西鄂南（长江以南）及湖南；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陕西；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之一部；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冀察方面。

会议决定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决定设桂林及天水行营，撤销广州、西安、重庆行营。

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侷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南岳会议，是国民党政府为了确定它在武汉失守后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而召开的。蒋介石此后的战略方针到底是什么，在他公开发表的言论里并不明确。他只说在今后战争第二期要“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只说要整军建军和加强军力，并不谈如何对日积极作战。他的用心就在这里。会后军事委员会制定的作战方针，体现了他的意图。那个方针规定以游击部队在敌后作战为主，而大量的国民党政府的正规军，只作“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他的部队的重要任务是进行整训以加强实力。不难看出，这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作战，而蒋介石则以加强了的实力为基础，相机行事，左右整个中国的局势。

武汉失守以后，日本方面和国民党政府方面各自从不同的意图出发，都把解放区战场摆在抗日战争主要战场的地位。

三 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

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下，国民党政府中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这个汉奸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国民党中委、宣传部长周佛海，国民党中委、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等。

汪精卫早就是亲日投降派。抗战刚开始，就主张妥协投降，宣传“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曾供认：芦沟桥事变以后，对于中日战争，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

一九三八年初，汪精卫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到上海、东京、香港和日本参谋部的官员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联系，探求日本的意图。六月中，高在香港获悉日本方面希望由汪精卫来收拾时局。为探明日方态度，高又到东京会见日本陆相板垣和次长多田。高将探得的情况报告给汪精卫。十月下旬，汪精卫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他的代表，与日方交涉。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又派梅思平等人带着“和平基本条件”到上海和今井武夫商讨，并拟定了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具体行动计划。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签署了反共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于是汪精卫等便于十二月十八日潜离重庆飞抵昆明，次日和周佛海等

叛国外逃至河内。二十二日日本政府按预定步骤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汪于二十九日发表艳电响应，宣称愿以近卫三原则与日本作“和平之谈判”，胡说什么这样“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汪逆在艳电中还大肆叫嚣中国共产党人“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从此，汪精卫成了可耻的头号汉奸卖国贼。

汪在河内逗留期间，一九三九年三月初，由高宗武代表他和日方商定“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五条，主要内容是：由汪精卫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起组织“救国反共同盟会”和“救国反共同盟军”，以“复兴中华民国”，“根本消灭共产主义的思想、行动及其一切组织宣传”；取消“临时”、“维新”两政权，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等。四月下旬，汪精卫等在日本官员的保护下秘密离开越南，五月初到达上海。此后，汪逆群丑更进一步充当日寇的帮凶，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叛国投敌，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解放区军民和国统区许多团体、著名人士、国民党的党政军官员，纷纷举行讨汪集会和发表讨汪通电，要求下令通缉汪精卫等，并给予制裁。对其他妥协动摇分子，也要予以揭发制裁。汪精卫集团的投敌，表明国民党内亲日派与亲英美派的公开分裂。

汪精卫等叛逃至河内后，国民党政府曾派外交部长王宠惠等劝阻，但被汪坚决拒绝。蒋介石始则表示对汪的叛逃事先并未预闻，继又声称汪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此行与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皆毫无关系。同时通知英美两国大使馆说，汪精卫绝对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驳斥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和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蒋还指出，近卫声明“是要以‘建立东亚新秩序’来关闭中国门户，打破九国公约，以‘东亚协同体’与‘经济集团’来排斥欧美在远东的势力”。他表示不会“背盟弃信，以破坏人类相与维系的正义的”。这表明了蒋介石继续依靠英美反对日本的立场。

汪逆艳电发出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宣布，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发表声明，称艳电只代表极少数意志薄弱、甘心为敌利用者之怯懦卑劣心理，对整个抗战前途决无任何影响。又说汪“未必甘心媚日，附和汉奸”，而是“客观上显属投降敌人，出卖祖国”。国民党政府没有对汪下通缉令。直到六月，由于全国各方面的强烈要求，同时汪精卫正在加紧组织伪政权，国民党政府才于八日通令严缉汪精卫归案。

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分析了汪精卫出走后的时局，认为：“蒋介石驳斥近卫宣言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表示了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部分动摇分子，已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但是蒋介石对近卫声明的驳斥和对抗战的某种积极表示，“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共产党一方面要支持蒋介石的积极表示，一方面要对他的限共防共政策作斗争。

四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及其反共方针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英美派买办集团，是国民党的主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危害了这个集团的政权和财产，也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击日本的侵略，又给他们以强大的压力。这些情况，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能不起来抗日。武汉失守前，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抗日方面，因此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的抗日高潮。但是，国民党并未放弃反共独裁和压迫人民的基本立场。它拒绝全国人民关于民主改革的主张，坚持十年内战时期的政治军事制度、民众政策和财政、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它反对全面抗战路线，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同时不断进行妥协投降活动。结果使国民党战场一溃千里，损失惨重。在统一战线方面，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要以新三民主义作为政治基础的主张，而实行“溶共”政策。为了应付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国民党设立了国民参政会，但那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国民党所坚持的仍然是一党专政。这些都表明，蒋介石集团的政策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和反动性。

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政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移向解放区战场。这时，国民党政府也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它的投机性和反动性日益暴露。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它改变政策的重要标志。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

关于抗战问题，全会虽然声言“坚持抗战到底”，但是按照蒋介石的解释，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就是说东北不要了，华北也可仅维持形式上的统治，只要能保存华中华南就可以罢战言和。

蒋介石在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蒋介石所要唤醒的“党魂”就是蒋记“三民主义”，要发扬的“党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蒋介石企图以此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整顿党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国民党。国民党为什么需要强化呢？是因为党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外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国民党处于“艰险”的环境中。长此下去，就不免“趋于消灭”。蒋介石说这是他“夙夜不能忘怀的衷心忧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加紧进行反共斗争。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指挥，由蒋介石任委员长。

会后，国民党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西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这些反动文件提出：要在军事、党政和行政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严禁第十八集团军的发展；取缔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及所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许共产党所办的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继续存在。派遣“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进行各种破

坏活动。加强国民党各级党部，“策动全体党员，从事共产党活动防范之调查监视等工作”。“积极加强并统一本党之民众运动”，利用中统局在各地的情报网和特工人员，运用保甲组织，“使各阶层民众，皆在本党领导之下”，“以杜绝共党活动之机会”。如此等等。

在这些反共文件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他们大造反共舆论，加派军队封锁陕甘宁边区，增派部队前往冀鲁等地，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在各地制造的磨擦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他们叫嚷当前即应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宣传上、外交上作“积极准备”，在“最理想之时期”，“一举而击溃共党武力”。但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革命力量已经更加发展，也由于日寇灭亡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这就使得国民党蒋介石虽然积极推行反共政策，却不敢赤裸裸地破裂国共合作；虽然准备同日寇妥协，却不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立即实行。蒋介石还不敢恢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剿匪”的口号，也不敢丢掉抗日的招牌。这种既想投降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反动两面政策，就是五中全会以后蒋介石集团政治态度的基本特点。

五 远东慕尼黑活动

日军占领武汉以后，日本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以早日解决“中国事变”。武汉战役期间英法和德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使日本受到很大的鼓舞，几乎所有的日本报刊都吹捧出卖捷克领土的协定，宣传“中国事变”的解决对于世界“和平”比解决捷克问题更加重要。德国在慕尼黑取得的“胜利”，英法等国对捷克的出卖，使日本意识到，它可以利用在中国所掌握的对英国施加压力的手段，让英美等国在中国再来一个慕尼黑协定。在英国方面，由于欧洲战争日益迫近，已无力顾及远东，希望以妥协的办法来保护其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利益。美国这时也不愿意卷入对日战争，表示准备参加对它有利的谈判，以解决中日战争。

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非正式的“和平”谈判，孔祥熙曾表示希望英美进行斡旋。接着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为了解决中日战争问题，准备接受第三国的“善意斡旋”。月底，英国外交副大臣巴特勒表示，英国愿意单独或同其他国家协力，调停中日问题。十二月，英国大使卡尔由上海到重庆进行活动和蒋介石会谈了七次，并历访国民党政府要人。事后他在香港曾对日本人表示“假使日本和中国两方面都能自动地接近，那时英国很愿作一个调停者”。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政府透露的消息，也证明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一意图。二月九日路透社重庆电称，重庆一个国民党官员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日问题将由列强以压力加诸中日两国解决”。

一九三九年初，英美通过报纸大量散布关于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解决“中日冲突”的消息。四月，英国大使卡尔再次从上海到重庆进行活动，劝说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蒋介石集团对此表示响应，并在报刊上公开宣传“拥护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

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等等。

七月中旬，为解决天津英租界问题，英大使克莱琪和日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举行谈判。二十四日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表示“完全承认”战争状态下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侵占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承认“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并表示“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九月初，天津的英军五六百人撤离天津。二十日，香港英政府通知各中文报馆，不得称日本为敌人，亦不得以“某国”或“X国”暗指日本。二十八日，日军在天津英租界搜捕“反日分子”。

十月前后，美英大使一齐到重庆活动。这时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对美国合众社发表谈话称：“希望爱好和平的国家如美国，能促成调停”，并请务将此意告诉美国。接着孔祥熙也对美联社记者表示：“罗斯福总统曾明白宣示其本人之政策，主张召开国际会议，以解决中日之纠纷，以恢复远东之秩序，足见你们之行政当局已经承认，欲求保护美国之利益，则恢复远东之和平，实为必要”。此后张群等纷纷赴香港，作“和平”的试探。于是“和平”、“妥协”之声，传遍各地。但是，由于日本同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无法真正协调，由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后，英国在远东地位的被削弱，太平洋会议未能举行。

但是，远东慕尼黑活动并未停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美企图利用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内部矛盾，拆散东京柏林轴心，贿赂日本，把日本拉过来。美国虽然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废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但是大量的军事物资，特别是石油和废铁，仍然通过私人企业之手运往日本。五月，英国违反中立原则，与日本成立共管中国政府在天津租界所存白银的协定。七月，英日成立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三个月内，禁止武器、弹药及铁道材料经缅甸运往中国。同时禁止这些物资从香港运往中国。九月，英日恢复会谈。谈判中英国在上海公共租界问题上作了让步，于十月至十二月撤退大部分驻在中国的军队。法国和英国采取同一步调。英法的妥协鼓舞了日本，日军于九月下旬入侵越南，切断了中国的又一条国际交通线，并为进一步南侵做准备。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一年，日美之间为达成两国谅解方案，进行了民间的谈判和政府间的非正式谈判。该方案要美国总统劝告国民党政府，将“蒋政权与汪政府合而为一”，并“承认满洲国”。由于美日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远东慕尼黑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面共同起来反对这一阴谋。在此前后，《新中华报》、《群众》、《解放日报》多次发表社论，揭发这个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六 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积极诱降，国际上东方慕尼黑会议的酝酿，国民党五中全会反动方针的制定，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的加紧，使投降分裂倒退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及时地向党内发出

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党要用全力来进行反对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斗争，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反抗”。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投降的报告，强调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这是目前形势的特点。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势是由三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即日本的诱降政策、国际的压力、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三种原因中，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是主要的。在这种形势下，抗战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大部抗战，小部投降，这是我们希望，要力争之；一种是大部投降，小部抗战，这不是我们希望，但是可能的。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我们就把它颠倒过来，这也是可能的，也要力争。总之投降的危险是存在的，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争取光明前途必然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党在当前的任务是：（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二）全党努力，动员群众，团结和争取一切可能团结和争取的人，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不能有任何的动摇。报告分析了对蒋介石应采取的态度，指出：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当然要以抗战为条件。同时要看到蒋介石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但是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毛泽东的报告正确分析了事态的发展，指明了党的行动方针。这次会议为反对投降活动、防止时局逆转，作了必要的准备。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投降活动的观点、做法、阴谋；揭穿了英美法帝国主义策划“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政策；严正表明了共产党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反对投降，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给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动摇妥协指明了方向。九月八日，毛泽东等七名共产党参政员发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对目前时局的意见》，提出应从政治、军事、经济、党派合作等方面努力，以克服目前的困难与危险。指出：必须加强各抗战党派的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实行战时民主，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

对于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反共磨擦的罪行，共产党用各种方式予以揭露、批评和打击，并严正警告国民党：“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第二节 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一 日军的“治安肃正”作战 人民抗日力量的猛烈发展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在进攻武汉作战期间，提出一个《关于武汉、广州两战役善后处理的形势判断》的文件。它承认日本兵力不足，“在作战上大致已到达前进限度”；同时，“国内经济形势不容轻易乐观”。中国方面，“虽然国共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是中央军和共产军的统一战线暂时还不会破裂”。根据这一判断，提出今后“不谋求大规模的作战”，而要对所有占领区“彻底进行治安肃正”，强化伪政权；同时在占领区谋求军队的“自给自足”，以“防止陷入因暂时的财政破产而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的窘境”。十一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方针是：“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以“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在华中，一方面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一方面以武汉和九江为根据地，协同海军确保从岳州以下扬子江下游的交通。在华南，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线。

为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敌大本营于十一月从华中和华南调出三个师团，一九三九年一月再调五个旅团，四月又从国内调来四个师团，全部编入华北方面军序列。至此，华北方面军共拥有十五个师团、九个旅团、一个骑兵集团和一个航空部队的庞大兵力。此外，日寇还决定扩充奸伪武装团体，如自卫团、治安军和各种警备队等。

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日本华北方面军连续发动三次“治安肃正”作战。目的是“彻底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和自主的建设”，以便掠夺资源，支持持久战。作战的重点“专以敌人的游击战术为对象给与完全封锁”。

面对敌军的大举进攻，敌后解放区广大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贯彻“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同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和“扫荡”，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在抗战第三周年的一年中，八路军对日伪军作战六千九百多次，歼灭日伪军十一万三千多人，缴获各种枪炮三万八千四百多件。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两年中，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二千四百多次，歼灭日伪军五万一千多人，缴获各种枪炮一万五千三百多件。从抗战开始到一九四〇年的三年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县城一百五十座，从敌人手里夺回了大片国土。一九四〇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和伪军的全部，总数共达七十万。在对敌斗争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猛烈的发展，到一九四〇年七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八十万人，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约达一亿。解放区军民既巩固了华北解放区，发展了华中解放区，又开辟了华南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

二 巩固华北解放区

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所创立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各解放区，象利刃插入敌人心脏，给予敌人以致命的威胁。所以这里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异常激烈。抗战的第二第三周年，敌千人以上的“扫荡”即达一百零九次，使用的兵力在五十万人左右，约占当时侵华日军的一半。敌人为了实施所谓“治安肃正计划”，在军事上采取分区“扫荡”、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战术。同时大修铁路、公路、据点、碉堡，实行分割和封锁解放区的“囚笼政策”。在政治上，加紧巩固伪政权，扩大伪军，建立县警备队、保甲自卫团，实行保甲连坐法，加强汉奸特务组织。在经济上，一方面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严禁日用品及军用物资进入根据地，切断各根据地内部的物资交流，并在“扫荡”中，对根据地的物资大肆掠夺破坏；另一方面在敌占区对人民财产进行公开掠夺，并实行严格统制，杜绝敌占区同根据地的经济联系。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华北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总部深入华北敌后，转战于太行山上，指挥根据地军民，同日寇浴血奋战。

晋察冀边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次年一月，日军两次围攻冀中地区，占领了大部县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二九师主力开至冀中，组成了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军政委员会和以贺龙为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的冀中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当地的游击战争。二月至五月，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攻。四月下旬，在河间县的齐会村歼敌七百余人，首次取得平原歼灭战的胜利。九月下旬，由冀中转移到北岳区的一二九师主力，在灵寿县的陈庄歼敌一千二百余人。十月至十二月，日军二万人对北岳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晋察冀军民奋战四十三天，毙伤敌军三千六百余人。其间在涞源附近进行的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抗战以来被打死的第一个敌人中将军官。同年一月，成立了冀察热挺进军，统一指挥平西、冀东、平北地区的武装斗争。挺进军粉碎了敌人对平西的两次进攻，在平西建立了较巩固的根据地。冀察热地区的游击战争蓬勃地发展起来。到一九四〇年，晋察冀边区已发展到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以南，山海关以西，同蒲路以东的广大地区。

晋冀鲁豫地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敌人对冀南的“扫荡”被粉碎后，次年一月，日军三万余人分十一路再次对冀南进行大“扫荡”，占据了所有县城。八路军先后进行了百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三千余人，粉碎了敌人控制冀南的企图。七月初，日军五万余人对晋冀豫山区进行大“扫荡”。一二九师等部展开反“扫荡”。到八月下旬，共歼灭日伪军二千余人。十二月，八路军进行邯长战斗，歼敌七百余人，攻克黎城、涉县等地敌伪据点二十多处，使太南、太北连成一片，巩固了后方。一九四〇年四月，成立冀鲁豫军区。至八月，八路军对平汉、石德、白晋铁路和敌人所占公路进行破击战，发动了白晋、武（安）沙（河）等战斗，严重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边区建立了统一的行政联合办事处。到年底边区已发展到西起同蒲路，东至津浦路，南临黄河，北抵石太、石德路的广大地区。一九四一年七月，原山东的鲁西区与冀鲁豫区合并划入本区，此后改称晋冀鲁豫边区。

晋绥边区一二九师东进冀中后，三五八旅和山西新军坚持西北的斗争，一九三九年多次粉碎了敌军的围攻。大青山支队粉碎敌军多次围攻，坚持了

绥远地区的斗争。但是由于敌军占领了偏关、五寨等重要城镇，阎锡山又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使晋西北的形势十分严重。一九四二年二月初，一二九师主力回到晋西北，肃清了顽军和旧政权。六月，日军两万多人对晋西北进行大“扫荡”，八路军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战斗，歼敌四千四百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同时大青山根据地也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十一月，晋西北军区成立，领导北起大青山，南至汾离公路，东至同蒲路，西到黄河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

山东区一九三九年春，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进入鲁西。三月首战郟城敌伪据点樊坝，克捷。四月下旬，敌集中十七个县的守备兵力六千人，一百多辆坦克，分七路包围八路军泰肥山区驻地陆房。八路军歼敌一千三百余人，胜利突出重围。八月，又在梁山泊歼敌一个大队。一九四一年一月，又歼敌千余，粉碎了敌人三万人的围攻，鲁西根据地获得了巩固。到了一九四一年底，全山东已有七十多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并成立了山东战时行动委员会，作为山东区最高行政机关。全区有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等五块抗日根据地。人民军队也壮大起来。同年五月一一五师南下，与华中新四军沟通了联系。

在华北军民的对日作战中，一九四二年八月至十二月进行的百团大战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实际参战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共计一百零四个团，近四十万人，动用民工二十多万人。战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通总破袭，进攻重点是正太路。第二阶段重点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第三阶段是粉碎敌人的“扫荡”。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三百多人（其中日军二万零六百多人）；攻克敌伪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三处；破坏铁路四百八十多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车站、桥梁、隧道、水塔等建筑物二百六十余处；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民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它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对于克服当时的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它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谰言，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在全国的威望。毛泽东获悉后致电战役的指挥者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回？”但是，这次战役也有错误，主要是对敌人的进攻方向估计得不对。战役后期，太行山区破袭的时间太长，使一二九师伤亡过多。

三 发展华中解放区

为了发展华中解放区，共产党成立了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统一领导华中的工作。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到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一九三九年春夏，第一支队向东挺进，取得了很大胜利。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对第四支队及江北部队进行了整编，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兼任新组建的第五支队司令员。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工作，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两个支队的兵力

增至一万多人，并于十二月下旬粉碎了二千余敌军的“扫荡”。一九四一年三月，又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八、九月间巩固了皖东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彭雪枫游击支队打开豫东抗战局面后，经过一年多的战斗，部队得到很大发展，创建了豫皖苏游击根据地。该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一九四一年六月，黄克诚率领八路军一部南下与第六支队会合，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五纵队。彭雪枫任第四纵队司令员，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执行东进任务，九月进入淮海区。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七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派出部队和干部进入皖东北，开辟了皖东北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一月，李先念率领新四军两个游击中队和一个干部队，自河南确山竹沟出发挺进鄂豫抗日前线。次年一月，将鄂豫边区各地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年底，创建了鄂豫边根据地，部队发展至一万五千余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江南指挥部组织新四军挺进纵队，开展扬州、泰州地区的游击战争。组织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创造了向北发展的有利条件。一九四一年七月，为了开辟苏北根据地，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陈毅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指示，成功地进行了反顽斗争，争取了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的中立。接着，将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七月下旬挥戈东进，一举攻占黄桥等地，歼灭顽军二千余人。尔后即展开打击敌伪的反“扫荡”斗争。十月初，又进行了反击顽固派韩德勤的黄桥决战。全歼韩顽主力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全部一万一千余人。十月十日与南下的八路军五纵队会师。至此，苏北的盐城阜宁均被新四军控制，完成了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与此同时，苏南根据地也有很大发展，成立了新的江南指挥部。

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坚持了皖南的斗争。一九三九年，第三支队与敌伪作战二百余次，粉碎敌人五次“扫荡”。一九四一年四月，又粉碎敌万余人的大“扫荡”。但是，由于项英的右倾错误，新四军在皖南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任命叶挺陈毅为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叶挺抵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这就为坚持华中抗战局面和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四 开辟华南解放区

广州失陷后，以东江地区红军游击队员、省港工人、学生为主要成分，组成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起，游击队在广九路两侧不断打击敌伪军。一九三九年春，在南海、顺德、中山一带也展开了游击战争。抗日武装力量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并以淡水为中心，在二十多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一年，组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曾生任司令员。

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在广州沦陷后整编为琼崖抗日自卫队独立队，积极准备迎击日寇。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寇侵入海南岛，国民党官兵闻风而逃。自卫队独立队扩充为六个中队，共二千多人，到处打击日寇。一九四一年底，

成立了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后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琼崖纵队），部队发展到三千人，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第三节 国民党强化法西斯统治第一次反共高潮及其被击退

一 日军的局部进攻 华中华南国土的继续沦丧

日军在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的同时，为了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和控制交通要冲，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为了取得南进的据点，从一九三九年初到秋，在华南和华中地区发动了局部进攻。九月，日本大本营决定撤销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另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统率中国战场的所有部队。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军一部在海南岛的天尾港登陆，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当天即占领海口和琼山，接着又占领安定和清澜港。十四日，另一部日军在榆林港等处登陆，当天占领三亚、榆林、崖县。三月三十日，日本政府非法宣布南沙群岛归日本领有。四月，日军攻占江门及新会。六月下旬占领汕头、潮州。十月初占领深圳。二月中旬，日军五个师团，以一部牵制鄂南、湘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向南昌进攻。二十七日南昌失陷。九月中下旬，日军六个师团由长江舰队配合，分三路进攻长沙。国民党军队奉命撤退。日军先头部队进抵长沙北面。由于受到赣北和鄂南国民党军队的牵制，日军兵力不足，联络和补给困难，遂于十月一日退却。国民党军进行追击，歼灭了部分敌人。为切断中国西南交通线，十一月十五日，日军在广东钦州湾登陆，二十四日占领南宁。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发动襄宜战役，以确保武汉并威胁重庆。八日占领枣阳。十一日国民党军队曾进行反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于是役阵亡。六月一日，日军攻陷襄阳，十四日占领宜昌。

从一九三九年春至一九四一年，日本空军大规模轰炸中国后方的城市，尤其集中对重庆进行轰炸，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和损失。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和四日对重庆轰炸，炸死四千余人，伤三千余人，毁房屋一千多栋。

二 国民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

蒋介石集团历来就利用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做为巩固其反动统治的工具。抗战时期继续这样做。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确定文化政策案》，规定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为国民精神教育之总纲”。强调“加强全国民众之精神国防”。这是国民党大搞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先声。

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在实行各种反动政策的同时，大力进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自任会长。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公约及誓词》和《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

《纲领》吹嘘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制胜之主要条件”和“救国建国之最新武器”，实际上是打着“抗战制胜”、“救国建国”的旗号，进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中心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必须认定“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国民“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牺牲个人之自由”。所谓“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就是要“国民一切之思想行动，均应绝对受国家民族军事利益之支配”。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在抗战时期“要求国民全体的思想，绝对统一”。

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不容其分歧及怀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论”。《纲领》要求确立所谓“救国之道德”。这种道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八德之中，最根本者为忠孝”。要求国民“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纲领》说要达到抗战建国之目的，需要改造国民精神，为此也写上了“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之类的话；但它的根本之点是要“纠正”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要求一切思想言论不能违反“三民主义”，不能“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违反此规定，就要“一体纠绳”。以上这些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主要内容。《实施办法》中规定，省（市）县都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规定国民以同业公会、学校、机关等为单位，每月集会一次，在会上讲解纲领的内容，宣读《国民公约》及《誓词》。五月，国民党决定举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蒋介石在重庆主持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蒋介石国民党大张旗鼓地推行这一运动，是有它的政治目的的。这次运动虽然打着为战胜敌国而改造国民精神的旗号，但主要是要人民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尽至忠”、“行大孝”，维护“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对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一概“摈绝”。它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对这次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共中央发表文告和对党内的指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对它标榜抗日的方面予以支持，对它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方面则进行实质上的批判，抵制揭露它的阴险企图，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正确的行动方针。针对国民党的三个口号，指出：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国家。抵抗到底，把日寇完全逐出于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这就是“国家至上”。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就是“民族至上”。有些人“企图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来代替和掩盖全国家全民族的最高利益，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就等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同样没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必须给以深刻的批评”。共产党早已提出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号召，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对于一切贪生怕死之徒，在前线后方一切违反和破坏军事胜利的有害活动，一切不顾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之徒的罪行，应予以严厉的批评，给以应得的制裁。唯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的。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与力量集中起来。共产党揭穿了国民党的企图，捍卫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三 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的强化和新县制的推行

抗战以后，国民党政府仍旧坚持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其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到反共反人民方面，国民党政权更加法西斯化了。

蒋介石集团尤其是蒋介石个人政治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与扩大，是国民党强化法西斯统治的一个突出表现。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凡国民党中央所属的各部会，国民党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所属的各部会，

均兼受这个委员会的指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担任。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另由委员长提出的人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就使蒋介石进一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同时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委员。在各战区司令长官部设立分会，在战区内的省政府设立办事处，以此加强蒋介石对战区的控制。一九四一年，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所谓计划、执行、考核三者互相联系的行政工作制度。为此设立了中央设计局，负责审议全国政治经济建设计划和预算、党政机构重要法规的调整以及重要政策的建议等。同时还设立了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直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以委员长身分兼任设计局总裁和考核委员会委员长。

国民党大力加强特务统治。一九三八年扩大原来的特务机构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这两大特务系统，建立对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的军令部第二厅。一九三九年设立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特训总队，一九四一年又将该组织改为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本部设在咸阳，在洛阳和兰州设两个独立大队，专门扣留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和强行“收容”各地失学失业青年。这个劳动营实际上是迫害青年的集中营。

国民党为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从一九三九年起开始推行所谓的“新县制”。六月，在行政院下设立县政计划委员会。九月，国民党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下令全国各地“应无分敌后与前方后方，一律遵照实施，战地各县，尤须尽量提前完成”。这样，新县制就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遍推行。

国民党实行新县制的根本意图，在把地方上的政治、财经、教育、地方武装、民众组织和训练统统紧紧地控制起来。新县制的主要内容是：“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区署为县政府的辅助机关。县以下为乡（镇）。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乡（镇）长、保长必须“经训练及格者”才能充当。为了便于国民党直接控制政权，规定“党政层级完全配合”，县长必须为国民党员。设立各级“民意机关”：县参议会、乡镇民代表会、保民大会、户长会议（必要时得举行甲居民会议）。这实际是假冒民意机关之名，利用中国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保甲制度和宗法制度，加强对农村的统治。地方武装组织，乡镇为乡镇国民兵队，保为保国民兵队，甲为国民兵班。队长由乡镇长、保长兼任。教育方面，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乡镇长、保长兼任校长。学校教师兼任乡镇保干事等职务。这样就把政治、武力、教育结合在一起。这是加强反动统治的一种措施。

新县制颁行以后，据国民党公布的统计数字，截至一九四三年底止，计有川康滇黔桂粤闽浙皖赣湘鄂苏鲁晋绥豫陕甘宁青二十一省，已经实施。据川康滇黔桂闽浙皖鄂赣湘陕豫甘宁青十六省一九四二年底的总计，调整县政府一千一百一十九个，区署一千八百五十三个，建立乡镇公所三千零四百七十个，保办公处三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一一个，甲四百一十一万八千四百一十三个。国民党公布的统计数字与实际上的效果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新县制的大力推行，在加强国民党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强化基层政权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上，是起了作用的。

四 国民党的宪政骗局和人民的宪政运动

抗战前夕，共产党就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抗战开始以后，共产党继续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进行争取抗日民主的活动，全国人民争取民主的热情十分高昂。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政权是买办法西斯专政，他们是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的。但是由于形势所迫，又因孙中山有在中国实行宪政的主张，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宪政。因而采取挂羊头卖狗肉和一再推拖的伎俩。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党顽固派迫于人民的压力，特别是为了抵制共产党的改造政府的主张，忽又玩弄起“宪政”骗局来了。九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国民党方面的参政员突然在会上提出一个“建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的提案，得到会议的一致赞同。在这次参政会上，经过中共和各党派民主人士提议，通过了《关于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案》，规定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底以前结束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

一九三九年十月和十一月，由张澜、沈钧儒等参政员发起，在重庆召开了四次宪政座谈会，到会的有七、八十人，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出席并参加座谈会的领导。第四次座谈会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选举黄炎培、沈钧儒、李璜、董必武等八十五人为筹备委员。同时重庆的三十几个妇女团体发起妇女宪政座谈会，青年代表二十五人发起青年宪政座谈会。成都、桂林、上海等地也先后组织了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各党派、各阶级、各团体的代表人物，在会议上和报刊上纷纷发表关于宪政的言论，宪政问题一时成为全国注目的大事。

共产党认为，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国民党并没有诚意，但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所以解放区广泛开展了要求国民党实施宪政的活动。在延安，毛泽东、吴玉章等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次年二月二十日举行成立大会，吴玉章任理事长。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大会发表宣言。其它解放区也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

事实上，国民党顽固派是假宪政之名，行法西斯专政之实。蒋介石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假惺惺地说，提早颁行宪法，是国民党“十年来所不断努力以求的一件大事”，他个人“没有一时一刻忘记如何使宪政早日实行”。但是，又说，促成宪政和实施训政“是相需相成”的。“将来虽在宪政颁布以后，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训政的工作”。“训政”是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别名。有了宪政以后仍要实行训政，可见他的宪政完全是假的。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召集国民大会以后，国民党的一些文人政客，叫嚷召开国民大会“并非即时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宪政不但不是党治之结束，相反，正是党治之开始”。中国只有一个党，因此“宪政时期的党治，自然是国

民党治国”。有一个国民党分子写道：今天“国家之要务，乃不仅在于保护个人应有之自由，更在于能约束人民不应有之自由。不只在防止政府权力滥施，更在于造成政府权力之善用”。他把“约束”人民的自由、加强政府的权力说成为“宪法的新概念”。可见国民党的宪政，完全是一个骗局。

国民党的“宪政”骗局，又一度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他们积极地参加宪政运动，以为民主宪政马上就要实现了。罗隆基说：“实施宪政，在今日是全国国民一致的要求，亦是蒋委员长的主张，因此，实施宪政的日期必不至过分延缓。这种意义的公开政权，今后或者用不着人民特别努力争取”。还有人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称为“划时代的民主改革案”。认为该案“显示出国家民族之向上线的无限性的永生”。

这时，共产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也被国民党的宪政骗局所迷惑，王明就认为国民参政会通过的请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和国民党六中全会定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开始了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新局势”。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是表示国家实行宪政的开始”。

毛泽东洞察蒋介石玩弄的宪政骗局，决定将宪政宣传夺取过来，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指出，我们现在所要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他揭穿了国民党蒋介石所鼓吹的“宪政”的实质，指出：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实际上是和袁世凯的专制主义一样的东西，不给人民以丝毫的民主自由，“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这些顽固派现在口谈宪政，是“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但是，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而“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同时，目前中国也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只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指出：“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毛泽东的演说为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于那些醉心于资产阶级宪政的人，也是一付清凉剂。

国民党本来就是玩弄骗局，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又使它十分恐惧，于是设法破坏这个宪政运动。它在各地禁止和限制争取宪政的活动，限制报刊刊登关于宪政的文章。在重庆派特务流氓在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上捣乱。反动宣传机器中央社捏造取消宪政促进会的消息。一九四一年四月初，在国民参政会第五次会议上，由秘书长王世杰强行通过一项决议，决议说“本会宪政期成会草拟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及其附带建议，及反对设置国民

潘公展：《宪法民主与三民主义》，《时代精神》第一卷第五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出版。

梁寒操：《宪法问题之根本认识》，《时事类编》特刊第五十三期。

罗隆基：《论公开政权》，《今日评论》第三卷第二十一期，一九四一年五月出版。

陈绍禹：《促进宪政运动努力的方向》，《新中华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大会议政会之意见，并送政府”。此后全无下文。九月国民党宣布：因交通不便，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国民大会之召集日期另行决定。热闹一时的宪政运动就此收场。这个运动又一次暴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反动本质，也又一次教育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一些民主人士。

五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打退

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反共活动愈演愈烈。一九三九年四月，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秦启荣部在博山等地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指战员四百余人。六月，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指战员四百余人。同月，湖南国民党军队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杀害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干部罗梓铭、涂正坤等六人。九月，国民党军队在湖北东部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人。十一月，河南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及家属二百余人。从这年年底到一九四一年春，国民党更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军事进攻主要在三个地区。第一是陕甘宁边区。一九三九年五月，国民党在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绵延千里。十二月，胡宗南部袭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第二是山西。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决死第二纵队和晋西独立支队，并以一部兵力配合蒋介石的军队，向晋东南的决死第一、三纵队进攻，摧毁了沁水等七个县的抗日政权。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蒋阎军进攻太南区 and 太岳区。阎军两个师进犯晋察冀边区的雁北地区。第三是冀南豫北地区。一九四一年春，第十军团总司令石友三部向冀南区进攻，同时蒋介石调遣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使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重危机。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是有准备的。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对国民党军队的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对时局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凡遇军事进攻，应“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严厉地打击了进犯的国民党军，并驱逐了绥德等五个县的国民党官吏，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山西，晋西北的八路军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发起反攻，二月底全部肃清了该区的国民党军；晋东南的新军除决死三纵队被反动军官拉走外，其余都在共产党领导下，编入一二九师和一二一师；太南和太岳区的八路军给阎军以严重打击，恢复了失去的部分地方。此外，晋察冀部队消灭了进犯雁北的阎军一个师，将另一个师赶出该区。在冀南、豫北，一九四一年一月，冀南部队在冀中部队的配合下，进行反击战，消灭石友三军一部，将另一部逐出冀南。三月，一二九师在晋察冀部队的协助下歼灭朱怀冰部主力万余人，残部南逃。同时，山东根据地的军民在鲁西和鲁中进行反击战，歼灭了石友三、沈鸿烈、秦启荣军各一部，收复了被占地区。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均被粉碎。

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休战，派人分别同国民党第

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结果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商定以汾河为晋东南和晋西南的分界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东南、晋西北为八路军与新军活动地区。至此，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第四节 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统治和掠夺

一 汪伪政权的成立 全国人民对汪精卫集团的声讨

一九三九年五月底，汪精卫等去日本，先后和日本首相平沼及陆军外交等大臣会谈，得到了日本政府支持他们建立伪中央政府的保证。八月底，汪精卫等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政纲》，通过了“以反共为本党之基本政策”、“根本调整中日关系”等提案，发表了宣言。宣言再次申明，承认日本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无耻地说日本已“放弃侵略主义，欲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吾人不可不以全力谋其原则之实现”。“自今而后，当易抗战建国之口号为和平建国”，“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

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签订《日汪协定》（即《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协定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既成事实之存在”。协定的附件具体规定了所谓“日支新关系”的原则及调整要项：第一，“承认满洲帝国”。华北为日、满、支“强度结合地带”，“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在财政经济、人事权、与日满间的交涉等方面有自主权。蒙疆亦属“强度结合地带”，在军事上及政治上处于特殊地位，有广泛的自治权。扬子江下游地域，为日、支经济上强度结合地带。日本在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有“特殊地位”。第二，日本得在“华北及蒙疆之要地”、“长江沿岸之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陆海军。并对驻兵地域内之铁道、航空、通讯及主要港湾水路，“保留其军事上之要求及监督权”。第三，华北、蒙疆及其它地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应与日本以特别之便利”。对沦陷区的财政、经济、交通、农业、贸易及海关等，日本将以“援助”的方式加以控制。第四，日本以配置顾问职员等方式控制汪政权。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者除汪派代表外，还有伪临时、维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及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的代表。会议决定伪政权用“国民政府”名义，“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决定由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王克敏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三十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四月，日本特派大使、前首相阿部信行，到南京“祝贺国民政府还都”。

十一月中旬，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承认汪伪政府。三十日由阿部和汪精卫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同时由日、汪和伪满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所谓基本关系条约，就是把日汪之间的秘密协定改为正式条约。它的内容远远超过卖国条约二十一条。

汪伪政权的成立和卖国协定的签订，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纷纷起来声讨。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伪中央；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抗战到底。二月一日，延安召开军民讨汪大会，各解放区相继举行讨汪除奸大会。四月，八路军新四军发表讨汪救国通电。国统区的各界人民、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群众团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海外华侨，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宣言和讲话，一致讨汪。在沦陷

区，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反汪怒火，也冲破敌伪的残暴统治而迸发出来。

日汪密约签订以后，蒋介石说这是汪精卫替敌人“建造灭亡中国的陷阱”。表示将继续抗战。他还利用这个机会，呼吁“诸友邦”应当“切实援助中国之抗战”。汪伪政权成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照会各国，否认汪政权，要求各国不要承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声明，日汪非法签订的条约全然无效。

二 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军事占领区大肆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其中关于经济方面的规定有：对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日满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重点，中国要“提供特殊便利”，在其它地区，关于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国也要“提供必要的便利”；对于中国财政经济政策的确定，“日本予以必要的援助”；在贸易方面，“采用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中国对日本的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在交通通讯等方面与日本“合作”；在农业方面，中国要“设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这些规定是日寇既定侵华方针之一“经济提携”的具体化。

在东北，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建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垄断钢铁、轻金属、汽车、飞机、煤炭等的经营。为了战争的需要，制定了两个产业五年计划（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疯狂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在农业方面，大量掠夺粮食，实行百万户农业移民计划，圈占大量土地。

在关内，日本在沦陷区对金融、工矿业、农业等方面，进行各种形式的掠夺：

在金融方面。日伪先后在华北华中设立银行二十余家。一九三七年九月设察南银行于张家口，十一月扩大改组为蒙疆银行，它是蒙疆地区的中央银行。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北平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后在各处设立分支行三十余处，这是华北“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一九三九年五月在上海成立华兴商业银行，它是“维新政府”的中央银行。汪伪政权成立后，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取华兴而代之。这些银行除经营一般业务以外，都有发行伪钞、代理“国库”等特权。它们控制着各该地区的普通银行和地方银行。一九四一年五月在汉口设立中江实业银行。在广东设立广东省银行。日伪利用这些银行发行的大量伪钞，掠夺物资。日寇还用军用票掠夺中国的物资。

在工矿业方面。“七七”后的第一年内，敌人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方式，在华北采用“军管理”，在华中采用“委托经营”（即由被委托的“公司”经营）。但是由于工矿遭到破坏，工人离散，资本缺乏，这种“经营”、“管理”办法归于失败，生产、运输、贸易陷于停顿状态。“以战养战”政策提出后，敌人改用“中日合作”方式。一九三八年设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两个“国策公司”，两个公司之下设立许多分公司，经营华北华中的煤铁等矿产以及盐、电力、交通、通讯等。按形式上的规定，华北开

蒋介石：《为日汪协定告友邦人士书》（一九四一年一月）。

发公司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百分之四十五，日本投资百分之五十五；华中振兴公司所属各企业，中国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本投资百分之四十九。以此引诱中国资本家与日本“合作”，实际上企业经营权全归日本，大部分利润也归日本所有。

到一九四一年三月，随着汪伪政权的建立，日寇采取了更具有欺骗性的办法。敌派遣军总司令声称“将以若干财产交还给合法的原主”。但所“交还”的工厂企业，只限于“军管理”下面的单位，而这些企业的大部分早已并入“国策公司”，余下的已很有限。就是这些余下的企业也不是直接交还原主，而是交给伪政权。由伪政权与原主谈判，在原主“偿还”敌人大笔“修缮费用”后，才能收回。至于由两个“国策公司”经营或日本私人经营的较大的工厂，都不在交还之列。总之，沦陷区的工矿企业完全为敌人所直接掌握和控制。

在农业和农村方面。第一是强占土地。“七七”以后，敌人的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军粮城、茶淀两大农场的土地五万六千亩。一九四一年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占冀东沿海土地七万顷。敌人修筑兵营、仓库、公路、碉堡、封锁沟墙、飞机场等，更是任意侵占土地。日寇向我国移民所占的土地房屋也是从农民手中夺去的。第二是由地方伪政权征收捐税。第三是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例如，一九三八年西河美国种棉花在天津市场上每担价格为六十五元，而日伪的统一收购价格为三十八元；华北各地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第四是日伪军直接掠夺粮食、耕畜和各种财物。敌人将粮食规定为军用物资，实行“粮食统制”，强行“征购”，实施所谓“配给”，造成普遍的饥馑和死亡。

除上述几方面，青壮年也是敌人掠夺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以前，日本侵略者仅在华北就劫走青壮年六百万人，到东北等地从事苦役劳动。到一九四四年，还有二十二万六千人被抓到日本去当苦工。

三 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对沦陷区的统治，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对文化教育的规定：“尊重汉民族固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对共产党，应绝对加以排除、扫击”。“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要“振兴儒教”。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教育方面奴役中国的方针。

沦陷区的教育完全适应日本的奴化政策的需要。高等教育是为培养各级傀儡官吏和高级奴才服务的。蒙疆学院、新民学院和建国青年学院，无不如此。中等教育，主要是所谓“实务”教育，即以培养为其效劳的下层技术人员和推行奴化教育的师资为目的。初级教育，日寇最为重视。向儿童灌输奴化思想，这是日寇妄图从根本上灭亡中国的最毒辣的手段。在师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上日寇严加控制。各个中学都派有日本教官。伪南京市教育局曾举行全市中小学教职员的思想测验，发现有抗日思想者即予停职或惩办。日寇经常派人到学校巡视，甚至每周一次，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谬论。日伪还常常举办师资训练班、补习班、“临时教

员养成所”等，制造奴役中国的奴仆。日伪还不断选派青年去日本“留学”，造就其忠实奴才。日伪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认为这是考验伪政权实行“中日亲善程度与真诚情势”的重要问题。课本中凡涉及抗日爱国和容易激发学生爱国心的内容尽行删除。在史地课本中，篡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教员稍有正确解说即罹大祸。课本和教学中除宣扬“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之外，还提倡尊孔读经，竭力利用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维护日伪的统治。伪华北教育总署把“提倡我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思想趋于正轨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定为教育方针。

社会教育及宣传完全为日寇所控制。日伪在沦陷区办了新民会、民众教育馆等团体和机关，出版大量报纸刊物，放映电影，演出戏剧，进行欺骗宣传。其内容主要是宣扬“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圈”、“皇军”战绩，宣扬中国的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散布大量诲淫诲盗的毒素。敌伪还扶植和利用封建会道门宣传封建迷信。一切对日寇有用的东西都动用起来为灭亡中国服务。

日本帝国主义为适应其政治经济侵略的需要，在教育和宣传上常常变换手法。初期，对中国原有的文化教育机关肆意破坏和摧残。我国丰富的文化古迹、古代文物、图书文献大量被毁坏和窃夺。当日寇转为巩固占领区时，就侧重在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为了达到征服中国民心的目的，妄图利用中国民众的民族感情进行欺骗。一九四一年汪伪政权建立后，日寇对孙中山态度的变化就是日本策略改变的一个明显表现。日寇妄想通过伪政权把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这面旗帜抓在手里，为他所用。一九四一年六月，汪逆手订《宣传工作人员训条》十二条，从反共卖国的反动立场出发，对三民主义横加曲解，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日寇的所谓“大亚洲主义”、中日“同文同种”等谬论混为一谈，胡说“和平、反共、建国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南针”。

四 沦陷区人民的反日伪斗争

处于敌人严密控制之下过着亡国奴生活的敌占区人民，日夜盼望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解放。他们在敌人残酷的军事镇压之下，仍然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共产党在沦陷区采取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深入到工人、职员、教员中开展工作，甚至设法打入敌伪的机关和要害部门，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智勇敢地为党收集情报，向解放区输送干部和物资，有力地配合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抗日积极分子、民先队员到平西开展游击战争。上海的地下党动员大量学生、工人和各种技术人员到解放区，为新四军购买药品、物资。党组织发动工人以各种灵活的方式同敌人进行斗争，如请假、怠工等。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天津老闸口开办的天津昌和厂，一九四二年改为生产军火，工人们便用“磨洋工”、破坏产品、以坏充好、虚报上缴数字、偷回入库产品再缴等办法，破坏敌人迫击炮弹的生产。共产党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一九四三年春天，北平门头沟矿工为要求改善待遇，罢工三天。一九四四年六月，上海在一周内连续发生六次罢工。自来水厂工人的罢工震动最大，全市停水四小时。这些斗争，增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教育和锻炼了工人阶级，给了日伪一定的打击。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为了配

合解放区的局部反攻，沦陷区城市工作也进一步发展，党提出争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新目标。

在敌人占领的县城和农村中，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而反抗。一些地区举行了示威和暴动。一九四二、四三两年内，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省都有农民的起义。一九四二年九月，江苏如皋三万多农民拿起武器和农具反抗百余人的敌伪抢粮队，歼灭大部敌人，并乘胜攻入敌据点，杀死敌伪军十余名。十一月山西洪洞、赵城、和顺、辽县四县农民为反对“配给制度”而起义，杀死四个伪县长和六十余名敌军。其他地方类似的斗争也时有发生。这些起义和斗争给予了敌伪统治以一定的打击。

在沦陷区人民反日伪斗争中，最值得称颂的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一九三八年以后，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极端艰苦的时期。这时日寇大量增兵东北，对抗日联军进行疯狂的“扫荡”，并采取并大村、筑围墙、坚壁清舍、封锁食粮、户口登记、十家联保、发通行证等等办法，企图隔断人民群众与抗联的联系，困死抗日联军。一九四一年由于环境日益残酷，东北共产党组织又将三路军缩编成十个支队，转入深山密林坚持斗争。他们冒严寒，顶风雪，吃草根树皮，在深山露营。当时流行这样一首歌：“天大的房子，地大的坑，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这是抗联生活的写照。在战斗中，无数的抗日英雄倒下了，为祖国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冷云等八个女战士，在重围中英勇奋战，宁死不降，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投入牡丹江。杨靖宇的壮烈殉国，更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贵的革命品质。一九四二年二月，杨靖宇率部在蒙江地区与日军激战，不幸被敌军包围，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坚持到最后最后一口气。牺牲后，敌人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烈士的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杨靖宇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反侵略的正气和共产党人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整个抗战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他们的英勇战斗，打击和牵制了敌人，对关内的抗战起了战略配合作用。

第五节 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和争论

一 文艺思想方面的斗争

南京失陷，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武汉以后，加强了对进步文化的压制。一九三八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时期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法令，用种种办法禁止进步书刊的出版和发行。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更加紧了对进步文化的摧残。在文化思想领域，国民党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方面，国民党御用文人提出了所谓“三民主义文艺”。他们说，文艺运动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在创作上，应使“三民主义”“成为作品的中心意识”。王平陵在《战时文学论》中露骨地说：文学家不仅要“竭诚的拥护”蒋介石，还要“指示民众协助领袖”以“加强其指挥权的绝对的统一”。可见，所谓三民主义文艺，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文艺。

抗战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最重大的问题是文艺要不要为抗日战争服务的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梁实秋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征求与抗战无关的文章，反对所谓“抗战八股”。他在《编者的话》中说：“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谁都没有益处的”。不久，沈从文提出“反对作家从政”的论调。他说作家参加抗日工作是“从政”，不是作家所应该从事的工作。他说抗战的作品，包含了“虚伪”和“浮夸”。他认为作家不应太注意时代而忘记了艺术，文学“堕落”的原因在于把创作的目的“集中在政治上的效果”。他鼓吹进行远离“战争浪漫情绪”的写作。这些论调，都是反对文艺为抗战服务的。

革命文艺工作者对这种论调进行了严正的批评。他们指出：抗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已经波及到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如果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实际上就是抹杀抗战。提倡这种论调的人，“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对于所谓反对作家“从政”，郭沫若给予有力的驳斥：“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他们说加紧反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胜利，是新文艺所负的使命。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陈铨、林同济等先后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和《大公报》的《战国》副刊，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极力颂扬所谓“力的文化”，崇拜“天才”。他们在文艺上主张描写强力，并把它表现为一种永远循环着的“恐怖与狂欢”。陈铨写的剧本《野玫瑰》竟把法西斯特务当

严明、黎明：《建立三民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民族文化》第六期。

沈从文：《一般或特殊》，《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二五五——二五七页。

罗荪：《再论“与抗战无关”》，《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二五——二五二页。

巴人：《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二五八页。

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三一一页。

独及（即林同济）：《寄语中国艺术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三三二页。

作“英雄”来歌颂。荆有麟写的小说《间谍夫人》，对卑鄙的出卖灵魂的特务夫人进行无耻的颂扬。这些作品是战国策派反动文艺观点的产物。对战国策派的文艺观点，当时的《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曾发表了汉夫、何其芳、欧阳凡海、洪钟等人的文章，予以批驳。他们指出：“‘战国派’的言论的实质，是一派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为虎作倀与虎谋皮的谬论”。战国策派叫嚣“力的文化”，是抹杀正义和非正义，是宣扬法西斯的侵略主义，是为日寇侵略中国张目，是在散布中国必亡论。至于所谓“天才论”以及“恐怖、狂欢、虔恪”的文艺观，其实质是宣传反理性的法西斯野蛮主义，是无耻地颂扬侵略者和法西斯特务的暴行，以欺骗人们，使之盲目地崇拜独裁者而供其驱使。

二 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抗战爆发后，为了运用文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文艺大众化成为文艺界的迫切要求。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建立了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另有通俗读物编刊社，编撰了不少通俗读物。与此同时，文艺界对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讨论。这时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与实践，比三十年代初期有所进展，但大半只限于形式方面，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亟需要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毛泽东的论述，对于文艺界正在讨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于是民族形式问题便成为讨论的中心。这一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讨论的继续发展。

在延安，《文艺战线》、《中国文化》等刊物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其中有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艾思奇的《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等。他们肯定了“五四”以来新文化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他们认为，新形式比之旧形式，无论如何是进步的，词汇、语法、体裁都更丰富、自由，对现实的表现力更提高。但是新形式也有缺点，它与传统的文艺形式缺乏深刻的联系，它还没有在工农群众中深入。旧形式有它接近人民群众的优点及其他优良的成分，也有它的局限性。因此新文艺要以发展新形式为主。同时对于旧形式“要在艺术上思想上加以改造，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把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他们还着重指出：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主要地还要依靠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真研究，对人民思想感

汉夫：《“战国”派法西斯主义实质》，《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三四一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四九九—五〇一页。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四—五页。

情的深刻了解，特别是对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艰苦实践。否则，一切关于形式问题的争论，都会陷于空谈。

在延安的讨论，意见基本一致。在国民党统治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然而同是错误的意见。一种意见以向林冰为代表，他把大众化问题简单化为只是民间形式的利用，认为唯有“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而“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纯粹是欧化形式，而不是民族形式。这种把民间形式和民族形式等同起来，以及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和民族形式完全对立起来，从而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观点，是错误的。另一种意见以葛一虹为代表，他认为“旧形式是历史的产物，当历史向前推动了的时候，……旧形式的可悲命运也只是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他完全否定旧文艺形式有可取的东西，也否定新旧事物之间的继承关系。他在保卫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口号下，否认新文艺存在的缺点，把新文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主要归咎于人民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因而认为利用旧形式是“降低水准”。主张文艺“更坚决地站在已经获得的劳迹上”，等待“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这种意见也是错误的。

在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中，郭沫若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写了《“民族形式”商兑》一文，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说：“‘民族形式’……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便很警策地道破了这个主题。又所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更不啻为‘民族形式’加了很详细的注脚”。他反对“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意见，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他认为“五四”新文艺在其发生时，离开民间形式，而接近最新阶段的西式，“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一个人的好恶或主张所能左右的”，而且“外来形式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可以成为民族形式乃至民间形式的。”他也批评了新文艺的缺点，一是“未能切实的把握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二是“用意遣词的过求欧化”，犯了洋八股的毛病。要“祛除”中国新文艺的“积弊”，“是要作家投入大众当中，亲历大众的生活，学习大众的言语，体验大众的要求，表扬大众的使命”。

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持续一、二年之久，参加的人数很多，涉及的问题很广。《新华日报》社和《文学月报》曾举行过专门座谈会，许多作家都发表了意见。这次讨论既肯定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成绩，又检讨了新文艺发展中的缺陷，使进步文艺界一般地明确了大众化与民族形式应该统一起来。这次讨论对文艺创作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对民间文艺的研究，也起了积极的影响。这些收获，为以后文艺界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作了一些思想准备。它的不足之处是较多地就形式讨论形式。

三 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斗争和争论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四二八页。

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四三三、四三五页。

一九三九年前后，中国政治思想界展开了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争论。这是一场关系抗战事业和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争论。

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声明，愿意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那样，坚决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三民主义可以作为国共重新合作的政治基础。“为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而奋斗乃是完全适合中国革命客观历史行程的光荣事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提出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由于抗战的需要、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放弃反共的根本立场，只是把武力“剿共”的方针改变为“溶共”的方针。他们肆意歪曲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它变为反共反马列主义的旗帜。他们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论调，狂妄地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这是引起关于三民主义争论的根本原因。

一九三九年五月，蒋介石做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在这个讲演里，蒋介石抛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摘取三民主义的某些词句，构成蒋记三民主义的体系，用以攻击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主义。他说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都是“一偏之见”，唯有民生史观“能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他说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皆有缺点，而且它们的内容很不完备”，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是“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他说只要按他的“体系”去“切实研究三民主义”，按他的“实行程序”去“努力奉行三民主义”，“就可以战胜敌人，也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

反动文人、政客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向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发起攻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民社党首领张君勱在蒋介石授意下，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他在“促进团结”、“统一力量”、“利于抗战之持久”的幌子下，向共产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介石，以实现“军事权之统一”；二是取消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做到“一国之内惟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系统”；三是共产党既“信奉”三民主义，“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

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共产党的叛徒、反动文人叶青连续抛出《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中国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等小册子，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全面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成为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叶青极力强调抗战时期需要“统一”和“强固中央政权”，因此，“民主在现阶段的今天，不论是抗战前、抗战中、抗战后，都非大问题”。他把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完全取消了。

叶青恶意歪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鼓吹“和平转变”和“一次革命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六大以来》（上），第八二七页。

《再生》第十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本目所引叶青言论主要见《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时代思潮社一九四一年六月印行（一九三八年九月初版）。

他说：民生主义的内容包括国营实业、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实业。按叶青的说法，国营实业是公有不是私有，公有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实业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他说，“国家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低级形态，共产主义和大同主义是民生主义的高级形态”。这样民生主义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里面了。叶青说，中国“由封建到资本的阶段”是实行民主主义的，也就是实行国营实业，也就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将来“由资本到社会的阶段”也是如此，并且那时国营实业要垄断一切。因此，“由于国营实业而使一般的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合而为一，并使中国之到社会主义采取和平转变底形式，是中国将来的特殊道路——特殊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叶青的“一次革命论”。叶说，通过国营实业的方法，“可以达到公有财产底目的”，这就是孙中山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说明。由此得出“两个结论：（1）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因此（2）中国有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就够了，用不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

总之，叶青打的是三民主义的旗号，宣扬的是法西斯主义。叶青的言论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谬论的一种。

当时还有另一种情况，共产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和某些进步学者，在理论上产生了混乱。他们混淆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在解释三民主义时，把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混同起来。如有人认为“民生主义具备了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性”，民生主义加上农工政策，就可以“冲破”“社会主义的门户”，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结”起来。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使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不和政府相冲突，避免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流弊，可能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前途发展”。这些学者向三民主义注入了它所不具备的内容，从而混淆了马列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了维护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抗日的民主的团结，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上述论调和意见进行严正的批判和评论。为此，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共产党人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阐明自己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其中主要的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洛甫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

共产党人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坚持新三民主义。共产党人指出：在抗日阵线中，对三民主义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是在于努力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的基本的革命精神”，“认为三民主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孙中山先生当时具体规定为联俄、联共、唤起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胜利的政治纲领”。这是共产党的历来的观点。只有坚持这种立场，“才能正确的估计三民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意义与作用”，才是“真三民主义”。另一种立场是“到处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基本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民主主义，把三民主义实际上阉割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而同时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某些消极的与保守的因素，使之成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这是一切公开的与隐藏的民族危害分子、一切叶青之流的人物的立场。这“不但不是拥护三民主义，而正是反对三民主义”。共产党人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坚决反对这种立场，反对“假三

民主义”。“只有真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抗战建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标志，把三民主义区分为“两个历史时代”，即新旧两种三民主义。他指出：“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共产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这样的三民主义。

第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共产党人指出：共产党主张“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并不是放弃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而是因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而奋斗所必经的过程，这是共产党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政治主张。共产党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必须在共产主义的指导下才能成功。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相比较，有其相同的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相同的”。但两个主义还有不同的部分，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共产主义除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

共产党人驳斥了那种所谓“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观点，指出这是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并且也是完全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共产主义的思想只有和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结合起来，才不是空想。孙中山民主主义的原则在基本上是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叶青等把民主主义曲解为共产主义，一是要把民主主义束之高阁，掩盖孙中山现实的革命精神；二是要把民主主义作为反共的旗帜。共产党人正确评述民主主义的历史价值及其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不但是对叶青之流反共文人的有力回击，而且也是对进步学者中出现的理论混乱的纠正。

第三，坚持革命阶段论，驳斥“一次革命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走。而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并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针对叶青所鼓吹的经过民主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论调，共产党人指出：将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主要的不是“和平转变”不“和平转变”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者的斗争问题，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人的问题，除此，是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在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斗争和争论中，中国共产党人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了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揭露了假三民主义，打击了顽固派，澄清了某些混乱思想。这次争论，促进了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第六节 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阐发 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一 共产党加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建设

抗日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大批革命分子要求参加党的组织。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大量发展党员是“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要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决议还指出，应该注意给新党员“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理论思想的基本区别”。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党的组织迅速扩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广泛。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在共产党经过大发展之后，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就成为当时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共产党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五月，《解放》刊登了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该文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

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做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长篇讲演。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的思想改造是非常必要的。他说：“一个比较幼稚的革命者，由于他：（一）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他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包括成见、旧习惯、旧传统）的残余；（二）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的实践；因此，他还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他号召共产党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刘少奇着重论述了思想意识的修养问题。他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他特别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行动的最高原则”；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首先在一九三九年八、九月出版的《解放》上连载。这篇讲演，教育了全体共产党员。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上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是党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

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规定党的发展一般应当停止，而以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为着巩固党，决定对党员成分进行详细审查，整理各级党的组织机构，清洗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

关系。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

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共中央创办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专门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为这个刊物写了著名的发刊词。

《共产党人 发刊词》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八年来在党的建设上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

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

(一)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 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

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就后退一步。

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和巩固，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武装斗争这一斗争形式的。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就后退一步。

毛泽东把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加以综合的研究之后，深刻地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的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同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

《共产党人 发刊词》总结了共产党十八年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对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在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环境下，为了给中国人民指明正确的革命道路，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并且打破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为了从政治上思想理论上建设中国共产党，纠正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使中国革命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继《共产党人 发刊词》之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主持写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一九四一年一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现

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过程及其特点，着重论述了现代的中国革命。毛泽东对现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根本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说明。他指出：整个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两重革命任务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完成。“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对上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全面的阐发。

毛泽东首先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首先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才能使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它的准备时期算起，是从一八四一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整整一百年，革命的性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它在五四运动前后起了一个变化，其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呢？毛泽东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从国际看，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从此以后，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从国内看，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领导权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一九二一年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接着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客观要求，虽然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这就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为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做了更加完整的解释。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它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必须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又区别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几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锋芒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毛泽东在著作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以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这个政权的构成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那些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就是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带有自己民族的特性。所谓科学的，就是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部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它驳斥了资产阶级专政的论调，论证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帝国主义不答应，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同意。它提出了革命的不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观点。它用这种观点揭穿了顽固派的“一次革命论”的反革命本质，从理论上粉碎了他们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另有一些人也迷惑于“一次革命论”，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这种观点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衔接，中间不能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如果说可以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合并并在民主革命任务上面去完成，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是空想。这是对党内长期存在的“一次革命论”思想的纠正。这就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统一和各解放区政策的统一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它科学地总结了我国一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明确地划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历史范畴。它深刻地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这些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有着巨大的深远的意义。

《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三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系统论述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总政策并没有改变，投降反共逆流依然存在。同时，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为日本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中日

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全中国绝大多数人要求坚持团结抗战；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无法协调，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起来；苏联对中国抗战依然采取积极援助政策；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切，使国民党不敢轻易对日妥协投降，不敢轻易举行全国性的反共内战。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日，继续同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逆流作斗争，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共产党内滋长了一种“左”的倾向，并且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有“左”倾情绪的人，把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已经不适用了。因此，他们主张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无限制的斗争，不懂得适可而止；把中间势力同顽固势力混为一谈，不注意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不愿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主张实行工农专政；过分地打击地主、资本家和商人，不注意区别对待；不愿意同非党人士共同工作，对他们表示不信任、不接近，等等。与此同时，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则错误地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因此只求联合，不讲斗争，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突然袭击缺乏应有的警惕。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妨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

为了正确地开展对顽固派的斗争，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武装全党，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和十二月，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两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抗战形势的基本特点，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方向和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方向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指出，为了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

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决不能重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不能重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他将这一政策具体化为十项原则，并相应地制定了共产党关于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惟有全党坚决地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共产党的政策是建立在对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之上的。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统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和派别划分为进步、中间和顽固这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放手发动一切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争取全国的知识分

子。这是我们斗争的立足点。“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因此发展进步势力是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争取他们。但要实现争取中间势力的任务，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争取中间势力同争取农民、小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作为革命的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而对中间势力，是作为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

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投降政策采取坚决斗争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的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我们对顽固派，一方面，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团结他们共同抗战；另一方面，同他们的反共投降政策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这三个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也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而是利用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对顽固派斗争要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以后，应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并主动地同他们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双方实行休战，而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时，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总之，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我们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和各项政策，是无产阶级坚定的原则性和斗争艺术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思想的杰出运用和光辉发展。它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它是革命人民对敌斗争的有效的武器。

第三章 解放区军民坚持抗战和巩固解放区的斗争国民党统治的日趋腐朽

第一节 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打退

一 皖南事变

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德军先后侵占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月，对法国发动进攻，十七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九月，日德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三国互相承认彼此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导地位”；在受到未参加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的第三国攻击时，进行互相援助。缔结三国军事同盟以后，日本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为此，在它疯狂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十一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对中国事变的处理，“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促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努力促进南京和重庆的合作工作”。十一月三十日，日汪签署《日华基本条约》及附属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以此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在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加紧诱降的时候，英美则要求中国放弃独立作战，加入英美同盟。一九四一年美国给国民党政府贷款一亿四千五百万美元。九月，日军侵入越南后，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废钢铁。十月，英国重新开放滇缅路，运送援华物资。这些都是为了向中国表示其反日的态度。

英美和德意日两方面都想拉蒋介石站在自己一边，这就从国际形势上加重了蒋介石集团的地位。蒋介石认为趁机发动一次反共高潮，打击共产党的力量，把中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既不会受到英美的反对，又可以讨好德日。

从一九四一年春起，国民党军就加紧在华中制造磨擦事件，阴谋截断华中新四军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然后分割包围聚歼，并制定了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迁就国民党，不敢大力扩大新四军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为了纠正项英等的错误，准备反击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给东南局的指示，强调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必须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只有斗争才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但是，项英仍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

七月，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取消陕甘宁边区、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及作战区域的所谓“中央提示案”。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提示案”中的无理要求，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示案”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先声。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致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皓电，诬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

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皓电的发出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三十万大军及顾祝同所部，准备向华中新四军大举进攻。又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增至二十万之众。

十一月九日，中共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复何白的佳电，对皓电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是，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佳电表示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关于北撤路线，中共中央提出，一由皖南原地经铜陵、繁昌直接北渡皖北；一经苏南，然后由镇江过江到苏北。经国民党同意，新四军决定经苏南北移。

十二月七日，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政府军令部下达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计划第一步，以顾祝同部兵力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李宗仁所部于二月二十八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八日，国民党政府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底以前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蒋介石一面于十二月九日发布要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手令，一面于十日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至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按照蒋介石的密令，顾祝同在皖南集结了七个师约八万人的兵力，准备包围聚歼新四军。

在这种情况下，将皖南军部迅速北移是正确的方针。一九四一年十月，毛泽东、朱德等指示新四军军部应“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但项英仍认为“北移困难”，坚持军部“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的意见，拒绝北移。十二月十四日、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又两次指示叶挺、项英立即北移，但项英仍迟疑不决，拖延北移。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对项英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中央严令督促下，项英才决定于一月初开始转移。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晚，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九千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五日到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袭击。六日，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部八万多人，在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英雄的新四军指战员与顽军进行了七昼夜殊死的战斗，终因众寡悬殊，伤亡过大，弹尽粮绝，陷于危殆之中。为挽救危局，保全部队，叶挺致书上官云相，责其背信弃义，并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十四日，新四军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除约两千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项英遇害。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是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滔天大罪。

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使反共顽固派冲昏头脑，一月七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气焰十分嚣张。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二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十一册、第十五册。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十一册、第十五册。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反共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除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坚决自卫外，在政治上进行了猛烈的反攻。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分析了这一事变的空前严重性和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的原因，指出，皖南事变暴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给以回击的有利条件。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上无情地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的倒行逆施；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充分提高警觉和加强作战的充分准备；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二十八日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了新四军军部，部队统一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活动于苏中地区；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副师长罗炳辉，政委郑位三，活动于淮南地区；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活动于淮海、盐阜地区；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活动于淮北地区；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活动于鄂豫地区；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活动于苏南地区；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活动于皖中地区。独立旅直属军部指挥。全军共计九万余人。二十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彻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的整个阴谋计划，提出了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全国人民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具体纲领和解决时局的根本办法。

正在重庆的周恩来收到新四军军部发来的被围紧急电报后，立即向国民党交涉并提出严重抗议。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新华日报》写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反对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均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为此，周恩来愤然挥笔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两段话，以手书大字刊登在一月十八日《新华日报》的“天窗”上，向全国全世界揭露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和团结的罪行。还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披露了皖南事变真相，一一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及反动报纸对新四军的种种诬蔑。

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沦陷区的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在通电中说：“新四军成立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其卫国卫民之功绩，中外各报，迭有记载’，事实俱在，均可复案，纵有误会，亦不难以政治手腕解决之，何至兵刃相见，而贻同室操戈之讥”。呼吁“终止磨擦，消弥内战”。在香港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致电国民党中央，反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行动，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

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在香港的另一部分爱国人士金仲华等四百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要求“制止内战，使国际形势之有利条件，不用于内，而用于外”。海外华侨纷纷发表抗议通电，表示：“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反共内战。克服这一空前的严重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保存抗战实力，团结抗战到底”。资产阶级中间派本来是劝共产党让步的，而在一月十七日以后，转而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立场，这就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动，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责难。苏联《真理报》指出：皖南事变“无异扩大内战，而内战只有削弱中国而已”。英美出于他们当时的利益，不赞成中国内战。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皖南事变说：“当日本正准备向‘南海’推进时，中国为本身及其友邦利益计，急应牵制多数在华之日军，是故此刻竟发生此种内讧，实为极大不幸”。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评论称：解散皖南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今后中国必须以最大努力来恢复团结。英国国会议员们曾表示希望中国当局对此事要妥善解决。

蒋介石没有料到共产党敢于和他的反革命命令采取尖锐对立的态度。又没料到全国最大多数中间派及进步人士、海外华侨都站在共产党方面，非难其举措。也未料到英美舆论发生如此大的不赞成的反响。在内外责难接踵而来的处境下，蒋介石被迫力图缩小事件的范围。他在一月二十七日的讲演中说：“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当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会前夕，蒋介石想掩饰他在皖南事变中的罪行，诱骗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共产党为了揭穿这个阴谋，抗议蒋介石假团结真分裂的反动行径，坚决不出席。三月二日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要求蒋介石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进攻，承认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释放皖南事变中被捕干部和兵员，发还所有枪支等，作为解决时局的临时办法和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对于第一个十二条，蒋不予回答。对于第二个十二条，蒋也不愿接受。共产党因此拒绝出席参政会。这一斗争，进一步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蒋介石，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暂时收敛他的罪恶活动。三月六日蒋介石虽然在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操纵会议通过反共决议，但也表示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军事”。参政会仍选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会员。蒋介石并约周恩来谈话，表示一些具体问题可以提前解决（如释放被扣人员、继续发饷及减轻对《新华日报》压迫等）。这实际是蒋介石被迫退兵。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是国共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由于共产党坚决贯彻执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拥护，博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声援，不仅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使新四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华中华北解放区的对敌斗争与各项建设事业更加深入开展，共产党在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地位更加提高。而蒋介石国民党则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其反共投降、破坏抗战的罪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特别是蒋介石改变抗战以来隐藏在幕后反共的手法，直接出面反共，这就促进了对蒋介石抱幻想的人们的觉醒。

这种政治情况的变动，人心的向背，标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大江南北抗日斗争的领导，于一九四一年五月成立了华中局（由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而成），刘少奇为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委员。华中局成立后，立即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清算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此，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三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间势力发展的一个标志，是皖南事变后共产党政治影响扩大，蒋介石国民党政治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反映。

抗战初期，代表中间阶级的各党派，对蒋介石抱有很大幻想。但是，从一九三九年起，中间党派的希望落空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一九三九年十月，国民参政会中的各小党派的参政员，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勱，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第三党的章伯钧和无党派人士张澜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拟定了十二条信约。该会的宗旨是以座谈会的形式“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当时它还不具备一般政党的组织形式。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肆行高压政策。上述各小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调解国共冲突，谋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于一九四一年冬决定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成立会。同年九月十八日在香港创刊了《光明报》。十月十日在《光明报》刊登启事，宣布民主政团同盟已经成立，并发表了梁漱溟起草的《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十一月十六日张澜、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四人出面在重庆召开茶会，公开宣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成立宣言》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结合的动机是看到国家“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曾“为宛转之尽力，而卒未有补”。深惧国人自丧抗战前途，所以“自为结合，以作团结全国之始”。今后旨趣是为促进民主团结抗战而尽力。宣言认为时局的中心问题是国家的统一，但要实现国家统一，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对时局主张纲领》提出了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十条主张。

毛泽东：《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七三六页。

《民主同盟文献》，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编印。

上述宣言和纲领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主张。它主张继续抗日，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投降和法西斯统治。但是，它所主张的“国权统一”、“军队属于国家”，又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它提出的“政治民主化”，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与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强化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时候，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要求和活动，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间阶级政治力量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民盟内部成分的变化，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本对国民党加紧诱降和对解放区的残酷“扫荡”

一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共产党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一九四一年以后，由于日本积极推行南进政策，使日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但是双方都想避免直接发生战争。从一九四一年三月开始，日美之间就维持太平洋的现状、中国问题和对欧洲战争的态度等问题举行谈判。

日美谈判期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背信弃义发动了对苏联的全面侵略战争。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与德意日法西斯阵线相对立的，包括苏中英美及其他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各国在内的反法西斯阵线。

七月初，日本政府决定加紧向南方扩展，为此目的，不惜对英美一战。月底，日军侵入越南南方。英美立即冻结了日本在两国的资产。美国接着又宣布禁止除棉花粮食以外的一切物资对日出口。十月中旬，日本东条内阁上台。东条内阁一面加紧准备对美作战，一面继续日美谈判。十一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递交了“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越南撤军，日美双方不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以外的任何其他政权等。日本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并于十二月一日的御前会议上，作出了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未经宣战，命令海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使停泊在那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紧接着日本又袭击了英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新加坡。战争范围很快扩大到东起夏威夷，西至马来半岛的太平洋海面。希特勒德国也在十二月十一日向美国宣战。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日本已占领了美属菲律宾、关岛、威克岛，英属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荷属东印度，以及法属印度支那，并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印度和澳洲。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扩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欧亚美许多国家纷纷对日宣战。已经和日本交战数年之久的国民党政府，这时才追随英美之后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对日宣战。我国的抗日战争与各国人民的反日斗争汇合起来了。一九四二年一月，苏美英中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共同宣言》，宣布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对抗法西斯同盟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五月苏英签订同盟条约。六月，苏美签订互助协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结成。英美政府参加反法西斯同盟和对德日法西斯开战，壮大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这一行动直接间接符合了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宣言》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呼吁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指示》指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

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建立宗主国政府与殖民地人民的合作，同时改善各殖民地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组织其民众，提高其积极性，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指示》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为了战胜日寇，“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指示》要求大力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努力开展华南敌占区、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南洋各地的工作，应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取得联系。

二 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加紧诱降

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为了从泥足深陷的中日战争中摆脱出来，全力对付太平洋战场上的英美，为了把中国拉向日本一边，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对英美作战，更加紧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决定“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一九四二年一月，日本首相东条在议会宣称：“今后帝国对重庆之方策，如其仍然继续抗战，则彻底粉碎之；同时热烈期待其反省，促其完全抛弃对英美之依靠性”。九月，东条在日本中央协力会会议上谈对华方针时说：“大东亚战争发生以来，中国沿岸完全被我压制，滇缅路亦被我完全切断，以及我屡次进行的作战与不断的讨伐，致令重庆政权之战力日益低下，现在它还依靠英美的援助而继续抗战，吾人当积极采取政战两方面之手段”，促使蒋介石国民党“参加和平阵营”。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是利用英美压蒋介石国民党投降，这时则转变为分化蒋介石国民党和英美的关系以促使其投降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的力量，以为很快就可以把日本压下去，所以紧跟英美之后对日宣战。但是，英美在开战初期的惨败，使蒋介石大失所望，觉得英美这个靠山不一定靠得住，以致对二十六国联合宣言的签字发生了动摇。他为了对日本示意，免去了对日宣战的外长郭泰祺的职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诱降下，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活动更趋表面化，扬言要和日本单独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中央某要人受蒋介石之命，对美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助，中国便单独媾和”。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关于太平洋战争后国民党对日投降空气日浓的消息说：“重庆自我国发动大东亚战争连战连捷后，已逐渐步入崩溃之危机，目前已几乎完全失去其战斗能力，对日媾和之主张已走上指导者之地位”。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以及太平洋战争胜负还未最后分晓，蒋介石仍在观望之中。他一面同日寇勾搭，一面继续用抗战的招牌蒙蔽国内外视听和向美国索取援助，以扩充其力量。

对于招蒋投降，日本原来的估计比较乐观。它认为对英美初战的胜利，将使蒋介石政权发生动摇，重庆国民党政权很快就会屈服。但不久就证明这种判断是不实际的。而日本已被迫多面作战，用军事力量攻占重庆，迫使国民党政权屈服也是不现实的。日本在外交上政治上诱蒋投降没有成功，军事上又无力进攻重庆，因此到一九四二年日本对华政策便陷入困境。

三 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日本首相东条宣称：“日本在大东亚战争的进行中，将以中国为兵站基地的地位”。为此，日寇在经济上残酷地榨取沦陷区，在军事上疯狂地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寇为了确保在华北的占领地，使华北沦陷区成为它进行长期战争的物资供应地，于一九四一年春，把过去在华北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进一步扩展为更凶残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在这一活动中，日寇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叫嚣对解放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以达到“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

日寇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对三种地区，分别施以不同的办法。

对所谓“治安区”，日寇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推行连坐法，设立“联合乡”、“集团村”，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企图肃清“治安区”内的抗日分子和抗日活动。同时，还着重对人民的欺骗怀柔，广泛进行反共反八路军的恶毒宣传，宣扬“王道乐土”，建立与发展敌伪统治下的“群众团体”，以期“掌握民心”，巩固其统治。

对所谓“准治安区”，敌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其怀柔政策，与“治安区”相同。其恐怖政策，则为普遍修筑封锁沟墙和碉堡，并实行所谓“绝缘政策”，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一九四二年春，日寇在从古北口到山海关的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长七百里，宽五、六十里，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的“无人区”。把当地群众赶进指定的“人圈”。“人圈”内的人不能与外界接触，不准种十里以外的土地。所有壮丁都编入“自卫团”，同时又是“勤劳奉公”队的队员，晚上值勤巡逻，白天充做苦役。“人圈”内有严密的敌特组织，经常对人民实行“大检举”，以“思想犯”、“政治犯”、“通匪犯”、“运输犯”等名目任意加以杀害。敌人在划定的“无人区”内，经常进行搜索。

对所谓“非治安区”，敌人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企图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从一九四一年春至一九四二年秋，敌人在华北接连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摧残、劫掠和屠杀。

但是，不管日寇采取恐怖政策还是怀柔政策，推行多少次“治安强化运动”，都不可能达到“掌握民心”和“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不仅对解放区和游击区的“扫荡”、“蚕食”被敌后抗日军民粉碎了，而且对沦陷区的

各项“治安强化”政策，也遭到了失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大汉奸王揖唐也不得不哀叹：农村村民对运动的推行“并不认真”，城市居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对运动的态度“显然冷淡”，连在第一线指挥监督的官吏，也有“漠不关心，敢做袖手旁观”的。

在华北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江南日寇和汪伪政府发动了“清乡运动”。其步骤为：（一）由日伪军配合向新四军、游击队活动地区进行“扫荡”，建立起“军肃清地”。之后，日军逐渐撤退，由汪伪组织保甲把“军肃清地”变为“清乡地区”。（二）把“清乡地区”进一步变为敌人的“具体和平模范地区”。敌伪在“清乡地区”和新四军活动地区建立以竹篱、木栅、铁丝网等构成的“隔绝膜”，在“清乡地区”内则进行大规模的“肃清战”。敌伪派遣警察、特务工作队、宣传工作队、封锁工作队、汪记国民党员，对群众进行挨户登记、检查搜索、捕杀威逼，推行连坐联保，同时，大力进行“和平建国”的欺骗宣传。日寇妄图通过“清乡运动”强化汪伪政权，消灭作为心腹之患的新四军，减轻日寇在占领区的军备力量，榨取江南的财富。

日寇为了准备和支持太平洋战争，急于变华北为“大东亚兵站基地”，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集中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三至百分之七十五，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对晋冀鲁豫边区的大规模进攻和“扫荡”，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共十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增至十九次。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千人以上的“扫荡”，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共二十五次，其中万人以上的两次，到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千人以上的“扫荡”增至七十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九次。总计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敌人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千人以上的达一七四次，其中万人以上七万人以下的三十次，较前两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兵力达八十三万人，较前两年增加了一倍。“扫荡”时间也延长了。敌人在一九四一年对晋冀鲁豫边区泰西之三个月的“扫荡”，对太行太岳的“毁灭扫荡”，对鲁西冀南的长期“扫荡”，以十万以上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持续两个多月的“扫荡”，以五万兵力对山东沂蒙山区两月之久的“扫荡”，一九四二年敌人以五万余兵力对冀中进行了“五一”大“扫荡”，以四万余兵力对冀东三个月的“扫荡”，以六万余兵力对太行的“铁壁合围”、“抉剔清剿”，一九四二年“四二九”与“六一二”对冀南的“铁壁合围”等，都是极为残酷的“扫荡”。

敌人的“扫荡”办法有所谓“分进合击”、“梳篦式清剿”、“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并在“扫荡”中实行极其残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一九四一年八月，日寇“扫荡”晋察冀的北岳区，烧毁房屋十五万余间，残杀群众四千五百余人，抓去东北作苦工的一万七千余人，抢去粮食五千八百万斤，牲畜一万余头。一九四二年五月“扫荡”冀中根据地，群众被杀害和抓走的达五万多人，区以上干部被杀害者达三分之一。山东解放区的南沂蒙纵横不过五十公里的地区，在一次“扫荡”中，群众即被杀害三千多人，牲畜被抢去一万头，粮食被掠夺一百六十余万斤，民房被毁五千余间。

为了缩小乃至摧毁抗日根据地，敌人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其“囚笼政策”。一九四二年十月，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夸耀说：“华北碉堡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

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日寇在冀中八千多个村庄、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千七百多个据点，修筑了七千五百多条公路，挖了四千多公里的封锁沟。据点周围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为二千多块。然后，分区逐块地进行“清剿”、“抉剔”，建立伪政权，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抢掠，实行奴化教育。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对华中敌后解放区也发动了空前的大“清剿”与大“扫荡”，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寇的进攻更加疯狂。平均每半个月各个地区有一次“扫荡”，最频繁的地区一星期一次。“清乡”则由苏南扩展至苏中、皖中和武汉近邻。配合“扫荡”与“清乡”，日寇在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增至二千五百处以上。

当日寇对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大批投降日寇，成为伪军，在日寇指挥下向解放区进攻。

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夹击下，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敌后军民有力地展开了全面的对敌斗争。

四 日本加紧对沦陷区的掠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资源缺乏财力枯竭同战争扩大化长期化的矛盾更加尖锐，因此，就更加紧了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

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和棉花，是日寇掠夺的首要对象。在华北，日寇提出了“勤俭增产”、“确保农产”的口号，推行所谓“屯粮保管”和“计口授田”政策。有的沦陷区，在麦收、秋收时，日寇强迫农民到“公共打粮场”收打，打完即全部交据点日寇仓库“保管”，每月按定量“配给”口粮，每人每天六两至十二两（旧制十六两为一斤），三至五岁儿童与五十至六十岁老人，不准领粮。此外，日寇还以低价征购、无代价征发的办法掠夺粮食。组织“抢粮队”、“运输队”到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抢粮。对重要军需原料的棉花，日寇强迫农民扩大种植面积，以便其进行大量掠夺。在冀西、冀中产棉区，规定每个农户必须以十分之七的耕地种棉花。日寇以摊派方式发放“贷款”，限定秋收时必须将棉花卖给“新民合作社”，价格只抵市场价格的一半，并以特制大秤收花，每一百四十斤只抵一百斤，另交手续费若干，使棉农饱受掠夺之苦。

日寇不仅疯狂地掠夺农产品，而且强占和毁坏大量耕地。为了加强对沦陷区的控制和解决国内粮食困难，日本大量增加向沦陷区的移民，侵占大量的民田。一九四一年三月在华日侨为三十四万五千人，到一九四一年四月就增至五十六万人。日本移民侵占了中国农民大量土地。日寇还掠夺大片农田辟为农场，以种植棉花、粮食、鸦片和其它农产品。日寇侵占的军事用地，其数量更为惊人。据一九四二年底估计，华北日寇已修成的铁路、公路及护路沟、墙，占地达八万五千八百平方里以上。

沦陷区的劳动力也是日寇掠夺的重要对象。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底，华北被劫走的壮丁为数在六百万人以上。敌人还征发大批人力挖沟、修路，使农

村劳动力遭到严重损失。

日寇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加紧对人民的搜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河北省人民缴纳的苛捐杂税名目即达一百多种。战争爆发后，敌寇更以“皇军慰劳金”、“国防献金”、“飞机献纳金”等无奇不有的名目横征暴敛。农村居民每年缴纳的捐税占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上述残酷掠夺之下，土地大量荒芜，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广大农民生活日益恶化。据山西太谷和顺一带的调查，一九四二年产量较一九四一年降低百分之六十。在华中，以水稻为例，一九四一年长江中游及平汉路沿线和镇江附近等地产量仅及战前的百分之四十，南昌附近仅及百分之三十，常熟、江阴、杭州附近仅及百分之二十。

在工矿业方面，日寇拼命“开发”煤铁等重要资源，掠夺工矿企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先后接收了英国投资的焦作、开滦、门头沟等煤矿。至此，华北煤矿全为日寇所劫夺。在华中，敌人先后掠夺了长江以北十三家煤矿、长江以南四家煤矿，这十七家煤矿年产都在五十万吨以上。再如铁矿，敌人大力开采龙烟铁矿，一九四二年，该矿产量占华北铁矿石产量的百分之八十。沦陷区的工矿企业几乎全被日寇所劫夺。上海一部分华商于上海沦陷后，在英美租界恢复建立的工厂，据一九四一年统计为一千一百四十九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工厂被日寇没收或倒闭的有五百余家。一九四一年四月，日寇提出了“自给主义”的政策，要求日人在沦陷区的企业，必须在中国榨取资本而不得依赖于日本国内。

在日寇的统治掠夺下，广大沦陷区人民日益辗转于死亡线上。日寇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和对粮食的掠夺，造成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以北平为例，一九三九年一月份，一斤玉米面八、九分钱，到一九四二年底就上涨到一元零五分。一九四二年，日寇先后在一些大城市实行粮食“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以上海为例，三年的配给数量还不足一年的口粮。在华北，大米白面为日寇军粮，禁止一般人食用。北平日寇配给的“粮食”是由豆饼、树皮、草根等制成的“混合面”。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普遍发生饥饿现象，经常有人饿死。在上海，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几天就饿死了八百多人。沦陷区工农群众饿死、累死和被屠杀的不计其数，其它各阶层人民也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的日趋腐朽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

一 国民党战场继续溃败和国民党官员大批投敌

抗日战争进入一九四一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国民党除继续政治诱降外，又施加军事压力，对国民党战场发动局部进攻。国民党则采取保存实力准备反共的反动政策，结果使得它的军队继续丢城弃地，狼狈溃逃。

一九四一年五月上旬，日军在晋东南集合了七万人的兵力，向驻守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当时国民党在中条山的军队近二十万人，在黄河西岸还有大批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短短的一周之内，日寇就侵占了若干山隘据点和山南沿黄河的各个渡口。国民党军队两万多人投降，十万人被俘。如果不是八路军予以接应，国民党二十万军队就要全部覆没。

九月初，日军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中下旬击溃了新墙河、汨罗江一带的国民党守军。二十八日日军一部进入长沙市内。但是日寇进攻的目的不在占领长沙，而在打击国民党军队。十月一日日军自动退出长沙。这次日寇动用的兵力约八万人，而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军队有四十万人。国民党军队放任敌人进攻，又让它从容退走，而事后却宣扬“长沙大捷”。

十二月下旬，日军再次进犯长沙。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进抵长沙外围，猛攻长沙城。国民党军队于四日进行反击，日军退至汨罗江右岸。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为了打通浙赣线，夺取衢县机场，发动了浙赣战役。日军在浙江方面集中的兵力约四万人，沿富春江、浙赣路西进。二十八日侵占金华、兰溪。六月六日侵占衢县，十五日侵占上饶。和西犯的日军相配合，另一部日军于五月下旬由江西南昌东进，于六月底七月初侵占弋阳、横峰。至此浙赣线被日寇打通。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三十多万，不作任何抵抗，只知退却逃跑。

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军队在豫南、郑州、广东、闽浙、大别山、滇边、鄂西、湘北等多次作战中，无不是日寇一来，就仓惶逃走。这都是国民党顽固派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

当时，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传播着一种极为可耻的“曲线救国”的论调。这一论调最早是由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提出来的。从一九三八年底开始，张就高唱着这个论调不断制造通敌反共事件。他为汪精卫辩护，说汪不是当汉奸，而是“曲线救国”。他在给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又为华北柴恩波投敌辩护，说柴“为保存实力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颁发的秘密文件中也声称：“除奸至为迫切要务，应分别轻重，首先从事剿共，如影响抗战，则可略走曲线”。这就说明所谓“曲线救国”即是联合日寇反共，袭击八路军新四军的一种阴谋伎俩。在“曲线救国”的掩饰下，一九四一年后，国民党的官员及军队大批投敌。据统计，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以前，叛国投敌的国民党官员中，有中央委员二十人，旅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五十八人，投敌军队五十多万人，占八十万伪军的百分之六十二。这些“曲线救国”的军队成为日寇进攻解放区的一部分力量。后来在日寇投降时，自称“地下军”，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

《抗战以来日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活动的一笔总账》，《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九日。

二 国民党统治的更加黑暗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及其以后，国民党加强了在国统区的反动统治，国统区的政治更加黑暗。

国民党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抗战民主舆论、革命政治主张和进步文化事业。在这方面，邹韬奋和他经营的生活书店及主编的刊物的遭遇，是突出的例子。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这个期间，生活书店的五十五个分店大部被封闭，仅剩下六个。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国民党继续用种种方法对剩下的生活书店进行摧残。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扼杀进步言论，摧残进步文化事业更加厉害。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不到半个月之内，生活书店的成都、昆明、桂林、贵阳分店，都先后被封闭或被迫停业。至此生活书店在国内只剩下一个重庆生活书店了，但反动当局也已命令重庆卫戍司令部相机予以封闭。只因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为中外观瞻所系，该店才得以幸存。邹韬奋本人不得不辞去参政员职位，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秘密离开重庆，到了香港。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新华日报》虽然没有被封闭，但只准印不准卖。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流氓毒打卖《新华日报》的报贩，撕毁报纸。国民党报业公会的头目竟声言，拘捕报贩一人赏洋五元至十元。

此外，国民党爱国人士冯玉祥的抗战言论被秘密禁止发表。在桂林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在重庆出版的《文学日报》，在桂林出版的《国民公论》等数十种报刊，被迫停刊或被禁止发行。反动派强迫各报刊登他们写的反共文章，或强迫报纸编辑撰写反共社论，否则就会受到警告处罚恐吓和监视，甚至被封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因在皖南事变中同情共产党新四军，国民党以“诋毁中央”为借口，撤销他的监委职务并把他开除党

一九四二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除了其它种种反动规定以外，又规定：政府对封锁工厂、罢工、怠工和其它妨碍生产之行为，可以“严行禁止”。“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信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令其为一定之记载”。政府“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这些反动措施本来是国民党政府早已实行了的，但这时又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表明了它对人民政治权利进行更加野蛮的剥夺。五月初，国民党中央下令各省市不准举行纪念“五四”的活动，就是实施这个总动员法的一着。

三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

（一）发行公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十八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一百

五十一亿九千二百万元，关金一亿单位，英镑二千万，美元二亿一千万。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一九三七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党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二）增加捐税。由于工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盐、统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党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党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三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增至六十元。由于通货膨胀，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一九四二年增至四市斗。从一九四二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一九四三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麦子二亿四千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三）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党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九三七年底为十六亿元。一九四五年底为一万零三百一十九亿元。八年中增加了七百三十八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四）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国民党政府从一九三八年三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一比二十，而黑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为一比八五点四，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为一比五四二点二。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五）实行专卖制度。一九四一年四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党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一九四二年为四亿七千八百万元，一九四三年为十七亿四千七百万，一九四四年为十八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六）统购统销。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国民党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党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一九四二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一百元，一九四三年差一千一百元。

总之，国民党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在金融方面，抗战初期设立了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党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一九四二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六倍，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只占百分之五十九。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官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一九三五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百分之十一弱。抗战开始后，一九三七年九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做为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一九四四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一百零五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三千七百余家工业中，官营的六百余家，民营的三千一百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百分之六十九，民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一。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一九三九年七月成立时的资本额为一千二百万元，到一九四三年增为十二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十三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四一年成立，一九四二年五月已完成及未完成的有十八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甘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一九四二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四分之一强。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十五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二十七，一九四一年为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四二年为百分之五十九，一九四四年为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党政府统购统销。在征实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最大剥削者，严重地阻碍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由于官僚资本残酷剥削所激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四节 整风运动 解放区军民克服严重困难的斗争

一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一九四一年前后，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敌后解放区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到一九四二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八路军由四十万减少到三十多万，新四军由十三万五千减少到十一万。本来就微薄的八路军新四军军饷，从第二次反共高潮一开始便被全部扣发。华北解放区人口由四千万减少到二千五百万，全国解放区人口由一亿降到五千万以下。加以当时华北地区又连续发生水、旱、虫灾，更增加了解放区的困难。抗日的队伍里，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盐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有些地区的军民不得不以树叶草根充饥。

但是，困难吓不倒压不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区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巩固解放区的严重斗争，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改进党的作风。为此，在一九四二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思想革命运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使共产党的领导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此后党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党内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对于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对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还没有在全党从思想上彻底清算。王明始终坚持他的错误，一九四一年三月第三次出版了他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因历次机会主义错误而遗留下来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风气，还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在当时党的广大干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还缺乏鉴别能力。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一次教育运动，使全党从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抗战以来，党员数量已经由几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其中大多数人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可贵的，并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的狭隘性、不稳定性和分散性，决定了他们思想上的主观片面、政治上的左右摇摆、组织上的自由散漫。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之所以有可能展开，是由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名著作。这些就为整风运动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总的局势变化较少，正是整风的极好时机。

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从一九四一年年底就开始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毛

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要求全党既要警惕重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又要警惕重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这个报告为即将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同年七、八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决定》等重要文件。九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以及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确认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干部的整风会议。同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中央及各根据地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与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各地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领导。延安有一百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学习，全国参加学习的共约三百人。

在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一九四一年七月，刘少奇在中共华中局党校作了《论党内斗争》的讲演，阐明了如何开展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次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在党内斗争问题上，要防止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机械的过火的斗争、无原则的纠纷等三种错误倾向，要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党与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使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进一步地巩固起来”。刘少奇提出的这些问题在当时和以后都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论党内斗争》是建设党的重要文献。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伟大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四月，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六月，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全党进行整风学习的通知，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在各解放区先后开展起来。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次整风运动是以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树立和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作为根本任务的。其中尤以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为核心。

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因此学风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揭露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学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的对立。指出，主观主义把理论同实践分离开来，把主观同客观分离开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则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党的历史上一切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观主义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当成万世不变的教条，而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行动的指南。他们不从实际出发，不是实事求是。

是从客观实际中引出事物固有的规律性，用以指导实践。经验主义者则是轻视理论，不注意使经验上升为理论。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主观主义是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反对主观主义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清算机会主义错误。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反对宗派主义就是从组织上彻底清算机会主义错误。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宣传工具，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所以，要彻底埋葬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号召全党把它打倒。

整风运动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这是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它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整风的步骤是：首先认真学习研究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然后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研究历史，并且互相批评，互相帮助。在此基础上，写出个人思想总结。再从个人思想、工作、历史的检查，进一步发展到对于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的检查，又发展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和实质，认真地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历史。在学习、研究、讨论过程中，认真贯彻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广泛地发扬了民主。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

一九四三年七月，刘少奇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一文，指出：一切干部和党员，都“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王稼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八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他在延安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又进行讨论和总结。各地区也召开高干会议或工作会议，对本地区党的历史进行讨论和总结。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学习和时局》的重要讲话，为整风运动作了总结。他在讲话中深刻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代表中央政治局对高级干部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一九四五年四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党的历史，总结了整风运动的成果，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决议分析了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方面的错误。全会对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作了正式的结论。决议指出：二十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全会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整风运动至此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实践证明，它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的成功的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经过这次整风运动，使广大的党员干部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继“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继承了“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同时又纠正了五四时期的形式主义的缺点。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成长。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这次整风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在共产党整风的同时，解放区的文艺界也展开了整风运动。

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文艺运动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贡献。但是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问题，主要是没有明确解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思想感情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许多人轻视工农，脱离实际，对火热的抗日斗争漠不关心。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流行着各种不正确的议论，例如“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等。这说明文艺界需要整风。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五月二日，讲了引言，二十三日，又讲了结论，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讲话》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

农兵所利用的。”这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要做到为工农兵服务，首要的是文艺工作者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那种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的。《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解决这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一定要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讲话》提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就是普及和提高的问题。《讲话》指出：所谓普及，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就是从工农兵提高。

《讲话》论述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艺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较之提高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和提高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应该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讲话》论述了文艺和政治、文艺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以及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讲话》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革命的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我们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和糊涂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

毛泽东号召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经过整风积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人民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把革命根据地和全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讲话》的发表，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阶段。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文艺界，立即掀起学习《讲话》、实践《讲话》的热潮，展开整风运动。此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

三 大生产运动

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支援抗战，抗日民主政府废除了苛捐杂税和不合理的摊派制度，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大大减轻了贫苦农民负担。

为了实现根据地经济的基本自给，首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各根据地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使受到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陕甘宁边区的耕地面积一九三九年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水浇地面积一九三九年比一九三七年增加了十倍，这就使粮食产量有很大增长。同时，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晋察冀边区由于农业生产

的发展，粮食达到了自给。

根据地的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兵工、纺织、采煤、采油、制盐、农具、制药、印刷等工业。各地建立了很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商业方面，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的商业资本增加了十倍以上，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商业网。同时，消费合作事业也有普遍的发展。各根据地的商业在内部可以自由发展，对外贸易则由政府实行必要的限制，建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一九四一年以后，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以求在物质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各解放区相继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由边区的部队开始的。当时一部分部队人员自己种菜、养猪、打柴、做鞋，以改善部队生活。党中央及时地总结了这个好经验并将它推行于边区所有部队、机关和学校。边区组成了生产委员会，作为生产运动的指导机关，并根据部队、机关、学校的具体情况规定了生产任务。几万党政军学人员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号召，投入了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生产运动。军队、机关、学校都进行开荒、种田、纺纱、织布。战士和干部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建立和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等经济事业。一九四一年三月，八路军三五九旅由王震率领，进驻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开荒种田。经过几年辛勤劳动，战士们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垦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三五九旅谱写了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凯歌，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模范集体。边区群众也组织起来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果。陕甘宁边区部队一九四一年开荒一万四千多亩。三五九旅三年内开荒二十六万多亩，不仅做到吃用全部自给，还达到了“耕一余一”，每年向政府缴公粮一万石。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边区共开垦荒地一百八十万亩，增产粮食四十七万担。此外，边区的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国营工厂发展到六十二个，职工近四千人，年产土布十万匹，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陕甘宁边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经济决定财政。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顾政府和军队需要，不顾人民困难，“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作法。这次会议以后，大生产运动在各个解放区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九四三年春节期间，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发起生产竞赛，并迅速推广开来。三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各地党委开展生产竞赛运动。此后，全边区工厂农村的生产竞赛发展得热火朝天。边区的全劳力和半劳力，都发动起来，组织到生产劳动中去，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在这个指示推动下，一九四四年各敌后解放区的生产运动都蓬勃地发展起来，连游击区也创造了发展生产的好经验。到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扩大至一千四百多万亩，产粮二百万石，植棉三十万亩，产棉花三

百万斤（净花）。据晋绥、北岳、山东、太行、太岳、皖中六个区的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四四年就增加耕地面积一百九十四万多亩（未包括机关、部队开荒数）。

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群众建立了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群众自愿参加的集体劳动互助组织。这种集体劳动组织，除了互助合作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综合性合作社。通过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大生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有历史意义的新事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提出动员敌后根据地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要求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到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已占全区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四。据晋绥、北岳、太岳、盐阜四个区的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四年组织起来的人数已达到一百零二万六千多人。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大生产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它改变了解放区的面貌。一向贫瘠荒凉的陕甘宁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敌后各解放区也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解放区军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大生产运动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军队、机关和学校人员普遍参加生产劳动，大大改进了工作作风，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密切了党政军民的关系。大生产运动锻炼和培育了大批干部，创造了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经验。

四 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扫荡”斗争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日寇集中大量兵力，残酷地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妄图以频繁的“扫荡”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结合大规模的“蚕食”，来摧毁抗日根据地。于是敌后战场的“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便成为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

为了在新的形势、新的条件下，更有效地战胜敌人，根据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各根据地都把发展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放在重要地位，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普遍发展民兵。在各个军区，建设起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一九四一年，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产的民兵，差不多较前发展了一倍。

在执行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方针的过程中，敌后军民创造了一整套对付敌人的办法：

在解放区，针对敌人的“扫荡”，部队以一部分力量分散与民兵相结合，日夜与敌人扭打，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同时又实行空舍清野，使敌人抢不到粮食、物资，保护了人民的利益。大部分主力部队则跳到敌后之敌后，主动地造成敌人的混乱与恐慌，然后灵活集结主力，坚决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

在游击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采取“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

使广泛的群众运动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在敌人点线的正面，组织联防，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级武装密切配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蚕食的嘴。如敌深入腹地扎下据点，就实行围困，迫敌撤走，或集中兵力袭占，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被动地位。在敌点线后面，以武装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推翻伪组织，使敌腹背受击，顾此失彼。

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了无数支武装工作队，向敌后之敌后展开全面攻势。武工队一般以三十人至五十人为一队，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并且还是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是一个党、政、军、民相结合的一元化战斗单位。武工队在敌占区分合自如，行踪不定，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各种斗争。他们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群众，展开对敌政治攻势。同时还进行一系列的斗争，如打击敌宪兵队、特务队和死心塌地鱼肉人民的汉奸，摧毁伪政权、摸哨兵、袭据点、打埋伏等。由于武工队进出敌后之敌后，逐步解放了许多村庄，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治安区”也不安了。

在共产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指导下，敌后军民胜利地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英勇斗争。

在晋察冀边区，一九四一年八月，敌酋冈村宁次集中了十万以上的兵力，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并使用伞兵和毒气，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空前的大“扫荡”。敌分十三路出动，企图将八路军主力合围于长城两侧。“扫荡”计划预期在四个月内完成。针对敌人的企图，八路军不等敌人来攻，就主动全面出击破坏敌交通线和封锁沟。当敌经半月时间到达根据地中心区时，八路军主力已适时转移到敌后，后方机关也早已疏散隐蔽，而游击队和民兵则到处困扰阻击敌人。敌合围扑空后，就开始分股“清剿”。敌小股部队到处搜捕壮丁，烧杀抢掠。这时八路军外线部队转戈回击，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到九月下旬，各路敌人因屡遭失利，渐形困顿混乱，八路军即集中相当兵力，收复阜平。

为了配合晋察冀的反“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协同作战。从胶东到晋西北，从晋冀鲁豫边区到大青山根据地，同时出击，克复了许多城市，占领了三、四百个据点，平汉、同蒲、沧石、德石等铁路线，不时为抗日军民所切断。

在八路军夹击下，敌主力被迫于九月中旬开始从北岳区撤退，留下二万人继续在根据地内进行破坏。十月中，敌被迫全部撤走，敌人的“扫荡”就这样被粉碎了。总计在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作战八百多次，毙俘敌伪八千多名，毁路八百乡里，击毁敌火车三列。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间所能奏效”，并以“狮子捕鼠，效力不大”来解嘲。

在这两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中，出现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一年九月，敌军三千五百多人围攻狼牙山。五位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凭借山险，与五百多敌人整整搏斗了一天。最后弹药用尽，石块扔完，五人一齐跳下深谷。其中三名战士壮烈牺牲。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纠集了五万余兵力，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首先由外至内逐步向根据地中心地区压缩，构成一个“铁环阵”；当发现八路军已跳出包围圈后，又由内

向外对根据地边沿地区反复“搜剿”，企图将八路军主力重新压回中心地区；随后又采取奔袭追击、分区“清剿”等手段，妄想把八路军主力一举歼灭。

面对敌人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民按照毛泽东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思想，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斗争。八路军主力大部跳出外线，少部分留下分散到各地区，实行地方党政干部和部队统一编组，展开高度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广大军民以“挑帘战”、“院落伏击”、“捕捉战”等打击小股敌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伪军伪组织，孤立日寇。共产党组织还领导人民把“五一大扫荡”前挖的土洞和地窖，发展成家家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开展地道战。从而筑成了一道“无形长城”，化无险可守的平原为不可攻克的要塞。敌人的“扫荡”被粉碎了。

在“五一”反“扫荡”期间，八路军在极端困难险恶的环境下，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迹，如六月九日宋庄之战，八路军两个连击破敌人二千五百人的进攻，打死敌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一千一百多人。

在晋冀鲁豫边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八路军从山地主动出击，与群众相结合，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坏敌人交通线的交通破袭战。敌人白天修路，抗日军民晚上破袭，使敌人的“囚笼”计划始终不能成功。由于交通破袭战的进行，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赞皇至临城的公路，敌半年多不能向前修筑；安阳水冶到武安玉泉岭南北的公路，敌费时近一年，才勉强修通；邯长大道长期破碎；临屯公路始终未通。一九四一年五月，八路军与一万五千多群众一起奋战七昼夜，彻底平毁了敌人称为“万里长城”的自大营至冀县的长墙。八路军经常攻打敌人占据的县城，袭击敌人的据点，使敌震骇于“八路军的巧妙战术”，“不能安枕”。一九四一年九月，八路军曾以一个团的兵力突破平汉路外围的敌人封锁沟墙，直捣敌伪据点邢沙，将敌兵工厂焚毁，并把重要器械运回根据地。为了袭击敌人，隐蔽自己，自一九三八年平原区即开始挖抗日道沟，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冀南挖成道沟五万多里。从一九四一年起，又由挖道沟转入地道建设，开展地道战，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

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两年中，敌对晋冀鲁豫边区“扫荡”达五百多次，都一一被粉碎。同时，抗日军民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也取得了巨大胜利，单在太行一区，武工队于一九四二年就收复了敌占区一千二百一十余村。

在反“扫荡”中，晋冀鲁豫军民英勇顽强，创造了许多英雄事迹。黄烟洞保卫战，就是一九四一年八路军英勇战斗的奇迹之一。十一月，敌三十六师团主力五千余人，配合第四第九混成旅团一部，分数路围攻辽县黎城交界处的黄烟洞，企图摧毁八路军的一个修械所。守军及该所员工不满千人，在敌大炮轰击、毒气弥漫和以密集队形猛冲下，屹立不动，与敌血战八昼夜，打死打伤敌人千余，才奉命转移。敌付出惨重代价踏进黄烟洞后，不到三天又仓皇逃走。

在山东解放区，一九四一年冬，敌以五万重兵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两个月之久的“铁壁合围”。敌先袭击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驻地，紧接着又向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驻地留田猛犯。同时在沂河以东布置强大兵力，准备诱歼向东转移的八路军部队。但敌阴谋很快被识破。八路军留下部分武装坚持内线斗争，大部分由内线跳到外线作战。在敌合围接连扑空后，一一五师师部秘密回到中心区，指挥转入内线的主力一部，采取伏击、截击等手段，十天

打了七仗，毙敌千余。同时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向反复“清剿”大肆烧杀破坏之敌作斗争，迫使敌军不得不分路撤退。

一九四二年，敌人对胶东区进行了四十多天的“拉网扫荡”。八路军用“转山头”、“钻空隙”的办法巧妙地摆脱了敌人。

在晋绥边区，一九四二年是敌“扫荡”、“蚕食”最残酷的一年。二月，敌以一万三千兵力，进行“春季大扫荡”。一二师和地方游击队，经八十四天大小二百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五月，敌村川大队奔袭驻兴县附近的晋绥领导机关，结果落入根据地内撒下的天罗地网。田家会一战，敌村川大佐及一个中队长受重伤，两个中队长被击毙，整个村川大队一千四百余人，除极少数逃脱外，全被歼灭。

敌“扫荡”失败后，又采取“蚕食”政策。毛泽东及时指示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根据这个指示，晋绥军民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主力部队抽三分之一的兵力，游击队抽二分之一的兵力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挤敌人，广大群众也想了许多巧妙的办法挤敌人，从而打破了敌人的“蚕食”，使敌伪统治区不断缩小，根据地日益扩大。

在华中解放区，一九四一年七月，日军万余人、伪军一万五千人，分四路合击苏北盐城，后又分两路犯阜宁，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苏北主力。新四军指挥机关和主力及时跳出合击圈，于外线抄袭敌背后，形成反包围形势。苏中新四军部队也配合发起进攻，使占领盐阜之敌仓皇南逃。苏北主力分九路猛追，收复阜宁、益林、东沟、永兴、建阳、高作等地。总计新四军前后战斗一百三十五次以上，毙伤敌伪五千，伪军反正一千。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日军二万，伪军三万再犯苏北又被击退。在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夹攻的困难环境中，华中根据地仍然不断得到发展。

在华南解放区，一九四一年，在广东东江一带活动的游击队，挺进广九路两侧，与中共东莞县委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会合，正式成立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对这支游击队，敌人曾发动了无数次进攻。一九四一年，敌寇曾以二千余兵力配合伪军不断轮番进攻，但都被游击队打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挺进九龙，袭击敌人后方。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抢救了许多从香港逃出的国际友人和同胞。

海南岛是日寇南侵的兵站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岛地位尤为重要。在岛上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琼崖独立游击纵队，此时已发展到数千人，并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在抗战最艰苦的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无比英勇坚韧的斗争，用鲜血写下了壮丽的诗篇。抗战第五周年，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八次，平均每天作战四十次，毙伤俘日伪军十三万二千人。抗战第六周年共作战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七次，平均每天作战七十五次，毙伤俘日伪军十九万九千三百人。在这最艰苦的阶段，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军民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是站稳了脚跟。这就为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五 人民群众的反“扫荡”斗争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战争最残酷的年月里，英雄的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开展了顽强的斗争。

在反“扫荡”斗争中，各地民兵单独和配合主力部队、游击队作战，到处打击敌人，创造了一系列适合平原、山地不同特点的作战方法，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围困战、破击战等等。运用这些巧妙战法，狠狠打击敌人。

冀中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发动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后，以民兵为骨干，挖掘地道，开展了地道战。这种地道，纵横交织，村村相连，户户相通，成为巨大的地下长城。它既利于隐蔽转移，又便于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使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一个个被打倒，却摸不清子弹从哪里打来。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又一一解决了照明、防水、防毒、防挖掘等问题，并把发展地道与改造村落相结合，构成了房顶、地面、地道“立体”作战阵地。广大民兵以地道为依托，神出鬼没，来去无踪，大显神通。冀中清苑县冉庄民兵就是这样坚持了英勇不屈的抗日斗争，打死打伤日伪军一千多人。

地雷战，是民兵和广大群众的又一出色创造。他们就地取材制造地雷，有铁制的，也有用木头、石头、陶瓷制造的，还有用壶、碗、缸、锅等日常生活用具改装的。民兵埋雷的方法更是奇妙。有时埋雷后以鸡爪、驴蹄精心伪装，迷惑敌人，有时又故意在埋雷区插上抗日标语，以激怒敌人，让其自取灭亡。民兵把雷挂在门框上，叫“抬头见喜雷”，把雷吊在井里，叫“蜻蜓点水雷”，把雷互相连接起来，叫“遍地开花雷”，把小雷套大雷一起埋设，叫“子母雷”。此外，还有埋在公路上炸汽车的“飞雷”，设在村口的“拉火雷”，设在山坡的滚雷，以及用猪尿泡制造的“定时雷”、“跳雷”等。地雷战，使敌人无从捉摸，防不胜防，处处挨炸。各抗日根据地都涌现出了许多大摆地雷阵的“爆炸模范村”和民兵爆炸英雄。

在对敌斗争中，村与村紧密配合，广泛开展民兵联防运动，做到村村相联，庄庄相助，一村遇难，村村解围，实行联防警戒、联防战斗、联防围困、联防破击，从而把民兵的战斗力的水平。

广大民兵积极参军入伍，使部队兵员及时得到补充。他们把参加革命军队看作是自己无上光荣的义务。

在日寇疯狂“扫荡”的艰苦条件下，广大民兵劳武结合，“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生产，一面战斗。为了对付敌人的烧杀抢掠，各地以民兵为骨干，广泛开展“坚壁清野”，一旦敌人进村，使它见不到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迎接敌人的是冷枪、冷弹和四处爆炸的地雷。

在反“扫荡”期间，根据地的广大妇女和男人一样，英勇地和敌人进行斗争。她们站岗、放哨、捉汉奸、送情报，常常以巧妙隐蔽的方式来完成任任务。她们还做军鞋、军衣，抬担架，看护伤员，积极拥军支援前线。

在各抗日根据地，儿童也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手执红缨枪，活跃在根据地每一村边路口，协助人民子弟兵站岗放哨，为八路军送信带路。在宣传党的政策、支前参战、防奸防特、拥军优属、减租减息等活动中，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如太行区黎城县的六千多名儿童团员，仅在一九四一年头三个月，就盘查出一百四十一名有各种问题的人，送上级机关审讯。

在日寇频繁扫荡的险恶环境下，如果没有群众的掩护，党政机关和干部就无立足之地，有了群众，则如鱼得水，活动自如。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身上，经常以身家性命保卫子弟兵，掩护伤员。在日寇对冀中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中，敌人为了捕捉隐蔽在深南县王家铺村的八路军人员，抓了村内二十七个人。

群众，以杀头相威胁，要他们说出八路军人员的隐蔽地点。杀了一个不说，杀了两个还不说，一连杀了十四个，群众始终只字未吐。在山东沂蒙山区，一九四一年日寇大“扫荡”时，仅沂南县鲁山后、艾山后等五个村庄的群众，就分散掩护了八路军伤病员一千三百多人。在敌人碉堡林立，频繁“扫荡”、反复“抉剔”的情况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仍然能稳住脚，扎下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说打就打，使敌人的奔袭、“清剿”次次扑空，关键就在于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想意的拥护。

六 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和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为了战胜严重的困难，增强解放区的力量，共产党在进行整风运动和领导军民开展大生产、加强对敌斗争的同时，还制定和实行了其它一系列政策。

贯彻“三三制”原则，加强政权建设一九四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这个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着手进行“三三制”政权的普选。五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表明“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全边区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了选举。按“三三制”比例，选出了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又选出了政府委员会。十一月，召开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毛泽东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号召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的演说。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选举林伯渠等十八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吸收各抗日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政府。根据“三三制”政策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政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加强了对汉奸和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实行精兵简政这是解放区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战胜严重困难局面的重大措施。这一措施首先是陕北开明士绅李鼎铭提出来的，共产党采纳了他的建议。抗战开始后的几年内，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机构，这是适应战争发展的情况的。到一九四一年，根据地缩小了，并存在着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就不能再保持这样庞大的机构了。因此需要缩小机构，使兵精政简。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充实编制，加强地方部队和发展民兵，并且加强整训，达到精干、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简政，就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十一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主力军大力实行精兵政策，同时大力武装和发展不脱产的民兵。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甚至实行主力部队完全地方化。各根据地遵照中央的指示，把精兵简政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取得很大成绩。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一九四一年冬精简了百分之二十四，一九四三年又精简了百分之三十五，并建立了各种工作制度，

实行合署办公。一九四三年，边区政府公布了《简政实施纲要》。晋冀鲁豫边区是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模范。它规定一切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不能超过居民人数的百分之二，政府工作人员不能超过百分之一，民兵虽不脱产也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各根据地经过精简后，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只占全区人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军政费开支大为减少，人民负担随之减轻，并且部队、机关人员积极参加生产，深入基层，不但改善了生活，也改进了工作作风。经过精兵简政的战争机构，适应了当时敌后斗争的环境，不仅在粉碎敌人合围“扫荡”中行动轻捷，应付裕如，而且由于组织精干，战斗力强，为执行全面敌后斗争方针，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良好条件。

开展减租减息抗战以来，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一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但各地在执行中还存在着政策不够统一和工作不平衡的现象，存在着右的或“左”的错误偏向。为了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党中央政治局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它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全面的具体规定。决定指出，共产党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出发点是：（一）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二）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必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存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对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租息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的条件下，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以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这是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的三条基本原则。各根据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一九四三年运动进入高潮。减租办法，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从原租额中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则一般减到不超过当时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般在减息后定为年息一分左右。通过减租减息，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推动了根据地的其他各项斗争，巩固了解放区的革命政权。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根据地的各项政策能否很好地贯彻执行，归根结底取决于共产党的领导。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并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为各地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各地区军政机关和民众团体中的党员或团员，必须服从上级和同级党委的领导，执行其决定。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中央决定颁布后，大大统一了各根据地党政军民的行动步调，使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和军事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一切服从战争”的总原则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体军政民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强解放区军民的团结，共产党中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地大规模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群众运动，使党政军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上述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解放区军民充分地动员起来，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团结成为一个强大的战斗整体，为战胜困难，巩固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节 少数民族的政治状况和抗日斗争

一 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战争应该是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的基本点。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更具体地提出了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指出：针对敌人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必须注意下述各点：

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等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

第三，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

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汉人必须用平等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与轻视性的语言、文字与行动。

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把对少数民族的工作，当做一项重要任务。一九三九年一月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根据这个原则，陕甘宁边区的少数民族，除和汉族人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外，还可以在他们的聚居地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在经济上，边区政府还减轻了蒙族回族人民的税务负担，同时在粮食与日用品方面经常给他们以帮助。在文化上，边区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机关，如伊斯兰小学、蒙回民族学院、抗日回蒙学校等，以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还不断地用蒙回文字翻译各种抗日书籍。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习惯，边区政府予以尊重。在延安曾先后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

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族工作也得到很好的开展。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公布的《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中规定：“边区各民族应相互尊重生活风俗及宗教习惯，在平等基础上亲密团结抗战。在民主选举中，应予回、蒙、满、藏同胞以优待，对其贫苦无以为生者，特予救济。”在《晋冀鲁豫边区目前建设的主张》中，也强调了“边区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原则，并且提出要“反对看不起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是各民族的共同敌人，由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正确民族政策，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道，英勇地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 蒙古、回、壮、黎、苗等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蒙古、回、壮、黎、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内蒙、广西和海南岛等地先后被日军攻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蒙古族抗战爆发后，蒙古族人民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确定，内蒙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各族人民团结抗日。四月，建立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在伊盟开展工作。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开赴伊盟。此后，当地的抗日游击战争便迅速发展起来。五月，绥蒙工委成立中共河套特别委员会，开展河套地区的抗日工作。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陷落后，共产党员在当地组织了一支蒙汉抗日游击队，在大青山南麓打击敌人。到一九三八年秋，发展成为有二百多人的骑兵游击队，为建立大青山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同年八月，李井泉率领由一二师一部组成的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与当地游击队会师。随后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三月，绥蒙工委迁至大青山，改建为中共绥远省委（后改为绥察区党委）。同年夏，在大青山建立了抗日政权。大青山支队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进攻，两次粉碎绥远国民党军的进攻。部队在战争中不断壮大，扩大为三个团。到一九四一年，根据地扩大到九个县，拥有五、六十万人口，部队发展到四千多人。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伪军三万余人向大青山根据地进攻。八路军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胜利突围，根据地大部成为敌占区，一部变成游击区。但绥西、绥中、绥南各地的部队仍继续坚持斗争。一九四五年春，晋绥边区部队发动攻势作战，使根据地也恢复到一九四一年的局面。

回族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都建立了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组织。河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成立了大小数十支回民抗日武装。其中冀中回民支队是最著名的一支。冀中回民支队是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一九三七年冬，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设立了回民干部教导队，一九三八年七月，与马本斋率领的河北抗日游击军回民教导总队合并，组成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一九三九年秋改编为三纵队回民支队，由马本斋任司令员。从支队成立到抗战胜利，六年多的时间，回民支队转战于冀中平原、冀鲁边区和冀鲁豫边区，经历大小战斗八百七十余次，消灭日伪军三万六千七百余人，创造了辉煌的成绩。

黎族和苗族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军进攻海南岛时，国民党军溃逃，以冯白驹为首的广东琼崖抗日自卫队独立队在潭口一带迎击敌军。此后独立队在琼山、文昌等六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黎族人民纷纷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春，根据地扩大到黎族聚居的东方、万宁等县。同年，独立队进入苗族聚居的吊罗山区，苗族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以后，抗日武装坚持对敌斗争，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建立起来。到抗战胜利时，琼崖纵队发展到七千多人，解放了海南岛五分之三的地区。

壮族抗战爆发后，中共广西右江特委领导汉壮各族人民展开抗日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军进攻南宁，共产党发动广西人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又一次大溃退。中共广西省

委和各地党组织，领导汉壮等各族人民，在临桂、阳朔、灵川、大苗山、武鸣、宾阳、钦县等地进行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

三 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背叛祖国的活动

抗战初期，西藏地方政府仍由热振呼图克图继续摄政。热振拥护抗战，并努力促进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关系。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对热振的爱国活动非常恐惧。他们秘密策划发动政变，推倒热振。同时英国陆续侵占了西藏的罗坝、满丹、阳却等地。

为了抵制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亲英派的活动，在热振主持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三九年二月，三大寺两次派代表赴重庆，要求国民政府开发和保护西藏，驱逐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应西藏地方政府的请求，一九三九年三月，国民党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前往拉萨，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主持了达赖十四世的坐床典礼。同年四月，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但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并没有采取阻止英国侵略和亲英派活动的有效措施。在亲英派的围攻下，一九四一年一月，热振被迫辞职，打札活佛上台。从此，西藏地方政权落在亲英派手中。

打札执政后，西藏地方政府依靠英帝国主义的支持，进行了许多叛离祖国的活动。一九四二年七月，西藏地方政府非法成立所谓“外交局”，作为“藏政府对其他国办理外务人员之机关”。并通知国民党政府：“今后汉藏间事无巨细请径向该机关洽办”。这是英美帝国主义策划西藏脱离祖国的又一个阴谋。“外交局”刚成立，英美等国代表立即和它发生关系。国民党政府坚持与西藏的一切往还接洽方式，仍然照旧，不经过“外交局”，同时对西藏作了军事部署。这样，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分裂行径没有得逞。此后，英国不断加紧侵略西藏的活动，一九四三年，英国的情报网已经布满全藏各要地，并在亚东、江孜、拉萨等地派驻英军。此外，还利用教堂、医院、学校等进行间谍活动。英国出版的地图竟将中国领土达旺划入未定界，并连年扩大达克绷噶乐的境界。一九四四年英国威胁西藏地方政府将提朗宗割让给它，并正式承认白马岗及门达旺两地以南地方为英国属地。英国的侵略活动遭到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西藏地方政府召集僧俗大会讨论英国的无理要求时，大会决定“藏地决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如有祸患，僧俗共之”。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终未得逞。

四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和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及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成为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必经之地。新疆统治者暂时采取了对苏友好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工作给予很大的注意，在乌鲁木齐设立了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以后，又陆续派遣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到新疆工作。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三五 页。

同上，第三五三页。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共产党帮助盛世才政府先后举办县长训练班、政治干部训练班，培养各级管理人才。废除乡约、农官制度，建立区、村政权。取消锡伯营、察哈尔营等军事封建组织，设立县制。此外，还成立了省政委员会，以及各县的县政委员会，吸收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协助政府推行各项工作。这些措施，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共产党组织十分关心各族人民的的生活，帮助新疆发展经济。毛泽民在一九三九年担任财政厅厅长后，采取了改组省银行，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建立经济预算和核算制度，减轻税收，发放工、商、农、牧业贷款等措施，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盛世才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政治影响的扩大十分恐惧，因此就转而采取抑制和反对共产党人的政策。一九三九年，盛世才将从事宣教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往边远地区。一九四一年，解除毛泽民的财政厅厅长职务。一九四二年，随着国民党反共活动的猖獗，盛世才彻底撕下了进步的伪装，以所谓“阴谋暴动”为借口，将陈潭秋等逮捕入狱，并于一九四三年九月，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据估计，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三年，被盛世才反动政府逮捕入狱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各族进步领袖人物和青年知识分子，达十余万人。

盛世才的反革命活动，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此后，国民党政府不断派高级官吏到新疆活动。一九四二年秋，盛到重庆向蒋介石“述职”。他回来以后，立即改组省政府，将大批国民党反动分子安插到政府各部门，同时正式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从此，国民党政府开始直接统治新疆。一九四四年八月，国民党政府撤销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调走盛世才，另派亲信任新疆省主席，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将大批军队开进新疆，并在各县建立了自卫团，作为镇压人民的辅助工具；强制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宪兵和警察的职能，加强了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统治。

早在抗战初期，新疆各地就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秘密反抗组织。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柯克托海（富蕴县）人民曾经发动两次武装起义。青河的哈萨克族人民大都参加了第二次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转移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继续进行斗争。一九四二年，在阿山建立了阿勒泰哈萨克民族复兴委员会，提出“打倒盛世才政府”的口号。一九四三年初，起义军向乌河盛军总指挥部发动进攻。四月起义军攻克了青河，接着向阜康、奇台、孚远、乾德、昌吉等县进攻，各地哈族人民纷纷来响应。这次武装起义声势浩大，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一九四四年三月，国民党省政府强令新疆人民为国民党军队捐献一万匹骏马，如不能交纳马匹，必须按其所定比市价高一半的价格交纳现金。这一野蛮掠夺的主要受害者是伊犁和塔城等地的牧民，因而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九月，尼勒克县的哈、维等族人民，发动了反对献马的武装起义，袭击了国民党政府的驻军和警察，攻占尼勒克县城。

尼勒克起义迅速得到伊犁地区维、哈等族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十一月伊宁人民发动武装起义，迅速攻占了国民党的专员公署和专区警察局，控制了整个伊宁市区。十一月十二日，起义群众的代表在伊宁召开会议，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十一月，起义部队继续攻占绥宁、宁西、霍城、温泉、博乐、惠远等县。一九四五年一月，又歼灭了在艾林巴克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余军队。至此，起义部队控制了伊犁全境。

一九四五年一月，临时政府颁布了施政纲领。三月，临时政府将分散的起义部队组成正规的革命武装部队——民族军，并制定了解放伊犁、塔城、阿山的军事计划。五月，民族军开始向国民党新疆政府展开全面进攻。六月间，民族军在各路起义军的配合下，向塔城地区发动总攻。九月，塔城地区全部解放。

与此同时，民族军在阿山起义部队的配合下东进，围攻阿山。九月，占领了布尔津，反动军警纷纷溃逃，民族军和地方起义部队控制了阿山全部地区。不久，阿山也成立了革命政府。至此，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全部获得解放。

第四章 抗战后期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失利 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制止

一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失利和放宽对蒋的招降条件

一九四二年七月，侵苏德军在占领罗斯托夫后，集中精锐部队二十个步兵师、三个机械化师、四个骑兵师、五个战车师和几千架飞机，向斯大林格勒进攻。八月二十五日完成了对该城的包围。德军进攻的目的是夺取该城，然后一方面北攻莫斯科，一方面南出波斯湾，打通德日联系。经过四十八天极为激烈的争夺战，德军始终没能攻下斯大林格勒。十一月十九日，苏军转入反攻。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将被围的德军全部歼灭。在这次战役中德军死亡被俘三十二万余人，损失坦克三千辆，飞机二千架。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经过这次战役，德军从战略进攻开始转入战略防御，苏军从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反攻。这次战役的胜利对日本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军很久以来就在等待的进攻苏联的机会，是不会到来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德国的同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受到很大震动，在这些国家里开始出现了单独讲和的征兆。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希特勒德国企图挽回不利的军事形势，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了进攻。苏军从七月十二日转入反攻，八月二十三日收复哈尔科夫，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从此苏军牢固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从八月开始，苏军转入战略总进攻。

在北非战场，一九四二年十月英军对攻入利比亚、埃及的德意军队展开反攻。十一月美英联军利用德意等国的主力部队投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时机，在北非一些地方登陆。一九四三年五月，北非德意军投降，北非战役结束。

一九四三年七月，美英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开始了进攻意大利的作战。美英军队的登陆促进了意大利人民群众的反法西斯斗争，加速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法西斯蒂党头子墨索里尼被罢免，由巴多里奥组织新政府。九月初美英军在意大利半岛登陆。九月三日巴多里奥政府签署了停战协定。十月十三日，意政府对德国宣战。

随着苏美英对德意作战的胜利，德国占领下的法、比、荷、波、捷、挪威、丹麦、希腊、阿尔巴尼亚等被占领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有了发展。意大利的抵抗运动发展得更为强大。德国人民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经过一九四三年一年的作战，苏军和美英联军在各个主要战场都占了优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空前扩大。德国法西斯方面则连战皆败，损兵折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这一年是法西斯集团开始瓦解的一年。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半年内，先后占领了菲律宾、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一直推进到澳大利亚附近。一九四二年五月上旬，日本集中了大量兵力进攻中途岛，遭到美军的反击，损失航空母舰四艘和二百五十多架飞机。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战局的转折点，此后日军由攻势转为

守势，美军由守势转为攻势。

八月上旬，美军在瓜达耳卡纳耳岛登陆，这是同盟军在太平洋上展开正面反攻的开始。从美军在瓜岛登陆到一九四三年初，日军举行了几次反攻，企图夺回该岛，但全归失败。二月，日本守军几乎全军覆没，瓜岛被美军占领。在瓜岛争夺战中，日军损失四十艘军舰和大量飞机，两个精锐的陆军师也被美军打败。在这次争夺战中，日本帝国主义损失了所有可能调动的陆海空军兵力。从此日军丧失了作战主动权，美军转入战略总反攻，日军则节节败退。

日本政府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曾利用战争胜利的声势，一度采取了压迫蒋介石国民党屈服的强硬政策，拟定了进攻重庆的计划，并命令日军从宜昌向西进攻。但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日军在太平洋上已经逐渐失利。东条内阁为了把牵制在中国战场的六十万陆军解脱出来，以加强对付美国的力量，于是决定采取“对华新政策”。十二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以汪伪政府的参战为“打开日本和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专心加强国民政府（指汪伪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指汪伪）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决定以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新政策”中的“对华经济措施，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标”。这就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加强汪伪政权“政治力量”的目的。“新政策”还规定“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如果形势变化，“需要进行和平工作时，另作规定”。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日本帝国主义同汪伪政府签订交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的协定。同日，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三月，日本首相东条访问南京，借以提高汪伪政权的地位。在经济上停止在汪伪地区发行军用票。十月，日汪之间签订了“同盟条约”。总之，日寇“对华新政策”的目的是“扶植中国傀儡势力，消灭中国抗战势力，紧紧地控制住所谓‘日满支高度结合地带’，以期与美国争霸”。

但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是日本政府的一项既定方针。在一度停止对重庆的诱降工作后不久，一九四三年五月底又提出“使国民政府（按指汪伪）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的问题。同年九月意大利投降，日本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作战全归失败，陆海空兵力和物资损失极大。日寇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侵略方针已经完全破产。于是九月底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缩小要确保的重要区域，把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群岛、缅甸在内的区域，作为“应该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区”。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决定“乘机迅速设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由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定了《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如果重庆政权“有与美、英断绝关系的诚意”，“解除在华美、英军队的武装，并使其撤出中国”，“断绝同美、英的交通联系”，就可以“达成全面和平”。这项工作要由日本“指导”汪精卫去进行，这样日本的政治诱降活动又恢复了。

二 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准备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解放日报》时评《东条访宁——对我发动新进攻之信号》，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

在西方的希特勒德国节节败退，太平洋上的日本又不断失利，整个国际形势面临大变化的前夜，国民党顽固派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战一旦结束，英美就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力气地取得抗战胜利，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冲击了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他们惧怕自己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为了免于这种灾难，为了在抗战胜利之后仍能维持以至扩大其法西斯统治，感到有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反共行动之必要。

这时英美帝国主义为了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国民党的军队抗击日寇，减轻自己对日作战的损失，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分别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所谓“平等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这年秋天美英名义上承认中国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有权有责任参加国际事务。这样就抬高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身价。蒋介石估计这时美英不会干涉他发动反共高潮。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新的形势，做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是为了使各国共产党能更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好地处理本国革命中遇到的极为复杂的问题，同时，也为了揭破敌人关于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从外来的命令的诬蔑，促进各国共产党与各国反法西斯势力建立和加强统一战线。五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宣布，自五月十五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他反对共产党的一个借口和机会。

在上述情况之下，蒋介石集团加紧进行反共高潮的准备。三月，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这是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中国之命运》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所谓“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歪曲和反动的论述。它是一本比较完整地表述蒋介石法西斯集团的立场、观点、内外政策的极反动的书。它从蒋介石集团的哲学思想到现行政策都有所论述，其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从理论上为买办封建法西斯统治辩护，也为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论述中国历史的目的之一，在于说明蒋介石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它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说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蒋介石和过去一样，仍然利用封建糟粕作为推行反动统治的手段。

《中国之命运》极力歪曲中国近代的历史。它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归结为列强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单独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说成“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美英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民党政府订立所谓“平等新约”，渲染成“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并说中国从此开了“新机运”。但是，文字上废除不平等条约，丝毫没有改变国统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性质。他企图用这样的手法转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

蒋介石在这本书里又一次提出了所谓五项“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的是“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为基础”，就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其主要的是忠孝。“社会建设”把封建时代的乡社说成“建国的根本”，这是要强化保甲制度。他的所谓“政治建设”，“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他念念不忘的是那个“训政”，即法西斯专政。所谓“经济建设”，不外空谈“工业化”和用“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之类的谎话骗人。蒋介石要“建设”的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主买办法西斯专政的黑暗的中国。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再一次重复他的诚的哲学或叫力行哲学。说什么“‘知’本于天性”，“‘行’发于真知”。“‘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就是革命”。这个“诚”的哲学是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民党愚民政策愚兵政策的思想基础，是国民党专政机关的野蛮性和特务的残暴行为的指导思想。因此他把建立这种反动哲学说成“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蒋介石把自由与法治问题看成“革命建国”的另一个根本问题。他说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自由’必须在法定的限界之内”。他攻击自由，喜欢“法治”，要在中国“建设”什么“法治国家”。其实蒋介石的“法治国家”就是法西斯国家的代名词。

《中国之命运》就其思想本质来说，每一个章节都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但这样他还嫌不够，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行了明目张胆的攻击和谩骂。蒋介石说：“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的附会”。这样的学说和政论，“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这样的学说和政派，“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他甚至恶狠狠地说，要把那些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的人们除掉。

在这本书的后面，蒋介石提出一个中国命运“决定的关头”问题。他在这里说的是反共反人民的行动计划。“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他诬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叫嚣对“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必须铲除。他下了最后通牒：“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中国之命运的决定，“不出于这二年之中”。这就是说他已决心于最近期间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活动。

《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极端反动的思想和主要政策，它是中国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它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

该书发表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六月间，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目张涤非假冒“民众团体”名义，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把这项消息广为散布，大造反共舆论。国民党报刊大叫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他们更狂叫：中国绝

无产生共产党之条件。“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六月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会议。会后国民党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集中在边区周围的军队多至四、五十万人，准备大举进犯。七、八月间反动军队进行了许多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这时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危机非常严重，中国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

三 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制止 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

对国民党准备发动的反共高潮，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和国统区人民坚决反对和回击。陕甘宁边区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敢于来犯的反动军队。七月上旬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人，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呼吁团结避免内战。七月九日延安民众三万人举行大会，要求边区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并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制止内战的通电。三边绥德等地都举行群众大会，号召制止内战，保卫边区。贺龙在延安民众大会上呼吁全国团结抗战，同时宣布人如犯我，坚决自卫。延安各界紧急动员，进入了战斗的岗位。工人加紧生产，准备战斗。一二师全体指战员呼吁制止亲日派祸国阴谋，并决心彻底执行贺龙师长“坚决自卫”的指示。晋察冀举行万人大会，声援陕甘宁边区。刘伯承号召太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太行分区举行干部动员大会，决心为保卫党而牺牲一切。邓小平痛斥国民党反动阴谋。晋冀鲁豫文化界发表通电，誓为陕甘宁边区后盾，消灭法西斯思想毒素。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一致动员起来，为制止内战保卫边区而斗争。华北八路军主力一部调到陕北和晋西北，准备歼灭进犯的蒋军。

制止和抨击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是一场大规模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在这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用自己的名义发表《中国之命运》，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猖狂叫嚣反共，甚至示意决心发动反共内战。这就给全国人民一个指名彻底批判蒋介石的好机会。对以《中国之命运》为代表的蒋介石集团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是抗日战争时期政治思想战线斗争的高潮。

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批判《中国之命运》的主要阵地。毛泽东亲自为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解放日报》还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批判文章。这些社论和文章论述了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任务和政策，从各方面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和政策。

第一，提出了“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提出这个中心任务呢？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为了战胜侵略我国的法西斯强盗，使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贯彻到底，取得最后胜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思想上分清敌我，不容丝毫含糊，不容在我们阵营之内还有人宣传法西斯主义或其变种”。其重要理由之二，“就是为了将来的建国，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不是法西斯的中国，或类似

法西斯的中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思想上反对一切误国害民的思想毒素，这种毒素就是法西斯主义或其亚种”。

第二，揭露了蒋介石“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封建思想糟粕和外国法西斯主义的“杂种”。《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是“祖述孔孟……以至西太后的传统的老式封建，是承袭中国近代军阀开山祖曾国藩、胡林翼以至袁世凯、张宗昌……的衣钵的道地军阀。不过还找来了一批‘外国’的法西斯主义，充实一番，中西合璧，造成了中国式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之所谓‘继承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思想’，实际上就是继承中外文化中一切丑恶方面之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分。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

第三，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诚”的哲学。艾思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之命运》所宣扬的“诚”的哲学，是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它“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蒋介石等所大肆宣扬的反动概念“诚”，“不外就是迷信的代名词”。这和要求善男信女诚心诚意去敬菩萨一样。蒋介石“‘诚则灵’的招牌，其作用正和和尚道士的招牌一样，不过是索取贡品的幌子罢了”。

胡绳的文章深刻地指出：“诚”是唯心论的神秘主义的东西。这种哲学虽然看来完全是玄虚之谈，但仍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的实际意图相联系的。所谓“尽性致诚”论的作用不外乎消灭人民大众的自觉的实践。所以在长期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下，“诚”这个概念，“在神秘的外衣下被抬上神圣的殿堂，使人顶礼膜拜，作为欺蒙与麻醉奴隶人民的思想工具，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揭穿的”。如果把“诚”当做行为的原动力，那就是说只要从主观直觉出发，爱怎样干就怎样干。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行动论。这是反对科学，反对理性，发扬兽性的行为。这样，“东方专制主义的‘诚’的神秘主义就和近代最反动倒退的反对人民大众的法西斯思想一脉相通，那正是我们更不能不加以揭穿的”。

第四，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奸党”、“奸军”、“新式封建”、“变相军阀”之类的诬蔑，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简单地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不仅激起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遭到国统区中间势力的指责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如职教社主办的《国讯》即曾呼吁“每人把他所有智力和体力”，“尽量贡献给中华民族生存的抗战”，反对把力量消耗在内战上。在国际上，苏联报刊尖锐地指责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认为国民党政府“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的冲

《解放日报》社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

《解放日报》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解放日报》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四日。

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

胡绳：《论诚》，《群众》第八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解放日报》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突，极力地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取消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行动”，是帮助日寇征服中国。美英要利用中国抗击日本，因此也不赞成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发动内战。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都曾批评国民党抗战不力和挑起内战之非。

在蒋介石的反共内战还没有正式发动起来的时候，已遭到国内外的一致反对。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感到一意孤行下去，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因此不得不停止军事进攻。九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声称：“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国民党一方面承认政治解决的原则，一方面又大肆诬蔑共产党，在它所把持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一个反共的决议案，但重申“中共问题应以政治方法解决”。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用拖和骗的办法，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和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发动内战。鉴于国民党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在《解放日报》上提出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随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恢复了谈判。

第二节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和成就

一 “新理学”、“新王学”和对它们的批判

抗战期间，特别是抗战中期以后，随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想进一步泛滥起来。《中国之命运》就是这种思想的大杂烩。抗战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围绕着抗战中的两条路线、两个抗战前途、两种中国命运进行的。这种斗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贯串着。

在唯心主义哲学方面，建立起一种体系的是冯友兰。他自称其哲学为新理学。新理学出现在三十年代初期，体系的完成则在四十年代。一九三七年，冯写了《新理学》一书。该书除绪论外，分为十章：第一章讲“理，太极”；第二章讲“气，两仪，四象”。这两章，论述新理学哲学的根本原理，其余各章是根本原理在各方面的推演和应用。第三章“道，天道”，论述宇宙发展的一般法则；第四章“性，心”，是从心理方面讨论人性善恶问题；第五章“道德，人道”，是从伦理方面讨论人性善恶问题；第六章讲“势，历史”；第七章“义理”，讲学问；第八章谈艺术；第九章“鬼神”，讲宗教；第十章“圣人”，谈修养。可见新理学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新理学把世界划分为二，一个是此岸的现实世界，一个是彼岸的虚构的“理世界”。现实世界之中的实际的物，不过是“相对的料”，它是第二性的；“理世界”（或者叫“众理之全”的“太极”、“大全”）那里是“万理俱备”，“万理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则是第一性的，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创造者。物不过是“理之实现”。新理学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冯友兰的又一本书叫做《新事论》，该书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但实际上这本书讲的不是到自由之路，而是受奴役之路。他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民治主义，都是一个社会已实行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制度以后的事，如果在一个尚未实行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里谈这些问题，都真正是空谈。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但如果因此而认为他真是主张中国工业化或者现代化，那就错了。因为他不主张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革命。他是维护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的。例如他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些封建道德教条是“不变的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这些实际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新事论》实质上是反对中国现代化的。

冯友兰写的《新世训》讲的是人的生活方法，即人的生活的“本然规律”。他所说的生活方法是所有的人“都须用之”的普遍方法。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可举个例来说明。该书最后一篇名叫“应帝王”，说的是“凡作首领底人，都可以用”的“作首领的方法”。所谓“作首领的方法”就是役使下属的方法。他说：“法家谓赏罚为二柄。这是当首领底人驱使群伦底两个工具，亦可以说是一个工具的两个方面。”由此可见，《新世训》中所讲的是些什么性质的东西。

冯友兰说他的新理学讲哲学是为了“提高人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是“圣人”。《新原人》一书就是叫人当这样的“圣人”的。“圣人”能“知天”、“事天”、“乐天”、“同天”，

这样就和“理世界”合而为一。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有最高的“觉解”。能够超成败，超顺逆，超贵贱，超物我，超生死。这样，身体虽然还在尘世，可是精神已经飞到“天地境界”中去了。但是冯友兰并不求人出世，还要人活在尘世。活在尘世干什么呢？就是在其所在的“社会地位”上“尽伦尽职”，即“担水砍柴”、“事父事君”等等。这样一个人所做的是日常应作的事，可是他的精神境界则是极高超的。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的哲学就是要人们都做“天地境界”中的“圣人”。也就是说统治者统治人民、被统治者以财物供上，都是在“尽伦尽职”。这样中国买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就永世“太平”了。

总之，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在复活孔丘伦理程朱理学的封建正统哲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道家哲学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地主买办阶级和为蒋介石反动统治服务。

冯友兰的新理学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刊物《群众》的批判。《群众》上发表了陈家康的文章，批判冯友兰的超越时空的理或理世界的观点，主张“即物定理”和“理有生灭”的理论，用来批判冯友兰的理。“物生则理生，物灭则理灭”。没有脱离具体事物超越时空的理。“天下本无理，物之所以为物就是理”。“理就是物之理”，不能离物而言理。“理者，物之理。即物即理，理物不二”。“若谓物外之理，则天下并无此理”。理也不能生物，“物不依照任何物外之理以成其为物”。总之，冯友兰所说的理或理世界宇宙间是根本不存在的。

《群众》上发表了胡绳的《评冯友兰著 新世训 》和《评冯友兰著 新事论 》等批判专文。前者指出，冯所讲的生活方法，不是在现在中国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方法，而是讲的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的共同的生活方法。在人的精神生活方面这种共同的生活方法是不存在的。冯所了解的社会是抽象的社会。他认为无论社会怎样变化，都有共同的社会组织规律。这样的社会的规律是没有的。很明白，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实践，脱离了基本的人生观，而讨论人的一般的生活方法，这就只能触到在生活中的抽象的形式问题。因为构成生活内容的就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和人生观，而这些都被他从生活方法中抽象掉了。

批判《新事论》的文章指出：冯友兰只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二者都是“生产社会化底社会”，而抹杀了两者的根本区别。其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是根本对立的，前者包含着剥削关系，后者则否。如果说生产方法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人和人的关系无关，那就把生产方法仅仅解释成生产技术。这是不对的。“谁要是把生产方法看做只是生产技术，谁就会把从一种生产方法向另一种生产方法的转变，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看做只是改进生产技术的事情，而用到我们当前的现实中，就会把‘中国到自由之路’看做只是生产技术的不断的改进，认为中国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方法就只是运用机器，建设工业”。这样中国是不可能现代化的。批判文章指出冯友兰在所谓“新性”和“旧情”的关系上，他是以“旧情”压制或束缚“新性”的。例如他认为辛亥革命做为政治革命在旧情方面没有充分根据，所以是不必要的。他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充分工业化了，然后才能谈民主政治，不然就于旧情无据，不合乎国情。按他所说，“社会的革新就‘不过是’把原来已有的旧式工业在规模上扩大一些，在技术上改造一些而已。至于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都一概照

旧好了”。既然如此，他“当然可以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拉手”。他所说的中国到自由之路，“原来就是五十年前张之洞的道路”。

冯友兰认为道德是不变的。他说社会无论怎样变动总是一个社会，既然总是社会，就应该有整个社会的共同的道德规律。《群众》批判了这种思想，指出：冯友兰之所谓社会不过是对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抽象掉其中的特性，而得到的共相。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总是某个社会，某种社会，而不是抽象的“单单只是社会的社会”。因此脱离社会生活具体内容的常存不变的道德是不存在的。这是批判了《新事论》的一个基本思想。

四十年代的贺麟与冯友兰不同，冯友兰在词句上不讲唯心唯物，贺麟则公开炫耀唯心主义。冯友兰是程朱理学的新式宣传者，贺麟则是陆王心学的新式宣传者。贺麟推崇陆九渊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他说：“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故所谓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现也”。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只是把科学常识加以玄学化独断化”。他称唯物史观为“外观法”，只研究“外表现象”，不如唯心史观的“内观法”“注重本质”。他认为“历史是观念的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贺麟说“力行哲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有“精辟的发挥”。他说“知行合为一体，行中即包含知。即知即行，即体即用，即本体即工夫”。行又“包含诚和仁在内”，仁诚行是“三位一体的东西”。这些话的本来的含义无非是：用行中有知取消知，行包含诚仁就是说行本身是善的。不要用知指导行，行就是一切。

贺麟宣扬“五伦”和“三纲”。他说五伦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三纲是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关系。只有五伦观念，则“人伦的关系，社会的基础，仍不稳定，变乱可以随时发生”。三纲则“进而要求关系者一方绝对遵守其位分，实行片面的爱，履行片面的义务。所以三纲说的本质在于要求臣、子、妻尽片面的忠、孝、贤的绝对义务，以免陷于相对的循环的报复、给价还价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

对贺麟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者也给予了批判。《群众》上刊登文章批判了他对三纲五伦的“新解释”：“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五常，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三纲，本是反映着封建等级社会中的人与人的支配关系的道德教条，而贺麟先生则认为从这里发现了‘新’的东西。……他以为臣必须尽忠于君并不是表示君支配臣，而是‘对名分对理念尽忠，不是做暴君个人的奴隶’。这正是向一切奴隶说教，你不必苦恼，要知道你并非服从你的主人，你不过是服从那个在主奴之间的天理罢了”。

批判文章指出，贺麟在中国宣传新黑格尔主义，是企图把黑格尔著作中的神秘主义的雾罩得更浓，“使辩证法永藏在这雾中，以消蚀它的革命性”。这是“企图以黑格尔的反理性主义的发展来虐杀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发展”。

当时由于客观条件不允许，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水平，对上述哲学体系的批判是很不够的。但是这些批判揭穿了它们的阶级性和反动的政治作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战斗性。抗战期间批判反动哲学的斗争，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

二 反动的史学流派和对它们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的反动思想也很猖獗。国民党统治区的史学界中，

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思想都有。他们用自己的反动史学为买办地主阶级服务。

在买办史学家中，蒋廷黻是一个代表。蒋于一九三八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书中突出的反动思想有两点：一是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立场为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辩护。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比做人生不可缺少的“水”，说“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甚至说英法联军退出北京“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二是宣扬投降主义，为汉奸卖国贼辩护。蒋赞扬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卖国投降派，辱骂林则徐，更仇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把蒋介石从“九一八”到“七七”这段时间内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行为，说成是“深谋远见”，要人们“追随”蒋介石去找“出路”。

钱穆的史学思想则具有更多的封建性。他以当代的司马光自居。他把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国史大纲》献给蒋家王朝做为“资治通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把它列为“部定大学用书”。此后钱穆陆续发表了若干文章，积极为蒋介石集团效劳。他说“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是中国的传统制度。“中国政府早已由全部民众组织”。“秦汉时代乃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与民主精神之发扬与成熟”。按他的说法，国民党政府不是法西斯专政，而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他以此来反对中国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他又说中国已往的社会是一种“超阶级”的“自成一格”的特殊社会。他把汉朝的专卖政策叫做“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各阶级早已“消融”了。这样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当然只能是无的放矢和罪恶。他攻击革命人民“妄肆破坏，轻言改革”。

对钱穆的史学观点，共产党的刊物《群众》以及其它进步刊物都作了批判。《群众》上的批判文章指出：近几年来，若干“学者”“教授”企图从各方面证明中国秦汉以来的政治并非专制政治。这种看法“是和现实政治中的某种要求相呼应的”。文章在批判了“中国式的民主”的主要论点之后说：“很奇怪，想出这些意见的先生们都不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与事业，甚至还加以赞扬。但实际上他们是应该反对中山先生的，因为中山先生所要推翻的就是两汉唐宋元明清的那种国体与政体”。把那为封建专制主义辩护的理论当做是民主理论，把那封建专制主义的实际政治当做是民主政治，那么其用意无非就是主张保持、复活这种旧的理论和实际政治，而美其名曰实行“中国式的民主”。昆明出版的《自由论坛》第二卷第三期，重庆出版的《宪政月刊》第九期、第十期，发表社论和文章批判钱穆的谬论。《宪政月刊》的文章说：“或以为中国历来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的言论最足以阻碍民主的进行。中国既是一个民主国家，则今日的民主运动当然为多事。故这一种意见，随便就把民主运动一笔勾销。而成了民主的障碍”。

法西斯主义史学的代表是战国策派。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间，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在《大公报》上办了一个副刊，名叫《战国》，同时出版一种刊物，叫《战国策》。战国策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战国策派宣扬意志哲学和英雄史观。他们说，“人类的意志，才是历史演进的中心”。英雄“是人类意志的中心”。“没有他们，宇宙间万事万物也许就停止了”。他们把这种英雄叫做“力人”，实际是没有理性，践踏道德的“自由乱创造”的残暴统治者。战国策派自称他们的史学观点为“文化形态史观”。他们按照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把人类历史分为封建时代、列国时代、大一统时代

三个阶段。而当代世界和中国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在战国时代，“战为中心”，“成为一切行动的大前提”。这样的时代需要“一切为战，一切皆战”的“全能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民治问题”“落到次要地位”。因此，他们为蒋介石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法西斯主义叫好，说那是“抗战以来，中国最有意义、最切合实际的口号”。这一学派是正当世界法西斯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反人民都很猖狂的时候在中国出现的。

当时革命的进步的人士对战国策派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更着重批判了他们的战争观和英雄史观。批判文章指出：战争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战国策派抹杀这一真理，“无非要把今天人类所进行的有目的的斗争降低成为盲目的厮杀，要把每一个清醒的头脑变为热昏的疯狂，以便于受少数‘英雄’们的‘权力意志’所驱使”。他们混淆了中日战争在日方为非正义，在我方为正义这一重要区别，简直是污辱中国的抗战而为日本的侵略辩护。批判文章指出：那些目前是大战国时代，一切为了战争的喧嚣，是法西斯疯狂的呓语。法西斯侵略战争不是美丽的而是丑恶的。我们的抗战恰恰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消灭侵略战争，这才是正义的战争，值得歌颂的战争。英雄史观是完全错误的。批判者指出：“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主要力量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英雄的作用，我们只是说英雄是历史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他的意志，更高级地综合了群众的意志，正确地表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群众有了英雄就更有远见，更有办法，但不是仅有英雄就可以创造历史。这些批判是打中了战国策派的要害的。

反动的史学流派，反映了中国买办封建阶级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愿望，同时也是反动势力日趋没落时的叫喊。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在抗战期间，有了新的茁壮的发展。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著作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是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著作。毛泽东的这些著作指导了中国历史研究工作，论述和阐发了史学理论和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一）只有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二）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及其形成过程和基本特征。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彻底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对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性质论战问题做了明确的总结。（三）划分了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时期。从鸦片战争起，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而五四运动又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四）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和对历史遗产的批判与继承。“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一个有研究能力的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都要研究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而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结论性的意见和关于历史科学

理论的一些论述，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抗战期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显著的发展。出版的重要的历史著作有：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和《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等等。这些著作虽然对某些问题还没有取得可靠的结论，甚至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上是前进了重大的一步。

三 抗战时期文艺方面的成就

抗战时期革命的进步的文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坚持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方向，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抗战开始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紧密结合抗战的需要和群众的文化要求，迅速和普遍地发展起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田间写了许多充满战斗激情的短小精练的“街头诗”和一些长诗。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是两首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长叙事诗。小说方面有刘白羽的《龙烟村纪事》和周而复的《开荒篇》等。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阶段。延安和各解放区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热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奔赴前线，和工农兵群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文艺创作获得了巨大的丰收。

首先表现出成绩的是戏剧。新秧歌最先在解放区成为一个群众运动。在秧歌剧普遍开展的基础上，产生了为群众所喜爱的新戏剧，如《兄妹开荒》、《白毛女》、《血泪仇》等。尤其是《白毛女》反映了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指出了农民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它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并且继承了民族传统和吸收了西洋话剧、歌剧的经验，表现出新颖的、富有民族色彩的风格，因而获得广大群众的欢迎，为新歌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旧戏剧改革上，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京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这个戏改变了“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的状况，在戏剧舞台上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了人民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在小说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绩。生根在劳动人民中的文学家赵树理，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优秀作品。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旧到新的变化，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在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上树立了一个丰碑。在诗歌方面，艾青在到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写出了《毛泽东》和《雪里钻》等许多诗作，显示了作者与前不同的艺术风格。田间在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上不断探索，取得了新的成绩。其它如木刻、漫画等也努力反映革命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解放区的群众文艺运动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参加人数之众多，创作数量之丰富，运动规模之广阔，都是中国文艺运动史上

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空前未有的。如太岳区二十二个县，就有秧歌队二千二百多个，剧团七百多个。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迅速成长起来的新文艺，表现了文艺作家与工农兵相结合、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特色。它为以后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在国统区，由于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抗战开始就组成了浩荡的文艺队伍，使国统区的抗战文艺得到蓬勃的发展。皖南事变前后，进步文艺运动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冲破重重阻碍困难地前进着，并且取得了重大成绩。戏剧作品十分丰富，郭沫若取材于历史事实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六个剧本，取得很高的成就。经过他剪裁与安排的历史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教育观众和读者去认识并起来反对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反对民主的罪行，起到了显著的政治作用。这一时期的重要剧作还有：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和于伶、阳翰笙的作品。小说创作方面，茅盾的《腐蚀》，暴露和控诉了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罪行，较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尖锐地暴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文化工作的罪恶行径。沙汀的《淘金记》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情况。诗歌方面有郭沫若收在《战声集》中的许多诗篇，艾青的《向太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诗集，田间的《给战斗者》和臧克家等人的诗作。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杂文。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与成都《华西日报》的“艺文志”，都是以刊载杂文著称的。桂林出版的《野草》专登杂文，为广大进步青年所热爱。在散文与报告文学方面，有郭沫若的《沸羹集》、茅盾的《时间的记录》、周而复刘白羽等集体写作的《海上遭遇》等。这些作品都及时地反映了现实，鼓舞了人民的斗争意志。

在国民党统治区险恶环境中进行战斗的进步文艺运动，是整个革命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写下了一批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作品。

第三节 解放区战场转入局部反攻 豫湘桂战役 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一 解放区的恢复和解放区军民的局部反攻

一九四三年，日寇对解放区仍然进行频繁的“蚕食”和“扫荡”，但由于共产党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已经得到贯彻执行，到该年春，解放区战场的形势就开始好转，各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阶段。

四、五月间，日军一万二千余人对晋察冀北岳区东部进行分区“扫荡”。五月，日军一万五千余人，对晋冀鲁豫的太行区进行“铁壁合围”与“抉剔清剿”相结合的“扫荡”。这两次“扫荡”被粉碎后，日军又于同年秋冬，分别对晋绥、晋察冀的北岳区、晋冀鲁豫的太岳区、冀鲁豫和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合围“扫荡”。这些“扫荡”也被各根据地的军民粉碎了。在这一年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二万五千余人，拔除据点碉堡二百四十多个。太岳军区二分区第十六团，在临汾韩略村附近，全歼由日军一百二十余名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

同时，各根据地军民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继续进行反“蚕食”和反“清乡”斗争。晋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等根据地，派出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进行“蚕食”的敌伪军，围困据点，惩处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发动群众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到一九四三年底，晋冀鲁豫区不仅恢复了原来的根据地，而且有所扩大。晋绥区挤掉敌人据点七十处，收复了一千多个村庄。晋察冀区收复和新开辟了一万多个村庄。被敌人“蚕食”最严重的冀中地区基本恢复到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前的局面。山东恢复了七千多个村庄。在华中，经过一年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

解放区军民一九四三年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新的一年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

从一九四四年起，解放区军民对日寇发动了局部反攻。

在山东，一九四四年三至四月，八路军在鲁中歼灭伪军十三个团，七千余人，收复国土一万二千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三十万。八月中旬的沂水战役，收复国土三千五百平方公里，解放村庄三百五十个。在滨海区，七月下旬收复国土万余平方公里。十一月解放莒县。在渤海区，七月至九月的秋季攻势中，收复利津、乐陵、临邑、南皮等县，歼敌伪一万二千余名。在胶东区，在八至九月的攻势中，收复国土二万余平方公里。在鲁南区，在夏季攻势中，歼灭敌伪一万七千人。总计一九四四年内，共歼灭敌伪军三万六千人，争取伪军反正一万多人，收复县城八个，光复了大片国土，解放人口五百万。

在晋察冀，八路军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曾经攻占和攻入许多县城。全区在一年中共作战四千四百多次，歼灭敌伪军四万五千余人，共拔除敌据点一千六百多个，收复五千余村庄，不仅恢复了一九四一年的局面，而且已将游击战争扩大到伪满统治下的东北。

在晋冀鲁豫，八路军攻势极为活跃，也曾攻入和占领许多城镇。全区经过一年的奋战，歼灭敌伪军七万二千九百余人，共克据点碉堡千余，收复县城十余座，收复国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百余万。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在河南战役中弃地溃逃以后，八路军组织了豫西支队，由晋南渡过黄河，

积极打击日寇，建立了豫西解放区。

在晋绥区，战绩也很大。九月中旬该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攻入汾河西岸的要地汾阳城，将离石至岚县公路截成数段。一年中该区共克敌伪据点九十五个，解放村庄三千一百零八，解放人口三十七万，收复国土九万七千余平方里。

与华北战场上展开局部反攻的同时，华中新四军也展开了积极的反攻。

一九四四年三月，新四军第一师在淮安县东南的车桥镇发动了震动华中的车桥战役，毙俘敌伪一千三百人以上，其中俘日军四十八人。这一光辉的歼灭战，使宝应、淮安以东纵横百余里的一百万人口获得解放。七月新四军一师又连续出击，攻克了长江沿岸的几个重要港口。一年中，新四军一师共毙俘敌伪一万五千人，攻克据点一百三十五处。新四军第三师于一九四四年二月攻入涟水。五月开辟了灌河沿岸地区的工作。六月向射阳河以南进军，消灭伪海防军一个纵队，十一月攻入阜宁。经过这些胜利后，苏北和苏中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淮北地区活动的新四军第四师，从一九四四年三月起，发动了三个半月军事政治联合攻势，歼灭大量敌伪，克据点八十处，解放人口八十余万，使洪泽湖北岸完全为抗日军民所控制。夏天，为牵制河南正面战场之敌，四师又挺进豫东，收复了大片国土。在豫东战斗中，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牺牲。

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新四军第五师，从四月豫湘桂战役以后，便分兵北上与南下，在豫南收复了信（阳）西、确（山）西、遂平、汝南等县，在湘鄂边解放了嘉鱼、岳阳、华容、公安等地，共解放国土五万平方里，解放人口一百五十万。到一九四五年初，五师活动的地区，已成为一个面积三十万平方里、人口九百二十万的大解放区了。

除以上所述外，活动于苏南、皖中、淮南、浙东等地区的新四军各部，也不断主动出击，歼灭了大量敌人，收复了大片国土。

在华南战场，东江纵队一年间由数千人扩大为万人以上的兵团，东江区扩大到东起惠阳，西至三水、新会，北达增城，南迄大海的范围。琼崖解放区在一九四四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琼山、文昌、安定等八个县中建立了县、区、乡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人口有一百五十多万。到一九四五年，华南解放区已拥有三百万人口、数万民兵和一万五千余正规部队。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四年解放区各战场对敌战斗共一万一千三百多次，毙伤敌伪军近二十万人，争取伪军反正近三万人，攻克县城四十七座，据点五千余处，收复国土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七百万。

一九四五年，解放区军民热烈响应共产党“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号召，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了广泛的进攻。这时，人民军队已由高度分散逐步地集中起来，经过残酷战争锻炼的广大游击兵团上升为正规兵团，同时以爆破为主的攻坚技术日益提高。在解放区各战场相继开展的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中，连续克复了大量被敌伪侵占的比较坚固的县城、市镇和据点，在许多地区已把敌人压缩到狭窄的铁路沿线和较大城市。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已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以上，建立了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或一部，总面积达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九千五百五十万。尤

其重要的是解放区地处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全国的重要城市，如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青岛、徐州、郑州、洛阳、开封、武汉、安庆、南京、镇江、上海、杭州、广州等，均处于人民军队包围之中，全国许多重要港口，在人民军队控制之下和活动范围之内。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已成为全面大反攻的重要力量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强大基地。

二 日军对豫湘桂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

在解放区战场对日寇的局部反攻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战场却出现了抗战以来第二次可耻的大溃败。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日寇在太平洋上步步失利，西方的希特勒有摇摇欲坠之势。日寇为援救其侵入南洋的孤军，并准备在中国大陆作最后挣扎，急需打通由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日寇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到结果，认为有给它再一次打击的必要。因此，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四月十八日，日寇从豫东中牟渡过黄泛区，开始了对国民党统治的河南地区的进攻。在敌军五、六万人的进攻之下，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汤恩伯部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四月二十二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郑州陷落，五月二十五日，洛阳被敌占领。在历时三十七天的河南战役中，国民党丢失城市三十八座，损失兵员二十多万。

河南战役后，日寇又调集十万兵力，由洞庭湖两侧地区，开始对湖南的进攻作战。不下四十万人的国民党军队见敌即溃。五月二十七日，敌人在岳阳以南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防线，六月十七日开始进攻长沙，十九日国民党军队弃城逃走。敌军向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东南和西南空军基地的中间联络站衡阳进攻。国民党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降，衡阳于八月七日失陷。

九月初，日寇自衡阳出动，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进犯。为呼应湖南方面南下的日军，广东之敌分别沿西江西犯和自雷州半岛北犯。国民党军队依然不堪一击，十一月十日桂林失陷，第二天柳州又失陷。日军再从柳州南犯，与由越南北上之敌会攻南宁，二十四日国民党守军弃城逃跑，十二月十日，两股敌寇在南宁会合。至此，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告成。

日军为扩大战果，又以极少的兵力追击逃入贵州的国民党军队，其先头部队有两股，每股三百余人，其后续部队也不过二千五百人。几十万国民党溃兵望风而逃，日军一直追到独山，距贵阳仅一百二十公里，重庆为之震动。如日寇再加些兵力，可能给蒋介石政权以毁灭性打击。但日寇已达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于是又对蒋介石重新实行以诱降为主的政策，因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自贵州撤退，并把方先觉等放回重庆，进行诱降。

从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至十二月初，短短八个月内，国民党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四个省会和郑州、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一百四十六个中小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七个空军基地和三十六个飞机场，丧失国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使六千万人民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在这次大溃败中，我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河南损失八十八家工厂，湘桂粤三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三分之一，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亦全被敌人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归日寇掌握。上述地区的文化机关、图书仪器，全被劫夺破坏。河南大学因未得国民党当局的撤退通知，全部人员被敌包围，医学院院长及大部学生被俘，农学院院长被杀害。日寇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一万九千余人，被虏者二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六千余人，房屋被毁七百余间，农具被毁值四千七百余万元，米谷被劫五万余担，棉花被劫九千五百余担。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成百的死于疾病冻饿，而国民党官员却趁机大发“救济财”。

三 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缅甸的作战

一九四一年六月，法国投降德国，英国单独对德作战，英伦三岛形势危急。英国为借助中国力量保护它在远东的殖民地，于十月重新开放被封锁的滇缅路，并且酝酿中英军事同盟。国民党政府为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的国际交通线，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和英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一九四二年三月上旬攻占仰光，然后分兵向缅甸中部和北部进攻。在仰光危急时，应英国的要求，国民党政府以第五、第六和第六十六军编组为中国远征军，先后开入缅甸。三月中旬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指挥远征军作战，同时蒋介石又命令远征军必须服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挥。

从三月中旬至四月，远征军先后在同古、仁安羌、腊戍等地和日军进行战斗。仁安羌之战解救出被日军包围的七千多名英军。由于英国没有防守缅甸的决心和准备，作战中又歧视中国军队，未能和远征军很好配合，而蒋介石又处处迁就英美，听任摆布，致使远征军连遭失败。四月底至五月，远征军陆续退却，大部通过野人山及高黎贡山向云南西部撤退，路途异常险恶艰苦，伤病死亡和落伍的比在战场上死伤的还多。另一部撤往印度。

远征军此次入缅作战，损失惨重。总数约十万人的部队，损失了六万人，装备大部丢弃。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切断了。

退往印度的远征军，于八月集结到印度的兰姆珈，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任总指挥。驻印部队及以后从国内运去的部队，改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接受美军的训练和装备。退至滇西的远征军及新增加的部队，于一九四三年春重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所辖部队也接受美军的训练和装备。美蒋商定，不经过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由美方直接装备十二个军。

一九四三年春，美军接替英国人修筑雷多公路（从印度的雷多到缅甸的密支那），以便打通中印陆路交通。中国驻印军负担掩护任务。为打退日军的袭击，加速筑路进程，驻印军从十月开始先后在胡康河谷等地进行了多次战斗，并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初攻占密支那，十一月中旬攻占八莫。一九四五年春又先后攻占南坎、腊戍等地。

为策应驻印军在缅北的作战，滇西远征军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中下旬西渡怒江攻击日军。九月先后攻克松山、腾冲，十一月初进占龙陵，中旬攻占芒市。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攻克畹町。二十七日，远征军和驻印军在芒友会师，

打通了中印公路。不久驻印军被调回国内。

四 国共谈判 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国民党的阻挠

皖南事变后，共产党仍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于一九四二年夏和一九四三年冬，两次派代表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解决全国政治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但因蒋介石顽固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谈判始终未获结果。

一九四四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同国民党谈判。五月二日林伯渠到达西安，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作初步商谈。

在西安谈判中，林伯渠提出，以周恩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演说的基本精神，即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循民主的途径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问题，为谈判的基础。国民党代表反对实行民主，主张先谈军事问题及边区问题。对编军数目，林伯渠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敌后的正规军四十七万七千余人，都是久经对日作战并卓有成绩的部队，应立即予以编整，目前可先给以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国民党代表只同意编四个军十二个师。经几次会商，最后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双方签字，各报其中央，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林伯渠按双方约定首先在记录上签字，国民党代表却没有签字。

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应邀到重庆。中共中央于五月二十一日电示林伯渠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其主要内容，关于全国政治制度者三条：（一）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实行名符其实的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主要有：关于编军，目前至少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撤销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对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进攻，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停止在报纸上对共产党的造谣；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对《新华日报》无理检查。国民党代表声称“如此写法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拒绝转达。

六月，国民党代表向共产党代表面交一份国民党政府提示案，顽固地坚持法西斯独裁和消灭异己的方针。国民党方面强调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妄图把八路军新四军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要解放区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这个提示案，是共产党所不能和不应该接受的。

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以致经过四个半月的谈判，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九月初，国民党召集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时国民党战场继豫湘溃败后，桂林又告急，国民党不但军事上面临崩溃的局面，政治与经济上的危机也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变误国政策，驱逐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挽救国家的危局。九月十五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参政会上报告了四个半月来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的症结，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林伯渠声明：“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

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需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

“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十月十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讲演中，代表共产党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第一，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第二，国事会议，应于最近期间召开。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通过切合时宜、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第五，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

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国统区各界社会人士张澜、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李济深、陶行知、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广大工人学生还举行了示威游行。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蒋介石则极力压制广大人民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一九四五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企图用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的空言，来平抑众怒，抵制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他说什么“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及时“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共产党立即揭破了蒋介石的欺骗，指出：国民党政府曾开过很多“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的空头支票，但一次也未兑现，而且，不先改变寡头专政，彻底改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也不可能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而只能是袁世凯曹锟所开过的那种洪宪国会、猪仔国会。

虽然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阻挠郑重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仍以最大的耐心和努力来争取其实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和一九四五年一月，两次派周恩来与国民党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毫无结果。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讲，声称：共产党最近要求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组织的联合政府，“而我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及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的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他还说什么组织联合政府将招致抗战失败国家混乱。他的“结论”是：“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最后他说要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

在蒋介石演讲的次日，共产党通过新华社给以严厉的驳斥，指出蒋介石的这个演讲“鲜明地反映了国民党内最反动集团的立场和企图”，是专制主义者的一篇“低级遁词”。所谓组织联合政府将招致抗战失败国家混乱，那么十八年来中国并无联合政府，只有蒋介石的独夫统治，难道抗战还未失败，

国家还未紊乱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提出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正是反映全国人民公意，为了挽救由于蒋介石独裁统治所造成的抗战失败国家紊乱的可怕现象。新华社在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及国民党内最反动的专制主义者，现在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但他们不愿顺从民意，废止独夫统治，成立联合政府，却想寻一件民主的外衣，来包裹其反革命法西斯的躯壳，这就是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实质。

中国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虽然被国民党蒋介石拒绝了，但是它为全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吸引着各阶层广大群众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从而把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五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官僚资本的垄断和压榨，使国统区国民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又使人民完全失去政治自由。这是国统区民主运动酝酿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的大溃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动和腐朽，这是抗战后期民主运动高涨起来的直接原因。

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在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实际收入大大下降。一九四四年九月国民党公布的一项显然缩小了的比较数字说：职业工人工资较战前增加指数为二百八十倍，而生活费指数增加四百七十倍；产业工人工资较战前增加指数为一百九十三倍，而生活费指数增加四百四十七倍。这样，职业工人的购买力降低到战前的百分之六十八，产业工人降低到战前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二。到一九四五年二月，据估计，工人的购买力已降低到战前的百分之二十。同时，国民党政府自一九四三年起实行“工资条例”，规定工资的调整必须由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和社会部决定，工人无权过问，工人转厂全被禁止，年终分红也被取消。国民党的垄断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工业危机，工矿企业纷纷停工歇业，大批的工人被赶出厂门矿井。一九四四年三月间重庆一地的纺织工人就有四万多人失业。同年云南个旧锡矿有大批工人失业。失业工人流离失所，生活极为悲惨。

国统区的广大农民，在国民党统治和地主高利贷主残酷剥削下，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国民党加在农民头上的负担不断加重，一九四四年丢掉了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却将田赋由一九四三年的六千二百万石增加到八千万石，到一九四五年更增至一亿石。同时，地主的地租也不断增加。到一九四四年四川已平均增到收获量的十分之八。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更增加了灾荒的严重性。一九四四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十三个省区。四川灾民二千万，鄂北三百万，陕西三百万。河南在“水、旱、蝗、汤（汤恩伯）”四灾祸害下，据不完全统计，饿死的有三百万人，流亡他省的有三百万人，濒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有一千五百万人。城市贫民的生活同样痛苦不堪。一九四四年重庆每日饿死街头无人收尸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许多妇女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重庆平均十三个女青年中，就有一人陷入火坑。依靠薪俸为生的小职员和教师，难以糊口的微薄薪资还常常被克扣侵吞，逼得大多数人典卖衣物，有的大学教授靠卖书籍补贴。大后方作家有的因经济困窘而自杀。青年学生因营养不足，疾病死亡率非常之高，愤而自杀者时有所闻。国民党士兵的生活也十分痛苦，每月薪饷只够买三双草鞋，吃不饱，穿不暖，病无医药，还要受军阀长官的打骂、处罚。

有些国民党的师旅，疾病死亡和逃走的士兵竟占员额的一半以上。

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豫湘桂战役的可耻大溃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慨。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的事件相继发生。各阶层人民反抗剥削压迫、要求民主自由的斗争日益高涨。一九四四年九月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把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工人阶级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追悼胡世合的群众性斗争。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因制止特务偷电，被开枪打死。《新华日报》号召工人和各界群众起来抗议特务暴行，得到了各阶层群众和舆论界的普遍响应，全市各阶层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工人和市民总计在二十万人以上。重庆的工人、学生，解放区的工人组织和沦陷区驻后方的上海工人协会，纷纷捐款致电慰问死难家属及受伤工人，抗议国民党暴行，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枪决行凶的特务。这次政治事件，鼓舞了各阶层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一九四四年七月，河南桐柏、遂平、唐河、确山、泌阳、信阳和湖北随县、应山等县农民，为反对国民党军勒索、拉丁而起义。国民党派六十九军二十八师前往镇压，屠杀了男女老幼五千余人。各县农民群起反抗，组织了农民救国军，提出了“反对不抗日的军队”等口号，将扰害人民的二十八师全部缴械。一九四五年，陕南第八行政区农民起义攻占县城，要求免丁免粮。四川宜宾县起义农民也一度攻入县城。贵州有万余农民起义，夺到步枪二、三千支，一度占领三都县城。这些民变，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和广大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下，国民党统治区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抗战与民主的声浪越来越高。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五百余人举行会议，共产党人董必武在会上讲了话。与会人士强烈要求彻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制订改组国民党政府的具体办法。十月，宋庆龄、张澜、郭沫若等七十二人发起追悼邹韬奋的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数千人，对国民党的寡头统治表示了极大的愤恨，提出要向法西斯统治展开更积极的斗争。同月，成都二千余人举行国事座谈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迅速成立联合政府。民主政团同盟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取消“政团”二字，改称民主同盟，并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十月十日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昆明的一些大学教授创办了《自由论坛》杂志，宣传民主，反对专制。一九四五年元旦，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等，纷纷发表“献言”、“献词”和“希望”，呼吁和要求：一切抗战部队“真正联合作战”，国民党与各党派切实合作，早日实现“举国一致之政府”等等。抗战后期，民主党派的若干成员在共产党的影响帮助下，在认识上较以前有很大提高。他们看到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对它已失去信心，而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同情，逐渐认识到民主是解决国内问题的先决条件，改变了抗战初期把民主与统一并提的主张。当然他们所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发展自己的政治力

量，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抗战与民主，是有重大积极作用的。

民族工商界的人士本来对国民党敢怒不敢言，这时也开展了反对四大家族垄断专卖的斗争，并和共产党往来。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工商界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向国民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会，弄得国民党穷于应付。

一九四五年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更加蓬勃开展，集会规模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斗争形式由座谈会、讲演会发展到游行示威。五月四日，昆明近两万学生在开完纪念“五四”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高呼“立刻停止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组织”，并一致通过成立昆明学联，以便统一行动，并以昆明学联促进全国学联的成立。

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高涨，教育了中间派，孤立和打击了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势力，使革命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这不仅有利于当时的抗战，而且为抗战胜利后围绕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给中国人民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节 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利用中国对日作战和控制国民党政府，以大量贷款、军火援蒋并替蒋训练军事人员。一九四二年二月，美国给了蒋介石五亿美元的贷款。六月，在华盛顿签订了八亿七千万美元的中美租借物资协定，规定美国以军火和军用物资供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则“供给美国各种物品、人工便利及情报”。同年春，美国认为中国应作为美军拦截和摧毁日本船只以及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从这一观点出发，委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美国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要他“紧握着领导权”，就是要把中国放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史迪威主持在印度装备与训练国民党军队的计划，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最新式的美国武器装备。从一九四三年起，一批美国军官，在中国训练国民党军官，到年底为止，在一个炮兵学校受训毕业的军官有五千名以上，在一个步兵学校受训毕业的军官有三千名以上。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空军与美在华空军编成混合大队，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兼蒋介石的空军参谋长陈纳德指挥。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特务统治和为美国提供情报，美国还派遣特务头子梅乐斯来华，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合作，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在重庆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并在各地设立各种训练班，训练与装备国民党特务、警察。

美国的对华政策，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主张和这个力量合作，反对蒋介石利用美元打内战，以便利中国人民的力量抗击日本。另一种是不承认中国革命力量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随着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反共反民主两种世界潮流、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斗争的加剧，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愈来愈露骨地表现为扶蒋反共。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开罗会议期间曾谈到，尽管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尽管蒋介石“不打日本人”而“把他大部分最精锐的军队驻屯在西北——红色中国的边境上”，采取一种结局对他“政治上大为有利的方式”来推行战争，“而不愿尽量迅速地来结束战争”，但是美国在中国却“不得不依靠”蒋介石。

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取得了局部反攻的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迅速发展。而国民党战场则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国民党反动统治遇到了空前的危机。由于当时日本还拥有强大的实力和优越的战略地位，对日战争胜利的迟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战场，因此，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对于美国在太平洋作战是不利的。尤其使美国感到焦虑的是国共两党势力的消长。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如果美国不采取步骤，“就中国境内实力的新形势加以调整”，那么，在这两种力量的战争中，“共产党将必然会胜利”。为了加强中国对日抗战的能力，减少美国对日反攻的困

《史迪威日记》，第九页。

小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第二二、一四六、一五四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三三页。

难，扭转中国这种十分明显的政治趋向，一方面美国授意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并于一九四四年六月派副总统华莱士，以“调谐国共关系”为名前来中国活动，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进行一些改革，对共产党问题寻求“和平的解决”，缓和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加强抵御日本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谈判的方式诱使中国共产党把军队交给国民党。

一九四四年七月初，罗斯福亲自写信给蒋介石，以补救中国局势的“危急”为理由，提出要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的一切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对此，蒋介石于七月八日复信罗斯福，表示“原则上赞成”。但实际上反对。这期间，蒋介石同史迪威在权力的争夺上，尤其在如何看待共产党军队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冲突。因此，蒋介石要罗斯福派一个有全权的私人代表来同他合作并协调同史迪威的关系。

八月，美国总统任命赫尔利为总统私人赴华代表，同时任命战时生产部主席纳尔逊为总统代理人，赴华研究中国“急剧恶化的”经济。赫尔利最初的使命是谐调蒋史关系以利于史迪威行使指挥权。九月六日赫尔利到达重庆。

蒋介石虽然接受了美国要他同共产党谈判的主张，但对于美国要他进行政治改革，不以武力进攻共产党是反对的。他仍然避免对日作战，以保存军事实力，并把军事失败的原因推到美援不足上，以便向美国索取更多的军火和金钱。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希特勒崩溃在即，日本的败局已定。美国为了阻止中国人民的胜利，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以便在战后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控制亚洲及太平洋的基地，已不再强调蒋介石的对日作战，而侧重于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十月中旬美国总统决定召回史迪威，另派魏德迈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十一月一日驻华大使高思辞职。十一月三十日赫尔利继任驻华大使。他的主要使命就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这是当时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目标”。史迪威被召回国和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是美国采取公开扶蒋反共政策的标志。此后，美国加紧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政府，极力扩张其侵略势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重庆成立了国民党政府战时生产局，它实际上是美国包办控制中国经济的一个机构。十二月，在美国协助下，国民党政府在昆明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何应钦，副总司令龙云、卫立煌。美国直接掌握这个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机构。在这个机构的主持下，用大批美国武器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五年一月，由美国操纵的国民党政府战时运输管理局在重庆正式成立。

美国一方面大力扶植蒋介石，积极扩张侵略势力；一方面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调停国共争端为名干涉中国内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国共两党调解人的身分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他表示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双方达成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五点协议。赫尔利又支持蒋介石提出三点反建议，其主要内容是：组织一个由美国人主持、国共两党各派一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领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三九页。

同上，第六 四页。

导的武装，交由蒋介石委派的一名美国军官指挥，然后由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邀请”一些共产党员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蒋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抵制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吞并人民军队。为了在五点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十二月，周恩来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围边区及袭击新四军之国民党军队和华南反共军队、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之压迫性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等四点具体意见，要赫尔利转达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不但拒绝这些起码的条件，反而在一九四五年元旦悍然宣布要召开国民党御用的国民大会，公开拒绝关于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到了三月，他更进一步说，中共必须先交出军队，然后他才给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同美国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和斗争下，美蒋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的阴谋遭到了破产。于是赫尔利就撕破伪装，一九四五年四月，他以美国驻华大使身份，在华盛顿公开发表声明，硬说蒋介石“并无法西斯心理”，他的目标是使国家走向“民主政府”。中国“统一”的障碍在于“武装的政党”共产党。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至此，美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充分暴露。

二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一党独裁，抵制联合政府，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相反，这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即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

大会由蒋介石致开会词，吴铁城作党务报告，吴鼎昌作政治报告，程潜作军事报告，何应钦作部队整编与湘西会战经过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纲领和决议，发表了宣言，选出了二百二十二名中央执行委员，九十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一百零四名中央监察委员，四十四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国民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决定坚持独裁，拒绝联合政府。它装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决定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并由这个大会通过宪法。国民党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的代表，是早在抗战前由国民党中央指定或由国民党包办“选举”出来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以抗战前国民党公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五五宪草”为依据，国民大会的职权及其它有关问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这样的实施宪政，不过是把独裁大权从左手交给右手。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实际上是使那个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按在人民头上的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们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国民党大会通过的《政纲政策》里，又一次虚伪地提出要“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学术研究之自由”。当然这也只是永远不会兑现的空话。事实上就在国民党通过这个政纲的同时，在他们的集中营里正关押着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他们豢养的大批特务正在到处横行，人民毫无民主自由可言。

在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所谓《农民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土地政策纲领》、《工业建国纲领实施原则》、《劳工政策纲领》等等。在国民党的所谓政策纲领里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等天然富源，应立即宣布完全归公”。“凡私有土地，应即速规定地价，照价征收累进税，并执行涨价归公”。国民党说的“公有”就是买办封建法西斯国家所有，实际上也就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的私有。至于所谓“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规定，则完全是骗人的谎话。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国民党的政纲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

国民党的政策纲领里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原属民营之事业产量未足定额时，由政府筹措”。这是明白规定国民党政府可以任意吞并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国民党还规定它的政府要“节制”“一切剥削行为”。这看起来是极端可笑的，但它的真实用意在于限制压迫中小资本家，扩大四大家族的“国营”经济。国民党又规定“以资金汇兑之便利，水陆运输之协助，机器材料之分配”等办法，“扶助民营企业”。实际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正是利用它在金融、运输、物资掌握各方面的特权，卡住民营企业的脖子，以至把那些企业据为己有。

大会通过的《工业建国纲领实施原则》，大言不惭地说要进行什么经济建设，并说要为此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等等。他们的经济建设主要是扩大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侵吞中小工商业，因此所谓进行经济建设实际是破坏经济建设。

动员国民党全党的力量，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是这次大会的又一中心议题，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反动集团未敢公开作出发动反共内战的决议，而是在《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里，以“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种暧昧的词句埋下发动内战的伏笔。因为国民党可以随时假借“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向中共发动进攻。所谓“商谈解决”，不过是伪装“和平”的一个幌子。这一点由下列事实可以证明：在国民党大会的特别报告中曾露骨地说：“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之优势条件与环境，故必然从政治上军事上强固党的力量”。国民党大会开过不久，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声称将以美援武器进行内战：“美国对中国租借武器近来已增加。……如中央部队遭受不友好之部队袭击时，若望中央部队不用其所有武器自卫，亦为不近人情之事”。

事实上，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两天，即五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就集中了三战区（浙西）五十二、七十九等十个师的兵力，以上官云相为指挥官，李觉为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苏浙军区进犯，企图将苏浙军区新四军一举消灭。新四军忍无可忍，起而自卫，将其击溃。但蒋军仍在解放区周围不断骚扰，并扬言将大规模进攻。在陕西方面，自七月十五日起，胡宗南突然从潼关、灵宝一带及韩城至朝邑之河防线和西安、华阴等处，调集了九个师的兵力，开至陕甘宁边区南线附近之同官、耀县、三原、泾阳、兴平、乾县、淳化、旬邑等处，准备大举进犯。二十一日，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九师，突然向边区防地耀县爷台山攻击。边区的军队为避免内战，坚守阵地，未予出击。后蒋军继续派兵增援，并使用火箭炮疯狂轰击，边区的军队于二十七

日奉命转移。国民党军队在夺占爷台山后，继续往北侵犯边区的赤水县境。此外，蒋介石还命令河套伊盟两区军队，挟美国装备的新式武器，向绥南、绥西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在其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策划的内战阴谋，已在试探性地实施。

国民党大会的路线是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是扩大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路线。这个路线不仅违反全国人民的公意，也违反世界的潮流。这条路线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日益尖锐的重要关头，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反对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全党一百二十一万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四月二十一日大会预备会上，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他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即使打败日本之后，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党的任务是用全力去争取实现光明的前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陈云、彭德怀等也在会上发了言。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大会经过充分酝酿，选出中央委员四十四人，后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六月十一日大会胜利闭幕。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夺取革命的胜利，领导全国人民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始终洋溢着非常民主、非常团结、非常融洽的气氛。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经过这次大会，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就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中国的光明的前途，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祖涵、张闻天、彭德怀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二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程，是听取和讨论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深刻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党在当前革命阶段的总路线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中国人民当前的基本要求是：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抗战胜利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这些基本要求呢？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问的。

从整个形势来看，当前，在中国人民面前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

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这次大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化。

这条政治路线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思想，详尽地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这些纲领应作为联合政府的共同纲领。毛泽东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同时，明确地指出了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这条政治路线指明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实现上述革命目标的根本途径。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发动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如何对待农民问题，就成了国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所在。毛泽东指出：“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他全面阐明了农民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农民是工人的前身、工业市场的主体、军队的来源、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壮大人民力量，重点是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以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

这条政治路线指明了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上述革命目标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领导，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使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继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在同各种错误倾向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在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理论和实践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是一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它正确地估计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它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共产党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抗战以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阐述了党的路线纲领和各项政策。它对于指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 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的制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修改党的章程。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首先说明了为什么要修改党章，他说，我们的党章，从一九二八年六大修改以后，到现在已有十七年了，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已有许多部分不能适用，十七年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极丰富极重要的经验也必须充实到新党章中去，以加强党的建设，动员全党去执行新的政治任务。因此“七大”必须制定完全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党章。

接着刘少奇就党章的总纲、党员、党员的义务与权利、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干部、党的基础组织、奖励与处分、党的严肃性与灵活性诸问题作了说明。在关于党章的总纲的说明中，刘少奇解释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我们党的性质问题，他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二是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他指出，我们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四是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大会讨论了刘少奇的报告和新的党章草案，制定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对于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作风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新党章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新党章的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第二，新党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新党章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新党章的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听取人民

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

第三，新党章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详细的规定，增加了党员义务和权利的新条文。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新党章的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新党章条文中把服从党的纪律规定为党员的义务，以保证高度的集中。同时，又把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规定为党员的一项权利。

新党章的制定，巩固了延安整风的伟大成果，进一步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从而使全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去实现党的“七大”所提出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四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共产党“七大”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他指出，解放区战场的伟大胜利，是由于毛泽东规定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是正确的。

朱德论述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创造、发展过程，及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伟大战绩，总结了解放区抗战的经验。指出“这种解放区的力量，是属于中国人民所有的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使中国人民有了胜利的展望，有了民主和光明的展望”。现在抗日战争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

朱德在报告中，论述了抗战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系统地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败的症结所在。与此相反，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前一条军事路线，是国民党的军事路线。后一条军事路线，是共产党的军事路线，就是人民军队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

朱德在报告中根据大会政治报告提出的党的总任务、总路线，指明了共产党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在全国，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帅部，成立一个民主的联合统帅部，改造国民党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在沦陷区，加强对沦陷区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作和组织地下军。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一）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二）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军；（三）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的训练；（四）提高军事技术；（五）加强指挥机关；（六）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七）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军人及退伍军人的工作；（八）加强军内军外的团结。上述一切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

第六节 解放区军民大反攻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雅尔塔会议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举行雅尔塔会议。会议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结果三国首脑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二）由日本一九四四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取得蒋介石对上述有关外蒙古及港口铁路协定的同意。“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雅尔塔会议没有中国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规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按照协定，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底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双方于八月十四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文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它协定的主要内容有：（一）中苏两国协同其它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二）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三）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担任，中国应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苏联经该口之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该海军根据地由苏联担任防护，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旅顺市主要民政人员之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五）苏联根据友好同盟条约所给于中国的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对新疆最近之事变，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二 苏联对日宣战 解放区军民大举反攻

一九四四年，苏联红军已把德寇完全逐出苏联国境，并攻入了德国本土。被法西斯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掀起了解放斗争的新高潮。英美军队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了拖延已久的第二战场。在三条战线的夹击下，希特勒德国迅速走向灭亡。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苏军攻克柏林。八日，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在希特勒覆灭以前，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已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希特勒德国的垮台，更加速了它的末日的到来。但是，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还有相当大的

军事实力。当美军进攻冲绳时，遭到日军的顽抗，损失极大。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认为，“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计要牺牲五十万美国人民的生命”。美陆军部长也认为，进攻日本本土，仅美军就要损失（包括伤亡和被俘人数）一百万。一九四五年七月，美英两国参谋长拟定的并经杜鲁门、邱吉尔共同批准的对日作战部署报告，认为“终止日本有组织的抵抗的日期为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决定观察苏联动静后再作处理，对公告发表了“不予理会”的声明。在这之前，日本曾一再要求苏联居间调停，在日本保持相当国际地位的条件下，与美英“讲和”。苏联遵守《雅尔塔协定》，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正当苏联预定对日出兵日期到来之际，美国迫不及待地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美国政府一再声明，投掷原子弹是“为了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迅速结束二次大战”。但事实上，日本军事崩溃已成定局，投掷原子弹对结束战争并无战略上的必要性，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说，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为了“使俄国人在欧洲更好商量”。这就是说，美国企图用这种作法确立战后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是为了单独占领日本。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九日，苏联红军同时向中国东北的东部、北部和西部边境发动进攻。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宣布对日作战。总兵力约七十五万人的日本关东军在苏军的打击下，指挥紊乱，阵线瓦解，不到一周就被击溃。

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十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迅速占领所有被八路军新四军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十日和十一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七道受降和进军的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敌伪发送通牒，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命令各地人民军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毛泽东的号召和延安总部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迅速发起大反攻。

在东北，八路军沿北宁路和由海上兼程挺进东北，经一个多月的战斗，收复了东北地区的广大国土。

在晋察冀，八路军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反攻。先后解放了张家口、秦皇岛、山海关等重要城市，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冀热辽军区的主力和其他部队一起向辽宁、吉林挺进。

在晋绥，八路军向平绥路西段、同浦路北段进攻，攻占了归绥和太原外围据点。

在晋冀鲁豫，八路军向平汉路中段、陇海路中段进军。解放了许多城镇。

在山东，八路军向津浦路中段、胶济路和陇海路东段进攻，并进逼青岛、海州和连云港。

在华中，新四军向沪宁、沪杭甬、浙赣、淮南等路及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进攻，取得了很大胜利。

在华南，华南抗日纵队向广九、潮汕两路进攻，解放了许多地方。

在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反攻的过程中，根据中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发展和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抢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情况，中共中央于八月下旬决定改变人民军队的作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向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的局面。按照这一方针，晋绥区攻占了左云、文水等七个县城；晋察冀区解放了永清、遵化、易县、涞水等四十余座县城；晋冀鲁豫区攻占了济源、焦作、临清等五十九座县城；山东区解放了莱芜、即墨、章邱等近三十座县城；华中区攻克了宜兴、宝应、靖江等三十二座县城。从八月九日至九月二日，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五万七千九百多人，攻克和收复县城一百三十九座，据点七百四十多个，破坏和切断了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平绥（东段）、北宁等铁路线，使各大解放区基本上联成一片。

自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共作战十二万五千一百多次，歼灭日伪军一百七十六万多人，缴获各种枪六十九万四千多支，各种炮一千八百五十余门。人民军队扩大到一百三十多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多万人。解放区面积达到九十五万六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共有县城二百八十五座。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同时也为以后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奠定了基础。

三 美蒋勾结抢夺胜利果实 解放区军民反对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到来的时候，解放区战场不仅有着雄厚的实力，而且具有十分有利的地理位置，沦陷区的大城市、铁路以及海岸，几乎都在解放区的包围中和控制下，而国民党则因一贯消极抗日，避战观战，所处的局面非常不利。“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不但不能拿到华北，连进入东北和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企图变中国为自己殖民地的美帝国主义，极力支持蒋介石垄断接受日伪投降的权利，积极调运蒋军抢夺胜利果实，甚至不惜公开利用日军贯彻其扶蒋反共的侵略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一连下达了三十“命令”：一个是要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一个是要他的嫡系部队“积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七——七一页。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七——七一页。

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要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对于延安总部所发出的限令日伪投降的命令，竟诬为“非法行为”。十二日，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赫尔利给美国国务院一份电报，内称：“我已建议依照投降条件，日本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交给中国国民政府”。同时，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战区内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投降。八月二十三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一道命令：把八路军新四军诬蔑为“非法武装组织”、“股匪”，说什么“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应负责作有效之防卫”。“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受前，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国民党不但和日本侵略者勾结反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并且利用汉奸头目进行反共反人民、抢夺胜利果实的活动。许多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要人，被封为“总司令”、“绥靖司令”等。敌伪的军事、行政、特务、经济等机构，也都和重庆国民党的机构合流。

美帝国主义积极组织它的运输力量，把散布在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队送到被解放军所包围的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城市和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至十月间，蒋介石在美国帮助下已动员了八十万军队，抢占了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并抢夺了解放区军民从日寇手中收复的三十一座城市。这样，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的浴血抗战之后，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

对于美蒋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共产党坚决予以反击。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正指出：“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评论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郑重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在八月十三日和十六日给蒋介石发了两个电报。在第一个电报中，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八月十一日要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在第二个电报中，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再次表示坚决地反对蒋介石的绝对错误的命令，继续命令抗日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

八月十五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宣布：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与此同时，朱德还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代表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向美、英、苏三国政府送出说帖，说明了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中国战场的基本事实，提出了四项声明和要求，表明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被美蒋反动气焰所吓倒的坚定立场，就使解放区及其军队得到迅速扩大，保卫了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以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充分有利的条件。

四 日本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和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美国在日本扔下了两颗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的大反攻。与此同时，朝鲜人民军和越南解放军也转入了总反攻。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统治集团慌了手脚，八月九日，连忙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研究接受波茨坦公告问题。八月十日在天皇出席的御前会议上作出决定：在“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于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日，日本通过瑞士和瑞典两个中立国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乞降照会”。但是日本统治集团的一小撮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仍继续进行战争叫嚣，妄图作垂死挣扎。陆相阿南惟几声称：“即使一亿国民全部战死，犹如活在大义之下。必须继续战争到底。对作战有着充分的自信”。“对于美国，也有在本土和它进行决战的自信。在海外各国的军队不能无条件地收兵”。十日阿南惟几发表“告全军将士”的训示，要他们毅然决然将“圣战”坚持到底，“纵食草啖泥，潜伏野处”，也要“断然作战”。同时，情报局总裁也发表谈话，叫嚣为了“维护国体”，政府将尽最后之努力“守卫最后一线”，要日本人民为“维护国体”去“克服一切困难”。在中国战场上，五十八万日本侵略军和近八十万伪军，在日本要求投降后，仍然盘踞着广大地区和许多城市交通要道，对解放区军民作战。

但是，无论日寇怎样竭力挣扎，它的灭亡是注定了。在中国解放区军民和苏联红军、美国军队的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无条件投降。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八月十五日，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告，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日本铃木内阁辞职，陆相阿南惟几自杀。十七日，东久迩组成投降内阁。日本宣布投降后，中美苏英四国同意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负责占领日本本土。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美舰米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在中国战区，九月九日在南京举行签字仪式，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至此，日本帝国主义被彻底打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八年浴血抗战胜利结束。九月三日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证明：要战胜凶恶的帝国主义，必须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五四 页。

同上，第五四七页。

同上，第五四八页。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在战争全局上打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扭转了一百年来中国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这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经过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力量极大地发展了起来，这就大大加快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中国人民也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及其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影响和推动了各国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进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中国人民八年英勇斗争的战绩，将永存史册。

第五编

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

第五篇

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九四九年九月）

第一章 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和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第一节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 国共两党两种根本对立的建国方针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际形势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在资本主义世界，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垮台了。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强国受到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加强了实力，因而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在资本主义各国中占了显著的优势。一九四四年与一九三九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一点二倍，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十五。到一九四六年，美国钢产量由一九三九年的四千七百九十万吨增至六千零四十二万吨。农业生产也有显著提高，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随着经济的增长，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大大提高。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资本输出总额由一百二十三亿美元增至一百六十八亿美元。黄金储备量由一百七十六亿四千万美元增至二百亿零八千三百万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量的四分之三。在军事上，美国军队数量由战前占世界第十七位一跃而居第一位，并最先掌握了原子武器。战后美国的实力虽有很大的增强，但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是大大削弱了。

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强大。它很快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从一九四六年起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从欧洲到亚洲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在四十年代末期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构成了世界革命变化的强大动力之一，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日益瓦解。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广泛开展。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增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显著提高。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汇成了世界潮流的主流，并且超过了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的力量。

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极为有利。“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严重的复杂的斗争。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同民族压迫之争，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美帝国主义取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代之，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各国反动派也对美帝国主义更加依赖。这是战后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特点。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首先是夺取美苏之间的辽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九七——一二九八页。

阔的中间地带。它一手拿着美元，一手挥舞原子弹，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做烟幕，在许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侵占别国领土，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在亚洲，它的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妄图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和称霸世界的主要基地。

因此，美苏的对立和斗争虽然是战后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但是最现实最尖锐的矛盾并非在美苏之间。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美帝国主义的反苏叫嚣，实际上是侵略、干涉、奴役别国的借口与烟幕。

当时，在和平民主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一种对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对人民的力量估计过低。错误地认为达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妥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应随之实行国内阶级之间的妥协，要求这些国家的人民放弃革命的武装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抵制了上述错误思潮，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 国民党的“劫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空前膨胀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大批军政官员到沦陷区接收。这些从天上飞来和从“地下”钻出来的接收大员们，在平、津、沪、穗等大城市争发接收财。接收敌伪财产时，常常是国府、省府、市府三道封条并贴，党政军各部门同时伸手。“你也抢，我也抢；文和武争，官和民争；有力者公然霸占，无力者暗中盗窃。”接收的物资多变少、好变坏、坏变无。最初瓜分，其次盗卖，等到不能交待时甚至一把火了之。天津的敌伪商店，接收后十室九空。有的工厂接收后，物资设备被拿被拆，以致无法开工。接收大员们个个都疯狂地抢洋房、汽车，抓黄金美钞。沦陷区人民称他们是“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抢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和婊子）。

国民党官僚们不仅利用军政权力独吞巨额的敌伪财产，而且拒绝发还原属人民而被敌伪强占的工厂、商店、房屋，甚至起用汉奸、地痞、流氓欺压人民，以诬指某人为汉奸、奸商进行敲诈勒索。安徽芜湖一地即被拘数千人，其中真正的汉奸不超过十人。国民党政府又以法币一元兑换伪币二百元的比价（当时法币与伪币实际比价是一比二十五），夺去了人民大量财富。拥蒋的《大公报》评论此举是“随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这一“无形”又“无限”的转移，“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

因此，弄得收复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京沪平津一带流传的民谣说：“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对国民党“劫收”的生动写照。中国战区统帅的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事一结束后，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

《文汇报》，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

《大公报》社评《为江浙人民呼吁》，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九二页，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国民党的“劫收”，在政治上丧失民心，在经济上却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空前膨胀。他们的财富骤增至二百亿美元之多，达到了中国官僚资本发展的顶峰。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敌伪的正金、住友、朝鲜、中央储备银行等金融机关后，垄断了国统区的金融机构。一九四六年六月，国统区共有银行三千四百八十九家，其中所谓官营银行二千四百四十六家，占银行总数的四分之三。其余银行的多数也都有官僚资本渗入或为其控制。

在工矿企业方面，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一九四六年七月报告，共接收敌伪工厂二千四百一十一家。在此基础上，四大家族建立了许多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独占组织。如资源委员会囊括日人在台湾的制糖业而设立的台湾糖业公司，宋氏家族设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CC系（指二陈）设立的中国蚕丝公司，都是四大家族的大垄断企业。天津宋氏的中纺七个厂，拥有纱锭三十二万余枚，占了全津纱锭的百分之八十四。据统计，一九四七年，以资源委员会为中心的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生产在国统区工矿企业生产中占的比重是：电力百分之六十三，煤百分之三十三，钢铁百分之九十，钨锑百分之百，锡百分之七十，水泥百分之四十五，糖百分之九十。

四大家的商业垄断也加强了。除原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商业组织全部恢复外，又开设了许多投机性的商业机构。它们垄断着国内外贸易，替美国垄断资本服务。如孔家的长江公司和扬子建业公司。前者操纵国内粮食市场，后者经营外贸，与美国十六家工厂订有总经售合同，推销美货并垄断国内茶叶猪鬃的出口。

四大家族还趁日寇投降之机，掠夺了大量土地，其中有日本华北垦业公司土地五十万亩，军粮城农场稻田四十三万亩，华北农业实验场土地二十七万亩，东北盘山农场土地三十余万亩等。

空前膨胀起来的垄断中国经济的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维护这个国家垄断资本及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使它不致在空前强大的人民民主潮流中覆灭，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根本原因。

三 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在“国家统一、民主政治”口号下坚持独裁内战方针，企图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和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蒋介石在《庆祝抗战胜利对全国同胞广播词》中，一方面说“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宪政实施愈早愈好”；但又提出种种“先决条件”阻挠民主的实行。他说：“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致动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通过推诚相见，共同商讨，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一九四六年元旦，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大法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通过容忍，无不可以通过协商。”蒋介石口中的“法统不致紊乱”，“政府基础不容动摇”，就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本质不能改变，而“军令政令统一”就是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老调重弹。这是国民党蒋介石对

待战后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

扶蒋反共，是战后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从它的全球战略出发，美国要以蒋介石政府作为侵略控制中国的工具，蒋政权也要以美国的援助作为靠山。在这个基础上，美蒋进一步勾结起来。由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内部矛盾发展状况的制约，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信中供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下列三种可能的抉择：（一）完全摆脱一切牵连；（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第一途，美帝国主义是决不会采取的，它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的侵略。第二途，美国慑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在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还不敢直接出兵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因此，选择了第三途。“在这条途径上”，美国“企图协助安排一个既可避免内战又可保持甚至增加国民政府势力的临时办法”，以便“将共产党人以一种类似西欧共产党所占的地位，纳入一个宪政政体的政治和军事范围之内。敌对的两党将共同参加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美帝国主义者估计，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成立统一政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的这条途径和办法，是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因而不断受到共产党的揭露和抵制。同时，它也不完全符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的需要，因而被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所反对。美国预计的办法无法实现。随着形势的演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走上了由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道路。

日本一宣布投降，美国就出动飞机、舰艇运送蒋军到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乘机展开侵略中国的活动。八月二十七日，把新六军由湖南芷江空运到南京。九月六日，将九十四军由柳州空运到南京上海。此后又将七十四军、九十三军、八军、五十四军、五十二军、青年军二六师等从空海两途运至京、沪、青岛、北平等地，使蒋军抢占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美国自诩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美国军队还打着帮助“受降”、“遣俘”的招牌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替蒋军抢占和守护战略要点及交通线，还配合蒋军骚扰、进攻解放区。九月三十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塘沽登陆。十月初，第三师、第六师先后在秦皇岛、青岛登陆。十月四日，大批美舰侵入早为中国人民军队解放的烟台港海面，企图登陆。由于中国人民军队严阵以待和强烈抗议，美舰才离去。十月十日，美国海军航空队三个大队又进驻青岛、北平。至十一月底，驻华美军达十一万三千余人。这些美国兵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不断制造事端，并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刚刚摆脱了日寇蹂躏的中国人民，又遭到了美帝国主义的践踏。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决定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三五页。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译本，第二六四——二六五页。

四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与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

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紧要关头，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讲演。

毛泽东在讲演中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他说：“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这段精辟的论述，是对新时期国内斗争实质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在讲演中通过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提出了共产党同国民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方针。他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阻止内战。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谁要想轻而易举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

毛泽东指明了依靠什么力量贯彻上述方针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内战的危险性，明确指出：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他发动内战，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但当前形势和我们制止内战的努力，使蒋介石不敢放手发动内战，因此，有可能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或使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他强调说：“全国性的内战不论那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

毛泽东的讲演，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美蒋的内战阴谋面前处于有充分准备的状态中。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在新时期中，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以下六条紧急措施：

（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 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 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中共中央宣言提出的六项要求及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符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五 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各民主党派的活跃

国家政权问题向来是中国各阶级各党派斗争的中心问题。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有着突出的重要性和特殊的表现。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内战方针，又要通过召开“国大”给其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同时，发动全面内战需要时间准备，也需要用政治欺骗的手段冲淡一下法西斯专政的凶残。中国共产党深知蒋介石的反动性，坚持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方针，但也不放弃进行合法斗争的一切机会，因此，以极大的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这种条件，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一中间势力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和时机，空前地增强了他们参政的信心和勇气。于是，各民主党派又一次活跃起来。他们积极整顿组织，发表政见，或建立新的政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十月一日至十二日，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史上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民盟的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修订了入盟手续，增选了三十三名中委，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和组织、宣传、财务、文教、国内关系、国外关系、青年、妇女、民教、工商、侨务等十一个委员会并确定了人选。大会继续选张澜为主席。

《政治报告》认为，战后时期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在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民盟对民主作了自己的阐述，认为“在一个社会里，人人做人，人人做自己的主人，一切政治经济的组织都成了这个目标的工具，这就是民主”。还认为英美和苏联的制度各有优缺点，要综合二者之长创立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报告》说：“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

《政治报告》指出，实行民主必先扫除障碍。当前要解决政治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三大问题。报告阐明了民盟对这三大问题的主张。

《政治报告》及大会宣言和纲领这三个主要文件，是民盟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完整方案。这次大会为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

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十一月十二日，发表《第三党对时局宣言》提出四条建议：国共两党停止军事行动，迅速召开政协，成立东北地方联合政府，“国大”召开前成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

十二月二十日，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布了政纲，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为基础的联合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民主国家制度，即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选举沈钧儒、陶行知，史良、曹孟君、李公朴、何惧、萨空了为中央常委，沈钧儒为主席。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洪门致公党在国外发表宣言，呼吁国内停止内战，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图建设。

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从延安返渝后就想组织政团。八月起，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十二月十六日，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大会通过了政纲、宣言、章程和组织原则，选举了理事和监事。会后组成了办事机构，并创刊《平民》周刊。这是以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的政治党派，其基本主张是，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他们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谭平山等一九四三年在重庆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和进行公开活动。

以马叙伦、周建人等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上海成立。一九四六年一月初，发表对时局宣言，他们的主张主要是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权，还政于民，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重新制定宪法等。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许德珩、涂长望、孟宪章等人举行会议，将一九四四年冬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正式定名为九三学社。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在重庆召开成立会，选举许德珩等十六人为理事，卢于道等八人为监事，许德珩等七人为常务理事。并决定在京沪区设立总社，在重庆、武汉、成都、昆明、广州、香港、北平、天津及伦敦设立分社。一九四六年秋，活动中心由上海转到北平。该社成立时发表了成立宣言，提出了基本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具体要求。宣言提出：国共两党的军队立即无条件停战，一切问题“概以和平方式解决之”。“请马歇尔元帅彻底实行调人责任。对两党争执予以仲裁，立即实行全面停战。在中国政府未根据政协决议改组以前，美国政府勿予中国任何一党派以任何援助（包括借款及运输军队）”。

以李济深蔡廷锴为主、以十九路军旧部为基础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酝酿于一九四四年豫湘桂战役期间，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在广州宣布正式成立。

这些党派及其成员，为了把握千载一时的良机，建立其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他们同共产党结为同盟。他们在促进政协召开、维护政协路

《中华论坛》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救国会》，第三八四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版。

《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纪要》，《平民》第一、二、三期合刊，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

见《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

线和反内战、争和平的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节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一 毛泽东应邀赴渝和“双十协定”的签订

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的谈判，于一九四五年春中断。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忽然摆出一种要和平的姿态，于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面商“国家大计”。二十四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二十七日，蒋介石派张治中及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同乘飞机到延安迎接。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了战后国共两党的谈判。

两党重开谈判是国际国内条件促成的。蒋介石的意图是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同时利用谈判时间作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和在谈判中捍卫人民的利益，也为了在争取和平民主的过程中揭露反动派的真面目和教育人民，团结和争取对美蒋尚抱幻想的人们，决定派毛泽东等赴渝商谈，并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继八月二十五日发表时局宣言之后，二十六日，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指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我们准备作必要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通知还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通知特别告诫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处境更困难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在毛泽东离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刘少奇在代理主席职务期间，领导全党密切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毛泽东抵渝时，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谈话。他说：“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在重庆受到各民主党派及重庆各阶层人士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到来，给大后方人民巨大鼓舞。工人们致书《新华日报》社，亲切地称呼“毛泽东——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星”。《华西晚报》曾报道说：“毛泽东的到来，是民主中国的曙光”。

毛泽东毅然赴渝，出美蒋意料之外。在谈判中，一切提案都由中共提出。九月三日下午，中共提出《谈话要点》交给国民党代表。九月四日，蒋介石也拟出《对中共谈判要点》。国民党代表以此为指导写出一个对中共《谈话要点》的答复。

见《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

从《谈话要点》和《答复》看，国共双方距离甚远。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经过四十天谈判，终于在十月十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列入纪要的共十二个问题，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各自表述自己的意见，未获协议，同意以后继续商谈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有些在谈判中未获协议的问题，也未载入纪要。这次谈判的主要成果，是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即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同时，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党政府应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国民党仍坚持“军令政令统一”，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在军队问题上，中共提出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可以缩编至二十四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并将散布在粤、浙、苏南、皖南、皖中、鄂、湘、豫（豫北不在内）八个省区的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之解放区集中。由于这一让步，共产党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个方案，均被国民党拒绝，未达成协议。

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各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国友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们向各界人士宣传、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愿望，争取了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由张治中、王若飞陪同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到延后即返渝）留在重庆继续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

二 国民党挑动内战 解放区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派大批军队进攻解放区，挑动内战。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二天，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一九三三年编写的《剿匪手本》。九月十七日，蒋介石又亲自下令送发。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发出密电，令蒋军指挥官遵照他的“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在蒋介石密令下，国民党军队以“恢复交通”为借口，分路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平绥线，早在八月十八日，傅作义部就勾结敌伪突袭正迫使归绥敌军投降的人民军队侧背。八月底九月初，傅部又接连侵占丰镇、集宁等地，并大举进攻早为人民军队解放了的张家口。在中原地区，蒋介石调集三个战区的二十多个师的兵力，由刘峙指挥，沿陇海、平汉两线分路进攻鄂豫两省的解放区。自郑州、新乡沿平汉线北犯的一路，十月下旬进至磁县、邯郸地区。在津浦线，李品仙及李延年、陈大庆部进攻苏皖和山东。在山西，阎锡山先后调动十几个师三万八千多人进攻上党地区，妄图分割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太行太岳两区，控制平汉、同蒲交通线，并以此迫使中共在重庆谈判中让步。蒋军的战略意图是打通铁路交通线，占领华北，切断华北与东北的陆上联系。

进而抢占东北。至十月中旬，进攻解放区的蒋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除外）达八十万人以上，侵占解放区人民从敌伪手中解放的城市三十一座。十月十八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十一月，杜聿明率两个军乘美国军舰在秦皇岛登陆，当即向人民军队进行攻击，连占山海关、锦州，挑起了东北的内战。

面对蒋军的进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措施。中共中央认为，东北地区工业发达，交通方便，资源丰富，粮食充足。背靠苏、朝、蒙，又是国民党势力最薄弱的地区。在战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热河、察哈尔两省，毗连华北与东北，战略地位亦极重要。因此，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军委即派部队向热察和东北挺进。冀热辽边区李运昌部先行出关，随后由关内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十三万人和两万干部从陆海两途兼程进入东北，并陆续派彭真、陈云、林彪、李富春、高岗、林枫、张闻天等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同时，各路进入东北的部队与原东北抗日联军共同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五年底，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委。

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刘少奇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并决定将中共中央山东局改为华东局，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派陈毅、饶漱石去山东领导。

晋冀鲁豫解放区，是有名的“四战之地”，是联接华北、华中和山东的要道。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中央局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中共中央指示他们要在进攻敌伪的同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解放区军民于九、十月间，在平绥路、上党、平汉路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在平绥路，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先后两次击退傅作义部向张家口地区的进攻，歼敌一万二千余人，收复了被侵占的城镇、车站。在上党地区，晋冀鲁豫军区调集主力三万一千余人，在五万余民兵配合下，于九月十日晨，奋起反击。激战至九月十八日，连克屯留、壶关、长子、潞城，歼敌近三分之一，将敌十九军困在长治。九月下旬至十月初先在老爷岭和土落滩歼灭援敌二万余人，击毙敌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接着在桃川一带将弃城西逃的十九军全部歼灭，活捉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上党战役历时一个月，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俘敌将官二十七名。本来，国共两党的谈判九月二十一日已经基本结束，十月五日，就可以签订纪要，但蒋介石幻想军事上的胜利，迟迟不签字。十月十日，上党战役以蒋军的失败告终，国民党代表立刻签了字。上党战役结束后，刘邓立即组织了邯郸战役。十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及地方武装六万余人将北进的敌军三个军全部包围在漳河以北。十月三十日，在马头镇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一个纵队万余人起义。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围歼了溃逃的三十、四十两军，只少数敌军漏网。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二万三千余人。

解放区三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歼灭蒋、阎、傅军十万余人，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从陆上进军东北的计划。同时，密切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时间，使政治协

商会议得以召开。

三 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运动 一二一惨案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违背人民的意愿。在解放区自卫反击战胜利的鼓舞下，国统区人民掀起了反内战运动。十月三十日，黄炎培致函国共谈判代表，呼吁停止军事冲突，提议组织包括各方代表的军事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十一月二日，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提出“国家一切的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十一月十八日，成都各大学二十一个团体联名发表《制止内战宣言》。在重庆，民盟、中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农业协进社、中国妇女联谊会等团体及《中华论坛》等二十八家杂志社，纷纷呼吁，制止内战、撤退美军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十一月十九日，文化、工商各界五百余人集会，由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提出了“内战必先停止，是非再付公论”的主张。重庆人民的反内战呼声迅速传遍国统区各大城市。

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是民主运动的中心，是国统区反内战争民主的重要阵地。十月初，蒋介石赶走龙云并调卢汉带兵赴越南受降后，改派关麟征为云南警备司令，李宗黄代理省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云南当局公开下令“禁止一切集会与游行”。二十五日联大、云大、中法、英专等校学生、教授、职工及市民等六千余人，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时事晚会。国民党一面派特务混入会场捣乱，一面派大批武装军警包围会场，在校墙外放炮鸣枪进行威胁。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武力威胁，从次日起，昆明市大中学生宣布罢课，并向社会进行宣传。二十八日，国立西南中山中学、云大、联大等三十一个大中学校的学生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立即制止内战”，“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自由”等主张；向云南军政当局提出四条要求：（一）追究射击威胁会场事件的责任问题；（二）立即取消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三）保障同学之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四）要求中央社改正诬蔑学生之荒谬言论，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士道歉。

对学生的反内战运动，国民党当局决定进行镇压。关麟征公开宣称“学生有在校内开会的自由，我也有在校外开枪的自由”。二十八日以后，便衣军人、武装特务、流氓打手在街上行凶的事件不断发生。二十九日一天之内，就发生了二十五起特务殴打学生的事件。十二月一日上午，大批军警、特务、暴徒分头围攻云南大学、联大新校舍、联大师范及工学院、昆华高工等学校。他们不但大打出手，而且竟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师范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业学校学生张华昌当场被炸死。路过联大新校舍的南菁中学教员于再，为阻止特务向校内投弹被炸受重伤，后亦牺牲。此外还有二十五人被炸或被殴打成重伤。这就是震动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师生们的斗争和牺牲，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十二月三日，在联大图书馆举行四烈士入殓与公祭仪式，昆明的学生、工人、农民、职员、商人、士兵等各界人士，怀着悲愤的心情前来祭悼。总计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参加公祭的群众达十五万余人。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由三万人组成的送

葬队伍，为四烈士举行了殡葬仪式。这实际上是向国民党反动当局抗议示威的一次抬棺游行。

一二一惨案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重庆、成都、上海人民先后举行了追悼四烈士大会。十二月九日起，重庆各界人士公祭三日，沈钧儒代表救国会主祭。致祭群众一致要求惩办肇事祸首。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上海召开万人追悼四烈士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争民主大游行。在全国各界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让关麟征“自请处分”，将李宗黄调离云南。

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成立和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成了国统区人民反内战运动发展的新起点。

四 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双十协定”签订后，国际进步舆论继续呼吁中国实行和平民主。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重申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同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商定了对华政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中国大使职务，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中国“调处”国共冲突。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向马歇尔发出训令，要他到中国后“用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的影响”，“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同一天，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声明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如果将“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声明又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美国政府既要马歇尔作为中立者在国共之间调停，又宣布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这就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马歇尔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于十二月二十日来到中国的。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抵渝（董必武、王若飞两代表已在渝），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认为，停止军事冲突是召开政协的前提条件。因此首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办法。十二月二十四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彭一湖、梁漱溟、张东荪等二十八人，分别致函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停止武装冲突，开诚协商。三十日，民盟主席张澜建议国共双方一九四六年元旦立刻停战。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党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并派出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经几度商谈，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关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

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在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一月十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双方还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停战令于一月十三日午夜起生效。上述停止军事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全部内容，一月十日同时公布。

根据停战协定，一月七日正式组成了由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参加的三人小组（或称三人军事小组）。一月十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三委员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担任，分别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执行部下设由三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军调部一月十四日起在北平办公。

国民党签订停战协定，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蒋介石一面下公开的停战令，一面却下秘密的作战令。停战令颁布前夕，一月七日，蒋介石密令：“政治协商会议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其尚未缴械地区速令当地驻军即行缴械，免被奸军利用。行动务须秘密迅速，免资共方藉口”。停战令公布后的第三天即一月十二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向所部传达所谓“委座手令”：“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会议，商议在政治会议前举行全面停战，停战令（十日）晚即可下达。各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速抢占战略要点。在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命令前占领承德，同时必须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在商谈停战问题的过程中，国民党方面还顽固坚持在停战命令中附加一条声明：停止冲突的命令，“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这就是说，停战协定不适用于东北地区。这就表明国民党决心打内战。

停战令生效前后，双方争夺战略要点的斗争十分激烈。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停战令下达后一度出现了和平局面。国共及马歇尔三方于二月二十五日，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通称整军方案）。三月二十七日，达成了东北停战协议，指令军调部派执行小组赴东北调处冲突。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东北停战协定及政协五项协议，是一九四六年春天的四大协议。

与停战令发布的同时，一月十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召开前，国共双方在参加单位和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有过一番斗争。最后商定政协由五个单位三十八名代表参加。一月七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会议召开办法及会员名单。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去北平军调部）、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常乃德。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张东荪、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勱。无党派人士即社会贤达九人：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莫德

《新华社记者评 军调部一年工作总结》（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二集，第一八七页。

惠、邵从恩。

一月十日，作为会议召集人及当然主席的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致开会词，并宣布了决定实施的事项：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身体之自由，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释放政治犯。一月十一、十二日，国共代表分别报告停止军事冲突商谈经过和国共重庆谈判经过。十四日至十九日，进行大会讨论和分组会议。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先后通过了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三十一日，会议结束。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鼓舞了国统区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致电政协会议，提出他们的希望和建议。一月八日，刚刚成立的民主建国会宣布公开活动并向政协提供意见，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以开放政权换取统一”。一月九日，重庆文化界七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一致通过由茅盾等提议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的建议。政协会议期间该会举行了多次政协代表演讲会。各界人士共同的要求是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五 政治协商会议上的严重斗争和五项协议的通过

参加政协的五个方面，实际代表中国社会中三种政治力量。会议的过程，就是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较量的过程。在蒋介石、周恩来、张澜的开会词中，就分别代表三个政治集团含蓄地申述了各自的基本主张和态度。随后，围绕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改组政府问题。一月十四日，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王世杰作了说明。国民党主张：国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即由三十六名增至四十八名；国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由主席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委员名额如何分配不作明文规定，但国民党必具“特定程度多数”以保证其“履行领导的责任”；国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其职权中无用人权；国府主席在紧急情势发生时，有紧急处置之权。这个方案骨子里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这个方案遭到各方反对。董必武发言说：我们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和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但国民政府必须改组。改组政府要有共同纲领；国府委员会应有用人权；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府委员人选不能由国民党中央通过；要“防止手令制”，国民政府主席作紧急处置要经会议通过，要有人副署；改组政府不能只限于行政院，应包括各院部会的改组。罗隆基申述了民盟主张改组政府的理由：第一，在这过渡时期“希望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我们很希望蒋先生成为民主的领袖”；第二，“希望各党派能参加政府”；第三，使目前政府的行政效率提高和现代化。他提出了改组政府的三项要点：要有共同纲领；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执行机关要真能执行。他又提出一连串询问，要王世杰答复，实际是不同意国民党的方案。他问道：国府委员会是政权机关抑是治权机关？府委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参加但须国民党机关通过，这些人是否要向国民党的机关负责？府委增加三分之一是整个国府委员会改组重选抑是只补充？主席紧急处置权，紧急两字如何解释？如此等等。这些质问击中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要害。

经过辩论和协商，一月二十八日，达成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无理主张，体现了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基本要求。

施政纲领问题。一月十六日，中共代表团正式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讨论中，吴铁城主张以《建国大纲》、《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六中全会政纲、民国三十五年施政方针为制定施政纲领的依据。常乃德主张以《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加以修改。章伯钧主张制定纲领要以国民党“一大”宣言、《约法》为依据，并参考中共及其他政党的纲领、各界人士的意见。罗隆基认为中共的提案“很切合需要，可做讨论根据”。李烛尘批评了国民党扼杀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提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经济建设方案。最后，基本上依据中共的方案，于一月二十六日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

军队问题是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其“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青年党提出了《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表面上主张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二者并重，实际强调“军队国家化为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反映了国民党的意图。一月十六日，民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主张两大原则：一是“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是大量裁减常备军额。为了达到上述两点，应立即成立整军计划委员会，由国共两党军事人员、非两党之军事人员、非军事人员参加；同时可聘美国军事专家为顾问。民盟代表梁漱溟特别解释说：军队国家化，“即是军队不属于任何私人，任何地方，任何党派所有”。周恩来重申了中共的主张，他说：我们同意军队国家化，但是不能“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必须二者同时并进。他还说，军队国家化就是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经过争论，勉强达成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项原则规定，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国民大会问题。一月十七日，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其主要内容是：（甲）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乙）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丙）一九三六年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合理增加”名额。具体地说，国大代表总数一千四百四十名，前已选出九百五十名。尚需选出四百九十名，其中二百四十名由国民党指定。这就是说，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其他代表只有二百五十名。

这样的国大，中共、民盟和进步的无党派代表一致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的《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规定国大代表共二千零五十名。“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新增台湾、东北地区的代表一百五十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为之。”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国大的企图。

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坚持把《五五宪草》塞给会议。中共、民盟及进步人士一致反对。吴玉章提出了制宪的四条原则：宪法应保障人民权利，不应限制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应取均权主义原则；省为自治单位，省长民选，省得自制省宪；宪法上明白规定有关军事、文教、经济各方面的民主政策。沈钧儒强调指出，国民政府应承认中共抗日的历史性及中共设施与政治的进步性，从法律上承认解放区。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立法院和行政院大体相当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议会和内阁，总统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协议还规定组织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

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采纳。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十分突出的采取合法形式的斗争，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特殊的一幕。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协代表团顺应人民的要求，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由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协议。会议再一次确认了和平建国方针，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方针。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制度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但它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的否定。政协的五项协议虽然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但会议所表现的协商精神和确定的政治路线，在人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六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协议的破坏

在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同各党派协商，一派反对协商，坚持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和蒋介石独裁。蒋介石依靠这两派势力不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

还在政协开会期间，蒋介石就一面主持会议，一面假手特务制造践踏民主的暴行。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国民党特务接连破坏政协陪都协进会在沧白堂举行的讲演会，打伤讲演的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造成了“沧白堂事件”。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宪警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住宅。政协闭幕时，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声称，对各项协议“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但是，二月十日，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在重庆破坏了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及群众六十余人，制造了震动中外的“较场口血案”。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北平当局策动所谓还乡请愿团在东四大街举行反共示威，并由特务率领闯入北平军调部，侮辱殴打中共办事人员。二十二日，国民党欺骗煽动重庆万余青年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在游行时，特务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和民盟的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此后，国民党又指使特务捣毁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并在其他一些大城市制造了反苏反共的游行。这样，蒋介石亲口宣布的“确保”人民享有各种自由的诺言，就被特务的暴行破坏得一干二净了。

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认为政协协议的通过等于所谓“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有人甚至要弹劾出席政协的国民党代表。蒋介石为了在国民党内统一“认识”和“行动方针”，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召开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会上，法西斯分子疯狂反对政协协议，尤其反对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蒋介石一方面要那些极端的反动分子“平心静气地”“认识环境及遵循政策”，“不可意气用事”，并说政协协议的通过要由他“负责”，“而不必责备本党的代表”。另一方面他支持法西斯分子的要求，宣称政协通过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要把握住重要之点多方设法来补救，务使宪草内容能够不违背五权宪法和建国大纲的要旨”。在这里充分暴露了蒋介石狡猾的阴

谋。他迫于形势承认政协协议，暂时避开人民的斗争锋芒，然后再设法把它毁掉。

三月十六日，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提出五条所谓宪草修改原则：（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这就完全推翻了政协确定的民主宪政原则。

国民党二中全会还决定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由该会“指导”国民政府的工作。同时决定把各党推选的国府委员拿到国民党中常会去选任。这就推翻了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协议。

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二日，国民党又召开了御用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企图利用它使二中全会的反动决议公开化和合法化。四月一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长篇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开撕毁了刚刚达成的东北停战协定，声称在东北“主权接收”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军事调处只能在不影响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他公开撕毁了政协协议，扬言“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替约法”。“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是决不能承认的”。

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严正的揭露和批判。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内许多有力人士现正试图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若干原则决定，特别是关于宪法原则的决定”。三月十八日周恩来向中外记者发表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就保障人民权利、改组政府、宪草、国大、整军、停战六个问题，发表了共产党的看法。他说：“宪法关系中国今后是民主或仍是一党独裁的大问题。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是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全体起立通过的，对这些原则如有任何变动，一定要经过政协各方代表的一致协议”。二中全会“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他严正指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三月二十一日，张澜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民盟“为对国民负责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其他民主党派也发表了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的谈话。

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周恩来选集》上卷，第二二七、二二八、二三一页。

第三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 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一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在践踏政协协议的同时，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在关内，国民党调动了二百一十个旅约一百三十万人到内战前线，向解放区进攻达四千三百六十五次，侵占解放区县城四十座、村镇二千五百多个。在东北，国民党不顾中共和民盟提出的接收主权与内政建设分开的建议，坚持“武力接收”政策，肆意扩大内战。杜聿明部不遵守国共双方达成的蒋军由北宁路东开沈阳、长春的协议，于占领锦州后，转而向西进攻热河，直达赤峰、承德。一月停战令生效后又侵占解放区八座城市。同时，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将新六、新一、七十一、六十、九十三等五个军运进东北，投入内战。三月十三日，蒋军进入沈阳，当即分兵向营口、本溪、四平进犯。东北民主联军忍无可忍，奋起自卫。先在本溪歼灭蒋军二千人，继在八面城歼其一个师。四月十八日，收复法库，并应人民的要求进入长春。四月二十八日，进入哈尔滨。在四平则同蒋军展开了为时一个月的拉锯战。五月十九日、二十二日，民主联军先后撤出四平、长春。蒋军于侵占四平、长春后，又向北向东进攻，直打到松花江南岸。至此，在全国实际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内战局面。

六月六日，蒋介石宣布从六月七日起在东北休战十五天。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加紧全面内战的部署。当他认为部署已经完成并相信三至六个月即可消灭人民解放军时，就在六月十七日向中共提出无理要求，声称只有中共退出下列地区国民党才能考虑停战问题：（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以迄冀东沿海；（四）东北的大部分；（五）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以后，解放区人民武装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了这些蛮横的要求。

六月二十一日，中共政协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四项建议，并要求在此基础上继续谈判，遭到国民党的拒绝。六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制造了特务暴徒殴辱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的下关惨案。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国性内战由此开始。

中原解放区地处鄂豫边界、平汉路两侧，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一九四五年年底，王震、王首道率南征湘粤的三五九旅转移到这里，与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新四军五师汇合，共约六万余人。蒋介石把他们视为心腹之患。在一月停战令生效后，蒋介石调派武汉行辕程潜所属十个军约二十五个旅二十一万人和十几个保安团向该区围攻。中原解放军被压缩在以宣化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为中心东西不过二百华里、南北只有五十华里的狭小地区。六月二十六日拂晓，国民党军十余万人围攻宣化店，扬言要在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造成“惊人的胜利与奇迹”。

接着，蒋军以徐州绥靖公署薛岳吴奇伟所属五十八个旅四十六万人，开始进攻苏皖及山东解放区；以郑州绥署刘峙及徐州绥署一部二十八个旅二十四万人，开始进攻冀鲁豫解放区；以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及傅作义属十八个旅十六万人，开始进攻晋察冀解放区；以太原绥署阎锡山的二十个旅九

万人及傅军、胡军各一部，开始进攻晋绥解放区；以西安绥署胡宗南所属十九个旅十五万人，开始进攻陕甘宁边区；以十九个旅七万余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琼崖解放区。八月二日，国民党派飞机七架轰炸延安。十月，杜聿明所属十六个旅十六万人发动了向东北解放区的新进攻。七月至十月，蒋介石以其全部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整编前的师）约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即一百九十三个旅一百六十余万人，发动了向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十月十一日侵占张家口后，达到进攻的顶点，共侵占解放区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十月十七日在北平向中外记者狂妄地吹嘘：“同共军作战‘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气焰极为嚣张。

国民党为在解放区恢复和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先后制定了《绥靖区施政纲领》、《土地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动法规。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以宋子文、白崇禧为正副主任。他们将所侵占的解放区划分为苏北、皖东南、胶东、鲁西南、豫北、豫东、豫西南、冀南、热河、察哈尔、绥远、冀中、晋北、晋南、湖北等十五个绥靖区，并派所谓督察团到各地督察，还选定苏、鲁、冀三省几个县为实验县。蒋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党棍、特务、地主还乡团随之而至。他们在占领区建立国民党组织，编练保甲，实行连坐法，强夺农民分得的土地，甚至残杀无辜百姓。蒋介石妄图以这种“行政配合军事”的办法，摧毁人民政权，巩固占领地区。

蒋介石胆敢发动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主要是依恃其军事优势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国民党总兵力四百三十万人，真正正规军多为美械半美械装备，还接收了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国民党政府控制着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七十六的地区，百分之七十四以上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城市，大部分交通线和近代工业以及丰富的资源。中国共产党只有一百三十万军队，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物资供应、运输条件远不如蒋军。解放区的面积只占全国百分之二十四，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八，城市占百分之二十三。近代工业很少。大小十几块解放区还没有连成一片，土地改革刚刚开始进行，内部封建势力没有肃清，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还不十分巩固。在整个军事力量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居于劣势。

蒋介石的内战部署是在马歇尔“调停”过程中完成的。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同美国记者谈话中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当蒋军进攻解放区时，马歇尔坐视蒋军进攻，拒不调处；人民军队一转入反击，对蒋军不利时，他就马上去监督停战。正是在马歇尔来华“调处”期间，美国政府用飞机军舰把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军、八个交警总队共五十四万余人运到内战前线。装备蒋军五十四个师。为蒋介石训练军队、特务、军医、军需等十五万人。给了蒋介石十三亿多美元援助。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正式成立了为蒋介石策划内战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更加从军事和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比如，六月二十八日，美国国会决定延长对中国的租借

见《中央日报》，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

毛泽东：《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毛泽东选集》，第一一四六页。

法案期限（一般在六月三十日期满）。根据租借法案，美国移让给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总值达七亿八千一百万美元。七月十六日，美国国会通过五一二号公法，授权总统将总数不超过二百七十一艘的舰艇及船坞器材等“赠送”给蒋介石。八月三十日，美国空军军官陈纳德在美国政府指示下，与国民党政府成立协定，设立陈纳德空中运输公司，为蒋介石空运内战人员和物资。八月三十一日，美国把它在西太平洋的价值八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大宗战时物资，以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低价售予蒋介石。（据美国援助远东民主委员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美对中国干涉的真凭实据的估计，这批物资实际上价值在二十亿美元以上，足供蒋介石两年内战之用。）同时，侵华美军不仅仍然留驻华北，为蒋军守卫港口铁路，而且不断向解放区进行挑衅。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驻天津美军六十多人和蒋军八十多人闯至天津西北约七十公里的安平镇附近，侵入冀东解放军防地，向解放军攻击。尔后美军非但不认错，反而出动空军配合陆军占领安平镇，造成“安平镇事件”。当军调部执行小组到此地“调处”时，美蒋方面的代表虽极力抵赖也无法掩盖其违反协议侵入解放区的罪行。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极大地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二 中国共产党准备自卫战争的战略部署和战胜蒋介石的方针

在政协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政治形势曾出现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中共中央于二月一日，发出了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作出了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估计，并要求全党学会新的斗争方式，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在做这种估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放手发动群众，做好粉碎国民党进攻的准备。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了周密的部署。其中首要的一环是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

早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就指示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首先将主力部署在东北门口抵住蒋介石，而应将重心放在背靠苏蒙朝和热河，在有依托的地区，有重点地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杜聿明部挑起东北内战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指示东北局要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刘少奇在多次指示中强调：“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一次强调要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放手发动群众。指示还指出，为建立根据地，“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号召和带领广大干部离开城市奔赴农村，在清剿土匪，粉碎敌伪残余势力和发动群众实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支援自卫战争的斗争中，逐步建立了东、北、西满根据地。四平战役后民主联军一部撤到南满，又建立了以通化、临江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在各根据地建立了统一战线的人民政权。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在哈尔滨召开了

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

刘少奇：《以主要力量建立东、西、北满根据地》，《刘少奇选集》上卷，第三七三页。

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选出了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委员二十七人。林枫任主席，张学诗、高崇民为副主席。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东北解放区，包括冀热辽地区，已建立了十个省政府，两个行署，四十六个专署，二百一十个县政府，三十二个旗政府，人口达三千三百万。东北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对解放全东北和争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减租、生产和练兵是建立和巩固解放区的重要战略措施。从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各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的运动。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加强了对生产运动的领导，把减租与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号召和组织农民参加互助组，并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在当地参加生产。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练习刺杀、射击、投弹等技术，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开展了一个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各地区在抗战胜利后组成的野战军得到了整顿和加强；地方兵团和民兵也进行了组织和训练；建立和扩充了炮兵和工兵；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增进了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团结；调整了军队后勤工作，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运动的深入开展，为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广大农民进一步迫切要求消除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山西、河北、山东和华中许多解放区的广大群众已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甚至有的实现了按人“平均土地”。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准备进行自卫战争，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及时地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五四指示》指出，党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已经获得的土地。“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五四指示》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转变和民主革命的深入。这一指示的贯彻，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政治的和物质的基础。

蒋军挑起全面内战之后，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人民要不要打败蒋介石，能不能打败他，怎样才能打败他。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明确而坚定地指出：一切反动派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能够打败。中国人民必须打败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国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在这种时候，革命人民如果表示软弱和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的历史就要倒退，国家民族的前途就将被葬送。中国人民能够战胜蒋介石，因为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人民解放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

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强调指出“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这个谈话，对于中国人民认清形势和美蒋外强中干的反动本质，增强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一系列指示中，提出了战胜敌人的政治经济方针和军事原则。

政治上：“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结成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经济上：“必须作持久打算”。力戒浪费，努力生产。“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主动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诱敌深入，然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以便逐渐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步步地求得战略形势的根本改变。这个战略方针的核心要求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论在战役部署或战术部署上，都反对平分兵力。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武器弹药和兵源上补充自己，方能沮丧敌军士气，鼓舞我军士气，振奋人心。速决，则使我军有机动的主动权，也能避开或歼灭敌人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

三 解放区军民粉碎蒋军的全面进攻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奋起自卫。各个作战区域的人民解放军，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战略方针，互相配合，集中优势兵力，展开大规模的运动战。

中原解放军胜利突出重围。六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中原解放军按照五月间周恩来的具体部署，在李先念、王树声、王震等领导下，以声东击西的办法，越平汉路西进，胜利突出重围。主力一部在豫西的卢氏浙川、陕西的雒南山阳，创立了陕南游击根据地。另一部创立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游击根据地。三五九旅及新四军五师一部经三个月的艰苦转战，途经鄂、豫、陕、甘四省，九月中旬抵达陕甘宁边区。中原解放军第一旅在完成掩护主力突围西进的任务后，于七月中旬由皮定均率领向东突围，到达苏北的淮安，随即参加了苏皖解放区的自卫战争。这次突围的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围歼计划的破产。中原解放军不仅未被消灭，反而吸引了蒋军相当大的兵力，并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就极大地援助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

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七战七捷，主动撤往山东。七月十三日，蒋介石以十

五万兵力集结于南通、靖江、泰兴、泰县一线，分路进犯，企图消灭苏北部队于如皋海安地区。华中野战军（四个纵队及一个特务团）在粟裕谭震林等领导下，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进退，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七战七捷，歼敌五万六千余人。随后，逐渐向北转移，先后在两淮（淮阴和淮安）、涟水、盐城等地大量歼灭了敌人。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又在宿北沐阳战役中歼敌三个整旅及其他部队共二万四千余人。敌六十九师中将师长戴子奇被击毙。号称蒋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十一师（原十八军）逃之夭夭。宿沐战役后，华中野战军主力撤往山东境内，与山东野战军会师，正式组成华东野战军。从此，华东野战军即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指挥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运动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汴、徐，战定陶，袭鄆城。为了配合中原和华东解放军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于八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一线的敌军出击，先后占领砀山兰封等十多个城镇，歼敌一万六千余人，打断了国民党军汴徐间的联系。八月末，蒋介石集结了二十二个旅的兵力，分由郑州徐州进攻鲁西南，妄图在菏泽地区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夹击消灭。晋冀鲁豫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迎击自郑州来犯之敌，九月三日，在菏泽、定陶、曹县一带，歼灭敌军四个旅共一万七千余人，粉碎了蒋军的“钳形攻势”。随后于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以远距离的奔袭战，全歼敌整编六十八师所属一一九旅于鄆城，共歼敌九千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部队八、九月间在同蒲路南段歼灭胡、阎等部二万人。十一月下旬，配合晋绥解放军在隰县、大宁一带歼灭胡部六十七旅等万余人，破坏了胡宗南袭击延安的计谋。

在其他战场，解放区军民亦奋起迎击蒋军的进攻。山东野战部队在胶济路两端予敌人以重大杀伤。晋察冀野战军抗击了国民党军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的进攻，歼其二万余人，十月十一日主动撤出张家口。晋绥野战部队，八月攻克朔、崞二县后，九月又在集宁地区与晋察冀部队配合歼敌八千余人。东北野战部队于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日，在新开岭地区歼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全部八千九百余人。

经过四个月作战，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解放区的承德、集宁、张家口、淮阴、菏泽、安东等一百零五座中小城市，但是付出被歼三十三个旅近三十万人的惨重代价。而且每占一城，就得派兵任守备。这就使蒋军战线太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九四六年十月，蒋军全面进攻的态势衰落了下來。从此，战局变为互有进退的拉锯战。蒋军除在个别地区还有战役主动权外，在全局上已由主动变为被动。人民解放军继续在各个战场寻机大量歼敌。

在华东战场，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至二十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峄县枣庄地区歼敌两个整编师师部、四个旅及一个快速纵队，五万三千余人，生擒两个师长。蒋介石在接连失败后，恼羞成怒，一月底在海州至临城一线集结三十万大军分三路北犯，并命胶济线王耀武部李仙洲集团三个军（七十三军、七十二军、九十六军）由淄博、明水南犯，妄图南北夹击，在临沂地区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陈诚亲自指挥，蒋介石也曾飞到徐州部署和督战，并派周至柔调空军实施“战略轰炸”。国民党扬言“胜败全系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南线蒋军鉴于以往被各个歼灭的经验，行动异常谨慎。北线蒋军则大胆向鲁中深入。二月四日占莱芜，八日占新泰。针对这种情况，华东野战军留两个纵队钳击南线之敌，主力七个纵队毅然放弃临沂，挥戈兼程北

上。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乘北线敌人调整部署之机将其围歼于新莱地区，歼敌七个旅六万余人，生俘徐州绥署第二绥区副司令长官中将李仙洲及其属下军长师长二十名。创造了自卫战争以来一次歼敌七个旅的光辉战绩。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收复城市十三座，使渤海、鲁中、胶东、滨海四个军区联成一片。二月十五日，南线蒋军侵入临沂，只得一座空城。莱芜大捷使蒋军惶恐万状，整个三月份华东敌军未敢出战。徐州绥署正副主任薛岳吴奇伟被蒋介石撤职。

东北野战军，针对蒋介石“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采取南打北拉、南北密切配合、集中力量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进行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坚持了南满，巩固了北满，并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结束了敌人在东北的攻势。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月二十五日由金乡地区南下，出击豫皖边之亳县、太康、睢县、宁陵地区，歼敌近万。晋察冀野战军向平汉线保定以南出击，一月底，连克新乐、定县等地。晋绥野战军及太岳部队进行了汾(阳)孝(义)战役，歼敌一万一千余人。

这样，又经四个月作战，再歼敌四十一万四千九百余人。敌占解放区城市八十七座，解放军收复与新解放城市也有八十七座。包括前四个月，共歼敌七十一万余人。蒋介石用于第一线的攻击兵力，由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一百一十七个旅下降为八十五个旅。但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由开始时的一百九十三三个旅增至二百一十九个旅。这表明，蒋军愈深入解放区，战线愈长，兵力就愈分散，就愈陷于被动。蒋军的全面进攻被粉碎了。

四 蒋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及其失败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起，蒋军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蒋军的战略目的是企图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与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并将解放军堵在黄河以北，使战争继续在解放区内进行。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在于企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共产党的右臂，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蒋介石即准备进犯延安。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与胡宗南密谋。三月十三日，胡宗南令二十九军等部十五个旅十四万余人，加上马鸿逵马步芳及邓宝珊的部队共约三十四四个旅二十三万余人，开始了向延安的进犯。

西北野战军只有二万余人，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根据敌我兵力对比情况，针对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中共中央制定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西北野战军在延安以南阻击敌军七昼夜予以重大杀伤后，中共中央于十八日主动撤出延安。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清涧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仍留在陕北；中共中央机构划分为前委、后委、工委分别负责指挥战争及其他工作。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前委，转战陕北。叶剑英负责后委工作，赴黄河以东山西临县。刘少奇、朱德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工委，赴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五月，经晋绥到达晋察冀边区平山县西柏坡。前委既领导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又直接指挥西北的作战。西北野

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按照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出色地组织了陕北的运动战。

胡宗南部侵占延安后，断定西北解放军“不堪一击”，急于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针对敌军意图，西野主力第一、二纵队、新四旅、教导旅在延安东北之青化砭集结待机，而以一个营伪装主力将敌军诱至延安西北的安塞。敌军为保侧翼安全，派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沿延榆公路北犯。三月二十五日，西野以六个旅的绝对优势，将该路敌军包围在青化砭，经一小时激战，全歼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三千余人，活捉其旅长，首战告捷。这时，蒋军发现解放军主力在东北，便掉头东向，寻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主力移至榆树坪一带隐蔽休整，只以小部分兵力与敌“蘑菇”。敌至清涧，又折回瓦窑堡，四月八日，回抵延安东北的蟠龙永坪地区。前后十二天，兜圈四百里。西野主力已休息了半个月。这时敌军留下一三五旅守瓦窑堡，主力南下蟠龙补给。解放军将敌主力诱至瓦窑堡西南方向后，主力隐蔽集结在瓦窑堡以南羊马河待命。四月十四日，敌一三五旅途经羊马河时，被解放军一举歼灭。这一仗，解放军歼敌四千七百余人，又活捉旅长一人。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决定继续与敌“蘑菇”，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地步。羊马河之役后，敌军妄图压解放军主力北上，东渡黄河。解放军将计就计，主力撤至瓦窑堡西北集结待命，以一个旅扮成主力，沿途遗弃臂章、符号、旧军装、破担架等，作出仓皇败退模样，把敌军九个旅诱至绥德。四月二十六日，敌向绥德米脂窜犯，扬言要打通咸榆公路与在榆林的邓宝珊会师。正当敌主力至绥德时，解放军主力突然袭击蟠龙，五月二日至四日，全歼一六七旅六千七百余人，再活捉旅长一人。蟠龙是敌人的重要补给站，解放军缴获极多，仅军装就有四万套。蒋军在绥德扑空，又得知蟠龙被围，顾不得和邓宝珊会师，气急败坏地仓促南援。敌回抵蟠龙时，解放军主力已在安塞休整了一周，而敌军已被拖得精疲力尽。五月八日，新华社记者任《评蟠龙大捷》的评论中赋打油诗一首，说：“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象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这样，撤离延安后的四十多天里，西北解放军三战三捷，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活捉三个旅长，给蒋军以沉重打击。五月十四日，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

蟠龙大捷后，人民解放战争已处于全国反攻前夜。西北野战军为了拖住敌人，便突向陇东，六月底七月初又北上收复三边（定边、靖边、安边），解放了边区西部长宽各三百多里的地区。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工作会议，贺龙、陈赓等也参加了会议。会上研究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具体部署及陈赓部队南进的问题。这时刘邓大军已渡过黄河。为了配合刘邓南下，西北野战军主力从三边挥戈北上，佯攻榆林、以调动胡宗南军北上。果然，胡军分别由锺松、刘戡率领，分左右两路北进，企图南北夹击消灭解放军主力于绥米地区，并迫中共中央过黄河。锺松的三十六师在榆林扑空后，又孤军南犯，命一二三旅与刘戡二十九军会师。早已撤至沙家店地区的解放军主力，趁敌立足未稳，在常家高山一带一举歼灭敌一二三旅，活捉旅长一人。接着于八月二十日向敌三十六师发起总攻，经数小时激战，全歼该师六千余人于沙家店地区，只锺松带数人逃掉。三十六师覆灭后，刘戡掉头南逃，解放军乘胜追歼，先后在岔口、清涧、延长等地歼其

九千余人。沙家店战役是西北战场关键的一仗，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从此，西北野战军也由防御转入进攻，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蒋军集中了汤恩伯、王敬久、欧震三个兵团和两个绥靖区的兵力共约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开始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四个月内，发动三次攻势，都被解放军击破。四月下旬，敌七十二师被歼，第一次攻势失败。五月十一日，敌军又由临（沂）泰（安）线三路北犯，敌中路整编七十四师（蒋军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械装备）在另外三个师一个军配合下，直犯坦埠，企图占据沂蒙公路。华东野战军以四个纵队及地方武装，钳制左右两路之敌，以五个纵队集中围歼七十四师。将敌包围后，经一昼夜激战，于五月十六日，将其全歼于蒙阴东南之孟良崮地区。敌七十四师所辖三个旅及八十三师十九旅一个团共三万二千余人，上至师长下至马伕无一漏网，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这一王牌师覆灭后，进犯的蒋军全线溃退。从此，蒋军对山东的进攻走上彻底失败之路。华东野战军向外线转战，敌人亦被迫从鲁中西撤。

这一时期，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乘势向敌军展开了战略性反攻。

在四个月作战中，蒋军侵占解放区城市九十五座，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共歼敌四十万七千人。

经过一年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蒋军一百一十二万人，其中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蒋军总兵力由四百三十万下降为三百七十三万，其中正规军降至一百五十万。蒋军的机动兵力只有四十个旅左右。人民解放军虽然损失了三十五万八千人，但总数却由一百三十万人增至一百九十五万人，正规军达百万以上。人民解放军不但装备大为改善，政治军事素质大大增强，而且百万大军皆可机动，在这方面远远优于蒋军。同时，蒋军实行重点进攻的结果，造成了军力部署上难以改变的哑铃形态势，重兵被拖在东西两翼，中原及江南空虚。国民党后方十三个省中，兵力只有二十一个旅，湘桂黔闽浙赣六省极为空虚。蒋军缺乏第二线部队。上述这些情况，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四节 国民党政府陷入全民包围中 第二条反蒋战线的形成中间路线的破产

一 “中美商约”的签订 国统区经济危机的加深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战后美帝奴役中国、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间第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

中美商约共三十等，它记载着：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为此可以在中国保有、建造、租赁土地及房屋，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危难”时，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以彼此“平等”、“互惠”的形式掩盖着不平等的内容及性质。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一切开放，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条约签订后，驻美大使顾维钧竟无耻地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该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十一月四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一九四七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中美商约签字前后，国民党政府还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卖国协定。对此，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郑重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成为美国独占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四大家族成为美货倾销的总买办。一九四六年七月，美商在中国设立的分支店有一百一十五处。大都经营进出口贸易。陈纳德与宋美龄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总资本达十亿元法币。美货通过公开倾销和走私，泛滥于市场。一九四六年春，上海永安公司的美货即达货物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中美商约签订后，行政院长张群发表了欢迎外国投资声明，美国资本家来华投资者更加踊跃，美货倾销更甚。

见《评中美商约总结魏德迈》一书，光明书店一九四七年九月印行。

由于美帝经济侵略的加紧，四大家族的野蛮掠夺和反革命战争的巨大消耗，国统区的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国民党政府财政上入不敷出，通货急剧膨胀。一九四六年支出法币十万亿元，收入只有二万亿元。一九四七年支出一百万亿元，收入只有十三万亿元。巨额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印发钞票弥补。法币发行额猛增，物价随之狂涨。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准，至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涨了六万倍，年底更达到十四万五千倍。一九三七年一百元法币能买一头牛，到一九四七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国统区工商业大量倒闭，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七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二十多个大城市，倒闭的工厂商店二万七千多家。上海原有工厂四千零五十家，至一九四六年底，已倒闭三千一百六十家。其中民营工厂倒闭四分之三。工厂开工率，一九四七年仅为平时的百分之二十。国统区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农业经济凋敝，出现了严重粮荒。国统区的经济危机，使劳动群众和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城市失业人员大增。一九四六年冬，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业和无业人员二百六十万。公教人员和学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村情况更为悲惨。一九四六年饿死一千万人。一九四七年，各地饥民达一亿以上。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政府对“已届非常严重之时”的经济状况，采取了所谓“紧急措施”。二月十六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和《修正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蒋介石为此发表了谈话。在谈话中，他提出“政府支出应极度减缩，本年度预算内，凡不必要之新建设均予以展缓”，用有效方法征收“所得税和各项直接税”，“如因此而或使个人负担有加重之处，则为一致拥护政府”起见，也应“一致予以遵行”；“以后提高工资，应即确定最高限度，不得漫无限制”。职工的工资应“以本年一月份之生活指数为最高指数，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增加底薪”。“对于民生日用主要物品”，“即予从严管制”。这些办法的实施，未能解救危机，只是使财富更加集中到四大家族手里，人民生活更加难以维持。

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国统区人民反蒋斗争不断高涨的根源，也是国民党军事政治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 国民党的“制宪国大”和“改组政府”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为了取得美援和尽快给其反动统治披上“民主”外衣，便加紧了“制宪”步骤。

依据政协协议及其规定的程序，国民大会的召集应在政协各项协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就是说，必须在和平环境中，由改组后的政府负责召集，各党派共同参加，国大通过的宪法，应是政协审议完成的草案，召集日期亦由各方协商确定。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上述一切，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擅自决定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十月十一日下午，蒋介石正式下令如期召开国大。国民党中宣部长发表谈话，要各党派速交国大代表名单。为了欺骗舆论，诱使各党参加国大，十一月八日，蒋介石发布了所谓“停战令”，十一月十二日，又宣布国大延期三天，声称是为了等候共产党交出参加国大人员名单。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拉着民、青两党召开了非法的分裂的国大。

对于国民党的非法国大，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抵制。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先后会见“第三方面”人士、司徒雷登和马歇尔，向各方表明了中共

的严正立场。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招待记者，发表了书面声明，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他明确声明：“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十一月八日‘停战令’的欺骗性。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照这样做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离开京（南京）沪返回延安。

民盟也对国民党非法国大采取了抵制态度。一些领导人拒绝了国民党的利诱。民盟中央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做出决议，坚决维护政协决议，宣布“一切行动均以此为唯一的依据”。晚上，张澜从重庆打电话给南京的民盟政协代表，坚嘱不可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张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即失去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对不可稍有变动。”为了维护民盟的立场，十二月二十三日，民盟中央决定，将参加了伪国大的民社党清除出盟。

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代表，也纷纷拒绝参加国民党的非法国大。国内外进步团体通电斥责一党国大。革命人民把参加伪国大视为“落水”或“堕入妓院的火坑”。

这次伪国大的任务是制定宪法，故称为“制宪国大”。经过四十一天争吵，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了所谓《中华民国宪法》，随即宣告闭会。一九四七年元旦，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这部宪法，并宣布十二月二十五日实施。

伪宪法共十四章一百七十五条。它抄袭了资产阶级宪法中一些自由平等的条款，实质上与《训政时期约法》一脉相承，是“五五宪草”的翻版。它的基本特点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国家制度，是一部封建买办法西斯宪法。“蒋记伪宪法的精髓和实质，可以八个字概括尽之：人民无权，独夫集权”。

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和通过的伪宪法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中国人民决不承认蒋记宪法。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提问时说：“蒋政府的伪宪，也只有把它当作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三十一日，民盟发表书面谈话，对“国大”通过的“宪法”“保留接受权利”。同一天，在上海的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民主建国会、工商业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等十一个团体，一致决议坚决不承认“国大”通过的“宪法”。国民党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不但未能起到巩固法西斯专政的作用，反而使它更加孤立。

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后，紧接着导演了“改组政府”的丑剧。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召开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宪政实施准备案》等议案，并发表了宣言。宣言提出今后的“要务”就是组成所谓“过渡政府”。三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等所谓“行宪法规”。四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四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名单，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副主席。行政院长张群，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传贤。

二十九名委员，国民党占十七人（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青年党四人，民主社会党四人，“社会贤达”四人。四月二十三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并公布施政纲领。国民党大肆宣扬“多党政府”已经成立，“国民党已实践还政于民之诺言”。事实上它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的政府。四月二十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指出：“蒋介石这一‘改组政府’的把戏，不过是继承袁世凯旧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其媚外、残民、打内战、走死路等特点，将无一而不相象。”“旧筹安会出现之后，袁世凯不久就垮了台。新筹安会出现之后，蒋介石的命运决不会好过袁世凯，也许比他更坏些”。四月二十五日，民盟在宣言中说：改组后的政府既不是根据政协精神产生的，也不是促进和平实现民主的政府，只是一个扩大分裂、三党“共同负责与共产党作战的政府而已”。

三 李闻惨案 国统区人民运动的高涨台湾“二·二八”起义

蒋介石对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政策。一九四六年春天，接连在各地制造血案，四、五月间又在西安捕杀了《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顾问、律师王任和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民众导报》主笔李敷仁。后者伤重未死，被当地农民救护到延安。六月，各地反内战要和平的工人、学生、市民一万三千余人被捕。七月，呼吁和平的文化团体、言论机关一百余处被封闭。特别猖狂的是在昆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闻血案。

李公朴、闻一多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委和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由于他们热心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内战独裁，遭到反动派的忌恨。七月十一日，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被害后，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更严厉地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七月十五日，他在云南大学作了一生中最后一次讲演。他愤慨地控诉反动派对李公朴的暗杀行为，坚定地表示了牺牲的决心：“争民主和平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象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当天傍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民主战士这种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肯牺牲不愿屈服的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在一城之中，五天之内，竟演出震动中外的两大血案，“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

在白色恐怖袭来，人民运动遭到残暴镇压的时候，在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团及当地党组织，始终同民主力量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海各界五千余人召开追悼李闻大会，邓颖超在会上宣读了周恩来亲笔书写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当邓颖超读到“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和下面每一句誓言时，会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悼词和掌声是对反动派的控诉和抗议，也是对人民的号召和鼓舞。

针对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要“依照

《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现代新闻》第一年第一期。

中共代表团致闻一多夫人唁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组织，团结进步人士和团体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美反蒋斗争。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由于国民党上海当局一再禁止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营业，并逮捕继续营业的摊贩近千人，引起了摊贩们的愤怒和反抗，他们游行示威，包围了警察局，参加斗争的群众达到五千余人。成为全市性的反蒋斗争。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平东单广场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事件。这一暴行激起北平和全国学生及各界人民的极大义愤。三十日，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平师院等校学生举行万人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和游行，要求“美军从中国滚出去”。北平学生的斗争很快波及全国各大城市，总计约有五十万学生举行了罢课和示威，并有不少市民工人参加，形成了全国“抗暴”斗争的第一个浪潮。在斗争中，三月八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总会。

一九四七年五月，爆发了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学生运动。五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叫嚣对爱国民主运动采取“紧急处置”。但是广大学生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当日下午北大、清华、北洋三大学学生上街进行反内战宣传，在西单商场附近遭国民党青年军二八师军人殴打，数人受伤。第二天天津学生在北大组织“五一八血案”后援会，要求政府保障人权，并宣布罢课。五月二十日北平二十多个大中学校一万五千多学生举行“华北学生北平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北大、清华学生中的退伍军人头戴钢盔，身穿军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队伍经西单，冲破埋伏特务用石块的袭击，胜利回到“民主广场”。五月十九日，上海七个国立大专学校七千多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五月二十日上午，京沪苏杭地区学生六千余人在南京联合举行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大游行，提出增加伙食费和全国教育经费等要求。游行队伍在珠江路口遭到国民党警宪特务的殴击，重伤二十一人，轻伤九十七人，被捕二十余人。这就是南京“五二惨案”。五二惨案发生后，学生运动更加扩大，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都行动起来，举行罢课和街头宣传。但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六月一日，国民党实行大逮捕，全国被捕者二千余人。在武汉打死学生三人。五月三十日和六月二日，上海学联和华北学联先后成立。六月二日，上海学联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起来反对内战。上海文化界八十八人，大学教授七十六人，北平大学教授一百余人分别联名发表意见，支持学生运动，要求和平民主。到六月中旬，学潮暂时平息。全国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备展开新的斗争。

由于粮价暴涨人民挨饿，城市贫民掀起了广泛的抢米风潮。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四月，有九个省三十八个城市发生了抢米风潮，参加者有十七万人。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省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台湾人民脱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后，又陷入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和美国帝国

《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主义的侵略控制之下。二月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市殴打女烟贩，并开枪打死群众一人。二十八日晨，市民罢市，举行抗议游行。下午，国民党军队开枪打死请愿群众三人，打伤三人。愤怒的群众立即夺取电台，呼吁全省人民支援台北人民的正义斗争，全省人民群起响应，大规模的起义于是爆发。至三月八日止，起义人民控制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实行镇压和屠杀。三月八日，大批国民党军队在基隆登陆，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二二八起义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台湾人民没有停止斗争。十一月十二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宣布成立，继续领导台湾人民举起了反美反蒋的旗帜。

在国统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为中坚、有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人民运动。形成了中国人民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它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作战相配合，给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

四 蒋介石关闭和谈之门 资产阶级中间路线的破产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蒋介石一步步关闭了国共和谈之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处”失败，放手让国民党大打内战。九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致备忘录于马歇尔和蒋介石，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蒋介石置若罔闻。

十月中旬，蒋介石为了诱使各方参加“国大”，摆出了和谈姿态。先派雷震等赴沪策动“第三方面”人士面劝周恩来回京商谈，又于十六日发表声明，提出八条所谓和平条件，声称只有共产党同意这些条件和交出参加国大代表名单，他才能下停战令。针对蒋介石的骗局，中共中央于十八日严正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其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李维汉等应“第三方面”人士之约，同他们一起由沪抵京，准备与蒋商谈。答应商谈的蒋介石却于当日下午飞到台湾去了，致使谈判无法进行。此时，“第三方面”人士仍以“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连日磋商，力图在如同水火的国民党八条与中共两条之间进行调和。

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马歇尔离华声明。声明既承认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这一集团坚持“武力政策”，又说共产党内的“激烈分子”“促使谈判中断”；既承认政协决议“系自由而且远大之宪章”，又说伪宪法是“民主之宪法”。马歇尔自相矛盾的逻辑，是为了掩盖美国援蒋政策的反动本质。

一月十六日，蒋介石通过司徒雷登向中共要求恢复谈判，企图把破坏和谈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当即提出“取消伪宪法与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两条，戳穿了蒋介石的和谈骗局。一月二十九日，美国

《中共中央对时局声明》，《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六九九——七〇〇页。

政府决定退出三人会议，撤回美方驻军调部人员。

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强迫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人员撤回延安。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又通知中共驻京、沪、渝的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及眷属于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中共中央得悉后，周恩来于二月二十八日致函责问蒋介石，并要他正式发出书面通知，承担最后关闭谈判大门的罪责。二十八日晨，中共驻重庆代表吴玉章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二百余人，被重庆警备司令部强制集中于曾家岩二十三号宿舍及化龙桥新村七十六号《新华日报》印刷厂两处，形同监禁。面对这种严重局势，吴玉章挺身而出同国民党当局抗争。三月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三月八日，董必武发表离京书面谈话，表示“我们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三月九日，驻京、沪、渝三地中共人员返回延安。

三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叫嚷“政治解决”已经“绝望”，公开宣布国共破裂。六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将中共参政员除名，取消了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已不留余地地破坏了国共关系和国内团结，决心在反革命道路上走到底。

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召开非法国大，关闭和谈之门，这一系列行动，使政协时期民主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驱使中间派别一步步走向绝境。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力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遂使一些人继续为“中间路线”奔走呼号。

宣传“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最积极的是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施复亮。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何谓中间派？》一文，主张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应是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中间派在行动上的态度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他认为民盟、民建、民进、民联、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都是中间派的政团，这些政团应当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一九四七年春，他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与作用》、《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等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主张。他认为“政协路线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政协路线就是这样的一条‘中间路线’。在今天的中国，也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真正的民主路线”。“目前的政局是：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的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的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为此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国共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大声疾呼“走向政协的道路”，并呼吁“一切中间派的民主人士，必须从今天起挺身而出，加紧努力，以创造光明的明天”。

《时与文》创刊号，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出版。

《时与文》第一卷第八期，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出版。

《时与文》第一卷第五期，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时与文》第一卷第八期。

这时，民盟仍然主张中间路线。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张东荪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一文中说：“中国的出路本来最理想的是：一、以整个儿的中国作为美苏的桥梁。在亚东方面把美苏的冲突调和下来，借以谋世界的安定。二、以广大与强盛并富有独立性的第三者人们作为国共的桥梁。将国共两党各迫使其趋于正轨，同时把他们拉拢起来，得到大合作。”他认为用“联合政府”的办法就可以改变国共两党的性质，使共产党由“革命的政党变为普通的政党”。在对时局的估计上，民盟认为在内战大打之后，“任何一方都没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可能”，“双方的打算，都是战后必和”。所以民盟一再表示“保持在内战环境中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在调解武力党争上继续尽其最大的努力”。

这个时期，在对国内时局的估量上出现过“南北朝”的议论。最早明确提出这种看法的是王芸生。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他在《观察》周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时局的前途有三个去向：第一个“以江淮为界的南北朝”。第二是“十月革命”。第三是“政协协议之路”。他认为“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他希望的是最后一个去向。

王芸生的议论，还只是一种对时局的推测。在战争打了一年以后，“南北朝”的议论在国民党的军界、政界和一部分知识界中盛行一时。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时与文》刊登了《大局的现状与前途》一文，其中谈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南北朝”。该文认为国民党政府要消灭共产党军队是不可能的，应在“战略上改攻为守”，即“听任南北朝的存在”。又认为“南北朝终究是个暂时局面”，它存在的久暂，“一面要看国共对峙情状，一面要看国际局势”。这些论调的产生固然有其认识上的根源，但也是与国民党的战略方针密切相关的。战争发展到一九四七年夏季，国民党的意图是迅速消灭陕北和山东的人民解放军，然后集中兵力聚歼人民解放军于黄河以北。刘邓大军渡河南下后，国民党仍想实现其既定方针。一个美国军官在一本小册子中说：“黄河乃是中国大陆上一条唯一可以利用作军事防卫的天堑，国军如果能够在共产党的十月份攻势发动以前，肃清黄河南岸的反政府叛乱，这么，就可能使十月以后的战事在黄河北岸进行，也就是说，使战事在共产党的基本控制区中进行”。他说“这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使国民政府得到一个必要的时间来实行各方瞩目的改革，从而使战争的体制趋于巩固。另一方面，这将使共产党区域大大缩小，造成它政治经济的困窘，以致军事上无法实现它所擅长的运动战术，这将使它重蹈一九三二年的江西覆辙”。这本小册子在国民党北方军政界中颇为流行。

“南北朝”论的出现，也是中间派的政治主张和希望的一种表现。那时，恢复政协协议之路日近绝望，而国共两党斗争的胜败之局还没有最后确定，或者虽然战争胜败趋势已经显现出来，但许多人还看不清楚。一些人还希望有一个以黄河为界或“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因为只有这种情况出现，中间

《观察》第二卷第六期，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出版。

《民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代宣言）》一九四七年一月，见《新华日报》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民盟在南京招待记者声明决保持“第三者”地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转引自马可宁《战局怎样变？》，《时代》杂志第七年第三十九期。

派才能保持政治活动的余地，才能乘机图谋发展。

正当中间派还在奔走呼号的时候，反动派决定不留余地地镇压民主党派的活动了。反动派首先拿民盟开刀。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捏造的文件《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某政治观察家谈话，声称：“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旨而行”。这是打击民主党派的信号。五月三十一日夜，成都、重庆两地几十个民盟盟员被捕。十月七日，反动派在西安杀害了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杜斌丞。十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南京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十一月五日，民盟被迫以张澜的名义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员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总部负责人总辞职，总部解散。

民盟被非法解散，说明了反动派的疯狂，标榜实施“宪政”的国民党政府连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也绝不允许存在。民盟的解散，也宣告了“第三大党运动”的失败，“中间路线”的破产。

五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 新疆三区革命的发展

战后，内蒙古人民的民族自治运动和反对美蒋的斗争，新疆三区革命斗争，都有了新的发展，成为中国整个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包括东北及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各省境内之蒙古民族的哲里木、昭乌达、兴安、呼纳、卓索图（以上通称东蒙）、锡林郭勒、伊克昭、乌兰察布、察哈尔、巴彦塔拉等十个盟和阿拉善、额济纳两特别旗（以上通称西蒙），面积共约一百四十余万平方公里，蒙汉人口共六百多万。

中国共产党把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作为领导内蒙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中心环节。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乌兰夫为首的蒙汉各族领导人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西蒙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内蒙自治运动的领导机关，并在各盟建立分会。由于历史原因，东蒙自治运动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封建上层分子手中。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成立了东蒙古人民政府。东蒙自治运动未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因此，使内蒙自治运动走上正确的统一的道路，就成为内蒙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联合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在承德召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有名的“四三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民族解放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在目前以联合会为公开领导机构；撤销东蒙自治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分会以领导东蒙自治运动；改造内蒙古武装，并分别直属人民解放军各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等等。会议选举乌兰夫为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四三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从此，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统一起来了。内蒙古各族人民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和艰苦工作，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乌兰浩特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各盟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选出的二百九十八名代表，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

《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两个重要文件。施政纲领规定，自治政府是内蒙古地区蒙族联合其他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民主政府，自治区域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自治政府的任务是团结自治区内的蒙、汉、回各族人民，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封建买办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为实现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代表会议选出了临时参议会，经参议会选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为政府主席。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七月九日，中共内蒙工作委员会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直辖六个盟（呼纳、兴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面积六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三十余万。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内蒙古人民自治运动的丰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第一个胜利。此后，内蒙各族人民在中共内蒙工委和自治政府领导下，在广大的农牧区域，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特权，发展党的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发展生产和文教事业，揭开了内蒙历史上新的一页。在军事上，内蒙人民骑兵在反对美蒋的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自一九四七年五月至一九五一年四月，共作战六百五十四次，歼敌二万一千九百人，俘敌一万二千二百余人，敌人投降二千七百余人，缴获各种炮七十门，战马二万二千四百余匹，还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

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运动，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区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派出了以阿哈买提江为首的三人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举行和平谈判，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双方签订了十一项和平条款。其主要内容为：三个月内各县选出县参议会，并由此选出县长和省参议会，扩大省政府委员会，容纳各民族及各方面人士；准予组织民族军队，骑步兵各三个团，总数为一万二千人，分驻三区各地，国民党军队不和民族军驻在一起，以避免发生误会；人民有宗教信仰、出版、集会、言论的自由；各级学校得使用本民族文字施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文书，汉文和维文并用；确保民族文化和艺术的自由发展；税率的规定及其他负担以不妨碍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为标准；商人可遵照商约，自由从事内外贸易。

根据这个和平条款的规定，一九四六年六月，新疆省政府实行改组。七月一日，新疆联合政府正式成立，国民党政府指派张治中为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三区革命政府派阿哈买提江等担任副主席及其他职务。从此新疆一度出现了和平局面，三区及新疆各族人民争得一定的民族自治权利。这期间，张治中释放了被盛世才逮捕入狱的马明方、杨之华等一百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并派人护送到延安。

但是，国民党同三区革命运动领导人谈判本是缓兵之计，随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也很快把战火引到新疆。以新疆省警备司令宋希濂为首的国民党军警人员制造白色恐怖，破坏“和平条款”的实施。国民党将大批反动军队调进新疆，一年之内由四万人增至十万人。国民党还不择手段地在当地民族中寻找败类，竟将新疆各族人民的公敌、大土耳其主义者麦斯武德、艾沙、伊敏之流送回新疆充当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走狗和工具。一九四七年二月，宋希濂伙同麦斯武德在迪化等地组织反对和平条款的游行，并图谋杀害三区革命的领导人。五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艾沙为秘书长，吹嘘这是所谓“民族政府”。麦斯武德上台后，大肆宣传反

动的大土耳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鼓吹建立“大土耳其国家”。他们利用政治权力，勾结阿山民族叛徒乌斯满、贾尼木汗等在富蕴、福海、青河等地举行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同时，麦斯武德等在美蒋指使下制造了反苏反共的“北塔山”事件。

鉴于和平条款已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无遗，三区革命的代表及其同情者于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先后退出了“联合政府”飞返伊宁。

此后，国民党指使乌斯满、贾尼木汗等武装进攻三区革命根据地。九月，乌斯满叛军攻占承化（阿勒泰）。一九四八年春，三区人民在阿哈买提江为首的革命派领导下，打退了乌斯满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解放了承化，初步稳定了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是三区革命运动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但是，三区革命领导者，以阿哈买提江为代表，认识并克服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纠正了无区别地对待一切汉人的政策，提出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劳动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民主的口号，走向正确的道路。

为了加强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进一步推动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三区革命的领导者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在伊宁成立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推选阿哈买提江为主席。这是新疆各族人民统一战线的组织。它在新疆得到迅速发展，至一九四九年八月盟员有八万余人。

新疆三区革命运动，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在革命过程中走过许多弯路，但“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贡献”。不幸的是，阿哈买提江等五名三区革命的领导人，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坐飞机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遇难牺牲。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复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临时代理主席电，《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二章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节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一 三路大军南下作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发表

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较量和人民解放军一年来的内线作战，国民党反动派同革命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形势，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转变的英明决策。毛泽东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人民解放军选择中原地区作为战略进攻的突破口，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国民党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人民解放军容易在那里立足生根。占据了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

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别山要采取跃进的进攻方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然后力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由陈毅粟裕等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谢富治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两个纵队和一个军（渡河前组成陈谢兵团）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胡宗南军北上；以山东野战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引向海边，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

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二、三、六四个纵队十二万余人，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在东阿至濮城间三百余里地段上，发起了渡河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自恃可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蒋介石慌忙从豫北和豫皖苏调来三十二、七十、六十六三个整编师和一五三旅，由王敬久指挥分兵两路北援。蒋军妄图以其五十五师坚守郟城吸引人民解放军于城下，然后两路会师，把解放军消灭在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逼其回渡。刘邓识破了蒋介石的诡计，趋势发起鲁西南战役。从七月七日至二十八日，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共五万六千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又纠集三十个旅，分五路向鲁西南合击，并企图在开封附近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主力。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

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一一七四页。

军根据中共中央不要与敌纠缠，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的指示，于八月八日，突然甩开敌人，分左中右三路向南疾驰，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八月十八日，涉越黄泛区，渡过沙河。八月二十三日，解放军以无比的英勇杀出一条血路，打破了蒋军在汝南埠的堵击，胜利渡过汝河。八月二十六日，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进到大别山区以后，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主力打运动战。经两个月艰苦斗争，至十月底，歼敌三万余人，建立了三十三个县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从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插进了一把尖刀。

八月二十二日，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由晋南平陆孟县间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先在陇海路洛阳至潼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歼敌三万一千余人，随后以一部出陕南，开辟了陕南根据地。主力于十月底跨陇海路南下，在伏牛山东麓广大地区胜利展开。

八月间，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挺进鲁西南地区。九月七日至九日，在沙土集歼敌九千五百余人。九日二十六日，由徐州开封间横跨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大平原。至十月底，歼敌万余，解放了洪泽湖以西、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北广大地区，攻克县城二十四座。

三路大军南下之初，国民党错误地认为解放军是“向国军兵力较弱的地区逃命”，他们还在做集中兵力向山东发动“九月攻势”的迷梦。在搞清了解放军的真正意图之后，十一月初，蒋介石才命令国防部长白崇禧组织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十一月二十三日组成），纠集三十三个旅向大别山地区的解放军进行围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刘邓大军以三个纵队坚持现地斗争，一个纵队渡淮北上，以新调到大别山地区的两个纵队越平汉路西进，开辟桐柏、江汉两军区。与此同时，陈粟、陈谢两军对平汉陇海两路展开破击战，以便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经一个月战斗，打破了蒋军的围攻。十二月底，三路大军在豫南遂平、西平地区胜利会师。从此，中原地区局面一新。鄂豫皖、豫皖苏、豫西三个新解放区联成一片，三路大军也由各自作战变为直接密切协同作战。

总计九月至十二月，四个月作战，三路大军共歼敌十九万五千余人，解放县城一百余座。在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江淮河汉之间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这个战略任务的完成对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在三路大军同国民党军逐鹿中原的同时，其它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转入外线作战或内线反攻，向敌人展开攻势作战。

“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于九、十月间进行了黄龙战役和延清攻坚战，歼敌整编七十六师八千余人，生俘七十六师师长。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日，第二次围攻榆林，歼敌二千四百余人。此后经两个月整训即转入外线作战。

聂荣臻等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继清沧、保北战役后，又进行了大清河北战役，歼敌九十四军、十六军及王凤岗保安团等部五千余人。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进行了清风店战役，全歼第三军军部、第七师、二十二师一个团共一万七千余人。生俘第三军军长以下一万一千余人。十一月十二日，乘胜一举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全歼第三军三十二师及暂编三十二师、河北保安团等部共二万四千余人。石家庄的攻克，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联

成一片，华北局面为之大变。同时，大大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占大城市的信心。

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及西北野战军一部，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攻克运城，歼敌一万三千余人。晋西南完全解放。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了胶东战役，收复县城十余座，歼敌六万二千余人；苏北兵团进行了盐城、李堡战役，歼敌二万四千余人。

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三日，发动大规模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余人，收复城市十五座，并将中长路农安至铁岭段、北宁路锦榆段完全破毁。使长春、吉林之敌完全孤立，并迫使东北敌军龟缩于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狭小区域内。

各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内线与外线的攻势作战，组成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人民解放军经半年作战，歼灭敌军七十五万余人。到一九四七年底，战争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丧失了大量有生力量、机动兵力消耗殆尽的国民党军队，被迫从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以来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向全国人民宣布自己的基本政策，推动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双十宣言）。

宣言分析了战争形势，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包括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等等。

宣言适应人民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新形势，给全国人民指出了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总目标。对正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人民，起了很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二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整党、新式整军运动

“五四指示”发布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胜利。至一九四七年九月，东北解放区六百二十九万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五千多万亩土地。其它解放区也发动了第一个土改高潮。但是，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土改运动没有展开或没收和分配土地不彻底，有的地方走了过场，贫雇农没有翻身。为了总结经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主要是右的倾向），以便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充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共中央工委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一八八页。

全国土地问题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党内状况、农民组织及发扬民主问题，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于十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公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除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和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解放区土改运动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展开。农民们郑重地将大纲全文书写在乡村的墙壁上，以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各地区的中共中央局或党委，都召开了土地问题会议，制定了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土地法大纲实施细则或补充条例，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开展土改斗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各项政策的贯彻，到一九四八年底，在老区半老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老区一九四八年主要是复查），在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地区使约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土地改革的胜利，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解放区生产的发展。为了保田保家，保卫革命成果，广大农民以“支援大反攻，参加胜利军，打倒蒋介石，拔掉老祸根”为口号，普遍掀起了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热潮。吉林蛟河一位杨老太太，在她翻身，先后将五个儿子中的四个送上前线。一九四七年，冀中安平县农民组成“翻身独立营”集体参军。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近百万、东北一百六十万人参军。广大农民抽出大批人力畜力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前进。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山东有五百八十万，冀中有四百八十万随军出征。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民兵，开展对敌斗争。在解放战争中，民兵参战者二百二十八万四千余人，作战十一万五千七百余次，共歼敌二十余万人。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一切正直的人士和正视现实的舆论，无不承认中国共产党这一政策的正确及其巨大作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多少年来，国民党把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当作其最重要的口号之一，不幸的是他们好象有点太忙，竟至没有工夫去实行那位卓越的领袖所订的土地改革方案”，“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着手实施这一计划”。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施复亮在《论中国的土地改革》一文中说：“土地斗争与军事斗争，成为中共当前政治斗争的两个主要源泉”。二者是“相辅而行的，前者保障后者的成果，后者扩

见《国讯》第四四一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版。

大前者的范围，而真正决定最后胜负的还在于前者不在于后者”。这些评论未必完全恰当，但他们说出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根据全国土地会议决定，从一九四七年冬开始，各解放区农村党组织，结合土改普遍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思想、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和抗战时期的整风不同，这一次整党主要是解决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整党的方法，除尚未巩固的新区外，一切党的支部公开，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依靠党支部中好的党员为骨干，吸收党外群众参加党支部有关群众利益问题的会议，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在内。这次整党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对于那些显然犯有重大错误，业已丧失作为一个党员起码资格的分子，对于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坚决清洗出党；对于那些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丧失作为一个党员起码资格的人，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正，并获得群众的同意，就对他们采取考察和教育的态度；对于那些犯有较轻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采取教育的方针。

通过整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风。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大进了一步。

和地方上整党的同时，人民解放军自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起，利用战争的间隙，普遍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这次整训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序地用民主方法进行的。首先开始于西北野战军，尔后在全国人民解放军内普遍展开。这是解放军政治工作和军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通过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还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这样，就为解放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作了准备。

三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和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到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等十九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形势，充分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的深远意义；全面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一年半以来各方面的经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纲领和政策。

军事方面，毛泽东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即：（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求

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五）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十大军事原则对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有重大意义。

经济方面，毛泽东着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关于土地改革，毛泽东重申了党的方针，并着重指出必须注意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和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这两条基本原则。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毛泽东分析了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垄断资本，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障着生产力的发展，是民主革命要消灭的对象。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对这个阶级的企业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对于这个阶级的右翼分子的反动倾向，应当进行揭露和打击，但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同。

毛泽东分析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他指出：（一）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份；（二）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三）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这个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政治方面，毛泽东重申了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把这时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比较，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现在比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他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的胜利实现，毛泽东强调必须整编党的队伍。

毛泽东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解决了中国革命伟大转变关头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作了充分的准备。

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四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

估计》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党内倾向以及土改和群众运动中的政策性问题，讨论的结果由毛泽东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会议还通过了两项重要决定：（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谈判）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2）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解放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事。

四 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贯彻和对“左”倾错误的纠正

在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右的和“左”的倾向。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又经过全国土地会议，右的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早已存在的一些“左”的观点和做法有了发展，成了共产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有：在宣传上，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宣传了一些完全违背马列主义原则和完全脱离中共中央精神的“左”的错误观点和口号，如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民主政府只是农民政府”等。侵犯中农利益。侵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执行政策上不讲区别，对地主和富农，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资料，甚至打击开明绅士。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乱打乱杀。整党中采用“搬石头”办法，等等。这些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重大损失。

对于这种“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在十二月会议上即予以注意并开始纠正。会后半年多时间内，党中央更以主要精力领导全党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大力纠正“左”的错误。在纠正错误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政策措施上，阐明了以下的主要问题：

首先，向全党指出了革命斗争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阐明了党在革命群众运动中实现政策领导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

第二，指明了党的总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的关系，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二九页。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四一页。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二九页。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五九——一二六 页。

第三，明确了划分阶级的正确标准。根据什么标准划分农村阶级，是当时全党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全国土地会议的缺点之一，就是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因而也就未能制定出统一的科学的划分阶级的标准。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报告中，着重指出，许多地方“过去是以剥削、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这样许多项目来作为定成分的标准。除剥削一项以外，拿其他几项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的确定，对于彻底澄清划分阶级成分中的混乱现象，分清敌我，顺利地推进土改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第四，指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对同盟者的领导的必要条件，并规定了一系列对同盟者及对敌斗争的具体政策。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由此出发，中共中央规定了许多具体政策。比如，必须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必须避免对中农、对中小工商业者、对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开明绅士，只要他们赞成反对美蒋，赞成民主（不反共）和土改，就要团结教育他们等等。

中共中央对这些理论、原则的阐明和具体政策的明确规定，正确解决了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切实纠正了“左”的错误，从而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其它阶级敌人，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五 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继续发展 解放区的扩大和统一

一九四八年春夏，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攻势。蒋军被迫放弃“全面防御”，实行所谓“重点防御”。

在中原战场，三路大军纵横驰骋，辗转歼敌。三月八日至十四日，攻克洛阳，歼敌整编二六师等部二万余人。五至七月，发动宛西、宛东战役，歼敌三万二千余人。六月二十二日，一度攻克开封。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又在豫东睢杞地区歼灭驰援开封的区寿年兵团五万四千余人，活捉区寿年。七月二日至十六日进行了襄樊战役，全歼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及一个整旅二万余人，司令康泽被俘。至此，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被打破。

在华东战场，山东兵团先后向胶济路西东两端出击，歼敌九十六军等部八万五千余人，活捉九十六军军长。五月底至七月初，向津浦路中段出击，连克邹县、曲阜、济宁、兖州等城，歼敌六万三千余人。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据点外，山东全境都被解放。苏北兵团先后进行了益林、涟水等战

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第三八、三九页，解放社一九四八年编印。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一六页。

役，解放苏北广大地区。盘踞宿迁之孙良诚部弃城逃走。

在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军于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三日，发动宜（川）瓦（子街）战役，全歼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二万九千余人，击毙军长刘戡。四月二十二日，收复延安。在西府、陇东战役中，截断了西兰公路，一度攻克宝鸡，击毙敌新任七十六师师长。

在东北战场，东北野战军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进行冬季攻势，在中长路四平至大石桥段，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歼敌新五军等部十五万六千余人，生俘新五军军长。三月十四日，收复四平。长、沈、锦之敌日益孤立。

在华北战场，杨得志罗瑞卿兵团先后向察南、绥东和冀热辽地区出击，歼敌四万二千余人。杨成武李井泉兵团出击保定以北，连克徐水、涑水、定兴、新城四城，歼敌万余人。徐向前周士第兵团于五月十七日攻克临汾，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六七月间，向晋中出击，歼敌七万四千余人，解放县城十四座。孤立并包围了太原。生俘太原绥署副主任赵承绶。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区日益扩大。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东北百分之九十七的地区和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口都已解放。在中原开辟了新解放区。整个解放区的面积达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部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解放区不但日益巩固与扩大，而且相继联成一片。

这种胜利在望的形势和准备夺取全国政权的繁重任务，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集中统一，严格组织纪律。但是，由于党和军队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农村环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鉴于这种状态的存在，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中统一的措施。

一九四七年逐步恢复了军队的各级党委制，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重申一切干部对中央颁布的文件都要认真学习、完全了解，不许擅自修改。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重印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供干部学习，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极严格的铁的纪律。

实行党委会的集体领导，重要问题不是由个人决定而是由党委集体决定，这是党的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为了进一步健全这一制度，克服当时浓厚存在的个人包办和个人决定重要问题的现象，九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

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陕北转移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合并。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渤海区统一起来，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充实中原局，建立中原军区。以邓小平为中原局书记，陈毅、邓子恢为第二、第三书记。以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邓子恢、张际春为副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下辖七个军区。这一决定加强了南线党政军的统一领导。

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至二十日，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接着，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

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任命了各部、会、院、行、厅的负责人。华北人民政府是解放区最大的一个大区人民政府。它除领导具有五千余万人口的华北地区外，还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统一领导和管理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军事工业等。它是新中国的雏形。它的成立和工作，为全华北的解放和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作出了贡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节 国民党的垂死挣扎 国统区人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各民主党派的 新转折

一 国民党政府的“戡乱总动员”

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危机，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举行的第六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并颁布了“总动员令”。七月七日，蒋介石发表了“戡乱建国”演说。七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此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国民党各省市参议会和所谓“人民团体”纷纷通电表示拥护“戡乱”，并在各地召开“戡乱建国动员大会”。这就是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

蒋介石“总动员”的目的之一，是要他的反革命队伍警觉“覆巢”的严重危机，全力作困兽之斗。他在“七七”演说中哀叹：“在中华华南各大都市，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国家民族的根本危机”，“或侥幸姑息，或苟且偷安”，“丧失了自强自立与独立自主的信心”，无形中成了共产党“精神上的俘虏”。他说，这种情形“真如古语所说，燕雀巢于危幕之下而不自知其危。实际上复巢之下决无完卵”。在这之前，尽管蒋介石早已进行了反革命内战的总动员，但表面上仍然挂着“和平”、“政治解决”的招牌。这时蒋介石亲自宣布“总动员令”，放弃“政治解决”的最后欺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表现。

蒋介石“总动员”的另一目的，就是更疯狂地搜刮国统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残暴地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纲要》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及妨碍征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购征用妨碍征购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等等。

随着“戡乱”令的发布，国民党反动政府到处征粮、抓丁、派款，逮捕与屠杀反内战反饥饿的工人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亲自在南京召集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爱国人士的迫害。十月一个月中，上海、北平、杭州、西安等八个城市，人民被屠杀者达二千一百余人。

在“戡乱”总动员之下，国民党实行了所谓“总体战”。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三月，两次召开苏浙皖赣豫鄂六省“绥靖会议”，决定推行政治经济军事互相配合的“总体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定，蒋军正规军负责“机动”作战，以对付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在地方上，加紧“编组保甲，组训民众”，实行“人必归户，户必归甲”，互具联保连坐切结，并把“户口与自卫均纳入保甲之中”，成立“民众自卫队”；在经济上，对解放军实行封锁。

为了实行“总动员”，蒋介石还对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作了变动。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和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合并党团组织。企图以此加强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自吹这是“中国政治引擎修整的起点”。但是，这项措施除了加深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组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中央委员会（执监委共六百二十五人）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在军事指挥机构上，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九江，统一指挥华中军事并指

导鄂豫皖赣湘五省政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裁撤保定、张家口两绥署，设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一九四八年五月，又正式撤销北平行辕；一九四七年八月，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由东北行辕负政治军事全责。八月二十九日，国民党政府明令陈诚兼行辕主任。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又任命卫立煌为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

国民党反动派欲以上述种种措施，挽救政治孤立、兵力削弱、后方空虚动荡的危殆局面。但是，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九四八年元旦，蒋介石在“训示军民词”中承认：后方各省市“动员还未能实施”，社会民众依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前线国军一直在波动中作战，也一直在孤立中应战，以至一年之间屡受损失，将士牺牲至为惨重”。但是，蒋介石还要自欺欺人，宣称蒋军侵占了延安、烟台，就摧毁了共产党的“政治中心、神经中枢和经济据点”，使共产党在关内“不能立足，亦无法负隅，只得被迫分窜，成为流寇”。他还吹嘘消灭共产党的“有形力量，终可在一年以内完成”，以此给他的喽罗们打气。

二 魏德迈来华“调查” 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新政策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急迫灾祸的迹象”，依照国务卿马歇尔的提议，宣布派魏德迈为特使来华进行所谓“调查”，训令他“即刻前赴中国，就中国现在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情况，作一个估量。……在与中国居负责地位的官员和领袖们讨论时，你要表明你所负的是调查情况的使命，并表明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有效办法以趋向中国元气的恢复，美国政府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再则任何可能提供的援助，必须由美国政府的代表监督的情形下，予以利用”。魏德迈来华的目的是要急谋挽救国民党危局的办法，考虑如何加强美援和发挥美援的效能，以及如何对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

魏德迈使团于七月二十二日到达南京，在听取了国民党首领的报告后，即巡行各战区，进行“视察”。八月中旬回到南京。八月二十二日，魏德迈在国民党政府“国务会议”上演说，他说：“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击败中国共产党，而只有立即改进政治及经济的状况以争取人民群众忠心的、热烈的、至诚的拥护”。“中央政府在共产党猛攻之下能否屹立或倒台，将决定于这种政治与经济状况改进的效率与时机”。魏德迈八月二十四日离开中国时，在南京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除诋毁中国共产党外，还充满了对南京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蔑视与不满之意。他强调“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必须承认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魏德迈还说：中国的“复原须有有感召力的领导和道德、精神的苏生”。魏德迈的话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赶忙诘问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这“是否表示美国想逼他退休或改职”。

见《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三——三 一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七六五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七七 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三 三、八三七页。

魏德迈回到华盛顿后，于九月十九日向杜鲁门提出了一个长达十余万言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一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魏德迈在报告中建议美国继续并扩大其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至少在五年内应给以军事和经济的援助。这种援助要以下列各项为交换条件：（一）国民政府将其援助的请求，告知联合国；（二）国民政府要求联合国促成东北停战，并请求将东北置于联合国监护或托管之下；（三）国民政府应利用本国的资源，改革其财政、行政与军队，政府、军队与经济方面都要延用美国顾问人员。”美帝国主义这个攫取东北并奴役全中国的计划，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迅速前进和全世界反帝力量的强大，而未实现。美国因恐其假联合国之名控制东北的侵略行为激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故将这一报告保持秘密近两年之久。

自魏德迈来华后，美国继续扩大对蒋介石的军火、贷款和物资援助，陆续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救济协定》、《中美海军协定》等侵害中国主权的协定，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职权，从训练国民党军事人员扩大到参加蒋介石的国防部工作和作战计划的制定，其监督权力“在范围上伸展到包括野战军、训练所和后勤部门”。美国顾问的任用扩大到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部门。美国还进一步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并使之正式处于受监督的地位。

美帝国主义在继续援蒋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改革的同时，又策划新的侵略阴谋。其要点是：（一）必要时去掉蒋介石，代之以反动面目尚未完全暴露或一部分人民对其尚保有某些幻想的傀儡；（二）直接培植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在华南或其他边远地区建立反革命据点，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作最后的顽抗；（三）扶植所谓“第三种”政治势力，以代替腐朽透顶的国民党，或指使他们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反对派，以破坏革命；（四）让其他伪装反蒋反内战反独裁的反动军人政客，来进行假和平，以图取得喘息机会，重整兵力，卷土重来。

继八月魏德迈发表离华声明之后，九月，司徒雷登答复美国国务院征询时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李宗仁上将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翌年春，美国支持李宗仁当了副总统。美帝国主义除扶植李宗仁外，还扶植在台湾的孙立人，广东的宋子文，华北的傅作义、阎锡山，西北的马鸿逵，乃至某些著名的蒋系黄埔军人。方式是直接供给他们武器，或支持他们进行各种政治策动。

美帝国主义对“第三种”政治势力的扶植，早在马歇尔“调处”时期即已着手进行。魏德迈“调查”之后，进一步放宽了对自由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选择尺度，以“知识分子大团结”、“新的革命运动”为号召，鼓动他们组成新的第三种势力。

但是，中国革命已接近最后胜利，中国的政局已不允许美国来摆布。因而美国的种种办法和活动，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三 国民党的“行宪国大”和总统选举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八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二九九——三〇〇页。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其中心议题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

这次国大是在国民党军事失败，政治经济发生严重危机的形势下召开的。蒋介石在四月九日的“施政报告”中，竭力给“代表”们打气，声称“黄金白银外汇，政府掌握甚巨，足能挽救经济危机”，军事上“东北必能固守，西北决无问题”，华中共军“必定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要他们“不要自造恐慌”，而要“加强胜利的信心”。

在危机面前，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会前，发生了“代表资格”问题的争斗。原来规定，国大代表由国民党中央和民青两党分别提名，然后经“民选”产生。还规定国民党党员非经中央提名不得当选。但各地未经国民党中央提名而由“选民”签署选出的代表就有六百多名，而原来约定分配给民青两党的名额几乎全被挤掉。会前，国民党中央命令未经“圈定”而当选的国民党党员，把名额让给“圈定”的党员和民青两党。这批非经提名而当选的代表纷纷以“国法”对抗“党纪”，拒不退让。他们组织“民选代表联谊会”向国民党中央请愿。由国民党提名而落选的人也跟着吵闹。天津一个“民选”代表，抬棺材到“国大”会堂。另有十人到会堂绝食，以示抗议。蒋介石亲自出来“训话”也无济于事。三月二十九日晨，派军警和卡车拖走绝食者，拉走棺材，始得开会。

因为各派明争暗斗，选举主席团就用了一星期时间。会场上更是乌烟瘴气，有“呼呼入睡的”，“有养神的，有闲谈的，有吃花生的，女‘代表’有脱鞋弄足的，有梳头的”。会场内嘘叫声打骂声不断，甚至闹到“全场鼎沸，人人离座，拂袖舞拳，大打出手”。蒋介石不得不出面进行训斥。

四月四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表示无意竞选总统，宁愿当行政院长。蒋介石的用意是嫌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四月五日，中常会通过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经过这番安排，蒋介石表示“尊重”和“接受”全会决定。四月十八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蒋介石以紧急处置的权力。四月十九日，举行总统选举，由居正陪选，蒋介石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出席代表二千七百三十四人）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总统。

副总统的选举，集中反映了李宗仁蒋介石（背后是美蒋）之间的矛盾。四月三日，蒋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要李“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则置之不理，并与于右任、程潜建立了竞选联合战线，共同反对“由中央提名”。四月六日，否决了由党提名的做法。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六人为副总统候选人。莫（社会贤达）徐（民社党）二人只是副总统选举的陪衬，为所谓“民主选举”捧捧场而已。竞争是在国民党的李孙程于之间，而主要是李孙之争。

竞选人大肆收买“代表”，贿买选票。李宗仁的竞选费用达一千多根金条（黄金一万多两）。由于竞争激烈，经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四次投票，才选了出来。第一次投票结果，无人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依选举法以得票多的前三名李孙程为候选人。第二次投票结果又无人达到当选票数，依法须进行第三次投票。此时，蒋介石示意程放弃竞选，目的在于支孙压李。当晚程发表声明退出竞选。李宗仁以退为进，也宣

布放弃竞选，以此对蒋进行要挟。四月二十五日，南京各报刊载李程放弃竞选的声明。这使李程的支持者对蒋异常不满，纷纷罢选。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宣布放弃竞选。在这种情况下，伪国大不得不被迫停开。蒋无法，只得疏通李程取消放弃竞选。四月二十八日，伪国大重开，进行第三次选举。第三次投票结果，李孙二人为候选人，进行第四次选举。最后经过四月二十九日的第四次投票，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孙科而当选。当时报刊称竞选副总统是“国大好戏连台中最精采之一幕”。副总统的选举，违反蒋的意旨以李胜孙败告终。

五月十七日，孙科、陈立夫当选为立法院正副院长。五月二十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五月下旬，组成了以翁文灏、顾孟余为正副院长的行政院。同时，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白崇禧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兼华中“剿总”总司令。

四 国统区人民的反蒋和“反美扶日”运动

国民党的“戡乱”令，没有吓倒国统区人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团结一致地展开了争生存、反迫害的斗争。

浙江大学是宁沪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二十九日，被杀害于狱中。国民党造谣说于子三是“用玻璃片自杀的”。逮捕和杀害于子三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学生及教职工的愤怒。学生自治会立刻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并同校方一起设法营救。营救无效，即于二十八日决定罢课三天。浙江区学联发表书面谈话，号召全省学生“团结起来，击破这个恐怖黑暗的时代”。三十一日，浙大教授为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罢教一天。浙大校长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挺身而出，于二十九日晚，前往保安司令部责问于子三惨死经过，并拒绝签署于子三“自杀”的证明。接着，赶到南京向教育部说明事件真相。十一月五日，向记者发表谈话，揭穿反动派的阴谋。

浙大血案引起整个国统区反迫害运动的新高潮。从十一月四日起，北平各大中学校都卷入了罢课的浪潮。六日，北大、清华、中法、燕京、辅仁等校五千多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于子三追悼会。在会上，北京各大学一百六十三位教授也联名发表宣言，表示同情学生的罢课斗争。会后，师生们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独裁政府要垮台要垮台”、“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围绕广场游行示威。天津、昆明、上海、南京、西安、厦门、长沙、武汉等十二个城市的大中学生纷纷举行罢课、示威。总计参加反迫害斗争的学生约十万余人。这是继“五二〇”运动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斗争。

一九四八年初，上海申新棉纺九厂工人，为要求补发被扣的工资和被资本家吞没的配给品以及按生活指数发给年偿而实行罢工。罢工遭到反动军警镇压，打死工人三名，重伤数十名，捕去二百余人，造成“申九血案”。同济大学学生为抗议反动当局大批开除进步同学而罢课。因校方无适当答复，遂决定一月二十九日齐赴南京请愿。当同济大学学生及前来支援的交大、复旦等二十七校代表一千五百余人奔赴北火车站时，遭反动派的马队冲击、践踏，数百人受重伤，数十人失踪，造成“同济血案”。四月，反动派又对上海发电厂工人进行镇压。二十一日，非法逮捕了该厂工会常务理事王孝和，施以种种酷刑，并于九月三十日将他杀害。反动派的暴行，激起学生、工人

及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三月二十九日，上海清寒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会、上海中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上海中等教育研究会等团体，发出按生活指数调整教师待遇的呼吁书。四月十一日，南京中央大学一百多名学生为反迫害反饥饿展开绝食斗争。五月，南京全市大中中学生联合举办盛大的纪念五四宣传周和“五二〇”周年纪念活动。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会后，中大四名学生被特务绑架到国民党青年部拷问。二十二日晨，中大、金大等校学生在青年部门前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将近正午，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也整队赶来。到下午三时，反动当局慑于群众的威力，将被捕同学全部释放。学生们当即在青年部门前举行了“南京市学生反迫害大联防宣誓大会”。他们同声宣誓：“面对独裁统治，无理迫害，我们谨以钢铁一般的意志，组成南京市学生反迫害大联防。今后任何一校、任何一人遭受任何迫害，我们誓与其同患难，共生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平津等地的师生提出了“向政府要饭吃”的口号，掀起了争取公费和挽救教育危机的斗争。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北大、清华、师院、燕京等十所大学为反对国民党当局查禁学联的反动命令，实行总罢课。接着，为争取合理待遇，各大学的讲师助教员工，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北大医院的医师护士，实行了罢教、罢职、罢工、罢研、罢诊，形成震动社会的六罢。四月八日北平警备司令部派军警宪特包围了北大，指名逮捕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等十二名学生。北大同学立刻拥聚民主广场，把十二名同学围护在中间，使反动派未能把人抓走。当日深夜，国民党特务手持铁棒突袭师院学生宿舍，打伤学生二人，逮捕七人。九日上午师院八百多名学生和许多教授教师集会，声讨反动派的罪行，并列队到北平行辕请愿。午后三时许，师院及前来支援的北大、清华、燕京等院校师生六千余人在新华门前召开大会，提出立即释放被捕同学，撤销查禁学联和传讯北大十二名学生的命令等要求。反动当局慑于学生们团结斗争的威力，只好将师院被捕同学释放。三个月后，北平又发生了“七五血案”。数万被国民党骗进关内的东北学生，吃住无着，无书可读。北平市参议会还决定对他们实行“军事训练”。七月五日，五千多被激怒的学生欲找市参议会议长讲理，当他们列队到达东交民巷时，遭到预伏的青年军二八八师的机枪扫射。事后查明，这次大屠杀中，知名姓者死亡九人，重伤三十八人，轻伤一百余人。

国统区人民反迫害反饥饿斗争方兴未艾，五、六月间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

在一九四七年秋，我国学者即注意到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问题，在上海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从一九四八年春起，“反美扶日”成为国统区人民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五月四日，上海一百二十所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在交大集会，发起组织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复兴、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通电全国，呼吁反对美国扶日。五月二十二日，发起十万人反美扶日签名运动。之后，反美扶日运动迅速扩大，各地学生、教授、文化人、工商业者都加入了斗争行列。六月，各界人士二百八十二人联名发表《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许多素来倾向保守的舆论机关和政治人物，甚至包括某些属于国民党的机关和人物在内，也对美国明目张胆的扶日政策表示异议。

在各阶层人民的严正抗议中，美蒋反动派凶相毕露。六月四日，司徒雷

登在南京招待记者，直接发表干涉中国人民革命的声明。他搬出“防共”理论为美国扶日的反动政策辩护，并对中国人民威吓说：“倘抗议运动‘仍继续进行，可能招致不幸之结果’”。国民党政府第二天即发表了遏制反美扶日斗争的声明，出动大批军警，破坏和阻止反美扶日集会与示威游行，逮捕和殴打爱国学生。《中央日报》叫嚣要对爱国运动“操刀一割”，“斩草除根”。国民党反动派还以所谓“显系‘共匪军事间谍职业学生’所策动主持”，来恫吓爱国的学生运动，为逮捕迫害爱国学生制造借口。但是，学生和其他阶层人民对美蒋反动派的回答是更大的愤怒，更辛辣的嘲笑，和运动的更加深入与扩大。六月五日，上海大中学校五千人汇集外滩举行游行示威，在美国驻华海军司令部及美国上海总领事馆门前高唱反美扶日歌曲，高呼“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反对美国干涉爱国运动”等口号，并散发传单。天津、南京、杭州、福州、重庆、成都、西安、长沙、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先后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各界社会人士也奋起投入运动。在北平有四百三十七位大学教师向司徒雷登发出抗议书，在南京上海有社会名流大学教授三百七十人发出对美抗议书。香港的同胞及留港人士也成立了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决定唤起国内外同胞一致反对美国扶日，制止日货倾销。学生和各界人士对司徒雷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谰言进行了严正的驳斥。被司徒雷登长期认作自己的政治资本的燕京大学师生，这次面对面地斥责了他的谬论。美帝国主义曾声称“受惠”于美国救济的中国人民无权反对美国的政策。为此许多人拒绝接受美国的“救济物资”。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金岳霖、张奚若、吴晗等百余人发表声明，“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气节，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并拒购美援平价面粉，退还配给证。

轰轰烈烈的“反美扶日”运动，进一步孤立了美蒋反动派，有力地教育和团结了人民群众，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社论《爱国运动的新高潮》中指出：“在今天的中国，不但下层人民因为胜利在望而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自我牺牲，而且颇为广大的中间阶层，也表现了类似的信心和勇气。……这个普遍的信心证明：革命高潮不独是在解放区存在，即在蒋管区人民中也同时存在，这正是革命临近胜利的象征”。

五 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

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和对其他民主党派的迫害，宣告了“中间路线”的破产。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代表中间阶层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步认识了美蒋的反动面目，放弃了对蒋介石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初，民主党派又重新结合起来，开展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活动。

早在一九四六年春，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龙云等即在重庆筹商组织反蒋团体。一九四七年二月李济深抵香港，同蔡廷锴一起定出反蒋纲领。同年秋，李济深等加紧了组党活动。李派朱蕴山赴内地联络。何香凝、李济深写信与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要他们赴港商谈。彭泽民、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李济深联名发出《上孙夫人书》，请宋庆

龄出面领导。十一月十二日，李济深、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谭平山、郭春涛、陈铭枢为首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和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等，联合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民主分子，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联席会议，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民革发表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正式宣告成立。民革的主要主张是：（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助长内战的政策；（二）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三）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的联合政府。这是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和民主分子的联合体，作为民革组成部分的民促、民联仍然单独存在，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为止。

民盟遭到镇压之后，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赴香港，坚持反蒋斗争。他们同在香港的邓初民等一起，团结了一部分中委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十九日，召开了民盟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严正地“否认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内务部发言人于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劫持和威力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等声明”，宣布重建领导机构，恢复活动。并确定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的新方针。会议还通过了《三中全会宣言》和《政治报告》。《宣言》总结了民盟成立以来的斗争经验和走过的道路，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欲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已不可能由谈判妥协中求之。我们必须粉碎一个独裁反动贪污腐化的政权，才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廉洁有效能的新政权”。提出了反对美帝援蒋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同时提出欢迎一切民主党派的合作，表示要“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宣言》认为：“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公开声明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在一月十九日通过的政治报告中再一次强调由于蒋介石破坏了“政协道路”，“关闭了和平大门”，“一切以合法公开的方式来争取民主的工作已经无法进行”，“以协商妥协方式不能求得民主和平，而必须采取人民的革命斗争以积极争取民主和平”。同时指出蒋介石集团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再次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批判了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和十四日，民盟先后在香港招待记者和民主人士，会上沈钧儒宣布民盟总部已移到香港，其新的政治路线和目标是“消灭反民主反和平的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真民主真和平的新中国”，“积极支持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武装”。他再次批判了“中间路线”，认为民盟的路线以前没有“落地生根”，这一次才是“落地生根”了。

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发表了评论，表示欢迎，并愿“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指出他们的活动表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

所公认的唯一道路”。

民盟遭迫害时，民主建国会的上层分子发生分化。进步分子转入地下，组织了一个十四人的委员会为领导核心，坚持民主斗争。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表后，黄炎培等进一步认清了前途，向共产党靠拢。其他民主党派也都在白色恐怖下在内地和香港坚持反蒋斗争。

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各民主党派政治上新的进步。这是中国人民的大革命日益接近胜利的表现。

六 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和民主党派的响应

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九四八年春，筹建全国人民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一号召不但获得了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也获得了中间阶层的热烈拥护。五月五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李济深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郭沫若（无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号召，通电国内外，号召国人共策进行。通电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同一天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表示“大计亟宜早定”。自此，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个新政协运动，先后发表宣言或声明，积极“为结束独裁统治，实现人民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六月十四日，民盟为展开新政协运动发表的声明中说：“时至今日，独裁统治的行将倾覆，中国人民的民主胜利，已经成了定局”。“在这种形势之下，结束独裁混乱的旧中国，创建民主和平的新中国，其唯一途径，我们认为仍旧只有走本盟一向主张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以实现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八月一日，毛泽东电复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对他们“赞同”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极为钦佩”。

自一九四八年八月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离开香港和南方大城市，浮海北上，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见《东北日报》，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

第三节 伟大的战略决战 国统区经济的崩溃 国民党的“和平攻势”

一 解放战争第三年度开始时的战局和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经过两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余人，人民解放军同蒋军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人民解放军已增至二百八十八万人，其中正规军一百四十九万人。军政素质和战术技术水平亦大为提高。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炮兵和工兵，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开封、四平城市的作战中掌握了攻坚战术；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已经基本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游击部队三者结合的完整体系。有了五支大的野战部队：西北五个纵队七万人，华北三个兵团十一个纵队二十万人，中原七个纵队二十万人，华东三个兵团十六个纵队四十二万人，东北十四个纵队七十万人。

蒋军已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一百九十八万人。用于第一线（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东，承德和长春之线以南）者一百七十四万余人。蒋军虽然还有相当大的兵力，精锐尚存，但在战略上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分割为五个孤立集团：东北“剿总”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师约五十五万人，分布于长、沈、锦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路上的锦榆段作为与关内联系的通路。总司令卫立煌坐镇沈阳，副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分守长春、锦州。华北“剿总”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四十四师约五十五万人，分布于平绥北宁线上的归绥、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山海关诸点。北平南北只有保定、承德。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北平。徐州“剿总”四个兵团四个绥区二十七军六十一师约六十万，分布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两路十字架上。总司令刘峙，坐镇徐州。华中“剿总”七十五万人，分布于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总司令白崇禧。西北胡宗南集团三十万人，分布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带。

上述战局及敌我力量对比表明，人民解放军同蒋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能否把握战机，敢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成了战略决策上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综观战争全局，果断地作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英明决策。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全面部署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各项工作，向全军发布了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五百万解放军的战略规划；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度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同时决定将战略决战的初战放在东北战场。

蒋介石集团也在谋求出路。一九四七年冬，美帝国主义向蒋介石建议暂时放弃北纬四十度以北，力争三十五度以北，坚守三十度以北，经营三十度以南。此计未被蒋全部采纳。一九四八年初，蒋军内部开始争论东北撤守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八月四日，国民党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决定实行“重点防御”，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指导方针。实际上仍是举棋不定。八月二十五日，南京国防部根据蒋介石的意图拟定了打通沈阳南北交通的计划，卫立煌不同意。九月十一日，廖耀湘又提出由沈阳经营口撤退（锦州兵力用于沈阳并接应长春部队回沈阳）的计划，十四日，被蒋批准。但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已开始，蒋军已来不及行动了。

中共中央决定将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这是因为在全国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对人民解放军最有利。第一，在兵力对比上解放军占优势。正规军七十万，地方军三十万，合计百万人，是全国五大战场上兵力超过蒋军的唯一战场。第二，东北敌军孤立分散，态势突出，所占地区十分狭小，补给非常困难。而且敌军战略意图或撤或守，正处于举棋不定状态。第三，解放军后方巩固，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雄厚。由于这些条件，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的卫立煌集团，就可将初战的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挥师入关，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如果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就会受到敌华北东北两大集团的夹击而陷入被动；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又会使东北敌军迅速撤退，实现其战略收缩企图。因此，首先打好东北战场的决战，就成了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

二 辽沈战役

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东北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进行了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

战役发起之前，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主攻方向应指向北宁线，“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这个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是东北战场作战的正确方针。军委电报还指出“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打下锦州，才能确实控制北宁线，封闭蒋军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置敌于死地；攻打锦州，才能把龟缩在几个要点不大好打之敌，调出来变成比较好打之敌，实现攻锦打援。这样做“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

当时，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不敢南下到敌人侧后作战，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他坚持要把主力留在北线打长春。经毛泽东多次指正后，林彪才执行南下北宁线的命令。

九月十日，东北野战军作了南下北宁线的部署：以一个纵队和九个独立师围困长春；以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南下北宁线；以三个纵队配置于沈阳以西黑山、大虎山地区，以两个纵队置于沈阳以北地区，共同对付沈阳之敌，并阻止长春敌人突围。

为了保证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华北野战军二、三兵团于九月十四日，发起察绥战役。命令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进行的济南战役，是全国整个战略决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歼敌十一万余人（内包括蒋军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两万人起义），生擒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这一战役的胜利，切断了蒋军华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的陆上联系，既配合了辽沈战役的进行，又为尔后

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这一战役所创造的“攻济打援”战法（七个纵队攻城，八个纵队打援，即打援部队多于攻城部队）也为淮海战役所效法。

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突然奔袭北宁线，连克昌黎、滦县、北戴河、绥中、义县，至十月一日，完全切断了华北蒋军从陆上增援东北的道路，并孤立、包围了锦州、锦西、山海关。蒋军原以为解放军会先攻长春，当发现解放军在锦 347 州城下展开时，蒋介石于九月三十日、十月二日，接连飞到北平沈阳，亲自决定以锦西、葫芦岛的四个师及由华北海运来的五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以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沿铁路东进。以沈阳主力五个军十一个师及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西进援锦。该路蒋军不敢直接援锦，却进至彰武一带，妄图以威胁解放军后方的取巧办法，引诱解放军回援，以达解锦州之围的目的。十月十日，两路敌军开始东西对进援锦。东北野战军预先配置于锦州西南塔山、高桥地区的两个纵队，顽强阻击东进之敌，使进攻塔山之敌轮番攻击六昼夜，都不能前进一步。廖兵团被东北野战军三个纵队钳制在彰武、新立屯一带。

从十月九日起，东北野战军经五昼夜战斗，扫清了锦州外围据点。十月十四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三十一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俘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以下十万余人，解放锦州。在解放军的威慑与争取下，蒋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二万六千余人于十七日起义，其余守军在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下于十九日投降，长春遂告解放。

锦州的攻克和长春的解放，使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但蒋介石仍梦想以廖兵团与锦西葫芦岛敌军东西对进，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联络。为此，蒋介石又增调一个旅加强廖兵团，严令其由彰武一带继续向锦州前进。同时，以沈阳的五十二军沿中长路南下抢占营口，企图取得由海上逃窜的退路。解放军一部在黑山大虎山以北进行阻击。主力从二十日夜起由锦州地区秘密迅速向东北方面回师，于二十六日将行进中的廖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及其以东地区，经两天一夜的激战，至二十八日晨，全歼该敌十万余人并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

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歼灭廖耀湘兵团后，立即向沈阳营口前进，十一月二日，解放了沈阳营口，再歼敌十四万九千余人。敌五十二军军部、一个师部及三个团从营口海上逃跑。十一月八日，锦西、葫芦岛之敌亦随杜聿明逃走。

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六、八、九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六个正规师，连同非正规师及其他游杂武装，共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了解放。

从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一月，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包括辽沈战役）共歼敌一百万人。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军队下降到二百九十万人左右，解放军则增至三百余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了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了优势。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起，人民解放军进行统一编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各大战略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部队；将野战军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大野战军。一九四九年初又依次编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三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下辖第三兵团（陈锡联、谢富治）、第四兵团（陈赓）、第五兵团（杨勇、苏振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下辖第七兵团（王建安、谭启龙）、第八兵团（陈士榘、袁仲贤）、第九兵团（宋时轮、郭化若）、第十兵团（叶飞、韦国清）。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一政委罗荣桓，第二政委邓子恢，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肖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下辖第十二兵团（肖劲光）、第十三兵团（程子华、肖华）、第十四兵团（刘亚楼、莫文骅）、第十五兵团（邓华、赖传珠）、特种兵司令部（万毅、钟赤兵）。解放军总部直辖第十八兵团（徐向前）、十九兵团（杨得志、罗瑞卿）、二十兵团（杨成武、李井泉）、铁道兵团（滕代远、吕正操）。还划分若干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为西北军区，贺龙、习仲勋分任司令员和政委。

三 淮海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和军区部队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邱，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内，同八十万蒋军进行了淮海战役，取得了南线决战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的完整作战方案，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逐步形成的，是两大野战军前线指挥员高度的主动性与毛泽东善于集中集体智慧的英明领导相结合的产物。九月二十四日，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由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拟兵出徐（州）海（州）线，打两淮和海州。中央军委同意这一建议，同时针对蒋军刘峙集团采取的一点两线的部署及重兵密集便于机动的特点，确定华东野战军以歼灭黄伯韬兵团和钳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为作战目标。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再次强调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歼灭黄伯韬兵团，打掉刘峙集团的右翼劲旅，将徐州敌人肢离体解，然后转用兵力予以各个歼灭。同时强调必须以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邱李兵团的东援，这是保证歼灭黄兵团的关键。毛泽东还指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中原野战军攻击郑（州）徐（州）线，牵制孙元良兵团，配合华东野战军在徐东的歼黄战斗。十月底十一月初，在华东指挥作战的粟裕，指挥中原野战军攻击郑徐线的陈毅、邓小平。在豫西牵制张淦、黄维两兵团的刘伯承、邓子恢、李达，不约而同地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截断徐（州）蚌（埠）线的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博采众议，于十一月九日、十日果断地发出了“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和迅速攻克宿县控制徐蚌线断敌退路的指示。至此，一个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南线决战方案正式形成了。

十一月六日淮海战役开始。华东野战军从临（沂）邳（县）线分三路南下，向黄伯韬兵团发起攻击。以十个纵队向新安镇方面实施主要突击；以三个纵队经徐州东北的贾汪地区向徐州东侧的曹八集方向实施辅助突击，割裂黄与徐州的联系，并阻击徐敌东援；另以三个纵队经新安镇之东，南下宿迁睢宁，迂回黄伯韬兵团南侧。黄伯韬闻解放军大军出动，仓惶西逃，企图靠拢徐州。解放军飞兵前进，勇猛追击。十一月八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二万三千余人在贾汪台儿庄一线起义。解放军当即穿过该部防地，直插徐州东侧。九日，黄伯韬部刚逃到运河西岸，即遭解放军迎头堵击。解放军主力追击部队也迅速渡过运河，于十一日将黄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二十二日将其全部歼灭。蒋介石嫡系第七兵团、四个军及其指挥下的第九绥区一个军共十个师十万人全部覆灭。黄伯韬被击毙。

黄兵团被包围后，蒋介石命令刘峙杜聿明以邱李两兵团的五个军，沿陇海路两侧向东增援。同时令孙元良兵团由宿县调防徐州。令平汉线上的黄维兵团迅速向徐州宿县一线前进。为保障全歼黄伯韬，解放军徐州东侧阻援部队八个纵队顽强抗击邱李兵团。到黄伯韬所部被围歼时，邱李兵团虽然付出了万余人的重大代价，但仍被阻于离碾庄地区五十余华里的地带。同时，中原野战军于十一月十六日，攻克了宿县，切断了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敌人的战略包围，并将由确山方向来援之黄维兵团迎头阻击于浍河上游以南地区。这时，中央军委为统筹领导，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委以“临机处置一切”的权力。中共中央还责成华东中原华北三大区全力组织支援。

蒋介石眼看着黄伯韬全军覆灭，无可奈何，只有哀叹。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给刘峙杜聿明的电报中说：“查此次徐州会战，我东进各兵团行动迟缓，未能彻底奉行命令，致陷友军于覆灭，实有失军人武德”。“此次作战共消耗各种炮弹十二万余发，而我军每日进展尚不及一公里。如此消耗浪费，亦我革命军人之奇耻大辱。”

黄伯韬兵团被歼后，徐州守敌恐慌万分，迅速将邱李孙三个兵团紧缩于徐州，加强防御。南线李延年兵团遭到严重打击，迟迟不敢北进。这时黄维兵团已进入中野预设的“口袋”中。毛泽东根据战局发展的有利形势，决定采取南北堵中间围歼的方针，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围歼黄维兵团。为了防止在黄维兵团被围以后，徐州敌人倾巢南逃。毛泽东重申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方针，指示总前委要对此作出妥善的部署。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原野战军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合围。二十七日，黄维调动四个主力师，企图向南突围。敌师长廖运周率部五千多人举行战场起义，其余敌人在解放军打击下缩了回去。至二十九日，敌反复突围未能得逞，被压缩到方圆十多里的地区以内。

蒋介石为了援救黄维兵团，令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由徐州南下，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由蚌埠北上。但在解放军阻击下，均未达到目的。蒋介石看到援救不成，黄维兵团有被全歼的危险，于是召杜聿明到南京面授机宜，决定避开解放军津浦路防御正面，从徐州西南绕道南下。同时令刘峙飞返蚌埠，另组指挥所，督刘李兵团再次北进。蒋介石企图使其军队南北对进，攻击中原解放军侧背，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合伙南逃。

十二月一日，杜聿明率邱李孙三兵团共二十七万人马，弃守徐州，向西南逃跑。华东野战军经三天猛烈追击，在十二月四日，将杜部三个兵团全部

合围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企图突围，被全歼。

为了加速战役进程，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采取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围住杜聿明部，阻住李延年部的方针，即刘伯承司令员通俗解释的“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方针。

十二月六日，中原解放军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至十五日，被困十九天的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被生俘。这是对蒋介石又一致命打击。这不仅使蒋介石丧失了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在内的十二万精锐之师，而且也完全孤立了杜聿明集团，造成了解放军迅速全歼杜部的大好形势。

人民解放军在歼灭黄维兵团后，毛泽东指示总前委，为配合平津战役，使蒋介石暂不下海运平津诸敌南下的决心，对杜聿明残部两星期内不进行最后歼灭，进行战场休整。杜聿明所部被围困期间，断草绝粮，饥寒交加，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到一九四九年初，平津诸敌已无逃跑可能。华东野战军主力遂于一月六日，向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四天战斗，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俘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击毙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逃脱。至此，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全部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六十五天，总共歼灭国民党军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共五十五万五千人。至此，人民解放军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四 平津战役

在淮海战役鏖战之际，东北野战军八十万人和华北两个兵团二十万人，协同发起了平津战役。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作战。

战役开始前，华北敌军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震撼下，已成惊弓之鸟。蒋介石为了摆脱彻底灭亡的危局，一方面企图利用华北集团原地固守，迟滞解放军南下，以争取时间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将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淮海残敌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华北敌军主力为了免遭覆灭，也有西窜绥远，据守一隅，苟延残喘的企图。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月上旬，蒋介石和傅作义在南京军事会议上确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傅作义依据这个方针，不断收缩兵力，调整部署。他把蒋介石的嫡系二十四个师部署在平、津、唐三角地区。把自己的二十个师放在北平张家口之间。随时准备从海上南逃或西窜。因此，能否稳住敌人，不使它南逃西窜，不让它收缩集中，就成为能否全歼平津张唐之敌的关键。据此，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了稳住敌人，不使逃跑，分割包围，就地全歼的战略计划。毛泽东利用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会迅速入关的错误估计，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后，迅速秘密入关，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其决策逃跑，中共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麻痹敌人的措施，如命令华北二十兵团撤离归绥，集结于集宁地区；命令十八兵团缓攻太原；对杜聿明残部“两星期内不

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同时，决定利用傅作义派人与解放军谈判以拖延时间之机，将计就计，用谈判拖住敌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广大指战员不顾疲劳，连续行军半个月至二十天，分别从喜峰口、冷口、山海关入关，十二月二十日前，八十万大军全部进抵平津前线，东北十五万民工随军入关。

十一月二十九日，平津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首先分割包围，断敌逃路。华北二十兵团包围了张家口之敌。十二月八日，十九兵团将傅部主力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地区，东北野战军一部将敌十六军主力围歼于康庄、镇边城一带。十一日，由怀来向南突围的暂三军也被歼于横岭、白羊城。至此，人民解放军将傅部主力七个师两个骑兵旅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两地，切断并控制了平绥路，敌人西窜之路断绝。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指出：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稳住敌人，他命令西线解放军对张、新二处暂取“围而不打”方针；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尽快入关，并对平津诸敌实施“隔而不围”的办法，割断诸敌联系，完成战略包围；命令山东军区部队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预作准备，以防敌人向青岛逃跑。

从十二月十二日起，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主力以神速动作，出敌意外地提前完成了对平津塘敌人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这样，到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完全斩断了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敌人已无逃跑之路。

在战役的最后部署完成之后，人民解放军即遵照毛泽东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的指示，对被围被隔之敌实行各个歼灭。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将新保安之敌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一举歼灭。二十四日解放了张家口，全歼敌十一兵团所属的一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四千余人。为了控制海口，切断和封闭敌人的退路，进一步孤立北平之敌，人民解放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由于该处地形不利于作战，因此，改为首先歼灭天津之敌。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在肃清天津外围据点完成攻城准备后，向敌发出了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城市及二百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劝告，令其先头部队至迟于一月十三日开出城外。但是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和平解决。人民解放军于一月十四日发起总攻，经二十九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活捉陈长捷。十五日下午，天津宣告解放。十六日塘沽敌人乘舰南逃，人民解放军追歼其掩护部队三千余人，于十七日解放塘沽。

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解放后，百万解放军云集北平周围。北平敌二十五个师二十余万人已成囊中之物。准备攻城的人民解放军与北平地下党相配合，精确掌握敌情变化，加紧进行政治攻势，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由张东荪引导出城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天津解放后，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函傅作义，向其指明两条出路，任其选择：“（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

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十二时止”。这件函札于一月十六日面交傅部代表邓宝珊和周北峰。一月十九日，北平民间十一个代表（包括何思源、吕复等）又出城与解放军联络。此时，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傅部双方协议在过渡期间内成立以叶剑英为主任的七人联合办事处（解放军四人，傅部三人）。一月二十一日，傅作义接受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的八项条件，愿意和平改编。二十二日，傅作义的文告经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这样，人民解放军以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迫使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傅部军队从一月二十二日开始，按照指定地点开出城外，至三十一日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于三十一日入城接防。同日，平津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发出通告，宣布约法八章。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宣告成立。二月三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这一战役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余人。

总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共歼敌一百七十三个师，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整个东北完全解放。华北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安阳、归绥等几个孤立据点外，全部解放。中国人民大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要到来了。

五 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崩溃

国民党军事政治走向土崩瓦解的同时，国统区财政经济也陷入了总崩溃的绝境。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发行额，至八月二十一日 357 止，已达六百六十三万六千九百四十六亿元，较一九三七年六月增发了四十七万余倍。法币与美钞的比价不断下降，一月为一十七万八千元比一元，八月即为一千一百零八万八千元比一元。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如以米计算，上海每市担白米，一月值法币一百五十万元，五月值五百八十万元，八月值六千五百万元。上海批发物价一至八月上涨了五十倍至一百倍。如以八月份物价同一九三七年一至六月平均物价相比，上涨了五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倍。法币的价值已贬低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

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美货倾销和官僚资本的吞并以及繁重的捐税，使民族工商业纷纷停产或倒闭。一九四八年，上海三千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天津市共有布机八千八百六十七台，开工的只有四千八百六十七台。六十三家橡胶企业，上半年只能发挥生产能力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下半年绝大部分停工。青岛一千余家工厂，只有四分之一处于半开工状态，其余全都停工。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一千余家机器工厂开工的不到一百家。民营工厂如此，四大家族的“国营”工业也是一蹶不振。由于普遍的停工减产或倒闭，工业总产量急剧下降。一九四九年与一九三六年相比，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全国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原煤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发电量四十三亿一千万度，棉纱一百八十万件。

农村破产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一九四八年，土地抛荒面积在河南、湖南、广东等省中，分别占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各地耕畜减少了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主要农具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一九四九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六千万斤，较一九三六年降低百分之二十四以上。棉花产量八亿九千万斤，较一九三六年降低百分之四十七以上。

蒋介石为了挽救财政经济的崩溃，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颁布了所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挽救办法，其办法的要点是：（一）发行总额为二十亿元的金元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元券一元的比价收兑法币。（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一律没收。（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这是对人民财产的再一次大洗劫。蒋介石在全国设上海、广州、天津等若干管理区，派俞鸿钧、蒋经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以特务、警察、特种刑事法庭等法西斯暴力手段进行这次掠夺。国民党报纸公然叫嚣要借“一二颗人头祭刀”，“刑乱世用重典”。

在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国民党疯狂地进行勒索追逼，劫夺金银外汇。他们选择联合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为进行恫吓的对象，指使特务主办的《大众夜报》攻击该行总经理逃避外汇。国民党声称要将其送交“特种刑事法庭”。在这种威逼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银行忍痛于九月十日左右，将所存金银外汇造表送中央银行。国民党在全国掠夺的金银外汇，据翁文灏一九四八年十月向伪立法院的报告，共值美金两亿元。

蒋介石同时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进行武力劫持，迫使他们按“限价”抛售物资，支持金元券。反动派拘捕申新纱厂的荣鸿元、永安纱厂的郭棣活，要他们具结照平价出售商品。拘捕纸业、杂粮油饼业、糖业等公会理事长作人质，压迫这些行业按“平价”出售商品。自金元券发行到十一月初“限价”取消，永利公司“限价”出售纯碱六万袋，损失一百万美元。上海纱厂“限价”出售棉纱五万件，棉布十万匹，损失达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百货业存货照“限价”售出四分之三，上海四大公司除永安外，存货一空。绸布商在金元券发行前存有绸缎呢绒一百五十万匹，一个月后出售殆尽。蒋介石为了劫夺侨汇，还对未按官价经营侨汇的公司行号进行打击。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因此被捕，于九月二十五日被特刑庭判处死刑。

但是，蒋介石采取的这些残暴措施，挽救不了国民党的财政经济危机。蒋介石“借人头平物价”、依靠武力劫持工商业所造成的“平价”局面，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就开始崩溃。十月二日，上海首先发生抢购风潮，市民见物即买，尽量将金元券花出去，深恐一夜之间币值大跌致受损失。南京路一带的著名绸布号和河南路的呢绒店，开门后人群潮涌而入，满架货物，顷刻抢购一空。百货店的营业额较平日要增加三、四倍，使上海成了物资的“真空”地带，这个抢购风潮从黄浦滩头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天津“百分之九十九的货架都空空如也”。北平“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十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抢米风潮。上海抢米风潮，一天达二十七起之多。米荒使上海的各

种机构陷于瘫痪之中。商店的货物卖掉了，补不进货。工厂因补不进原料，纷纷宣告停工停产。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迫于十一月十日宣告取消“限价”，接着又公布了《修改金元券发行办法》，宣布金元券贬值十倍，并撤销金元券发行二十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元券的发行便如决堤洪水，无边无际地泛滥起来。十一月发行量为三十三亿九千四百万元，十二月为八十三亿二千万万元，一九四九年一月猛增到二百零八亿二千二百万元。五月又猛增至六十七万九千四百五十八亿元。金元券也同法币一样变成了废纸。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一天之内金元券贬值百分之四十。黄金每两与金元券的比价达到一比七百五十万元，美金一元与金元券比价达到一比十四万八千元。与上年八月比较，上涨了三万七千倍以上。这期间，物价上涨也达到惊人地步。如以一九四八年八月物价总指数为准，十一月，上涨二十五倍，十二月为三十五倍，一九四九年一月为一百二十八倍。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份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物价与一九三七年比，上涨了三万六千八百零七亿倍。各地人民群众纷纷拒用金元券。国民党政府用发行金元券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完全破产。国统区经济的总崩溃促进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灭亡。

六 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 蒋介石“和平攻势”的破产

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看到单靠军事斗争已不能阻止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他们就更加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他们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企图以此保持国民党的残余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取得喘息时间，然后重整旗鼓，进行反攻；另一方面利用某些既同美蒋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无可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挽救危局。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公开化了。十月二十三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提出了“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的建议，马歇尔答复说：“美国政府不能自居于劝告蒋委员长退休的地位，或推荐任何中国人作中国政府的元首。如果提供了这类意见，就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自然而然地将使美国政府不顾美国的切身利益如何，必须支持这个继承的政权”。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必须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十一月九日，蒋介石致函杜鲁门，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同时要美国公开发表一个支持蒋介石的声明，以便“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十二日，杜鲁门复函予以拒绝。十一月底，宋美龄赴美求援，亦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他派张群、张治中等与李宗仁洽商。桂系军阀白崇禧抢先打出了“和谈”的旗号。十二月二十四日，白电蒋，建议“请美、英、苏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

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十二月三十日，白再电蒋重申前意。与此同时，湖北省参议会和河南省主席张轸均电蒋，要求他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寻取途径，恢复和谈”。这些情况表明，在“战既不易，和亦困难”的局面下，蒋桂都在策划着“摆脱困境，创造新机”的和谈阴谋，而他们之间的矛盾正在表面化。桂系力图乘机逼蒋下野，取而代之。

在这期间，一些号称“自由主义人士”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分子，害怕革命进一步发展将会触犯自己的利益，积极配合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向中国共产党“呼吁和平”。他们劝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战争“立即停下来”，替国家“保留一点元气”。说什么诉诸于武力是“不仁也不智的冒险”，不管胜也罢，败也罢，“同一祖宗的子孙，穷兵黩武总要不得，总不应该”。有的人幻想依靠美国支持发展“第三种势力”。也有人要乘机在东南发展军事力量，造成与国共三分天下的局面。在人民阵营中有少数人，他们往往“以协调为上德，以姑息为宽仁，在苟且偷安的本质之上，披负着悲天悯人的外衣。这就是敌人施行和平攻势的最后心理根据，也是敌人的最大的奥援”。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是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听信反动派的“和平”谎言，就此止步，使革命半途而废？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及时而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针对敌人的政治阴谋，毛泽东提醒全国人民必须善于分清敌友，决不能容许敌人混入革命阵营，从内部破坏革命，指出：“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毛泽东着重指出：“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与这个献词发表的同一天，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亲自出面“求和”了。他在《新年文告》中声称愿意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必须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为条件。还说“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个表示要“和谈”、“引退”的虚伪声明，是蒋介石在美国压力和桂系逼迫下不得已而做出的，也是为了从桂系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主动权。蒋介石文告的核心是保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权。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所谓“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蒋介石所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二一页，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版。

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有把握，在不要很长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的声明，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对蒋介石是致命的打击，使他不得不于一月二十一日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南京飞往奉化溪口，把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蒋介石的下野表明反动派“和平攻势”头一回合的破产，此后便由李宗仁出面“备战言和”了。

第四节 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论争

一 革命的新闻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的发展 文艺界对“主观论”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教育和社会科学事业，密切配合了人民革命斗争的进行，并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而不断发展。

新闻事业方面，抗战时期创刊的报刊继续出版，并创办了一些新的刊物。《解放日报》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出了最后一期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东北日报》创刊。十二月，苏皖解放区出版《新华日报》华中版。一九四六年五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出版《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它同《晋察冀日报》合并，于六月十五日创刊了华北地区统一的报纸《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二月，出北平版。它实际上代替了《解放日报》，起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地方及专业报刊大量增加。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不完全统计，共有中央及地方各种报纸二百六十三种，各种杂志一百一十四种。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群众》半月刊继续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停刊。《群众》杂志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迁至上海，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后，移至香港继续出版。由于国民党的迫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另一刊物《文萃》周刊改为丛刊形式，秘密在上海出版，至一九四七年七月，由于负责该刊的共产党人被捕才停刊。这些刊物，尽管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绞杀，但它们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揭露美蒋内战阴谋，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教育事业方面，各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有发展，尤其是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据一九四七年初统计，东北、晋冀鲁豫、山东、陕甘宁解放区共有大学七所，学生一万二千余人。中学二百一十所，学生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人。小学八万七千八百九十八所，学生四百八十五万三千零七十九人。一九四八年，东北解放区共有小学一万七千七百多所，学生达一百六十八万八千人。中学一百四十五所，学生达六万余人。

在解放区，几乎村村有小学，每个区（县以下单位）有一所或几所中心完全小学。中小学都实行“教学做合一”，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同时加强政治教育，引导师生参加土地改革和支前活动。学生在学校中既有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积极性，又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高度的政治热情。在社会教育方面，如不脱离生产的民众小学、冬学、识字班和读报组等更是普遍。山东解放区一九四六年有这样的小学二万三千七百多处，学生一百三十五万余人。

在高等教育方面，陕甘宁边区有延安大学，是培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干部的学校。全校有三院一系，即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及医学系。东北解放区有大学四所，是各解放区中大学最多的地方。东北大学一九四六年三月在安东开课，有教职员五百人，学生近二千人。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一九四五年冬在张家口复校。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邢台成立。随着华北解放区的扩大和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一九四八年八月在石家庄附近的正定，正式由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

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由吴玉章和范文澜、成仿吾分任正副校长。其主要任务是吸收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学生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为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干部，全校共分四个部，八个研究室。此外还附设农学院、工学院等。一九四九年初，在河南开办了中原大学。这些大学的开设，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后办大学教育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社会科学战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了一批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的教学与研究人员。他们曾分别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同一切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文化作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制造舆论，培养干部，教育人民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对哲学和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一九四九年秋天，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北平纷纷成立研究会或学会筹备会，加强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的团结，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除毛泽东的著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外，还出现了一些政治历史方面的著作。如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及直接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论著《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许多历史学家，在参加革命斗争活动的同时，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吴晗等都有论著问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九四八年由华北新华书店出修订版。它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比较完整的中国通史。他的另一著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一九四七年二月华北新华书店修订出版，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八分册。一九四九年修订重版），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创性著作，它显然影响了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出版了第一、二卷，在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他继续撰写该书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史）。他写的《孙皓的末日》、《评南北朝的幻想》等文章，在反蒋的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场文艺思想上的论争，即对胡风等人的“主观论”的讨论和批评。

一九四五年一月，由胡风主编在重庆出刊的《希望》第一期上，刊登了舒芜的长达四万余字的《论主观》一文。胡风在《编后记》中为该文写了如下的按语：“《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并要读者认真阅读，而且要“无情地参加讨论”。同期还刊登了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的论文。以后在胡风等人办的《希望》、《呼吸》等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挥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一）认为“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并说这就是马列主义哲学“约瑟夫阶段”的“特质”。（二）“所谓主观，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即是一种能动的用变革创造的方式来制用万物以达到保卫生存与发展生存之目的的作用”。（三）“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详言之，人类并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势力来斗争，而是用真正的主观作用来斗争；也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或自然生命而斗争，而是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质上更高并且中间就有机的统一了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之真正充分实现而斗争的。”（四）

主观作用是为使人类“从这种直接仰赖（自然）的状态脱离开来，反把自然的简单的原体变为更复杂的新的东西，也就是把所需要的而自然中本来没有的创造出来。必须如此，才可以脱离自然的束缚，反而不断战胜自然，以争取无限的生存机会，真正实现了大宇宙的本性——生生不已的‘天心’。而当这生命力在全新的基础上被使用之时，亦即人类屹然出现于大宇宙之日。人类，便是大宇宙的进化力之具现。”这些论点表明，胡风舒芜等人认为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是人们的主观意识支配和决定客观存在，主观作用成了高于一切、决定历史的基本的因素。从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出发，他们在文艺上提出了“主观精神”、“战斗要求”和“人格力量”三个口号，作为文艺的指导思想，认为这就是文艺上的根本问题。

“主观论”出现之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重庆文艺界进行了讨论。一九四八年春，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文章对“主观论”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逐渐揭露了它的实质。邵荃麟在《论主观问题》一文中，首先指出了“主观论”在哲学上的错误。他说：舒芜等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把历史的动力说成“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他们“用一种玄虚‘本性’去代替了社会主观的物质基础，因此把历史上激烈的阶级意识斗争，理解为‘一部分主观作用的反其本性，另一部分主观作用保存并发展本性’的关系”。“用人类求生存的欲望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抽去了社会的具体过程，抽去了阶级斗争，把人类的历史单纯地解释为保卫和发展生存的斗争，其结果自然是历史离开阶级论而走向类似唯生论的道路上去了”。这是他们所有错误的一个中心根源。其次，邵文指出：“主观论”者在文艺上用三个口号“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认为只有解决了作家的主观上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谈到革命文艺的创作。这样，他们对于作家所要求的就“主要不是思想的改造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变，而是强烈的感性机能；主要不是在实践中观察、比较、研究去具体认识他的周围世界，而只是借这种精神力量去进行所谓‘血肉的搏斗’”。“作家的主观问题必须在客观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改造与提高”；而“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要从他们自己阶级走向另一个阶级，这是脱胎换骨的事，决非单纯凭借其原来阶级的感性机能所能解决”。最后，邵文指出：“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大抵是带着一种对现实不满，对旧社会的反抗而走向对革命的追求”。“对于这样的要求，毫无疑问，我们不仅应该肯定它，而且应该引导它到革命中来”。但是，小资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立场是不同的，不要把这种要求“误认为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立场”，“也不要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实践要求，就是与人民相结合的决定因素。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追求或对于工农大众的同情，最初往往是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因此真正和工农大众结合之间还存在着相当距离，如果没有积极的领导和在实践中的改造，则仍然可能停留在空想的追求上，而最后终于碰壁而回。”

胡绳写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林默涵写的《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等，都批评了胡风等人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及其在文艺创作上的表现。

二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

中国出路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斗争中的重大根本问题。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时候，国统区政界、文化

界一部分人又一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以《观察》等杂志为主要阵地，或者往返辩驳，或者只做自己政见的阐述，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

一九四七年九月梁漱溟在《观察》第三卷第四、五期发表了《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认为国民党的大选不过是一场灾难，欧美的“政党分立的选举竞争之一套”，不合中国传统，因此宪政必然失败，“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政治的“正当出路”。接着，张东荪在《观察》第三卷第七期发表《我亦追论宪政兼及中国文化的诊断》一文，表示对梁文“深感共鸣”，并认为中国不能有真正的选举，是由于“有特殊势力在那里利用”，所以，象桔过淮而为枳一样，选举在西方是好东西，在中国就变成坏东西了。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观察》第三卷第十四期发表了樊弘的文章《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他说：民主政治所以在中国屡试屡败，“就是因为中国永远停滞在农业的阶段，无论任何的阶级都不感在维持土地生产力一点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国将来如果不走“资本主义的老道”，就不需要“由资本家阶级所领导的民主”，中国的建设和民主的政治，都要由“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张东荪在《观察》第三卷第二十三期发表《关于中国的出路看法——再答樊弘先生》一文，认为在政治经济制度上世界上有苏联、英国、东欧三种类型，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民主与苏联民主不同，它政治上多党并存，经济上容纳混合方式，土地上实行“合理的再分配”，“这都是中国今后所当取法的”。此后不久，有人在《观察》第四卷第三期发表《宪政和中国文化》的文章，表示坚决拥护“英美型的宪政”，说：“我们必须把这个制度的理想，贯注于我们人民的实际生活，濡染浸淫，使这个制度，能够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纵有错误，我们可以不断的修改，时间一长，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樊弘在《观察》第四卷第七期发表《只有两条路！》一文。他认为在中国的经济上、政治上、人道上、哲学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反动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但叫剥削者阶级自动的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的限他们自己的剥削，于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所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于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中国只有两条路，更没有第三条路。”

一九四八年七月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出版。在本书中他明确而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主张自称为“新型的民主”。这个“新型的民主”，在保留私有财产，各阶级合作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是相类似的，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张东荪只谈保留私有财产，不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领导作用；只谈政治上各阶级合作，不谈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用。同时，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一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偿其十分之一”，并把革命同“换朝代”混同起来，一概加以贬斥，他一再宣传“以增产而求平均”，反对“以再分配而求平均”的主张，这在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的错误都是显而易见的。

当上述的讨论还在进行的时候，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政治团体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该会提出“初步主张”三十二条，并出版《新路》杂志，宣传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政治制度化，

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化”。“法治必须代替人治，……宪政尤重于宪法”。
“国家机关“对人民负法律责任”。确立“文官制度”。“军队属于国家，……
军人不得干涉政治”。“国内应有并立的政党，互相批评与监督，……政党
不得假借任何口实，用暴力压迫异己，民意的最后表现为选举，政权的转移，
应视选举的结果而定”。民主政治“应保障人民基本自由与权利。”“国家
应筹划妥善方法，负责发展国家资源，实现全民就业，促成公平分配，提高
生活水准”。“国家应运用各种合理的政策，积极促进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与
工业化”。“全国土地，以全部收归国有为最终目标，第一步，应即规定私人
农地的最高限度，超过此限度者，应立即收归国有。对于原来地主，给以
长期债券，以为补偿。收归国有的农地，或租与自耕农，或集体经营，视情
形而定。市地应立即收归国有，并酌予补偿”。“国家应即制定现代化的攸
关劳工福利之立法”等等。

这三十二条主张，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纲领，也就是他们的所谓
“新路”。该会以超然的面目出现，宣称只是为了对中国的政治、外交、经
济、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索”。实际上这些主张是抵制中国革命的，
是保护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反动派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眼看就要
灭亡的时候，该会却鼓吹“用和平方法能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武力革
命”。声称“现政府有改善的希望”，已经“走上了行宪的大路”，副总统
的选举，证明“现在的政府已不是一个独裁的政权”。

以上所说主要是资产阶级学者和各阶层政治活动人物的言论。他们大多
数人的政治主张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根本问题上是对立的。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指出的“中国的出路”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这种言论的一
度广泛宣传，表现了他们对这条道路的一往情深。但是过去中国的国情没有
允许它实现，现在是更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三 人民文艺的成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解放区的人民文艺，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遵
循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沿着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继续向前发展，获得了很
大成就。

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前线、农村、工厂，深入工农兵生
活，在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
观，为创造人民的新文艺而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在短短的几年中，创作了一
大批不同程度体现工农兵方向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题材新颖，主题鲜明，
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在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在语言和艺术形
式方面也呈现了新的面貌。许多作品作到了相当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既接
受艺术遗产，又加以推陈出新，创造了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诗歌方面，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李季创作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
是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第一部杰作。作者把穷人的幸福和“闹革
命”紧紧连在一起。长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的选择和锤炼上，都是相当成

炳章：《用和平方法能实现社会主义》，《新路周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出版。

蒙毅：《现政府有改善的希望》，《新路周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出版。

功的。长诗采用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但又有很大的突破。李季以民歌中传神的比兴手法刻画人物形象，而且也以比喻来叙述事件，写人物对话。这就使形象更生动、具体，更有感染力。除《王贵与李香香》外，这个时期重要的诗篇还有阮章竞的《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等。

小说方面，一九四五年冬赵树理写了《李家庄的变迁》，此后还写了几个短篇小说《福贵》、《传家宝》等。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小说集，是描写解放战争初期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柳青于一九四七年写成长篇小说《种谷记》。草明写了《原动力》。欧阳山写了《高乾大》。孔厥袁静合写了《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合写了《吕梁英雄传》。一九四八年，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写了《暴风骤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农村土改斗争的好作品。它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斗争进行中农村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显示了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同时，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去描写，赋予他们各有特色的性格。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相当高的成就。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的全过程。是一部表现人民的历史活动和塑造那些为新的生活理想与新的社会制度而坚强战斗的英雄形象的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农民英雄赵玉林、郭全海等的典型形象，并通过他们的活动和成长过程展示了时代的真实风貌。

戏剧方面，解放区的新歌剧有很大发展。在戏剧舞台上，除《白毛女》继续上演外，阮章竞创作了《赤叶河》，西北战斗剧社集体创作了《刘胡兰》。三幕十二场歌剧《刘胡兰》是根据女英雄刘胡兰壮烈牺牲的事迹而创作的，是继《白毛女》之后，解放区出现的又一部优秀的歌剧作品。

在通讯报告文学方面，刘白羽是一名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家。他的作品，闪耀着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历史光辉，有突出的成就。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先后写了《环行东北》、《光明照耀着沈阳》、《人民历史新的一页》、《横断中原》、《火炬映红了长江》等。此外，有华山的《英雄的十月》、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曾克的《挺进大别山》等等。

在解放区，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也进一步发展。广大工农兵群众由于政治、经济上的翻身，积极参与文艺创作和表演活动，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创造能力。一九四七年，在冀晋（北岳区）搜集的群众编写的优秀剧本就有八十多种，冀中数目更多。同时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农村剧团和新的民间艺人。东北解放区将几个主要的文工团和文艺团体分散在北满农村搞土改，促进了东北文艺运动的发展。农村中广泛开展了新秧歌运动。农民诗歌和诗人也不断涌现出来。部队文艺保持和发扬了过去红军时代的传统，全军上下的“演唱活动”、“枪杆诗运动”和“兵演兵、兵写兵、兵画兵运动”普遍展开，出现了一些战士们创作和表演的反映部队生活、鼓舞战斗意志的优秀作品。人民解放战争后期，由于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工人的文艺运动也随之开始扩大，工人秧歌队遍及各城市、工厂和铁路、矿山。大批文艺工作者也进入工厂，促进了工人文艺的发展。工人的诗歌、戏剧、舞蹈都有不少好作品。

解放区的音乐、电影艺术也有发展。音乐工作者在火热的斗争中创作了不少优秀歌曲。如优秀的作曲家郑律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电影事业方面，在延安和晋察冀均有电影制片厂或电影队，拍摄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纪录片或素材。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一九四七年五月，开始出产纪录片《东北新

闻》等。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先后拍摄了《桥》、《中华女儿》、《赵一曼》等以革命战争和新的人民生活为题材的故事片。

国统区进步的革命的文艺队伍，在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称）领导下，在争取民主、反对美蒋的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都有文艺工作者的参加。有些作家们的诗歌、杂文，成了群众运动中的武器。在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反美、反饥饿、反“戡乱”的群众运动中，文艺工作者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一部分到了香港的文艺工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总目标下进行工作，所起的影响不只限于海外各地的华侨，而且还渗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而到达国统区内的人民大众中间。

诗歌方面，政治讽刺诗的众多是本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一九四六年，生活书店出版了《马凡陀的山歌》，一九四八年又出了续集。

小说方面，有沙汀的《还乡记》，艾芜的《山野》、《一个女人的悲剧》，巴金的《第四病室》，老舍的《四世同堂》等。

戏剧方面，一九四五年冬，上海剧艺社恢复活动并上演了陈白尘的《升官图》。重要的剧作还有田汉的《丽人行》等。

散文方面，有茅盾的《杂谈苏联》、《苏联见闻录》，郭沫若的《天地玄黄》，李广田的《金坛子》等。

在群众运动中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战斗的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跌倒算什么》等。

电影事业是国统区革命文艺界有成就的一个部门。一九四六年六月，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组成联华影艺社，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九四七年五月，该社并入昆仑影业公司，又拍摄了著名的优秀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

一九四九年初，平津解放后，大批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进入北平。不久，许多长期在国统区艰苦奋斗的文艺工作者也陆继到达，再加上原来在北平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就形成了中国文艺大军的胜利会师。

三月二十二日，华北文委和华北文协举行招待在平文艺界人士的茶会。郭沫若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代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这个提议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接着就由原全国文协在平理事和华北文协理事联席会议产生了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四十二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郭沫若任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参加大会的代表八百二十四人。会前，中共中央向大会发了贺电。大会第一天，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词，第五天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对文艺工作者们表示欢迎。在大会上，周恩来做了政治报告，号召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认识中国共产党，学习毛泽东，熟悉工农兵。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傅钟作了《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的报告》。许多代表作了发言。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全国文联。随后又成立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和其他各部门的协会。选举郭沫若和茅盾、周扬为全国文联正副主席。茅盾和丁玲、柯仲平为全国文协正副主席。大会通过了宣言。宣言号召“全国爱国的民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

之下，和全国人民一起，为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人民文学艺术的建设而奋斗”！

第五节 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一九四九年初，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两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即一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七届二中全会。

一月八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将革命进行到底，粉碎美蒋新的和平阴谋和向全国进军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决议对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问题作了估计，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对美帝国主义在革命阵营内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这一阴谋计划，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决议指出：为了保证胜利，我们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还要学习很多东西。决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的十七项任务。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召集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一九四九年“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出席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祖涵、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林彪、康生、李富春、李立三、陈毅、贺龙、邓小平、蔡畅、陆定一、聂荣臻、李先念、邓子恢、谭震林、陈绍禹、邓颖超、王稼祥、王震、云泽等。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全会批准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与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一九二七年以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在乡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但是，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只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

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他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有了它，中国人民就可以“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对党的经济政策，作了理论上和原则上的说明，批评了在这些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他进一步分析说：

第一，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是进步的。由于这一点才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落后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谁要是忽视和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大量的的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轻视和忽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的工业的第二位，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要对它加以限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的限制政策，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的反抗。“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认为不要限制资本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如果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第五，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和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总之，“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对外贸易实行统制政策。

毛泽东在报告中考虑到阶级斗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以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这些适应革命新形势而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措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的报告，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及时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分析了中国的各种经济成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生产建设任务和这个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问题；探讨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毛泽东的报告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二 北平谈判 李宗仁拒签和平协定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表明国民党反动营垒中分化出一个主和派。这个主和派为了达到阻止革命继续前进和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目的，继续进行和平攻势。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发表任代总统文告，表示“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并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他派定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和谈代表；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赞助和谈；一月二十四日，令行政院将“剿总”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被封报馆等；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但是，李宗仁的种种措施，只不过是和平“空气”而已。南京政府的实权仍操在蒋介石及其死党手中。下台前，蒋介石就对反革命战争作了部署：派陈诚、蒋经国经营台湾，派朱绍良任福州绥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余汉谋、薛岳经营广东，张群为重庆绥署主任；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命中央银行总裁俞济时把上海所存黄金银元外汇移存台湾；将国民党中常会移到广州。蒋介石拟借李宗仁和谈争取三至六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一支二百万人的军队。下台后，蒋介石仍以“总裁”名义“以党控政”和指挥“中央军”与特务系统，操纵着党政军大权。他实行孤立李宗仁分化桂系的策略，使李宗仁既不能战又不能和。因此，李宗仁的命令没有一件付诸实施。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一事曾派代表赴台与陈诚商议，经一周之久，毫无结果。在蒋介石操纵下，南京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破坏和平的措施，掀起新的战争鼓噪。一月二十九日，顾祝同密令蒋军，要他们与中共“誓不两立”，进行“长期”战争。二月十

三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特别宣传指示》，要各地的国民党着重宣传“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南京政府又由“呼吁和平”变为叫嚣战争了。

李宗仁仍在做着“和谈”准备。二月十三日，派出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率领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试探，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加入代表团。二十七日，该团带着毛泽东致李宗仁的信返回南京。二月二十日国民党主和派中心人物张治中应李宗仁电邀由兰州抵南京。二十八日，孙科的行政院也迁回南京办公。三月二十三日，何应钦正式组阁（孙科已辞职）。次日，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和谈代表（后又加派刘斐为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组成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南京李何政府为代表团拟定了和谈腹案即“原则性限度”及国防部所拟“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这个腹案的中心意思就是在“八条”上讨价还价，力求“就地停战”和与中共以同等名额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达到“划江而治”实现“体面的和平”之目的。

对于李宗仁的和谈，中国共产党采取宽容与争取的态度。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指出，如果南京政府“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話，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四月一日开始在北平谈判；派定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四月一日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

四月一日，张治中率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抵平。从此，双方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解放军渡江问题交换意见。四月十二日，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周恩来作了概括说明。张治中代表南京代表团，提了四十多条修正意见。十五日晚，举行第二次谈判。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八条二十四款。南京和谈代表予以接受。这个协定在前言中明确了历史的责任，“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接收和改编问题。中共为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国内和平，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也都从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上述协定，中共代表团宣布以四月二十日为最后签字日期。十六日，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带协定飞南京劝李宗仁签字。但是李何政府不肯割断与蒋介石的联系，立即派人将协定送给蒋介石。十九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决定电请中共延长签字日期，继续商谈。实际就是拒绝签字。二十日深夜，李何致电张治中要他们向中共提出“成立临时停战协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张治中将电文转给中共时，已是二十一日上午九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中共对李宗仁一再进行争取，考虑到他的处境，劝其来平或在桂林签字，更劝他离京后万不可去广州。李济深的代表朱蕴山等也从旁相劝。但是，李宗仁终于未能这样做。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谈代表团由于中共的诚意挽留，他们又看到人民胜利的历史已成定局，故均未南返，以后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三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和向全国进军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国民党一面发动“和平攻势”，一面部署江防。蒋介石调集残余陆军一百一十五个师，海军第二舰队，二百八十多架飞机，共约七十五万余人的兵力，担任宜昌至上海一千八百多公里的长江防务。以汤恩伯为江防总司令，以九江为界东西两段分由汤恩伯白崇禧指挥防守。

与粉碎敌人“和平攻势”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完成了渡江南进和其它新攻势的一切准备。李宗仁拒签和平协定之后，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地区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全面大进军。

四月二十一日晨，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中路军三野第七、九兵团，首先突破了敌人安庆芜湖间的防线，进占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接着西路军二野第三、四、五兵团，于二十一日下午，在贵池湖口间突破敌人的防线，占领了东流、彭泽、至德、殷家汇、贵池等南岸阵地。与此同时，东路军三野第八、十兵团也发动了渡江攻势，歼灭和击溃了顽抗之敌，占领了扬中、镇江、江阴。地下党领导江阴要塞国民党官兵举行起义，控制了江阴要塞，封锁了长江。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英国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竟然侵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线，与国民党军舰共同炮击人民解放军，打死打伤战士二百五十二人。解放军当即予以猛烈还击。英舰紫石英号负伤搁浅于镇江附近，其他三艘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至此，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千里江防全线崩溃。

四月二十三日晨，南京政府如鸟兽散，伪总统府和行政院逃往广州，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当晚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反革命统治的中心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写道：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南京解放后，解放军各路大军向南挺进，猛追穷寇。三野主力，以由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向杭州溃退的敌军为追击目标，从逃敌的两翼施行平行追击和迂回包围，截获逃敌十四万余人，乘胜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二野主力，以向浙赣线溃退的刘汝明等两个集团军为追击目标，分成多路，齐头并进，截获逃敌十万余人，于五月上旬陆续到达浙赣线，控制了南昌以外的主要据点，并向浙南、闽北、赣中追击逃敌。

汤恩伯所属部队，除大部在人民解放军追击中被歼灭外，其余八个军二十多万人，盘踞淞沪地区。蒋介石要汤恩伯死守上海六个月至一年，幻想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帝国主义保护下重新统治中国。为了彻底歼灭残敌，抢救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五月十二日，三野主力发动了淞沪战役。

在地下党和上海人民支持下，经过十六天的战斗，于二十七日解放了中国的最大城市、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汤恩伯率残敌五万人向舟山群岛逃走。六月一日崇明岛解放。

五月十四日，第四野战军先遣队第十二兵团和鄂豫、江汉两军区的部队，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十六、十七日解放了华中重镇汉口、汉阳和武昌。第二野战军为迎接第四野战军渡江作战，于十七日解放九江，二十二日解放南昌。

自四月二十一日横渡长江至五月二十七日淞沪作战结束，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城市一百二十余座及苏、浙、闽、皖、赣、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地区，歼敌四十余万人，为进军华南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华北人民解放军于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先后肃清了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敌人残余据点，歼敌十六万八千余人，最后解放了华北全境。西北人民解放军于五月二十日解放了西安及渭水流域，歼敌两万七千余人。

渡江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北、西南、华南进军，全部歼灭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

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华东大部地区已获解放，只有浙江部分地区和福建大部地区尚为残敌窃据。一九四九年五月，三野第七兵团以杭州为中心，分三路向宁波、象山半岛、海门、温州沿海进军。至七月上旬，除定海外，浙江全省解放。三野第十兵团在解放上海后，接替二野在福建的战斗任务。八月上旬至十月中旬，进行了福州战役和漳（州）厦（门）战役。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十月十七日，解放厦门。至此华东全境解放。解放军进入致力于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

在西北地区，第一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转属的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于七月十一日开始了解放西北各省的作战。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强大军事攻势和政治争取下，九月十九日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宣布起义，归绥和平解放。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先后通电起义。十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王震兵团进驻乌鲁木齐，新疆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国民党残余部队大部猬集于华南、西南。白崇禧集团据守湖南广西，余汉谋集团据守广东，胡宗南集团和川、滇、黔等省地方军阀据守西南。这几个集团的军队总数在百万以上，并互相勾结，组织所谓湘粤联防和西南防线，妄图负隅顽抗，等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如果上述计划破产，则退往云贵，最后在无法存身时逃亡国外。

为了彻底消灭这些敌人，毛泽东指示解放军在继续进军时，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在作战部署上，以二野第四兵团与四野第十五兵团等部，由江西出广东，占领广州歼灭余汉谋集团后，继续迂回白崇禧部，以四野主力在第四兵团配合下，聚歼该敌于广西境内。然后西出昆明，解放云南。令二野主力于解放广州后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通路。以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一个军，由秦岭地区南下，会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于四川盆地。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野对白崇禧集团发动强大攻势。白崇禧所部桂系军队自长沙地区南逃。八月四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

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九、十月间，四野在湘南衡阳宝庆地区发起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主力一部。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自赣粤边境南下，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十月二十六日，在阳江阳春地区歼灭了企图逃往雷州半岛的余汉谋集团。十一月初，四野和二野第四兵团分三路向广西进军。西路沿黔桂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南路进入粤桂边境，防敌逃往海南；中路由湖南南下。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桂林。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白崇禧系国民党军及其指挥下的蒋军一部，除少数逃入越南外，全部被歼。

广州解放后，国民党的流窜政府逃往重庆，人民解放军二野主力和华北十八兵团及四野一部，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了大西南围歼战。二野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一部由湘西进入贵州，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接着分由遵义毕节向川南兜击。二野第三兵团及四野一部由川鄂边境向川东南进击。于十一月下旬从彭水突破乌江，进迫重庆。两路大军于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之后向成都急进。并以一部迅速向东山、大邑、邛崃一线迂回，切断胡宗南退入西康的逃路。与此同时，屯兵秦岭的华北十八兵团分兵三路入川，将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数十万人紧紧压缩到成都地区。在解放军胜利进军下，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分别在昆明、彭县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十二月十日蒋介石由成都逃到台北。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解放，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集团及退集成都地区的其他残敌，全部被歼。至此，全国大陆除西藏外，都解放了。

总计，人民解放军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三年作战，共歼灭（包括毙伤、俘虏、起义、投诚、和平改编）蒋军五百六十九万余人。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共歼敌六百二十五万余人。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海南岛解放，共歼敌八百零七万一千余人。解放军在扫荡残敌过程中，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 各人民团体的建立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

随着人民战争的胜利，各界人民团体纷纷建立和扩大。过去被分割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团体也统一起来。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在哈尔滨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共五百八十一人。他们代表着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二百八十三万余人。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定恢复全国工人阶级统一的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选出了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全国工人阶级组织上的统一和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标志着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中共中央就提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试办。一九四八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成立团中央机构。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二月，成立了以任弼时为首的全国筹委会。四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有团员十九万人。大会通过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纲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选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并决定出版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的成立，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月一日，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的决议，选出了全国领导机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委会，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学生组织。

三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五月四日至十一日，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七月，召开了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七月十三日，召开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筹备会议，十四日，召开了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发起人会议。二十三日，召开了中华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都讨论了各自的任务和成立了筹备委员会。

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大会和筹备会议的召开，说明了在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形势下，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加强，为新政协的召开和取得重大成果准备了条件。

一九四八年夏天，新政协运动展开之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并准备北上进入解放区。中共中央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欢迎和安排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周恩来一面派人到大连接待，一面派人以救济总署特派员身分去香港协助当地党组织安排民主人士和知名人士浮海北上。一九四八年九月，民主人士陆续从安东，大连分途进入东北解放区。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代表与到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经过协商，就新政协的性质任务达成了协议。决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号召的二十三个单位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起草筹备会组织条例，同时确定了新政协参加范围、召开时间和共同纲领的制定等问题。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朱学范、陈其尤等五十五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他们表示对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实现人民民主联合政府”，“愿在中央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他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对象，必须彻底廓清。美蒋策动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摧毁。他们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二月二十五日，沈钧儒、李济深等三十五人由东北到达北平。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有二十三个单位，一百三十四人参加。这次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等文件，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选举李维汉为秘书长（后由林伯渠代理）。在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小组，加紧进行各项具体筹备工作。九月十七日，召开了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基本通过了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

纲领草案、政府组织草案。因起草宣言和国旗、国歌、国徽建议案工作没有做完，会议决定将这两议案移交政协第一次会议解决。这次会议还决定将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确定政协参加单位代表名额及人选是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经过三个月协商和研究，最后决定：党派代表十四个单位，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候补代表二十三人；区域代表九个单位，正式代表一百零二人，候补代表十四人，军队代表六个单位，正式代表六十人，候补代表十一人；团体代表十六个单位，正式代表二百零六人，候补代表二十九人；特邀人士宋庆龄等七十五人。总计五个方面共有代表六百六十二人，包括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民主阶级、各界各民族的代表人物。这样广泛的代表性，就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

至此，建国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五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

将要成立的新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各个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国家的内外政策、前途是什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筹组过程中提出的急需回答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正在制造混乱，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党内外有不少人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有着不同的观点、主张和要求。有些人力图否认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要与共产党“轮流执政”。有的人主张对反动派施“仁政”，对帝国主义不要太“刺激”，幻想英美政府的“援助”，实行“协和”外交政策。面对这种种情况，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明确阐明自己在政权问题上的观点和基本纲领，以便澄清人民当中的错误思想，回击反动派的攻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准备。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依据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为讨论新国家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基本的依据。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途和国家消亡问题，表明了共产党人在阶级、政党、国家政权问题上的根本观点。他说：阶级、国家政权、政党在将来都是要消灭的。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是促使这些东西消灭的条件。达到大同境界是人类进步的远景。这就向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国家政权的目的是大公无私的，不是为少数人的狭隘的利益的。这也就从根本上驳斥了认为共产党人“自私狭隘”和把共产党领导与国民党一党专政混为一谈的荒谬观点。

接着，毛泽东论述了中国人民如何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指导思想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他从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深刻阐明了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就向西方寻找真理。但是，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找到了中国的出

路。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道路。

毛泽东批判了在国家政权问题上的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观点。

毛泽东论述了民主和专政这个中心问题。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成自己的国家，向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现在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它是暴力，不是“仁慈”的东西。在人民内部则使用民主的方法，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对于反动派则是把他们打倒以后，对反动阶级中的个人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

毛泽东重申了人民内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但是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因为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毛泽东总结了我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指导思想。

六 美帝侵华的失败和白皮书的发表 对白皮书的批判

南京政府的垮台，表明美帝国主义侵华援蒋政策的彻底失败。但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还坐着不动，企图继续进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活动。只是在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后，才离开中国。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司徒雷登还在离华返美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公布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把他七月三十日写给杜鲁门的信，作为该书序言一起发表。司徒雷登离华，白皮书发表，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胜利仇恨恐惧而又无可奈何的表现。美帝援蒋的失败，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关于失败责任问题的激烈争吵。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反对派攻击和责难当权的杜鲁门艾奇逊等没有给蒋介石更多的援助，致使美蒋失败。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杜鲁门一派突然摊牌，公布了若干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真实材料，作为替自己辩护的根据。这样，白皮书在客观上就成为美帝侵华罪行的自供状。

白皮书正文有八章，另有一百八十六个附件（实为二百三十三件）。它叙述了从一八四四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至一九四九年中国全国

基本解放期间的中美关系。特别评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遭到失败的经过。

当时，中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存在着幻想。白皮书的发表，是教育这些人的好时机，白皮书是难得的反面教材。为了揭露美帝侵华政策的实质与特点，为了教育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新华社从八月十二日至九月十六日，接连发表了对白皮书的六篇评论。除头一篇《无可奈何的供状》外，其余五篇都是毛泽东写的。

毛泽东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并阐明了反动派和人民的两种根本不同的逻辑。他指出：自一八四一年以来，美国就是侵略中国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间，“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藉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当前美帝侵华政策虽然破产了，但他们还要继续捣乱。毛泽东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毛泽东解释了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他用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阐明了：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为自己准备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遭受失败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

艾奇逊歪曲中国近代史，把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归之于“人口过多”和“西方的影响”。毛泽东驳斥了这种谎言。他指出：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这就是侵略。帝国主义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人曾经学过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共和国方案等，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但是失败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改换了方向，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解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完全是歪曲。

艾奇逊的观点也正是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批判了艾奇逊也就教育了民主个人主义者。

上述评论，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谈话或评论文章，谴责和批判白皮书。八月二十三日民盟发表了《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一文，说：“艾奇逊函中所谓鼓励‘民主个人主义’者来推翻‘外来制度’，这就是另找奴才，以华乱华的阴谋。”这本白皮书，“使中国知识分子把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司徒雷登们在中国唱卖的西洋镜完全看穿。即令还有对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亦必为这本白皮书所唤醒”。“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必能站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来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八月二十四日，民建负责人在谈话中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打击，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几乎保全了‘民族’，就有丧失‘资产’的危险。可也正是这样的考验，改造了、提高了中国民族资

产阶级的品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和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参加了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费孝通，以自己对人民民主的亲身体验批判了白皮书和资产阶级民主。他说：“我过去所了解的民主是形式的不是本质的”，“是抽象的，形式逻辑的，不是辩证的。民主了，这个社会就不包括专政，两者不能同时并存”。这种错误认识，这次代表会议“给我解除了”。“白皮书里口口声声说中国已经进入独裁政治”。“真巧，太平洋那端闭了眼睛混说的时候，太平洋的这一端却在事实上答覆了中国是不是已走上了民主的道路。我可以做见证：在我们开步走的时候已经超过了美国现有的民主程度”。

中国人民对白皮书的评论，是从政治思想上对美帝长期散布的恶劣影响的一次大扫除，也是对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一次清算。这场批判，为新中国的诞生准备了思想上的条件。

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五十四发礼炮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由毛泽东主持隆重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民的盛会。六百六十二名代表，济济一堂，显示了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九月二十七日，代表们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九月二十九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九月三十日下午，进行了两项选举：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一百八十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六十三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贺龙、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陈云、邓小平、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电和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办法及碑文。会议还作了以下四项决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北京。（二）采用公元纪年。（三）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

为国歌。（四）国旗为五星红旗。下午六时，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说明“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决定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然后全体默哀。哀毕，毛泽东宣读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奠基时，毛泽东及各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铎铲土，以示崇敬先烈。奠基礼成，代表们又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报告。当会议主席宣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代表一致起立欢呼万岁达数分钟之久。而后由选出的主席副主席主持举行闭幕式。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他指出：“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会议在军乐队演奏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胜利闭幕。

大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除序言外，有七章六十条。在“序言”中，宣告了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时代的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各章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率。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实行民兵制度。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份，使之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文教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外交政策，以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原则。

大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了人民政协是全国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政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商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一个创造。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宣布就职。委员会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会议责成他们迅速组成各个政府机关并开始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发表公告，向世界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和遵守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十月一日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乐队奏国歌。毛泽东主席开动电钮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上二十二米高杆。这时在军乐声中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接着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随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读毕，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为阅兵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为阅兵总指挥。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种部队后，回到主席台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受阅各步炮骑兵部队由东向西分列经过主席台。人民空军的十四架飞机在会场上空飞行受检阅。阅兵式达三小时。晚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红灯的海洋。举着红灯游行的群众通过主席台时高呼：“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扩音器前大声地回答：“同志们万岁！”并不时地向群众挥手致意。晚九时二十五分，游行队伍全部通过主席台。红灯队伍火龙似地穿过全城。首都二百万人民沉浸在狂欢之中。庆祝人民的新中国诞生的狂欢浪潮随即扩展到祖国的各个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数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多年以来的帝国主义侵略，二十二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一齐被中国人民葬入了坟墓。广大人民受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过去了。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又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使世界殖民体系遭到致命的打击，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促进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表明：（一）买办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是不可能稳定的，是必然要被推翻的。这由几方面的情况所决定：第一，北洋军阀也好，国民党新军阀也好，从来没有在全国建立过真正统一的政权。军阀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因此大大削弱了整个统治营垒的力量。第二，这个政权是严重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破坏和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违抗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的。这是它最根本的弱点。第三，这时的反动统治面对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这个革命的浪潮是不可阻挡的。这就决定了整个反动统治最后必然归于消灭。（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是一

个不能实现的空想。虽然民族资本主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一定的比重，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思想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为实现他们的理想进行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由于国内国际条件的不允许，他们鼓吹多年的中间路线最后只有破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愿望一天也没有实现过。（三）只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上面三条道路、三种国家命运经过激烈斗争，而由人民共和国道路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面临着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是许多先进人物和革命志士所梦寐以求的。中国近代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破坏、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从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条道路破火了；中国共产党主张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法，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人民共和国，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国家的现代化开辟道路创造前提，只有这条路走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只有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挫折和最后成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旗帜。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域广大的、历史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取得的。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它是世界上规模大、过程长、斗争环境复杂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基本经验，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能不具有很大的普遍性。